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英〕拉尔夫·密里本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英] 拉尔夫·密里本德 著

沈汉 陈祖洲 蔡玲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 Ralph Miliband 1969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ress, London, 1969.

根据英国伦敦韦登菲尔德和
尼科尔森出版社 1969 年版译出



1969年10月

译者的话

拉尔夫·密里本德(1924—1994)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是“工具主义”政治学流派的代表人物。1924年1月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华沙的皮革业手工工匠,后来参加了犹太人同盟,是一个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有觉悟的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受贫困、无秩序和以后的专制主义统治所折磨,大批波兰人移居国外。拉尔夫的一个舅舅参加了托洛茨基指挥下的苏联红军。1922年,拉尔夫的父母先后离开华沙,以后移居布鲁塞尔,一年后他们结婚,后生下了拉尔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取得政权后,把纳粹主义影响散布到整个欧洲。当时年仅15岁的拉尔夫积极参加了犹太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自卫军”。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以后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时期,拉尔夫认识了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的本质。他的一位挚友,后来被绞死的莫里斯·特兰送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以后他在政治活动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1940年夏季,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铁蹄开始蹂躏比利时。拉尔夫和他的父亲步行到奥斯坦德,找到一条船逃到英国,他的母亲和妹妹仍留在比利时。她们在抵抗组织的帮助下得以在法西斯迫害下幸存。战后他们一家得到团聚,但这个大家族在战争期间有43人死于纳粹之手。残暴的法西斯主义在拉尔夫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拉尔夫·密里本德16岁进伊林技工学院,当时他父亲在搬家公司工作,家境贫寒,只住一间房子。1941年他进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结识哈德罗·拉斯基并受拉斯基很大的影响。他在

1942年经拉斯基介绍以比利时公民身分加入英国海军,在军舰上服役3年,对德军进行无线电监听。1945年离开海军回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在那里取得第一等的成绩和博士学位,他的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是《1790年代法国的社会主义观念》。拉斯基对他的论文极为满意。拉尔夫·密里本德毕业后先在芝加哥罗斯福学院任教,以后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讲师。1968年“五月风暴”波及伦敦时,他给予伦敦经济学院学生发动的学潮以原则上的支持。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直到1972年。从1972年到1978年,他在里兹大学任高级讲师并担任政治系主任,后升任教授。1978年以后拉尔夫·密里本德为北美一些大学聘为教授,先后在布兰德斯大学、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部任教授。从1964年起,他便是《社会主义记事》的编者之一。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注意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1994年拉尔夫·密里本德因心脏病逝世。密里本德生前和中国学者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在本书之前,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了密里本德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年英文初版,中译本1983年出版)、《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1983年英文初版,中译本1988年出版)。密里本德还著有《议会社会主义:工党政治研究》(1961年)、政论集《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1983年)。密里本德的政治学著作中最重要的当数这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它系统地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权力运行中诸特征的见解,奠定了密里本德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工具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地位。

密里本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于1969年出版,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著作中较早问世的一部。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前,在西方政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各种资

产阶级政治学流派,如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流派都还有相当的影响,“多元民主”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很流行。另一方面,在葛兰西之后,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专门对政治学理论进行研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政治学的内容又显得不系统和薄弱,更无法反映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情况和动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亟待发展。再则,1956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面对国际范围内“冷战”的问题、国与国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民主和集中的问题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作为一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里本德关注着这些问题,他的一些看法也在这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中流露出来。可以说,密里本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一部在许多地方具有论战性的著作,他是在与西方各种正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流派的论争中来阐述自己对西方国家的见解的。这几年国内译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的著作不少,现在把密里本德的这部书翻译过来,可以便于我国读者比较分析各派的方法和见解,以得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全面的认识。

密里本德在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它们都有庞大的、极其复杂的、高度统一的、技术非常先进的经济基础,工业生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其次,它们大部分经济活动资料都为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占有并控制着生产资料的阶级,由于他们掌握了经济权力,所以能够使国家作为他们统治社会的工具。大多数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形成了被统治的工人阶级。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各种各样的“中间阶级”,但是这些国家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与出

卖劳动力的被统治阶级的对抗,形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这两支力量相对抗的过程。

密里本德在评述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政治学流派时指出,晚近几十年间关于政府、公共行政、统治精英和官僚、政党和选举行为、政治权力和政治稳定的条件、政治流动和政治文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它们对于国家的性质和作用都注意得不够,它们尤其在论及国家时很少注意到权力问题。密里本德强调指出,“一种国家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和在这个社会中分配权力的理论”。^①他还反对了那种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以假设西方社会中权力是通过竞争,破碎而扩散开来为出发点”的理论,以及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只存在着竞争的利益集团,这种由国家批准和承认的竞争使权力处于散漫和均势状态,而且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能够对国家施以重大压力”的观点。^②密里本德认为,“尽管各种各样关于权力精英的理论是如此精巧,但对于权力的多元民主论最重要的替代理论仍然惟有马克思主义一家。”^③

密里本德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社会构成问题,即国家精英的构成问题。密里本德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业界人士参与了国家事务,他们的代表进入了政府部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构成国家精英整体中的主要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准确地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与前工业阶级、贵族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比,他们并没有构成一

① 见原书第2页。(原书页码系本书边码,下同。——编者)

② 见原书第3页。

③ 见原书第5页。

个‘统治’阶级。”^① 在此同时，“一种社会淡化过程已经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出现，并且已经使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士，甚至更多的出身于中等阶级下层的人士，取得国家体制内部的精英地位。”^② 他认为，从附属阶级中补充国家制度的上层，通过他们进入国家制度的上层，使他们成为持续统治的阶级的一个部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化”，而是对新加入统治集团的来自其他阶级的人士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讨论是本书的另一个中心论题。作者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容忍广泛的文明和政治自由；它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在文明社会的许多领域有助于缓和阶级统治的形式和内容，但这种缓和作用并没有取消阶级的统治，相反作为一种代价有助于保证这种统治。^③ 在讨论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各种观点时，密里本德指出，“如果有谁相信并宣布说，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不充分并持续不断地遭到侵蚀威胁，因此它们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是危险而混乱的。就它所有的巨大的局限性和伪善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和专制主义，特别是和已证明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④ 密里本德就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立场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被社会主义者批评之处不是（或者说不应当是）它们无关紧要，而是它们极其不完善，需责备它们机能不全和有腐蚀作用，因此需要在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上进行激烈的改造以扩展它。”^⑤ 他指出，“历史地看，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是扩大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特征

① 见原书第 59 页。

② 见原书第 64 页。

③ 见原书第 266 页。

④ ⑤ 见原书第 267 页。

的主要推动力。”^①

密里本德在这部著作中还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特征。他指出，“可以在所有这些国家发现，数量相对来说较小的一部分人拥有明显不相称的个人财产。”^②“再则，在这些国家中，社会阶梯的另一端为一个工人阶级所占有，它主要由工业劳动者和正在日益减少劳动力组成部分的农业工资收入者组成。换言之，在这些国家中，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雇主和产业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集约社会为一方，以前工业化社会和‘第三世界’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主要的不同之处。”^③密里本德极为重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等阶级的研究。他指出，“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都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并且正在增大的职业人群——律师、会计、中等董事、建筑师、技术人员、科学家，行政官员、医生、教师等——他们构成了‘中等阶级’两个主要成分之一”。“这个‘中等阶级’的另一个成分是和中小企业相联系着”，一些雇用了少数工人的实业家和“一些小的或中等的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农场主也属于这个阶级”。^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个由自我经营的小商、技工和工匠构成的阶级仍然远未灭亡，事实上，尽管存在着报酬通常很低而辛苦和使人烦恼的忧虑却时时不断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历史上持续存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小规模经营者（小实业家也同样）不屈不挠地抵制为其它被雇用者等级所吸收。”^⑤密里本德还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谱系与第三世界国家作比较。他写道：“如果以

① 见原书第 272—273 页。

② 见原书第 15 页。

③ 见原书第 16 页。

④ 见原书第 17 页。

⑤ 见原书第 18 页。

这些国家为一方,以非工业化或集体主义国家为另一方作比较的话,这就非常明显了。这样,许多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的阶级也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小实业家和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或产业工人。但是,正如已经提到的,它们在那里很明显占有完全不同的比例,例如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或者在大企业主(在那里除了外资企业,他们也完全存在)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一个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阶级,在非工业化条件下只占很小的部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些在前一类国家中只占从属地位的阶级——如地主和农民——常常在后一类国家中成为社会综合体中主要成分。”^①

密里本德对于西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这些见解极为重要,值得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和社会史的学者和读者注意。

沈 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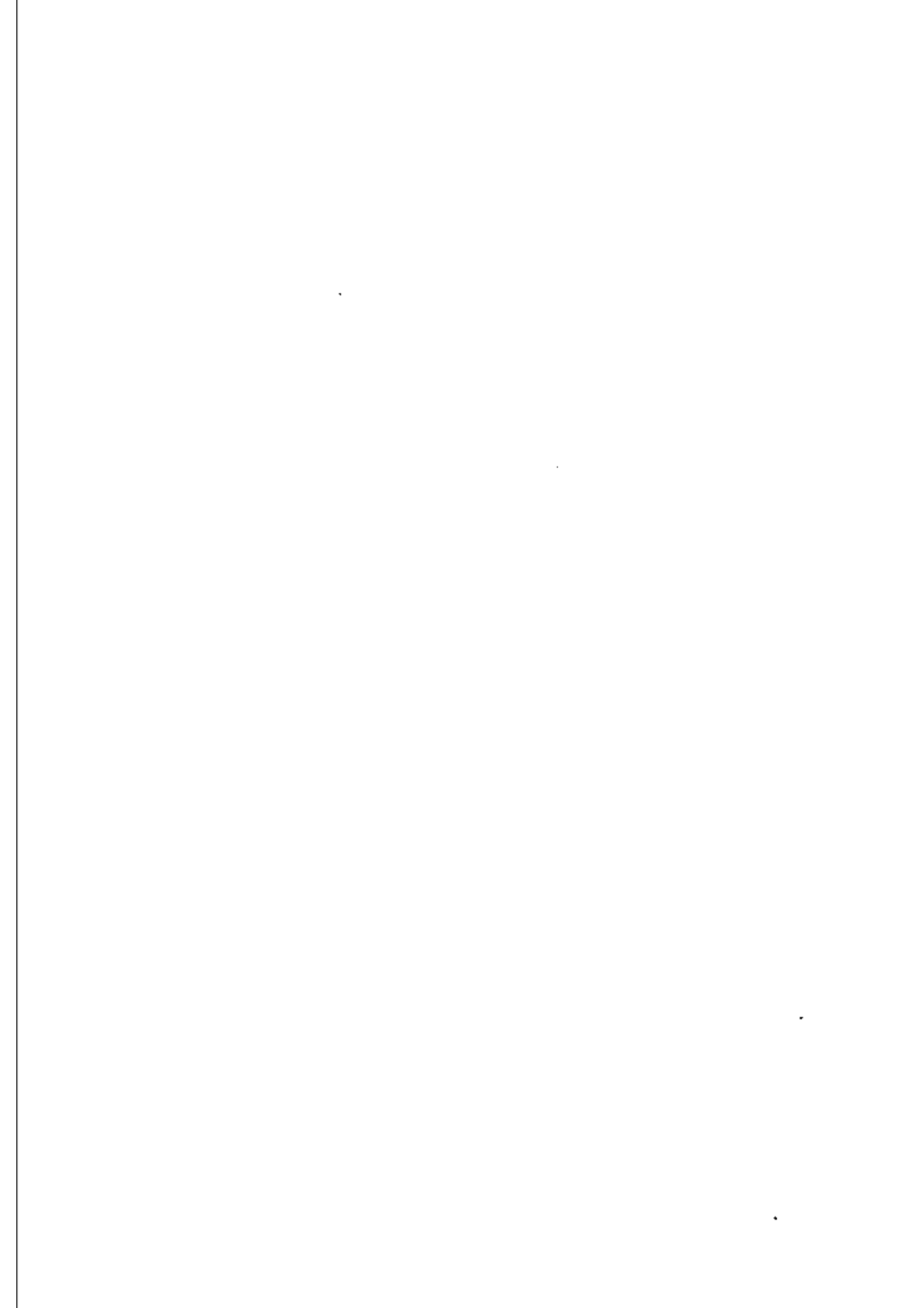
1994年3月于南京大学

^① 见原书第20页。

目 录

| | |
|---------------|-----|
| 前 言 | 3 |
| 第一章 绪论 | 5 |
| 第二章 经济精英和统治阶级 | 27 |
| 第三章 国家制度和国家精英 | 54 |
| 第四章 政府的意向和作用 | 73 |
| 第五章 国家的雇员 | 124 |
| 第六章 有限的竞争 | 150 |
| 第七章 合法化过程(一) | 182 |
| 第八章 合法化过程(二) | 221 |
| 第九章 改革和镇压 | 265 |

为了纪念 C. 赖特·米尔斯



前 言

ix

正如本书标题所表明的,这是一本关于现在常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性质和作用的著作。由于在绪论中所解释的一些原因,我认为,尽管这些社会多种多样,它们仍有足够的基本共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家在其中所起作用的一般条件。其他类型的社会也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与国家有关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准备论及了。

这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主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特征的概览。第二章,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发现的经济权力的模式。第三章,概略地记述了“国家制度”主要的机构设置和“国家精英”的社会构成。第四章,讨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的意向和作用。第五章,考察了文官、军人和司法所起的作用。第六章,讨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利益”竞争中国家的作用。第七章和第八章,涉及的是各种各样的“合法化力量”,如政党、大众宣传媒介和教育。最后,第九章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运行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想法。

我对友好地审读过本书文稿并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的下列朋友和同事表示感谢,他们是:厄内斯特·盖尔纳、H. G. R. 格里夫 x 斯、J. A. G. 格里菲思、W. L. 古兹曼、马塞尔·利布曼、罗伯特·卢克、约翰·萨维尔、约翰·韦斯特加德和厄内斯特·沃尔格姆斯。我要对我妻子表示最大的谢意,她的批评和支持鼓励是极其宝贵的。

我还要感谢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研究部,它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了安娜·马尔库斯小姐在 4 个月的时间里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

帮助的服务,感谢安娜·马尔库斯小姐在那一段时间里为我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感谢路易斯·拉比诺维兹基金会使我能取得假期,免去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感谢林达·斯诺登夫人以极大的耐心和技巧一再为我打字;并感谢不列颠政治经济科学图书馆馆员的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本书表达的观点富于论辩性,我对文中表达的一切负责。

拉尔夫·密里本德

伦敦经济政治科学院

1968年7月

第一章 绪论

1

—

现在人们的生活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多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无论他们现在希望取得什么成就,大抵都得依靠国家的许可和支持。但是,由于这种许可和支持并不是不加区别赐予的,人们必须甚至是非常直接地寻求影响和决定国家权力的意向,或者干脆试图把它占为己有。为了引起国家重视或者说为了控制国家,人们展开了竞争;这就要搏击社会冲突的风浪从而危及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人们不仅是与人相对抗,还在与国家相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说,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不曾意识到,他们既是社会人又是政治人。很可能人们对国家在做什么不感兴趣;但是人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在目前这个时代,下述观点具有全新的绝对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某一天在核战争中化为尘埃,那是因为以他们的国家的名义并被授权行动的人们,自愿作出这种错误决定的结果。

然而,本书所讨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和活动的极度膨胀已成为政治分析中一个绝对的口头禅,一个显然自相矛盾的看法是,国家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研究的客体,长期以来对它的看法一直是非常陈旧的。在晚近几十年间,关于政府、公共行政、精英和官僚、政党和选举行为、政治权力和政治稳定的条件、政治实2
践和政治文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论及或涉
及国家的性质和作用。但是,作为一种设置,它在晚近得到的注意

远比它应得到的重视少得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写道:“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作为一种概念在政治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注意。”^① 然而,这种在论及国家时考虑到权力的观念,现在看来已经为致力于西方政治制度领域研究的“政治学学者”逐渐接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始终没有通常称作“国家理论”的东西。相反,恰恰是他们提出的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比较轻视作为政治分析核心的国家。根据那种用于解决问题的理论,某些按照惯例被认为是关于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任何关于国家在西方类型的社会中的性质和作用的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实际上被置之不理。

一种国家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和在这个社会中分配权力的理论。但是,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学者”就其著作来看都倾向于以假设西方社会中权力是通过竞争,破碎而扩散开来作为出发点:任何人都(直接地或通过有组织的团体)拥有一些权力,但没有人拥有或能够拥有太多权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市民享有普遍的、自由的和规定的选举权、代表制度、包括言论、结社和表示反对的自由在内的实质性的市民权利;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法律、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政治文化保护下,都能充分地行使这些权利。

这种意见的结论是,一个代表国家根据竞争的利益所希望和要求的来行动的政府,不会在不太长的时期中遭到失败。结果是包括那些排在队伍最后面的人在内的任何人都得到满足。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多元论者的话来说,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居民中
3 所有积极的和合法的群体都能使他们自己在作出决策的最严峻的

^① D. 伊斯顿:《政治体系》,1953 年版,第 106 页。

阶段表达的意见得到重视”。^① 达尔曾指出,其他的多元论作者“……假设在政治决策时有一系列有影响的中心;实业家、工会、政治家、食利者、农场主、选民和许多其他的集团都对决策结果施加影响;那么,这些集团中就没有哪一个对所有的意向持一致态度;他们中每一个都在某些范围内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其他许多方面的影响则微弱得多;而用权力否决不合乎其要求的选择较之用权力直接作出决定更为普遍。”^②

另一个批评多元化论点的作者根据美国的情况作出下列总结:

国会被看作是全国各地的利益集团通过两个大党或者直接通过院外活动集团施加压力的焦点。政府颁布的法律是通过无数参与立法的力量而制定的。全面地说,国会只是反映了这些力量,把他们结合在单个的社会决策中,或者用物理学家的话说,是把他们‘溶解了’。一旦私人利益的力量和方向发生变化,那些大的利益集团——劳工、大实业家、农业——的组合和活动也相应发生变化。政府的风标缓慢地适应着舆论风向的转变。^③

这种观点是基于美国的情况并在美国得到极其广泛的阐述。但是,在所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它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支配着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以及政治生活本身。这种观点的第一个结果是通过定义排斥了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中特殊的掌权阶级的见解。在西方社会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只存在着竞争的利益集

① R. A. 达尔:《民主理论导论》,1965年版,第137—138页。

② R. A. 达尔:《对实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潜势》,1959年版,第36页。

③ R. P. 沃尔夫:《纯粹宽容之批评》,1965年版,第11页。

团,这种由国家批准和承认的竞争使权力处于散漫和均势状态,而且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能够对国家施以重大压力。

- 4 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承认,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行政、自由职业的和和其他权力的金字塔顶端,都存在着精英集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精英全然缺乏把他们转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内聚力度。事实上“精英多元论”和不同的精英之间进行的竞争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弥散和非集中化的一个首要的保证。

简而言之,遭到来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大量的相互冲突压力的国家,无法持明显的偏见支持某些人而反对另外一些人:事实上,它的特殊作用只不过是进行调解,使他们和解。国家在发挥这种作用时,仅仅是作为社会对它本身支持的一面镜子。反省不可能永远使人愉快,但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为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民主、竞争和多元政治,付出这种代价显然是值得的。

这种在西方式社会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多元论的观点,并不杜绝对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批评,这也许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批评和对改革的倡导,主要是遵从改进和加强其基本“民主的”和令人向往的特性已经确立但有待巩固的制度这样的原则。然而,对这种制度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看法,如认为它已经是“民主”社会,因此,“统治阶级”和“权力精英”的概念对它根本是文不对题。

这种流行的正统主义的力量有助于把这些要求(因为它们不超过要求这个范围)转变为政治知识固定的条款;冷战酿成的观念和政治气候倾向于对那种知识不仅在政治才智上同时在政治道德上进行考验。然而,一般地接受一种特别的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并不表明它就是正确的。这部著作的主要意图实际上是要详细地说明,在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对于它的社会、政治和国家的

那种多元民主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远未提供一种对于现实的指导意见，却造成了一种对于现实的深刻的困惑。

尽管各种各样关于权力精英的理论是如此精巧，但对于权力 5 的多元民主论最重要的替代理论仍然惟有马克思主义一家。值得很好讨论的是，在 1945 年以后迅速发展的特别是在美国出现的多元民主政治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需要迎战在这个领域内比世袭的政治科学看来更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分析长期以来一直有着明显的欠缺。在这里同时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多元论则完全走上了一条歧途。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分析，特别是在与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有关问题上，看来则是长期固持着自己的错误道路，并且一直难以自我更新。

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本人，他从未试图系统地研究国家。他在 19 世纪 50 年代撰写的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中曾希望包括这一部分内容，但是这个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这就是《资本论》的第 1 卷。^① 不管怎样，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始终反复地提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国家；至于他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对于国家的全部主要观点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公式化的表述来概括：“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这一概念具体化地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一再出现；尽管他们在讨论国家时常常有细微的修改或限定——值得提出的是他们认为国家可以有“例外的情况”^③ ——但他们从未离开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

① 见 1858 年 2 月 22 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和 1858 年 4 月 2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见《通信选集》，莫斯科版，日期不详，第 125、1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3 页。——译者

③ 见原书第 93 页。

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机器,它本身为它的所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限定。^①

- 6 一般说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命题始终多少有些自信地感到满足;他们把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作,而且它在本质上不过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主要观点的一种精巧的重复,以及对它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有效性作了某种断言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论述作为他们关于国家的教科书^②。自那以后,对于国家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对于这个主题所作的富于启发性的笔记到晚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其影响则超越了意大利。^③ 在其他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结合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现

① 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 25 周年后写道:“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2 页。——译者)恩格斯写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一个特殊的赞成现时的剥削阶级的阶级组织,一个旨在把任何干涉排除在现成的生产关系之外,特别是用暴力把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之下(奴隶制、农奴制、工资劳动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36 页—438 页。原文与中译本稍有不同。——译者)它写于 1887 年,(原文如此,应为 1880 年。——编者),同样的观点可以在 1881 年(原文如此,应为 1884 年。——编者)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和许多恩格斯的晚年著作中找到。

② 例如,“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以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类似的提法还有,“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复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8、200 页。——译者)

③ 至今研究葛兰西的惟一重要的英文著作是 J. M. 加迈特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1967 年版。此外还有 J. 梅林顿的父亲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和实践》,载《社会主义记事》,1968 年版。

实来讨论国家问题,只作了很少的有价值的努力。在进行这种努力之时,总是由于对于文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解释过于简单而受挫。尽管这种“模式”比民主多元理论更接近现实,它却需要比迄今已做的进行更多的精心推敲:保罗·斯威齐在若干年前著述时⁷曾经不无夸张地写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的研究,不仅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极为不足的。”^① 本书的意旨就是想对这种不足作些贡献。

二

这里所考察的国家彼此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它们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语言和制度。但是它们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次,它们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手段都是私人所有和私人控制的。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就使得它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使它们完全区别于像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这些工业不发达国家,即使在那些国家中,经济活动手段中居支配地位的也还是为私人所有和私人控制;它们也有别于那些国家所有制占优势的国家,尽管它们中有一些国家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换言之,区别的标准是经济活动水准和经济组织的模式相结合。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共有的特点也降低了在它们中可以找到的诸种差异的意义。约瑟夫·熊彼特曾注意到,

^① S. 楚鲁(主编):《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1961年版,第88页。然而需要指出,一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模式”作出精心的理论研究的著作,在本书将要完成时已经问世,这就是尼古拉·波朗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1968年版。

……社会结构、方式和态度铸成了那些不易轻易融解的特点：一旦它们形成，就会持续下去，甚至会持续数世纪之久；同时，由于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表现了不同程度残留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试图对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作出结论的话，我们几乎总是发现，真实的群体或民族行为多少有别于我们期望的那样。^①

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所有这一切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特征被充分认识之后，下述事实继续存在，即处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对于受它统治并大大地衰弱的国家来说，表现出许多基本的一致性，尽管差别没有消失，却逐渐趋于缩小。作为其结果，这些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甚至政治上，出现了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在越来越发达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领域内，它们许多基本的方式具有更多的共同性。正像晚近一位作者所指出的：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关键的制度和经济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时常是造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分裂的原因。然而，当考察其整体面貌时，这些社会的内涵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如果考察的是它们怎么做的，而不是它们怎么说的，从数年的长时段中它们的行为来看，这种相似性越发引人注目。^②

这种相似的极大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上已被注意到：这些社会具有极其宏大的、复杂的、极为完整的和技术上很发达的经济基础，同时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极大比例，而农业在经

① 转引自 R. 本迪克斯：《国家建筑和公民身分》，1964年版，第8页。

② A. 肖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1965年版，第65页。

济活动中只构成较小的部分；^① 在这些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经营并控制着这些活动的收入。

就后一点而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时当然往往也拥有坚实的“公有部分”，国家拥有它并管理广泛的对于经济生活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工业和服务设施，它们主要是但不绝对是低结构型产业；⁹ 而国家也通过管理、控制、协调、“计划”等途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常常起着一种更大的作用。与此相似，国家又是“私营部分”最大的主顾；而私营部分的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果没有国家的光顾和贷款、补助金以及国家所实施的保护，就无法维持下去。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涉决不是新东西。相反，国家干涉不仅在德国和日本，同样在其他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并且在早期阶段指导和帮助着资本主义；^② 甚至在完全倡导自由放任和严格奉行个人主义的国家，它在资本主义的实际运转中也从未丧失其极大的重要性。^③ 无论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国家干涉的规模和普遍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无可比拟，而且还在继续增大；对于这个社会中国家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广泛的社会服务设施情况也大致一样。^④

经济生活中的“公有部分”和国家干涉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近年来认为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指谓这些国家占优势的经济制度

^① 农业产品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百分比，1961年美国 and 英国为4%，联邦德国为6%，法国为9%，日本在1960年相应的数字为15%。——R.H. 拉西特主编：《世界政治和社会指南》，1964年版，第163—164页。

^② 参见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版。

^③ 参见P.K. 克罗泽：《美国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1960年版，以及G. 科尔柯的《保守主义的胜利》，1963年。

^④ 一种恰当的综合评述可见肖恩菲尔德的《现代资本主义》。

是用词不当的见解流行的一个原因。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倾向的持续发展,^①有这样的看法,公共干涉已经根本使资本主义改变了旧日的形象;正如克罗斯兰等人指出的那样,这些国家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它在类别上不同于过去甚至不同于晚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种信念不单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的重要变化,对此不存在疑问,而且认为它实际上超越和演变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且毋庸置疑是一种更高级的制度),它构成对西方社会多元论解释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经济制度和旧制度的不同,不仅在于经营上的不同,用加尔布雷思教授的话说,同样也表现出对私人资本出现了一种有效的“抵消力量”;而它始终是靠国家干涉和控制转变而来的。由于所有这一切,需要取消资本主义便自然地消失了;而出于一切实际需要提出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用利普塞特教授的话来说,政治学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去解决“围绕修改或摧毁资本主义和它的结构的变革问题上”;“中心问题”乃是“官僚社会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②或者如利普塞特教授所写的:“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工人已经取得了工业和政治上的公民地位;保守党人已接受了福利国家;左翼民主派已经承认,国家权力的全面增长对自由的危害,远比解决经济问题为甚”。^③换句话说,“打倒马克思,拥护韦伯”。在资本主义社会剧烈变革期间,这一信息同样支持当今时髦的论点,即世界的真正基本

① 见原书第 28 页以下。

② 利普塞特:《政治社会学》,载 R.K. 默顿(主编):《今日社会学》,第 9 页。

③ S.M. 利普塞特:《政治人》,1963 年版,第 406 页。同时可参考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所说的:“处于民主保护下的工业的发展,为‘工人阶级’所希望的极为重要的合法性事实上已经实现”。(T·帕森斯:《共产主义和西方,冲突的社会学》,载 A. 和 E. 埃兹奥尼(合编):《社会变革》,1964 年版,第 397 页。)

区分是：“工业化”社会和“非工业化”社会。^①

在以后几章中将会讨论，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而其缺陷行将进入历史垃圾箱的信念，是极端不成熟的。但是，作为客观存在而必须首先提出的一点是，尽管存在着“公有部分”，它们至今仍然是其大部分经济活动仍为私人和企业所控制的社会：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国家掌握着哪怕很少一部分生产手段。^②从这个意义上至少可以说，——正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混合经济”将对混杂的观点起一种特别的使人误解的作用。^③正如稍后将要表明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管理和控制也不像希望的那样按照“后资本主义”理论家所设计的方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起着那样重要的影响。无论为它们虚构出什么精巧委婉的说法，无论它们已经在进行怎样的变迁，它们在所有本质方面确实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人或是合作所有的中小企业，它们汇集成为成百上千万个经济单位，^④组成了它们经济外观一个特殊的重要部分，并同时

① 例如可以参见雷蒙德·阿隆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以及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同一类型的工业社会的两种形态”的观点。（R. 阿隆：《工业社会十八讲》，1962年，第50页。

② 例如可以参见J. F. 迪尤赫斯特等著《欧洲的需要和资源，18世纪的潮流和前景》，1961年，第436—442页，特别是附表13—17；同时参见，P. 洛厄尔：《来自海外的教训》，载M. 香克斯（主编）：《公共事业的教训》，1963年。

③ 当“混合经济”具有强烈的辩解之意时，资本主义则完全是一种过去的事情，在共产主义的文学中用以形容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相反，它倾向于强调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势力与国家的联盟。无论如何，这种倾向于隐蔽“垄断资本主义”剩余程度的提法，仍然有助于在国家帮助下保持私人事务的性质。

④ 凯森教授指出，在美国“目前存在着大约450万个企业……其中一半以上是零售商业和服务业中未组成公司的小商号。公司占整个数字的13%，95%的非公司商号雇员数少于20人。（C. 凯森：《公司：它有多大权力和多大能力？》，载E. S. 马森主

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外观。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利于中小企业,许多这类企业以这种或那种方法独立于或附属于大公司。但是,它们在这些社会的生活中重要性也不能由于大股份公司具有较大的重要性而被忽视。人们不会怀疑,这些国家的政治史大概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经济权力无情而迅速地集中化完全不同。事实上,如 E.S. 马森教授在研究美国时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公司发展非常猛烈,经济发展也同样如此”。^①

无论如何,发达资本主义几乎是大企业的同义语;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一点也不比为数较少的常常是互相关联的大企业日渐控制的关键的工业部门更为重要。卡尔·凯森教授在讨论美国时注意到,“数量不多的大公司在我们的经济中具有压倒的不相称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它的某些关键的部门中。”不管我们考察其经济的哪个方面——雇佣、投资、研究和发展,军事供给——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情况。”^②加尔布雷思教授也以同样的语调写道:

……工业制度,再明显不过的特点表现在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规模上。1962年美国5个大工业股份公司的财产总值超过了360亿美元,所有这些财产的12%用于制造业。50个大股份公司拥有所有制造业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500个最大的股份公司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总资产。股份公司拥有的

编:《现代社会中的公司》,1960年,第86页。)1896年在法国雇用1至10名工人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3%,1958年这个比例仍达95.4%。另一方面,1896年小企业雇用的工人占有所有工资劳动者的62.7%,而到1958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20%。(E.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3年,第2卷,第11页。)根据日本1960年人口统计资料,日本小业主为275万人,他们中只有36万人是雇主,121万名业主根本未雇用工人,86万名业主只雇用他们自己家庭成员。还有344万名小商贩。(H.塔穆那:《城市中等阶级代理商状况的演变》,载《日本社会和政治思想杂志》,1963年,第2期,第82页。)

① 马森:《现代社会中的公司》,第10页。

② 凯森:上引书,第86页。

总资产超过了1000万美元,大约总数为200个的企业和所有资源的80%用于美国的制造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28个股份制企业¹³在制造业、矿山、零售和批发商业中雇用了大约10%的雇工。23个股份公司¹³为制造业提供了15%的雇工。在50年代开始的5年(1950年6月至1956年6月),100个商号得到了所有防务合同价值的三分之二;10个商号得到了防务合同价值的三分之一。在1960年,4个股份公司估计占有所有工业研究和发展开支的22%,384个股份公司雇用了5000名或更多的工人,占这些企业开支的55%;26万个企业雇用的工人少于1000人,仅占其开支的7%。^①

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于是,基德隆先生指出:

……在英国,1963年占净资本支出二分之一的180个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另有职工人数在万人以上的74个企业占净资本支出的五分之二。200家企业生产了一半的出口工业品,另12家企业生产了五分之一的出口工业品。在德国也是这样,在那里,1960年占有工业临时投资额五分之二¹³的100个最大的工厂雇用了占工人总数三分之一的工人,并出口一半的工业品;那里最大的50家企业从1954年起销售额从18%增长到29%。而这种情况几乎到处可见,惟一明显的例外是法国,它是小生产单位的故乡;但是甚至在那里,现状的变化也非常快。^②

① J.K.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1967年版,第74—75页。

② M. 基德隆:《战后西方的资本主义》,1968年版,第14页。关于法国,一位作者评述说,“除国有公司之外,只有50家集团在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M. 德朗古尔:《权力的奥秘》,1964年版,第14页)。对于垄断集中的一般考察,参见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1卷,第12章。

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为大企业统治的现象在未来的年代中将更加明显;一点也不不是由于国家干涉本身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这一过程,^①不要忽略时常表现出的保护小企业和反对垄断的倾向。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私人经济力量集中化的巨大的政治意义,包括它对国家的影响,是这里研究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但是也要指出,大企业不单纯是一种民族现象,也不仅仅影响各个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资本主义无情的国际角逐使它不由自主地冲破了国界。但是现在它又有了全新的表征。当代资本主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一批大公司,从所有制到经营都具有更加显著的跨国特征。这些特点中有许多是由于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美国大企业迅速膨胀,以至于达到实际上控制了后者主要的工业企业而造成的。^②它在相当程度上在这里和那里激起民族抵抗,但是尚未对这一进程起到决定性的制止作用。^③

在此同时,类似的资本国际化过程最近正在西欧集聚力量。它时时与美国资本的渗透相抗衡,有时又与它结合。新的庞大的资本集合体就这样在西欧存在着,它的跨国性质不仅广泛地牵涉经济方面而且广泛地牵涉政治方面。^④“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这种

① 例如,在英国工党政府建立工业改组协会便具有鼓励托拉斯的明确意向。

② 关于晚近美国向西欧广泛的渗透,可参见J.J. 塞汶-施赖伯:《美国的挑战》,1967年版,第1部分。关于英国则可参见J. 邓宁:《美国在英国制造业的投资》,1958年版,和J. 麦克米兰、B. 哈里斯:《美国对英国的控制》,1968年版。

③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采取暴力,以及为了地方资本的利益不停顿地吸引它,可以举出戴高乐时代法国发展的例子,尽管一般把它称作“反美国主义”。

④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E. 曼德尔:《国际资本主义及其超越国家》,载《社会主义记事》,1967年版。

征兆制度化的表现,它表现出试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它的一个主要“矛盾”,即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国际生活单位已日渐明显地萎缩。

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即在更加传统的意义上具有国际性,具体地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已深深地插足于世界上非工业化地区。这些广阔的开发地区取得正式的政治独立以及它们中许多地区为革命所激荡,已经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利益团体的扩展和保护比过去花钱更多,并且更具危险性。但是目前西方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下的依然很大的赌注的重心,事实上 15 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上,^①如果说这不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全部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那么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之一。

三

先进资本主义共同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这些国家具有极其相似的“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也有助于并实际上造成其社会结构和阶级划分极其引人注目的相似性。

这样,可以在所有这些国家发现,数量相对来说较小的一部分人拥有明显不相称的个人财产,他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所有制。^② 这些富人中的许多人还控制了有他们投资的那部分资产。但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这种控制权交给那

^① 参见 P. A. 巴兰:《政治经济的增长》,1957 年版, H. 马格道夫:《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载《每月评论》1966 年,第 18 卷,第 6 期;和《帝国主义时代》,载《每月评论》1968 年,第 20 卷,第 5 期和第 6 期; M. 巴拉特·布朗:《后帝国主义》,1963 年版;和 P. 雅莱:《对第三世界的掠夺》,1968 年版,和《处于世界经济中的第三世界》,1968 年版。

^② 参见本书第 2 章。

些尽管自己可能致富(事实上一般都是这样)却没有拥有哪怕一部分甚至一点也不拥有他们控制和管理的资产的人。总而言之,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些所有者和控制者是否能这样混为一体,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而是否在任何情况下论及这些国家时都可以采用“统治阶级”的提法,是这里研究的一个主要论题。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可以明显看出经济精英的存在,由于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支配着经济生活中许多极为重要的部门。

- 16 再则,在这些国家中,社会阶梯的另一端为一个工人阶级所占有,它主要由工业劳动者和正在日益减少劳动力组成部分的农业工资收入者所组成。^① 换言之,在这些国家中,“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雇主和产业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集约社会为一方,以前工业化社会和“第三世界”为另一方它们之间主要的不同之处。

和其他阶级一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中也始终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这个和那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然而,如果撇开这些差别,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由于影响其成员的共同特征,与其他阶级的成员相比较,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社会群体。^② 这些特征中最显著的在于,一般说来他们“所得最少”,却为之付出了最艰苦的劳动。也可以这样说,这个等级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者、上了年纪的穷人、长期处于贫穷和半无产状况的人们中补充进来。对于所有强调“阶级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我们现在都是工人阶

① 相关的数字参见拉西特等(主编):《世界手册》,第177—178页。

② 参见本书第2章。

级”)的人来说,在劳动方式、收入水平、他们的机会或匮乏,以及整个现存的社会界定上,无产阶级的状况仍然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严峻的基本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即由所有者阶级为一方,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仍然是这些社会力量,其相互冲突极其强有力地决定着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趋势。事实上,这些社会的政治进程主要靠这些力量的对抗推动,并且试图制约他们间关系的条件。

在此同时,它也许很清楚地使人们误以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其他阶级和社会组合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事实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点也不亚于它们对两极阶级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这极高的社会凝聚,这可从它们的经济结构看出来。这种高度的社会凝聚自然会有其政治表现形式,并大大有助于阻止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两极分化。

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主要之点是,这些社会都大致表现出一种类似的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极化”的阶级上,同时也表现在其他阶级上。

这样,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并且正在增大的职业人群——律师、会计、中等董事、建筑师、技术人员、科学家、行政官员、医生、教师等——他们构成了“中等阶级”两个主要成分之一,他们在这些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这个“中等阶级”的另一个成分是和中小企业相联系的,它的极大重要性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由于这个阶级中一些实业家雇用了少数工人,也有的实业家拥有或部分拥有大小不等的各种企业;一些小的或中等的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农场主也属于这个阶级,

所以这个阶级也存在着许多差异。^①

但是, 尽管存在差异, 这个实业阶级却可以看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有别于其他的成分: 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无法同大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相融合, 也无法同自我经营的店主、技工和工匠相融合。

作为一个阶级, 后者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恶劣的影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自我经营部分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在某些情况下, 这一现象有戏剧性的下降, 例如在美国, 它从 1870 年占 40.4% 下降到 1954 年时的 13.3%。^②

18 即使这样, 这个由自我经营的小商、技工和工匠构成的阶级仍然远未消亡。事实上, 尽管存在着报酬通常很低而辛苦和使人烦恼的忧虑却时时持续不断这样的事实, 资本主义历史上持续存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小规模经营者(小实业家也同样)不屈不挠地抵制为其他被雇用者等级所吸收。在这方面, 这种倾向也不应当掩盖这个阶级的持续存在, 其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它至少为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提供了一条逃脱无产阶级状况的出路。

独立地自我经营的技工和店主持续地衰落, 始终伴随着构成发达资本主义销售力量的政府公务员阶级的显著增长。这个阶级持续地吸收着很大一部分劳动力, 在晚近百年间, 它数量上的膨胀事实上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最大的职业变动。^③

① 在另一方面, 大土地所有者则更加适宜与大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划为一类

② K. 迈耶尔:《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载《第三次社会学世界大会会报》1965 年, 第 3 卷, 第 70 页。至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 见莫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 1 卷, 第 197—198 页。

③ 在某些国家它占被雇佣人口的至少四分之一, 在美国占三分之一。参见 M. 克罗泽:《无意识阶级或无阶级社会的预兆》, 载《欧洲社会学档案》1960 年, 第 1 卷, 第 2 期第 236 页; 还可参见 R. 达伦多夫:《最近欧洲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载《代达罗斯》, 1964 年冬季号, 第 245 页。

维尔纳·桑巴特把这一部分劳动力称作“准无产阶级”今天其大部分情况很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它和工人阶级一道构成了完全可以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属阶级的主要成分。同时，它在事业上的前途、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和方式，从整体上说高于产业工人阶级；^① 而它自己并不明确说是工人阶级——它总是对这一概念表示厌恶而不予恭维——这对其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的结果，有助于防止这个从属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纳入任何政治集团之类的东西。

最后，这些社会包括了大量的“文化工人”——作家、新闻记者、批评家、传教士、诗人、这种或那种知识分子，就其中地位较高和多少有几分富裕者来说，可以归入职业中等阶级，至于其余一些则处于独立的技工和白领工人的地位。但是这种同化恐怕任意性太大，并且有模糊这些人在这些社会生活中起的特殊作用的倾向。^②

这种简略的列举并没有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经济、社会和职业群体包括进去。例如，它没有包括数量相当大的犯罪分子和一个大致可划为自由职业者一类的人，他们特别是在某些经济活动领域的作用，尤其在美国，是不容忽视的。同样，它也没有包括现在数量巨大而且在数量上和政治上其重要性都在日益增长的学生人口。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文化工作者不一样。

但是最大的疏漏是那些实际上管理国家的职业者，他们中既有政治家、文官、法官，也有军人。这种有意的疏漏将在以后的章

^① S.M. 利普塞特和 R. 本迪克斯：《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1959年版，第14页等处；另外参见 R. 圣萨卢：《寻找自己身分的雇员》，载《达拉斯》，《利润分配、法国的扩张和不公》，1966年版。

^② 参见第7章和第8章。

节中予以补充。这些人未予提及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属于任何阶级”。毋宁这样说,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而无法简单地在这里概括。

也许还应指出,上面列举一点也没有揭示这些成员对于他们阶级地位的觉悟程度,也没有揭示这些觉悟(或者说缺乏这种觉悟)所酿成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继而也没有揭示实际的阶级关系。这些显然都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它们与政治进程本身有关。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解答必须首先从这些人在这一进程中的实际活动研究开始。需要补充的是,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许多人可能还不了解他们的路线,或者因为他们坚持要扮演“错误的”角色。正如怀特·米尔斯所指出的那样:

20 这些人缺乏“阶级意识”,这一事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阶级”,或者说“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属于中等阶级”。经济和社会事实是一回事,精神感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采用理智的方式。两者都是重要的。如果精神感觉和政见并不与经济 and 职业上的阶级相一致,我们必须找出原因何在,而不是把经济的婴儿随同精神的浴盆一同泼掉,那样就无法了解他们每个怎样才能适应民族的浴盆。^①

这种意见同样也适合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观点并不只是说,不管后者自我意识程度如何,这些国家都有着可视为相同的社会阶级,而同时还是说,早已表明的区分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共同”的。毫无疑问,其等级的大小存在着差别,但是没有有一个地方其社会结构是迥异的。

如果以这些国家为一方,以非工业化或集体主义国家为另一

^① C. W. 米尔斯:《权力、政治和人民》,I. L. 霍洛韦兹编辑,1962年版,第317页。

方作比较的话,这就非常明显了。这样,许多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的阶级也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小实业家和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或产业工人。但是,正如已经提到的,它们在那里很明显占有完全不同的比例,例如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或者在大企业主(在那里除了外资企业,他们也完全存在)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一个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阶级在非工业化条件下只占很小的部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些在前一类国家中只占从属地位的阶级——如地主和农民——常常在后一类国家中成为社会综合体中主要成分。

由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观点对于那些集体主义世界的社会也同样是正确的。官方认为的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这种观点很难被认为是对这些社会结构细致的描写。但是,不管对它们采取何种分类,必须把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所有者阶 21 级和雇主阶级的情况算进去,还须把社会金字塔顶端客观存在的、从一个特殊的政治制度产生而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系统中其余每个部分的杰出人物集团算进去。不论它们彼此间有什么不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

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许可以说对那些已经确立的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广泛的相似的社会经济环境时,其政治生活本身却常常是极其不同的。

就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力量、在一些国家存在的两党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存在的多党制、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所区别,或司法权强弱不一而论,并不能就此说明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更奇怪的是 20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提供了纳粹在德国、斯坦利·鲍德温在英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以及 30 年代在日本流行的特殊类型的独裁主义统治的条件。经验一再表明,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包括极端的独裁主义在内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形式。这样

说法如果认为有点太牵强的话,但事实胜于雄辩。关于资本主义同专制主义难以两立,或者说它提供了反对独裁主义的保证的说法,也许是很好的宣传,但它在政治社会学上是拙劣的。

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广泛类似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必要一定与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式样和政治设置相联系,它们之间从来没有这种倾向;而且,由于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竞争,存在着表示反对的权利、正规的选举、代表制国会、公民保障制和其他对使用国家权力的限制,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都有所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描述过的那种制度模式,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
22 在描述它,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越来越熟悉地被人的简称为“民主的”制度。最初的描述倾向于认为,在这种制度中,一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民主制度而不是通过专制的方式进行统治;其次尤其是根据这样一种自诩,在它们这个制度中,由于它的体制是民主的,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能够持久地僭取其政治统治权。以下各章将要阐述这各种论点的长处。而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它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只称为“民主”,这些社会确实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同样在政治上都有极其相似之处。尽管它们有许多特殊的特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它们使自己适应于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普遍政治社会学。

第二章 经济精英和统治阶级

2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一个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它凭借给予它的经济权力这一优势,能够把国家作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与这种观点相反,自由民主党的理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也持这种见解)始终否认真正有可能在实在的意义上讨论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认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经济权力是如此散乱、破碎、富于竞争性,而且有如此多的国民起着抵制作用,致使它无法对国家或社会维持其领导权。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指出的,人们至多不过论及的是众多的相互竞争的政治和其他类型的精英,由于他们大多数处于竞争状态,他们缺少内聚力和共同的意向,他们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无论什么类型的统治阶级。

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的不是这样的社会中是否有一个在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确实在实施其经济权力,而是要确定究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阶级存在。只有在这一点确定以后才可能讨论它的政治影响。

—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导论中告诉读者说,全书是在“因为看到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许多世纪”而在作者思想上产生“一种唯恐上帝惩²⁴

罚的心情下”^①写成的。当然,他所指的是民主平等的进展。

那是130年以前的事。从那时起,一代代人都在重复着德·托克维尔的信念,即平等在不可抗拒地前进。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一直在得到鼓励,即一股力量巨大的冷酷无情的恐吓势力一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并正进入平等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一个社会学家写道:“以斯多葛派基督教伦理传统为后盾的平均主义,代表了现代极其有力的社会政治溶剂。”^②其他作者则倾向于把平均主义归因于不那么飘渺的较为世俗的原因,诸如工业化、民众压力、民主制度等等;但是,不论原因如何多种多样,那种趋势的力量和有效性的信念,始终是战后社会政治著作中一种最常见的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而且,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作是这个时代伟大的“观念力量”之一,它支持诸如“大众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束”、工人阶级生活和意识的转变、西方社会民主政治性质,以及此外其他各种理论。但是,这种抑制平均主义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现今,主要是那些保守派作家,他们意在强调这种恐吓势力走得太远,并且悲叹它们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大批强烈反对保守主义标签的作者加入他们之中,但是,他们也一直在宣称,在平等真正到来或迫近之时,无论如何不应当对它不满,而应当欢迎它。这样,整个英国的社会民主“修正派”呼应着保守主义作家,在战后的年代里把推动巨大的英国工人运动朝着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初出现的平等发展,作为自己的事业。^③

25 然而,用蒂特马斯教授的话说,晚近的证据足以表明,“我们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51年版,第1卷,第4页。

② J. H. 迈泽尔:《统治阶级的神化:盖塔诺·莫斯卡和精英》,1962年版,第6页。

③ 对这种作用的概览可参见,约翰·萨维尔:《劳工和收入分配》,载《社会主义记事》,1965年版。

恐怕越发不愿作出这样的论断,即 1938 年以后在英国存在的任何平等力量能够被提高到‘自然法’的重要地位并用以构想未来……存在着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结构、为大规模经济所固有而朝着相反方向运动等诸多因素所哺育的其他力量”。^① 科尔柯教授曾经推断说,在美国这个国家,在 1910 年到 1959 年间“不存在朝收入均等发展的重大倾向”;^② 另一个强烈地与这种观点论争的研究这个时期早期阶段的美国作者则指出,“由于缺少补救办法,这个国家可能很快会面对收入日趋悬殊的现象,那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社会革命’不仅已持续 20 年之久,它也正开始倒退了”。^③

如果说现存的经济不平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至少还不那么明显,那么这种发现的意义并不那么大:似乎可能提出这样的争辩意见,既然在过去某个时候已经取得高度的平等,那么对于说今后继续迅速地再进一步平等是不可能的,也就不会感到惊奇,并认为这种说法无实际意义。

但是不能认为这是由于在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中确实存在着极大的困难的缘故引起的;^④ 对于米德教授近年来称之为“财产所有权中一种真正的大得难以相信的不平等”,也是这样。^⑤

这后一种不平等的形式最明显的例证可以在英国找到,在那里,1960 年时 1% 的人口拥有私人财产的 42%;5% 的人口拥有私

① R. 蒂特马斯:《收入分配和社会变革》,1965 年版,第 198 页。同时参见 R. 布莱克本:《不平等的社会》,载 R. 布莱克本和 A. 科伯恩(合编):《难以两全的工会的战斗性和一致》,1967 年版。

② G. 科尔柯:《美国的财富和权力》,1962 年版,第 13 页。

③ H.P. 米勒:《富人和穷人》,1964 年版,第 54 页。

④ 参见米勒:前引书,第 12 页。

⑤ J.E. 米德:《实力,平等和财产所有权》,1964 年版,第 27 页。同时参见 J. 雷维尔:《20 世纪英国财产社会分配的变革》,1965 年版。

26 人财产的 75%；10% 的人拥有私有财产的 83%。^① 至于说到美国，一项调查指出，在 1953 年，2% 的美国家庭拥有财富最高增长达 29%（而在 1922 年为 33%）；^② 1% 的成年人拥有 76% 公司股本，在 1922 年时这个数字是 61.5%。^③ 在英国，60 年代中期只有 4% 的成年人口在商业和工业公司中拥有股份；在 1961 年 1% 的成年人口拥有 81% 的私营公司的股份，几乎所有其他的股份均被占人口 10% 的上层分子占有。^④ 即使说股票的拥有现在比过去范围多少要大一些乃是真实的，但这也很难证明这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因为不仅股票的拥有者今天仍极其有限，而且，数目相对很少的人拥有绝大多数的股票，而绝大多数的人拥有的股票只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不平衡的。^⑤

总之，有这样一些国家，尽管一切宣传都说那里是平等的，那里的人民依旧存在着人数相对来说很小的一个阶级，他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拥有大宗财产，他们的大宗收入通常全部或部分是从他们所有的或控制的财产中得到的。^⑥

① 上引书，第 27 页。1911—1913 年的数字为 69%，87% 和 92%。同时参见《经济学家》，1966 年 1 月 15 日《仍然没有财产所有的民主》一文，它提供的数字表明不平等甚至更厉害。

② R. J. 兰普曼：《上层财产所有者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1962 年版，第 26 页。

③ 上引书，第 209 页。

④ H. F. 利德尔和 D. G. 蒂平：《私人财富在美国的分配》，载《牛津大学统计学院学报》，1961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91 页；同时参见《经济学家》上的文章《股票持有人为什么如此少》，1966 年 7 月 2 日。后一篇文章也提到，英国“完全走在欧洲前面，欧洲还没有对股票持有者的统计。但是完全有把握说，在欧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限于较为富有者”（第 52 页）。

⑤ 例如，参见 V. 珀洛：《“人民的资本主义”和股本所有权》，载《美国经济评论》，1958 年，第 48 卷，第 3 期。

⑥ 例如，在英国，1960 年拥有全部个人财产 83% 的 10% 的人口，他们（征税前的）个人收入的百分之 99% 来自财产。（米德：《实力，平等和财产所有权》，第 27 页），同样确切的是，所得税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返回了实际收入进款。以美国为例，一个

但是,在这些国家中不仅存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富有阶级,还存 27
在一个数量极大的民众阶级,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或者一无所
有,①他们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出卖劳力,这意味着物资严重贫
乏,真正贫穷或穷困。

正如通常所说的(一些他们自己并未为之困扰的人讲得一点
也不少),贫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而随着“富足的社会”被虚
构出来,要否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有时甚至是极端的
贫穷和剥夺,现在比若干年以前更难界定了。从 20 世纪 60 年
代初以来,在像英国、美国和法国这样一些国家中,有着足够的证
据表明,毫无疑问,这里不只是存在着无足轻重的或残余的现象,
而是存在着影响它的人口中相当部分的特有情况。②

最近,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发生了“消费者革命”,各个阶级之间

作者曾评述说:“记录是难以置信的坏:税收部门估计,大约有 330 万美元的股息和利息——它们大部分付给了富裕家庭——以非常露骨的哄骗做法逃避税金的支付。这种开支耗去政府税收岁入每年大约在 8 亿至 10 亿美元之间。(H. 罗恩:《自由企业家,肯尼迪、约翰逊和实业机构》,1964 年版,第 52 页。)同一作者还指出,根据 1961 年国内岁入报告,“宣布 48% 的进款从支出帐目中扣除是错误的,而所有未得到承认的扣除额实际上都是个人支出,而不是真正的营业项目。”(上引书,第 56 页。)

① 1959 至 1960 年英国 87.9% 的纳税人拥有全部财富的 3.7%,他们人均拥有财产为 107 英镑。(见《经济学家》上的文章《仍然是没有财产的民主》,1966 年 1 月 15 日,第 218 页。)

② 1962 年报告说,美国一个官方的经济发展大会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下面的话:“3400 万成家的居民和 400 万未婚的个人[就是说未婚者在经济上属于一个家庭单位]生活在贫困中;3700 万成家的居民和 200 万未成年的个人生活在压抑状态中。1960 年时,整个 7700 万人构成了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二”(H. 马格多夫:《美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载《社会主义记事》,1965 年版,第 73 页。)大会用“压抑”来描述那些生活在真正贫困线之上但是低于劳工部调查中作为“适度的但是足够的”工人家庭生活费标准以下的居民。(前引书,第 73 页。)同时参见 J. N. 摩根及其他人:《美国的收入和福利》,1962 年版;N. 哈林顿:《另一个美国》,1962 年版;P. 巴兰和 P. 斯威齐:《垄断资本》,1966 年版。关于英国,参见 B. 艾贝尔-史密斯和 P. 汤森:《穷人和最穷的人》,1965 年版;P. 汤森:《贫穷,社会主义和工党当权》,1967 年版。关于法国,参见 P. M. 德·拉各斯:《法国的穷人》,1965 年版。

28 “生活方式的融化作用”被认为已经开始了。^① 但是，坚持认为消费模式发生变化的观点使人有着双重的误解：首先，因为它惯常是有意低估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消费的可能性和消费的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别的持续存在；^② 第二，取得更多的商品和公用事业无论怎样令人满意，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劳工们与世界资本的关系。塞尔日·马莱所写的可能完全正确，“假期里在蓝色海岸中部，西西里和希腊，年轻的冶金工人分享经理女儿的‘塔希提岛式’的平房，他们购买同样的唱片和跳同样节奏的舞蹈”。^③ 但是，不管在假日里“年轻的冶金工人”同“经理的女儿”关系如何，前者同经理他们本人的关系依然如故。即使阶级在外表上和呈现出来的可见部分，并不像它们在事实上那样显著，恐怕仍然不应当把这解释为深深地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体系中的阶级划分被侵蚀的证据。要使它们分解，甚至他们真正被腐蚀，恐怕要采取比让工人阶级取得电冰箱、电视机、小轿车、甚至里维埃拉那种“塔希提岛式”的平房更多的东西；取得比遗产税、累进税和大量其他的被富人讨厌和斥为废物和无用的东西，然而，即使这样也还无法对医治经济不平等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这种所有权体制是根据“他拥有的就是应当给他的”的原则实施的，它将为富有者提供充足的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所以不要对此非常吃惊。^④

① 对这个论点的批评可参见，J. H. 戈德索尔普和 D. 洛克伍德：《富裕和英国的阶级斗争》，载《社会学评论》，第 10 卷，第 2 期，1963 年；以及，D. 洛克伍德：《新工人阶级》，载《欧洲社会学杂志》，第 1 卷第 2 期，1960 年。

② 例如，参见，A. 皮札诺：《欧洲个人特有的流动》，载于《代达罗斯》，1964 年冬季号，第 217 页等处。

③ J. 马莱：《新工人阶级》，1963 年版，第 8 页。

④ “在资本主义真实的生活里，它对 90% 的人采取极端的措施以防止他们占有的国民生产的份额下降，这样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活动的增长而上升……资本

二

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人口相对很少的阶级拥有极大比例的财富而且他们确实从他们的所有权中得到许多特权,可能不会有很大的争议。但另一方面,时常产生争论的是所有权的意义现在日渐消失这个事实,不仅因为它受到大量的限制——法律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而且因为私人财富和资源的所有权和对它的实际控制之间持续地发生着分离的现象。人们熟悉这样的观点,在经济生活极为重要的领域,控制权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他们自己拥有的份额在他们所管理的资产中最多只占有很小一部分的经理人员手中。这样,尽管所有权可能仍然提供一些特权,但它已不再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有更多的理由不仅否定“统治阶级”是以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基础的看法,而且同样否定了“资本主义阶级”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的看法。这种经理主义的议论需要进一步考察。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经理主义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没有问题的。一百年前,马克思便以合股公司的成长为根据,注意到资本家的实际功能转变为纯粹管理其他人的资本的经理,以及资本的所有者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所有者,一个纯粹的金融资本家。但是马克思那时(以惊人的预见性)指出现象在当时只处于它的初期阶段。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晚近几十年间,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至少在大规模企业中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组织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主义在事实上具有一种固有的极端和过分发展的不平等倾向。因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又怎么能导致过去百年间所有采取的平等主义的措施,除了保持他们的地位外,收效甚慢呢?”(J. 斯特雷奇:《当代资本主义》,1956年版,第150—151页。)

与此同时,如果像持续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或暗指这个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因此不仅在对待中等规模的企业,而且在对待非常大的企业时忽视了让·梅诺说的“一个精力充沛的资本主义家族”^①仍然具有重要性,则完全不正确。因此,最近对于美国,人们已经指出,“估计[即在500家最大的工业股份公司中]有150家公司目前属于《财富》杂志所列巨富企业,它们的所有权的控制落入一个人或单个家庭成员的手中”;^②作者不无道理地补充说,“在500家大工业企业的30%明显为单个的个人所有,或者被家庭集团控制的证据面前……认为传统的美国业主已灭亡,有点言过其实了,同时,表明广为宣传的组织化的胜利,也远非全部事实”。^③与此相似,“至少有10个家族控制的公司跻身于最大的100个公司之列,这些公司中有几个十分活跃地是所有者经营的。”^④而“在500个公司中有将近70个以家族名命名的公司始终为创建它的家族所控制”。^⑤

这些是大范围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个真实的情况,以最大的公司为首,一些最具活力、力量最强的财团正在建立,并将继续建立,其经理和董事并不拥有所有权,而是委派和选用的人士;这种趋向并非划一,但它却是非常强有力而且完全不可逆转;回复到所有者管理是不可能了,只有实行公共或社会的所有权和控制。

当然,人们一直承认,经理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单个股东的控制甚至不受其施加的压力,而企业越大,它的所有权就越分散,它的豁免权似乎就越大。阿道夫·伯利在研究美国时写道,(尽

① J. 梅诺:《专家政治》,1964年版,第131页。

② R. 希恩:《世界上大企业的所有者》,载《财富》,1967年6月15日,第178页。

③ 同上书,第178页。

④ 同上书,第180页。

⑤ 同上书,第182页。

管其论点具有普通的适用性)“制度化的公司实际上为一小批恋栈的寡头所指导。依次吸收美国企业家和财团零零碎碎的意见并作出判断……惟一真正控制即指导或限制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行动的,是一些尽管含糊且保持缄默却是真正能够安抚他们的哲学家”。^①

从经理人员的活动范围不受来自控制它的财产所有者的直接压力影响这一观点出发,只要再走出一小步,就意味着宣布,这些经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社会集团,他们在感情、利益和动机³¹上,都与纯粹的所有者完全不同,甚至与之对立——事实上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用最早的非常极端的“经理革命”理论的措辞来说,他们不仅对总体国家的权力负责,而且将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但是,经理资本主义的理论不仅是这样的观点为基础的,经理们都按所有者以外的旨意行事,同时还逐渐出现含蓄地而有时是十分明朗的倾向,即经理们的动机和推动力与旧式资本主义所有者相比应当更为高尚,而少“自私”,更富社会“责任感”,更加密切地关心“公共利益”。所以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股份公司与私人财产》中指出,早在1932年古典的经理主义理论就认为,如果“股份体制”尚且存在,“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对大公司的‘控制’将发展成为一种纯中立的专家政治,它平衡社会各种团体不同的要求,按公共政策而不是以私人的贪欲,在总收入中给每人一份”;^②他们说,这个事实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种观点的推行一直十分困难,尽管它已成为代表卡尔·凯森教授所说的“那些充满

^① A. A. 伯利:《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60年版,第180页。

^② A. A. 伯利和 G. C. 米恩斯:《现代股份公司与私人财产》,1932年版,第356页。

生气公司”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思想。^①

32 这种主张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因为人们所关心的、要求他们所接管的许多大工业、财政和商业企业的决定,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组织,同时也影响着更广泛的领域,有时关系到整个社会。但是,如果他们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如此富有生气,如果他们能像经理人员一样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更广泛的公共责任,他们就可以被似乎很有道理地描述为被授予控制公司资源权力的值得信任的名流——犹如天然的最合适的管理人员;而且就可以更为容易地找出理由为之辩护,说这些身负重任的人决不应当受到国家过分的不必要的“干预”。毫无疑问,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措施现在已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甚至这一点也只能在以内阁大臣和文官这些公认可以信赖的保卫“公共利益”的人们为一方,以他们自己持有同样愿望的那些实业界的代表为另一方的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实施。根据同样的论据,对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部“修正派”的争论,就不足为奇了。国有化的反对者恐怕会发现,用受益茨克尔派影响的主要政策文件的话来说,“随着经理

^① 凯森教授写道:“所有权的代理人不再去寻求投资的最大利润,董事会认为自己对公债持有人、雇员、客户、一般公众、恐怕更重要的是对作为一种机构的公司本身负有责任……不存在贪心和贪婪的表现;也没有想把企业的大部分社会开支推到工人或团体身上的企图。现代股份公司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公司。”(C. 凯森:《现代股份公司的社会意义》,载《美国经济评论》,1957年5月,第47卷,第2号,第313—314页。)同时还可参见,C. A. R. 克罗斯兰:《保守主义的危害》,1962年版,第88—89页所说:“现在在较大的公司中恐怕最为典型的是采取迅速发展和高额利润方针的公司——但是,它仍然服从于它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有利于公众和劳工关系的意向……它的目标是‘公正’而不是最大的利润,是合理的迅速增长和出于公共责任意识产生的强烈的激情。”同时参见,F. X. 萨顿等:《美国的实业纲领》,1956年版。至于法国人对同一问题的见解,可举出H. W. 埃尔曼:《法国的实业组织》,1957年版,以及R. 巴雷:《“富于生气的企业家”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为何有如此的愿望》,载《经济评论》,1958年,第6期,第896—911页。

的日渐职业化,大企业从整体来说是在为民族利益服务”。^①

在考察这种观点并把它付诸应用时,回忆一下曾经提出而现在为人们大为斥责的旧式资本主义者,非常类似的说法,也许是有价值的。本迪克斯教授于是指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企业家阶级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企业家对于权力的要求,由于遭受穷人的谴责和根本拒绝以民族利益相标榜、根据所谓道德领导权和权威而精心安排的虚假宣传而改变了”。^②从这点来看,这种对于经理主义的新的宣传,也许除了一阵喧嚣之外,没有多少意义。

还有,对于纠缠于最大利润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各守岗位、具有公共精神的经理人员两者之间对待利益的鲜明对比,似乎前者更为非正义。

就古典企业家来说,其动机和感情冲动无疑像现代大公司的经理一样,富于变化、复杂、并且很可能是矛盾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把资本家说成是卷入一场积累的热情和享乐的愿望之间浮士德式冲突——而“享乐”在这里可以看作包括与积累相冲突的众多目标,或者说它至少被认为具有与利益同样的重要性。早期对于经理行为的研究表明,“对企业家行动最重要的刺激,不是满足直接欲望的商品欲求,而恐怕是:对权力的迫切要求,对声望的渴望和与竞争有关的冲动,创业的冲动,把个人同一个群体等同起来的嗜好和与群体忠诚有关的感情,对于安全的渴望,冒险和为了自身的目的‘玩一场游戏’的刺激,以及为其他人服务的愿望……”^③ 无论怎样看待这个范围广泛的范畴,必须明确,它的每

① 《工业和社会》,1957年版,第48页。

② R. 本迪克斯:《英国企业家阶级自我合法化的例证》,载《格萨姆特政治科学杂志》,1954年,第48页。还可参见同一作者的《工业中的劳动和权威》,1956年版。

③ R. A. 戈登:《大企业中的实业领导人》,1945年版,第305页。

一个细目,如同适用于传统的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家一样,也应当用于未拥有所有权的经理。此外,一个英国社会学家写道,在家庭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业企业的目标“非常明确地被限制在为企业所有者谋取自己利益的范围,其实,在现代制度下,恐怕其目标很早就潜在地同其他目标,如生产、扩张和创新相融合,很难清晰地指出它们之间究竟是相互联系呢还是相互矛盾”。^①但是,要说“家庭资本主义”过去(或者说现在)未曾极度关心生产、扩张和创新,似乎是一个非常稀奇的想法,因为它未能注意到像利益“融合”这样一类现象。

34 马克思所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毫无疑问也在现代股份公司经理的胸中激荡,甚至它可能采取了一种变化了的新的不同的形式。然而,像过去最坏的年代里粗俗的企业所有者那样,无论现代经理人员是多么聪明和有光彩,他们都必须服从于他们所控制并为之服务的那个制度所固有的强制性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须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无论其动机和目标怎样,他们只能从这个观点出发获取他们的成功。无论是所有者还是经理,实业家唯一的最重要的意图是必须为他们自己的企业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实际上从这种体制的本质来说,一个充满生气的经济精英也许不知道如何去追求不同的目的。大体上说,如果对这类精英和所有实业家来说这不是惟一的参照系,也是一个谋取利益的参照系。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的权力所追求的,所有其他的考虑,包括公共福利,都必须服从于它。

这不是企业家和经理灵魂“自私”的问题;我们宁可这样说,“自私”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由它支配的政策所决定的。

^① J.A. 班克斯:《工业社会中工业企业的结构》,载 P. 哈尔莫斯(主编):《工业社会的发展》,1965年版,第50页。

和旧式资本主义一样,经理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子化的体制,它持续地表明,甚至在事实上更加鲜明地表明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说过的那种极端的矛盾,即在它似乎日益社会化的特征和它的永久性的私人目的之间的矛盾。认为无论哪一类实业家,也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作为矛盾的主要工具,同样能够凭借“充满生气”的意志的作用去克服它。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需要拒不承认他们活动的真实意图,即获取个人利益。正像巴兰和斯威齐指出的,“利润尽管不是最终的目标,却是达到一切根本性目标的必要手段。就这点而论,它们成为股份政策当前惟一的、统一的、能够用数量表示的目标,股份制理性化的检验标准和股份制成功的措施”。^① 现代经理人员在追逐利益时,确实比那些旧式企业家更加 35 精力旺盛,因为正如另一位作者所提醒的,“随着我们的大企业家迅速地越来越多地雇用经济学家,市场分析师和其他类型的专家和经营顾问,……合理地谋求利益越来越表现在企业的行为中。”^②

就这个观点来看,由经理控制的企业股东没有理由担心他们的利益会成为外国人祭坛上的牺牲品。在经理和股东之间完全可能发生关系紧张的情况,并且有时会发展成为冲突。例如,股东可能感到经理们没有足够的红利意识,或者说对他们自己在报酬上过于慷慨,或者过多地把钱花在不是直接或明显地与谋利有关的项目上;而经理方面会感到股东们或者至少他们中那些总是自以为是的人,是贪婪、无知和目光短浅之辈。但是,这些只是在战略上一致的情况下策略上的分歧,无论如何那些感到有些不满而

①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第40页。

② J.S. 厄尔利:《对讨论某些经济理论新发展的影响之我见;解说和评价》,载《美国经济评论》,1957年5月,第47卷,第2期,第333—334页。

就真的只有放弃自己股份的股东,毕竟是极少数。因此,事实依然是,无论如何事情绝对不致于是,经理的功能成为执行经理任务之人和代表他们执行任务的人之间离间的因素。他们之间存在的目的和动机的分歧为一个基本的集团的利益所掩盖。

总之,根据经理所有制,分离的观点可能被推向一个极端。因为通常看到的,经理在他们的企业中常常又是大股东。科尔柯写道,在美国,“经理阶级在拥有股份的人当中是最大的单独的群体;这个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的股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①此外,经理还可以通过对股票的选择在最优惠的条件下增加他们持有额。^② 36 经理收入的绝大部分可能不是依靠股份所有权或来自这种所有权,但是,经理似乎不论在什么时候还是很少把他们拥有的股份当作无足轻重的财产。^③ 由此看来,经理与他控制的资源相“分离”的情景,看来是过分夸大了。

此外,高工资是上层经理阶层共同的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他们

① 科尔柯:《美国的财富和权力》,第76页。同时参见C.W.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版,第121—122页。还有D.维拉里戈:《股份所有权和对公司的控制》,载《大学新思想》(1961年秋季和1962年冬季号),第2卷,第33—77页,第45—65页。

② “最近一份全国工业大会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1950年至1960年这个时期,在215个最大的总经理中,通过对股票的选择,有73%至少得到5万美元,32%得到了25万美元,8%的人得到至少100万美元”(R.C.海尔布伦纳:《来自上层对于实业观念变革的看法》,载E.F.切特(主编):《创大业》,1964年版,第25页)。到1957年,在纽约或是美国股票交易所登记的工业公司中,有77%制订了选择计划(E.F.切特:《新的实业之殿,为什么经理谋求社会责任》,载切特,前引书,第178页)。科尔柯还指出,“1957年初,通用汽车公司的25名官员每人平均拥有11500份股份,如果说他们确实已经选择了想通过他们的股份控制通用汽车公司,他们拥有的股份合在一起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这些人中每一个人都在公司中拥有将近50万美元的股份……”(《美国的财富和权力》,第65页)。

③ 如希恩先生指出的,“例如弗里德里克·C.唐纳主席只拥有0.017%的通用汽车公司已发行的股票,但现在价值却为391.7万美元。林恩·A.唐森主席拥有0.117%的克莱斯勒的股票,价值大约238万美元。他们在这些投资中获得的利益很难说与个人无关”(《大企业家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第242页)。

事实上都拥有很高的工资。因此,一个作者写道:“[在美国]那些首屈一指的大公司的总经理们的年工资超过 25 万美元完全是常见现象,拥有最高工资者并不十分罕见,这还不包括足以使得总经理收入翻番的股票的红利和减价购买股票的特权。”^① 此外,根据《财富》杂志的研究,在 900 名美国上层总经理中,有 80% 除了股份、年金和退休金、支出项目等等外,年收入都在 50000 美元以上;^② 而科尔柯提出的数字是,1958 年美国收入最多的 1700 个大公司总经理中,中等收入者为 73600 美元。^③ 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经理阶层的上层可能不那么幸运,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处于收入金字塔的最顶层。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这些国家中,经理集团的社会根源一般来说和其他高收入者和豪富的根源是类似的。一位作者说,在美国,³⁷ “说到现代工业中经理人员的聘用时,三种各不相同的研究都大致表明了同一情况:绝大多数大公司的经理来自中等阶级上层或上等阶级家庭,他们的父亲都是从事实业的”。^④ 格拉尼克对西欧评论说,“尽管英国并不特殊,大陆实业界的主要特点是所有的经理阶层主要来自资产拥有者,他们根据自己拥有的私人财产来思考和行动”。^⑤ 把英国排斥在这种模式之外看来并不公正。用古兹曼先生的话来说,事情完全可能是这样:“相当大部分的经理总是从那些已进入工业界而处于工厂低层的人中补充——并不是他们中所有的人必需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后代”。^⑥ 晚近的材料指出,

① W. E. 穆尔:《股份公司的经营》,1962 年版,第 13 页。

② S. 凯勒:《统治阶级以外》,1963 年版,第 224 页。

③ 科尔柯:《美国的财富和权力》,第 66 页。

④ 凯勒:《统治阶级以外》,第 63 页。

⑤ D. 格拉尼克:《欧洲行政》,1962 年版,第 30 页。

⑥ W. L. 古兹曼:《英国的政治精英》,1963 年版,第 333 页。

100个英国大公司中64%的总经理具有上等和中上等阶级成员的标记,即他们进过公学。^①很明显,这一情况说明,“处于社会底层的,实际上是不被重视的,而处于上层者则非常有利,他们有步步高升的机会,能极快地登上社会的顶端”。^②

38 最重要的是,因此似乎没有什么适当的理由去接受这样一个站得住脚的论点,即发达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一个从根本上或本质上说有别于大资本所有者的由经理和公司法人构成的“新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专门论述经理现象的章节中谈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矛盾自我解决了,它表面上看来代表了一个仅仅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转变阶段”。^③这无疑只是一种转变阶段。但是,经理们并不是自愿地成为旧秩序的掘墓人并且自愿地被带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强加给经理这种未必有的作用。经理主义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财产最重要的成分现在发展得过于庞大,以至不能完全为拥有所有权的企业主所有和经营。但是,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超越

① H. 格伦勒斯特和 R. 普赖克:《公学》,1965年版,第17页。

② R.V. 克莱门茨:《经理,对其工业事业的研究》,1958年版,第83—84页。一项最近对法国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领导人出身于资产阶级”(N. 德雷福特里-苏贝鲁:《法国工业的领导人》,1961年版,第51页)。在日本,企业领导人中最大部分其父亲本人是大企业所有者和总经理,其次是地主和小企业家之子,而没有什么人来自劳工之子。(J.C. 阿贝格伦和 H. 马纳里:《现代日本的领导人的社会来源和流动》,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第9卷,第7期,第2部分,[1960年10月],表I,第112页。)R.P. 多尔也指出,“在日本总的说来,很少有体力劳动者之子和租地农场主之子补充当代日本实业界领导人的”(R.E. 沃德和 D.A. 罗斯托(合编):《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4年版,第203页)。以瑞典为例,1958年的一项概览表明,拥有500名以上雇工的工业企业,其董事只有3.5%来自工人阶级,而且这个百分数自4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减少(G. 特尔本:《瑞典王国的权力》,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1965年,第2卷,第7期,第60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9页。

资本主义。^① 用让·梅诺的话来说,“家庭风格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之间的亲近因素远比他们之间的分裂因素更坚实。前者和后者都是资本主义的领导者”。^② 这个观点对于“工业关系”领域如同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是确实有根据的。像所有其他工人的大雇主一样,负责复杂的多重过程的企业经理人员在缓和劳动关系和企业内部“习惯发生”的冲突上,无疑和他们有利害关系;而为了寻求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能把联盟者看作一个盟友而不是对手——或二者皆有。但是,不论在其他什么地方,这意味着没有足够的证据 39 认为它造成了经理经营的企业和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在组织上的差别。^③ 在两个方面,劳动过程仍然是居支配地位的主体:发达资本主义的产业大军,不管其雇主是谁,都持续地在组织内部起作用,他们对于其权力结构的存在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们对于其政策和意图的决定也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① 需要在这里提及,加尔布雷思教授最近论述说,经理的权力实际上已转到“技术专家”手中,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它从大股份公司的最高级官员一直到处于外围的他们接触的其职能是多少无意识地遵照指令和惯例的白领和蓝领工人”(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第71页)。“不是由经理作出决定,有效的决定权完全落入了从事技术、计划和其他工作的专家手中”(前引书,第69页)。正如我在《加尔布雷思教授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记事》,1968年)一文中所议论的,这个论点对我来说很明显缺少任何真实的根据。

② J. 梅诺:《专家政治》,1964年版,第169页。在前引的论文中,希恩得出类似的结论:“很少有董事认为,广泛地控制公司的经理在从事他们的业务时,同更加细密地控制着公司的所有者有什么不同;认为一个经理由于只拥有公司股份很少一部分,因而他缺乏努力去争取利润的动力,是不实际的”(《大实业界的所有者》,第183,242页)。

③ 例如,可参见塞尔日·马莱:《新工人阶级》一书中对于法国某些最现代化的企业中劳工关系研究的有趣的例子。马莱对此研究之一认为,“管理着约翰牛的经理和技术专家不是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试图起劳动关系先驱者的作用,而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能够,他们都使用传统的指导和惩罚的方法……”(第81页)。同时也参见 R. 布劳勒:《异化和自由,工厂工人和他们的工业》,1964年版。

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理主要来自有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阶级。但是,这只是向富裕阶层和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指挥部门聘用人才过程的一个例子——虽然一些家族宣称这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其“精英是迅速地流动着”的社会。

事实上,这些社会中对精英人才的聘用完全具有世袭性的特点。工人阶级进入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机会一般说来是非常少的。正如韦斯特加德先生指出的,“有大量的个人在不同阶层之间运动”,但是,“这种运动的大多数在社会空间中只跨过很短的距离,在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内部的移动比在他们之间的移动要多得多,而且它还有这样的特征,即它在机会分配上总是极不平等的”。^① 以直到1960年的资料为基础的40研究已经发现,能够通过被密勒教授称为“大跳跃”而进入实业和独立职业群体的体力劳动者之子的数目,几乎完全在5%以下,在美国这个数字较高,将近8%。^② 出身于有产者甚至有一个富有的父母对于取得物质上或职业上的成就可能不是关键性的;但是,就像是加入一个入会条件苛刻的俱乐部,在任何情况下其成员对于巩固和获取利益的机会,肯定有

① J. 韦斯特加德:《摧毁阶级,一个当代的神话》,载 P. 安德逊和 R. 布莱克奔(合编):《朝着社会主义》,1965年版,第89页。对于这种阶级之间的运动而不是阶级之间的流动,可以参见 R. 本迪克斯和 S.M. 利普塞特:《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1964年版,第1章。

② S.M. 密勒:《比较社会流动》,载《当代社会学》,1960年,第9卷,第1期,第39—40页。同时参见 D.V. 格拉斯(主编):《英国的社会流动》,1954年版。

着极大的方便。^①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经理主义的普及正方便了哈罗德·拉斯基常说的父母们精心的选择。不像所有者资本主义那样,要想进入经理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上层,越来越要求某种正规教育的资格,而这对富裕家庭的子女来说就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女容易得多——这对所有其他职业的资格也是一样的。^②凭教育资格很明显不足以上升到经理阶层的顶层,情况也常常不是这样。但是,实业的专业化趋向已十分明显,至少,要获得这样一个特殊的起跑点,越来越要求在大学或相当的学院中取得某种正式的教育资格;而这对于取得其他的精英地位甚至更是如此。

但是,这种体制对上等和中等阶级父母的子女比那些其他阶级父母的子女更容易接受。数年前一项概略的调查曾这样指出:

……就其实质来说,学生群体的构成在整个欧洲都差不多。无论怎样规定,上等阶级和上中等阶级从未处于绝对少数(在荷兰是45%),通常是占真正的多数(在瑞典为56%,在地中海国家超过80%)。这种均势主要是由领取工资的受雇者、小业主和农业团体人士的子女造成的——甚至在那里差不多同样富裕的工人阶级子女其代表数也可怜得很——最多不过10%至15%,多数情况下是4%至

^① “自我聘用——这是一种家族的无形之手——它当然在上层人士的事业中起一种比在一般社会中更大的作用”(R. 达伦多夫:《最近西欧社会的变革》,载《代达罗斯》,1964年夏季号,第235页)。

^② 这一点并非与政治毫不相干。如梅诺教授指出的,“达到小学水准便结束教育,对于有意成为议员候选人者是极为不利的”。(J. 梅诺:《议会职业》,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61年,第13卷,第4期,第520页。)

8%。^①

达伦多夫教授关于联邦德国曾说过这样的话：

……直到最近，所有德国大学的学生只有5%来自那些在整个职业结构中刚刚超过50%的家庭。这个比例现在刚刚上升到6%以上，但这仍然非常低。^②

两位法国作者对他们的国家曾经评述说：

……根据其父辈的职业对进入大学的机会的估计表明，农业工资收入者的子女不到1%，实业界人士子女为70%，自由职业者的子女为80%以上。这些统计清楚地表明，教育体制客观上对于一个完全不属于特权阶级人士的排挤是如此彻底。^③

关于英国，罗宾斯1963年的报告表明：

父母从事“高级职业”而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年青人为54%，而那些父亲是熟练体力劳动职业的青年为4%，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④

一份对于战后年代美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比较考察报告表明：

① A. 克尔：《欧洲大学》，1962年版，第51页。关于英国，参见下一个脚注所引书，第43页。

② K. 达伦多夫：《德国教育的危机》，载《当代史杂志》，1967年，第2卷，第3期，第143页。

③ P. 布尔迪埃和J.C. 帕斯朗：《继承者》，1964年版，第13—14页。同时参见M. 普拉迪里：《社会继承和提升机会》，载“达拉斯”《利润分享》，和H. 吉拉尔：《法国的社会成就》，1961年版，第345页以下。

④ 《高等教育》，卡姆登，2154号，1963年，第51页。两位英国社会学家也指出，“一个非熟练体力劳动者的女儿进入大学的最大可能机会只有五百至六分之一——这比那些出生于自由职业家庭的女孩的几率要低一百倍。”（A. 利特尔和J. 韦斯特加德：《英格兰和威尔士教育机会上阶级差别的趋向》，载《英国社会学杂志》，1964年，第15卷，第4期，第307—308页。

……总的情况……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确不平等。⁴² 社会中非工人和非农民家庭子女的学生占五分之三至十分之九,然而这个社会集团在任何社会中只占很小一部分。^①

关于美国本迪克斯和利普塞特在 1959 年是这样写的:

……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大学中压倒多数的学生是实业家、富裕的农场主或专业人士的子女,^②

而另一个作者在 1961 年指出:

……可笑的是,甚至美国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子女得以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几乎是 12 比 1。^③

这种上等和中等阶级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压倒优势简直令人吃惊。这样的教育要求有早期准备,而工人阶级子女很少有希望接受这种早期准备。一般地说,这些儿童进入的学校,迈耶尔恰当地称之为一种“看管制度”,在那里,学校允许学生将时间用于从事一些与本阶级相称的工作,而不像出身其他阶级的孩子去劈柴和担水。达伦多夫教授所说的与联邦德国直接相联系的情况,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其他地方:

[他写道]德国社会有时被一些社会学家描述为而常常为我们的政治家们所承认的事实上无阶级的社会,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常说,在现代世界中很明显这些阶级和社会阶层都已经消失了,现今到处人人机会均等,等等。对我来说,如果研究一下教育问题,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鲜明的德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它反映了希望保持其社会地位的人的愿望,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雄心壮志多少受制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社

① C. A. 安德逊:《与经济式样相联系的大学学生的社会等级:一种国际比较》,载《第三世界社会学大会会报》,1956年,第5卷,第51—52页。

② 本迪克斯和利普塞特:《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第94页。

③ M. 迈耶尔:《学校》,1961年,第16页。

会等级。^①

43 当然,许多教师确实在寻求并且有能力在教育上起一种积极的作用。但是事实仍然是这样,工人阶级的子女不得不在与他们的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同路人相比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去抗争,并且会遭遇到大量的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障碍。^②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障碍,工人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还是在持续地增加,^③这并不只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与旧式的工业体制相比要求训练有素的人才。但是,正如1967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的,“教育发展自身没有必要蔑视不同阶级之间的参加者”。^④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提供给它的制度之间存在的旧差别,便具有新的重要性。某些制度比其他一些制度提供了多得多的各种设施,享有更高的声誉,并且似乎更能给社会的指挥部门提供人才。进入这些岗位当然要求比其他岗位更严格的资格,而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学生进入这些岗位也似乎比工人阶级的学生更为容易。

那些担心“能人统治”的社会的人认为起初多少还有点是人人平等的,但最终只是根据能力来评判,因此无须大惊小怪:竞争就

① R. 达伦多夫:《德国教育的危机》,第144页。同时参见H. 亚当姆:《社会通过教育运转吗?》,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1964年,第1卷,第4页。

② 例如参见J. W. B. 道格拉斯:《家庭和学校》,1964年版;J. 弗洛德等:《社会阶级和教育机会》;本迪克斯和利普塞特:《工业社会的社会运转》,第94—95页,脚注24;《高等教育》,附录I,(卡姆登,2154—I),第2部分《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因素》,和第3部分《能力上的拼搏》;P. 布尔迪埃:《文化遗产的传播》,载“达拉斯”《利益分享》;和A. 吉拉尔:《法国第二次教育的选择》,载A. H. 哈尔西,J. 弗罗德和C. A. 安德逊(合编):《教育,经济和社会》,1961年版,第186页以下。

③ 例如,《时代》周刊的记者在报道1967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教育部长会议时说,“英国大学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体力劳动者的子女。这与瑞典的14%,法国的8.3%,西德的5.3%形成对比”(《时代》,1967年11月20日)。

④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教育计划的社会目标》,1967年版,第307页。

是愚弄工人阶级的竞争者。

即使所有这一切都不管它,但也必须记住,大学资格只是为大学以后的竞争提供一个起点。但是即使在这里,竞争也是被控制的。因为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在干预,并且实际上影响事业的前途。⁴⁴其中之一是联系着精英集团成员的“关系”网,而工人阶级家庭从整体上说缺乏良好的关系。

还要补充一点,并非更多的“机会均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助于在它所存在的环境里出现真正的平等。它也许会使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子女上升到“顶层”,但是这远不足以摧毁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寡头制,而只是有助于加强它们。把新的社会血液注入经济和社会金字塔的上层,势必会对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造成一种威胁,但是这不会威胁到这个制度本身。即使把通向顶层“能人政治”的道路同现存经济体制接轨,也只会保证一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占据现存制度的顶层阶梯。这可能被认为是希望,但是这不致于使它转变为一种不同的制度。

然而,这个观点只是学术性的。因为,对于这个社会的上等和中等阶级,包括它的企业家和经理在内,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招聘的,因此有着很高程度的社会内聚力。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阶级现在比过去有着更强的社会内聚力。一百年以前,在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贵族仍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构成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阶级。从那以后,贵族在一切地方都日渐融入工业、财政和商业企业界,并且经历着一种“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它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但它无疑已经发展得非常快。的确,贵族仍然保有大量的身分标记,而实业阶级自己不再有自己是社会新星而在实际上优越于任何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意识,甚至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从社会方面

说,对普通实业界人士来说,直到最近,贵族阶级仍占压倒优势。

45 格兰尼克先生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实业界完全未能在上等阶级中树立它的威望……在两次大战之间,实业界的威信越来越高……到 50 年代,在德国历史上传统的前工业上等阶级已经第一次失去了他们的重要性”;^① 而一位日本作者论及日本时说,“今天,那些致力于商业和工业的人士被认为是共同体的支柱,并发现进入社会最受人尊敬的上层已非常容易。财产的追逐者可以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社会风尚的变化只不过是衡量国家生活中企业界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尺度。”^② 这个过程在英国也比较明显,在那里,成功的总经理们已经能够用贵族的标志来增补资本主义的现钞,但是在这里,财富也同样是接受的,晋身的通行证。

非常相似,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功的总经理和经理,无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从他们的眼界来说,现在非常容易被纳入有产阶级。某些人可能还保持着对他们祖先缠绵的情思,但是,这似乎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已不再有重要的影响。至少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说,财富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

然而,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术语来说,财富也是一个伟大的“平

^① 格兰尼克:《欧洲行政》,第 30 页。另一个作者作出类似的评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竞争的精英集团如普鲁士乡绅、官僚集团和贵族发生让渡。在经历了最初的倒退以后,在最后十年企业家的权力迅速上升。并且他现在能够把自己看作是有影响的人物了”(G. 布朗撒尔:《德意志联邦的工业在政治中》,1965 年版,第 58 页)。

^② N. 池:《日本政治》,1958 年版,第 82 页。另一位作者指出,“最高等级的公司总经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老的财阀家族并成为战后日本主要的精英。”(A. B. 柯尔:《日本社会和政治:社会分类和流动对政治的影响》,1956 年版,第 86 页。)

等主义者”。熊彼特曾经说过，“阶级的成员……用同一双眼睛，同一观点，从同一个方向来注视世界的同一部分……彼此间了解得很透彻”。^① 这个观点无须引伸得更远。阶级的成员除了在人与人之间造成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致性外，还存在其他的影响；根据逆定理，阶级的成员可能根本不会产生如此的一致。姑且不谈宗教和政治上的歧异，有产阶级的成员很明显时常存在大量具体的政策和问题上的分裂。

但是这一点不应当推引得过远。阿隆教授曾经令人啼笑皆非地抱怨说，他的“失望”之一是发现那些“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被认为决定事件的进程”，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他们缺乏政治观念”[原文如此——作者]；“就近十年法国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看，无法说清法国的大、中、小资本家，垄断资本家和托拉斯的人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我曾遇到一些这个‘不幸的群体’的代表，但我从未听到他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有何明确而一致的看法”。^②

这可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印象。因为发生在保守派范围内的有关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只存在于法国经济精英中间而其他人被严格排斥在外。在这些精英人士中可能有一些希望加快非殖民化的人，但是不知何故，历史上没有记载下存在着来自代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或者是争取私人企业国有化，争取在较大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或是为了激进地扩大社会利益，或者是为了扩大工会权力而斗争的人的广泛的群

① J. 熊彼特：《社会阶级在同质的种族环境中》，载《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55年版，第109页。

② R. 阿隆：《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平等的政治制度的理论》，1958年版，第81页。

众压力。^①

统治阶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方面固有的分歧,这也许是真的,但在对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关键问题上,却并不排除基本的政治上的一致。这一事实明显表现在统治阶级都一致地支持保守党:正如将要在后面进一步讨论的,这个阶级的某些部分可能会支持别的处于竞争状态的保守党派,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支持反对保守党的政党。事实上,统治阶级已经十分充分地比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更好地意识到“阶级自身”的存在,即它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富人总是比穷人有更强烈的“阶级意识”。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这方面的记录并不是明显的特别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就明白,像保卫个人利益一样在保卫阶级利益上犯了错误。但是这也没有影响这样一个问题,富有者和有产者能够超越他们所有的分歧和异见,在维护给他们提供特权的社会秩序方面,始终基本保持团结,对此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如科尔柯教授在论及美国时指出的:

……美国实业史显著的事实是,在企业家中,不管是什么行业的和其重要性如何,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值得用这种或那种形式维护的;这导致了一种共同的态度,即没有必要反对经济领域中重大的创新,但是他们反对激进的经济纲领,因为它们即使不动摇现存秩序,也可能在改变经济权力集中化的过程中损害稳定。^②

^① 达伦多夫教授在最近研究联邦德国的著作中与研究法国的阿隆教授一样,强烈地坚持认为,德国的精英缺少思想意识和政治上的聚合力,但是他随即指出“精英们在改变国家结构上只有在很小的可能性”(R. 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1968年版,第275页)。这可能被认为并不是不利于聚合的基础。他还猜测“那些处于德国社会顶层的人在本质上并非相互陌生”(第271页)。但是,这些“陌生人”有着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即他们都希望“尽可能小地改变目前的结构”。

^② 科尔柯:《保守主义的胜利》,第12页。

应当补充的是,并没有哪怕是最小的证据足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理这个因素,在需要保持和加强私人所有制和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资源,以及,如早已指出的,在需要提高因所有权和控制权而可能获得最大利润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起误导作用。

即使这样,不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多元的经济精英;并且,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具有整合的倾向,这些精英却构成了殊异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竞争极大地影响了政治进程。然而,这种“精英多元论”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社会各 48 个分离的精英构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他们有着高度的内聚力,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的使他们超越某些分歧和异见。

就目前研究的情况看,这个现存的占优势的阶级所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问题并不在于这个阶级是否拥有行使政治权力和影响的实际手段。没有人会真正否认这样的事实:至少无人真正对这一点持否认态度。问题在于,这个统治阶级是否行使着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大的权力和影响;它是否拥有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权力;它那在经济生活极其重要领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否也能保证在发达资本主义特定政治情况下拥有政治决策的控制权。这把我们拉回到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作用和性质的问题上去。

第三章 国家制度和国家精英

有一个很少讨论但却是关于国家的入门的问题,如果要充分地集中地讨论国家的性质和作用,就需要对它加以注意。事实是,“国家”并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所谓“国家”,其本体是由一系列特殊机构共同构成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可被称为“国家制度”的要素。

这个观点决没有学究气。因为把国家要素之一——通常是政府——作为国家本身,就会在讨论国家性质和国家权力的产生时成为一个导致混乱的主要因素;这种混乱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后果。依此,如果相信政府事实上就是国家,也就可能相信有了政府权力就等于获得了国家权力。这种以关于国家权力本质的众多假设为基础的信念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并令人失望。要理解国家权力的本质,首先必须区别并联系起来看待构成国家体系的各种要素。

对于通常把政府和国家看成同义语,并不十分令人惊奇。因为正是政府代表国家说话。韦伯在论及国家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为了成为国家,它必须“成功地要求在一个既定的领域内取得合法地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但是,“国家”不能要求一切东西,只有当时的政府,或是它充分授权的代理人,才能这样做。俗话说,人们不是忠于当时的政府,而是忠于国家。但是,根据这个观点,国家乃是一个模糊的实体;当人们作出选择把他们的忠诚给予国家时,他们也即把忠诚给了自己选择的政府而顺从之。对政府命

令的蔑视便是对国家的蔑视,惟有政府能够以国家的名义说话,并对国家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对待国家其他因素或其外部势力上,政府都必须表现出强而有力。相反,它也许是非常弱的,而只为这种或那种其他因素和力量提供掩饰真相的门面。换言之,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说话,并被正式赋予国家的权力。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已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权力。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国家权力,是需要确定的主要问题之一。

需要加以考察的国家制度的第二个因素是行政机构,它现在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它包含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构,时常与某些内阁部门有关,或者或多或少地享有自主权——如公共团体,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等——并与现在国家直接或间接介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活动的管理机构有关。这种存在于所有社会,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机构和官僚机构,其令人吃惊地发展,无疑是当代生活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它的领导人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对于决定国家的作用,也是十分关键的。

形式上,官员是听从政治执行机构的,是它顺从的工具,是执行其意愿的工具。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任何地方,很明显,行政过程也就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至少从与政策制定的关连这个范畴来说,从上层行政工作者来说,行政永远既是政治也是执行机构。它之所以如此,并不必然由于行政官员希望它这样。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可能完全希望避开“政治”,而把“政治”事务留给政治家去做;或者在讨论问题时完全“非政治化”。卡尔·曼海姆⁵¹曾经提到,“所有官僚思想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转变为行政问题”。^①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味着政治问题、态度和假

^① K. 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52年版,第105页。

没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被纳入“行政问题”，并相应地影响着行政建议和行动的性质。官员和行政人员都不可能在提出建议时或者独自作出可能被采纳的决定时，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的外衣。最高层文官和其他国家行政官员拥有权力的状况，在国与国、部门与部门、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差别很大。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些人人都不能直接地为人明察地行使国家权力。如果政权虚弱，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发生的那样，内阁不断地倒台，不能保持内阁的稳定，文官就会乘虚而入，而常常会在政策制定中起主导作用。但是，甚至在那里，政治执行机构也是强有力和稳定的，最高层行政官员仍然能够通过政府对政府时常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发现非常难以决断的问题提供咨询而在重大政策领域起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这种社会中官僚权力的性质和大小可能发生许多争论，但是，认为最高层文官会降格为只是政策的工具的地位，这种可能性被排除在外。正如梅诺教授所指出的，“确定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绝对分界，从来不曾比一个意识形态要素不容忽视的简单的法律上的假定，更为明显”。^①

这些考虑中有一些适用于国家体制的其他部分。例如，它们适用于这些因素中第三个部分即军队，就目前情况看，也许还应当加上国家准军事的、保安和警察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与“强力控制”有关的分支。

- 52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高压机器是一种巨大的无计划延伸的消耗财力的设施，它的专业领导人是那些在国家体制和社会中有很高身分和有很大影响的人士。军事设施的膨胀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这个被证明是首先沿着

^① 梅诺：《专家政治》，第 68 页。

高度文明化方向发展的国家那样明显。^①而且,这种膨胀也同样发生在“国内公安”部队中,这不仅仅美国如此;在此以前,除了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那么多人受雇于警察和这种或那种镇压工作。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行政机构和强制机构在宪法上的正式地位是通过服务于当时的政府来为国家服务。与之相比,至少在西方方式样的政治制度中还根本没有在宪法上正式规定司法机构有职责满足其政府的意图。它们在宪法上独立于政治执行机构,并通过保护所有权和其他保证人来保护它。实际上,司法独立的概念认为不仅需要让司法不去承担政治执行机构的责任,而且它们在行动中还有责任保护公民免受政治执行机构和它的代理人的侵害,并且在国家和社会成员的冲突中,作为后者权力和自由的捍卫者来行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意味着众多不同的东西。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司法是国家体制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时常深刻地影响到国家权力的执行。

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国家体制的第五个因素,即各种次中央政府单位。作为它的一个方面,次中央政府作为行政机构的触角和触须,组成中央政府和行政机构。在某些政治体制中,它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在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次中央政府要比一种行政设置的作用稍大一些。除了作为国家的一个代理人以外,这些政府单位在传统上还起着另外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中央和边缘地区交流和施政的渠道,而且也反映边缘地区的声音和代表边缘地区的特殊利益,它们一直是一种克服地方特殊化的手段,同时也是它们表达意见的讲坛,是中央对其控制和干预的工具。对于所有作为这些国家政府

^① 参见米尔斯:《权力精英》,第8章。

主要特征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次中央机构就其自己的权利来说仍然是权力结构,因此能够非常明显地影响它统治下的居民的生活,这在美国那样的联邦制之下特别明显。

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机构,同样有许多问题要讨论。现在不仅它们的活动环绕着政府进行;而且甚至在那里,如同在美国那样,它们在宪法和政治权力中仍是正式的独立的机构。它们与政治执行机构的关系不只是起一种纯粹批评或阻碍作用,那种关系既是冲突关系又是合作关系。

根本不存在区分亲政府和反政府的问题。双方都表现出这种二元性。因为反对党不可能完全持不合作态度。只要加入了立法工作,它们就要帮助政府工作。这成为革命政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只要它们进入现有的议会机构,无论怎么不情愿,也只好参加它的工作,而不可能完全起阻碍作用。它们应当判断所付出的代价。但是,随着进入议会机构,它们就至少可能参与一种特别的政治游戏,并且必须根据并非由它们自己选择的准则去扮演这个角色。

对于执政党来说,很少有它的真心诚意地支持政治执行机构并完全屈从于它的事。这包括那些为借助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而不得被臣服、哄骗、威胁和收买的那些人。

这是立法议会拥有行使国家权力而宪法认可的既协作又批评的功能。它所分享的权力不像这些机构时常宣布的那样广泛和强大。但是,正如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讨论的,甚至在一个行政权占统治的时代,它也并非无足轻重。

54 正是这些机构——政府、行政机关、军队和警察、司法分支机构、次中央政府和议会——它们构成了“国家”。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国家制度的形式。国家权力正是存在于这些制度之中,权力的行使正是通过每个在这些机构中占居领导职位的

人——总统、首相和他们的大臣阁僚；高级文官和其他国家行政官员；高级军官；法庭的法官；议会两院的一些领导人，尽管这些人常常又是政治执行机构的高级官员；以及在他们后面躲得远远的一些次中央单位的政治和行政领导人，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国家中。就是这些人构成了可称为国家精英的集团。

当然，国家制度并不是政治制度的同义语。后者包括许多组织，例如政党和压力集团，它们在政治进程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实际上影响着国家制度的实施。还有许多其他根本不属于“政治性的”机构，例如大股份公司、教会和大众媒体等。很明显，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可能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时，必须统一考虑。

然而，就是在国家制度以外拥有权力而其权力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制度，还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是国家权力的实际贮存所；为了分析这些社会中国家的作用，对于各个不同的组织实体拥有国家权力的国家精英，必须加以考虑。

在分析国家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关系时特别需要这样做。在进行这种分析时，首先要指出这一明显而基本的事实，即这个阶级与国家发生的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典型的政治条件下，不能把它们假定为主要代理人。确实可以发现，这种关系事实上是非常密切的，拥有国家权力的人由于诸种不同的原因就是私人经济权力的代理人——所以，对此话不用作过分引伸，那些支配着权力的人就是“统治阶级”。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必须加以限定。

二

卡尔·考茨基在 1902 年的著作中评述说，“资本主义阶级的统治并不是治理”，然而他立即补充说，“它对于自己控制政府感到满

足”。^① 这是一个需要检验的命题。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但并不实际上“治理”，这一点，却无疑是真实的。人们必须回溯到早期资本主义史的个别事例上去，例如威尼斯和卢卑克的城市商业贵族阶级，就可发现实业人士直接的统治作用。^② 除了这些情况，资本主义阶级一般来说把国家视为一个分离的统一体——甚至在它上升到掌权地位的时候，作为一种异化的有时是敌对的因素，它时常处于地位已确定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它们拥有的国家权力在法国不得不为革命所摧毁，而在 19 世纪的英国则被侵蚀^③，在英国这种侵蚀过程被 17 世纪的暴力所造成的宪政和政治变革极大地促进。^④

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实业家本人在政府中取得主要职位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通常在政府执行机构和同时在国家体制的其他部分很好地得到代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晚近的历史中尤其真实。

这种实业家进入国家体制的情况通常被大大低估。例如马克斯·韦伯便相信工业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参加政治生活所要求的那种特别的素质；^⑤ 而熊彼特在谈到“工业家和商人”时写道，“毫无疑问，对他来说，要作为统治人物，没有任何神秘魔力的迹象。股票交易所对于圣盘^⑥来说是一个可怜的替代物……一个在事务所中可以称作天才的人，常常可能在它以外的客厅里和讲坛上被喝倒彩，了解这些之后他希望离开政治单身独处”。^⑦ 雷蒙德·阿

① K. 考茨基：《社会革命》，1903 年版，第 13 页。

② 例如参见 O. G. 柯克斯：《资本主义的基础》，1959 年版。

③ 例如参见 J. D. 金斯利：《代议制官僚》，1944 年版。

④ 对于这一点，例如参见小巴林顿·摩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第 1 章。

⑤ R. 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一个知识分子的肖像》，1960 年版，第 436 页。

⑥ 传说中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用的杯盘。——译者

⑦ J.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50 年版，第 137—138 页。

隆最近不是那么鲜明但却相当肯定地写道,实业家“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甚至在英国,他们都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在对生产资料的管理和在社会生活中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特点在于,在大多数国家中他们自己并没有发挥政治作用的欲望。”^①

实业家他们自己时常倾向于强调他们自己远离于政治,甚至厌恶“政治”;他们总是倾向于把政治家看作一种可怜的人,用尊敬的话说,他们从来不曾找到一本薪金发放册,因此他们关于真实世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然而,只要他是一个冷静务实的人而试图介入事务,他在工作中就一定会找到工资册,他因此也会了解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这里的意思是说,实业家和行政官员一样,希望把争论的问题极度地“非政治化”,并且根据实业家推崇的原则来对这些问题作出评判。这看起来像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避,但在事实上,他们不知不觉地加入了政治事务。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直接地或以个人的方式提出的实业家远离政治事务的观点和不愿意谋求政治权力的观点,是很不实际的;而且同样过低地估计这种谋求权力的成功程度。

在美国,从1889年到1949年,实业家事实上是内阁中惟一最大的职业集团;在这些年代里,内阁成员人数的60%是这种或那种实业界人士。^② 在1953年到1961年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⁵⁷ 内阁中企业家的人数并非不突出。^③ 至于说到1886至1950年英国内阁成员,包括邦纳·劳、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三位英国首相在内,

① R.阿隆:《阶级斗争》,1964年版,第280页。

② H.D.拉斯韦尔等:《精英的比较研究》,1952年版,第30页。

③ 参见米尔斯:《权力精英》,第232页以下。

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实业家。^① 在 1951 年至 1964 年保守党内阁执政期间,实业家的代表也根本不在少数。尽管实业家在其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够出色,但在任何地方他们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政府本身决不是实业家在国家体制中有直接发言权的惟一处所。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明确地说,这个体制的行政机构上层是他们不断渗透的领地。

国家干涉已经发展得非常快,并且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资本主义世界的地方采取了更加精巧的制度形式。^②但是,无论在精巧的“法兰西计划”还是在它们的执行中,属于实业界的特别是大企业的人士对于任何其他职业或“部门”集团的人士都具有一种明显的、几乎是压倒的优势。正如肖恩菲尔德先生指出的,“在某些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法兰西计划的发展,可以被认为是高级文官和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们之间一种自愿的共谋行动。政治家和有组织的劳工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抛到一边”。^③

58 实业家统治着其他经济集团的现象,同样也可以在国家的财政和信贷机构^④ 和国有化的部门发现。^⑤ 创建这种部门常常被看

① 拉斯韦尔等:《精英的比较研究》,第 30 页。同时参见古兹曼:《英国的政治精英》,第 92 页以下。

② 然而,甚至在这里,“计划”的概念也不应当被赋予过于积极的含义:对此,可参见 J. 希尔安:《战后法国对工业的推动和控制》,1963 年版。他指出,“整个 50 年代,法国计划的安排是使用一种能使不同的支持者保持合作的温和的制度,而没有对拒绝合作的人附以任何直接的惩罚”(第 181 页);该作者还描述说,法国的“计划者”是“一群具有善良意向和聪明的人士,他们试图帮助政府和企业家作出清醒的选择”。(第 181 页)

③ 肖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第 128 页。

④ 关于英国,参见 S. 威尔逊和 T. 勒普顿:《上层决策者的社会背景和联系》,载《经济和社会研究中的曼彻斯特学派》,第 27 卷,1959 年版。

⑤ 例如,参见《大学和左派评论,了解内幕的人》(日期不详);C. 詹金斯:《上层的权力》,1959 年版;和 J. 休斯:《混合经济中的国有化工业》,1960 年版。

作是改变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影响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活动。但是，除了所有那些旨在阻止辅助性的国有化部分进行控制而不怕正统路线的力量外，同时还存在这样的事实，实业家力图为他们自己在那些指导性的机构中取得一个强有力的位置；更准确地说，不论实业家的政治色彩如何，他们已经被政府邀请在管理和控制公有部门方面起主要作用。^① 相比之下，工党的代表则是以非常可怜的老父母的形象出现——不，应当补充说，引进大批“稳健的”工会领袖会给事实上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一个主要部分的制度方向，带来许多影响。

实业家不直接卷入政府和行政机构(同时也包括议会议院^②)的说法明显是个谎言。他们甚至比密切关心经济生活的国家更为密切地介入了政府活动，无论在哪里，只要国家以一种与其他经济群体相比异常有力的姿态去“干涉”的地方，在那里也就可以发现实业家在影响甚至决定这种干涉的性质。

现在完全可以承认，进入国家体制的实业家，不论其能力如何，恐怕都不能认为他们是一般的实业界的代表，更不能说他们只是他们自己的工业或企业的代表。^③ 但是，尽管他们以国家名义考虑问题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但卷入政府和行政机构的实业家们似乎都不想看到那些与他们设想的企业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有多大的价值。由于他们似乎明确地相信这样的政策将不利于“国家利益”，他们不太情愿使自己成为这样的改革的倡导者。对于实业家来说，要求他们把自己的股份和股票作为进入政府官职的买路

① 最近的典型的例子是威尔逊政府任命了一个与工党没有任何联系的著名实业家去领导新实现国有化的(更精确地说，是再次实行国有化的)钢铁公司。

② 参见原书第66页。

③ 然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的结论说：“只有象征性地领取菲薄薪金的人(当时这样称呼他们)是一些‘拿着斧头苦练的人’和‘说客’”(D. C. 布莱斯德尔：《压力下的美国民主》，1950年版，第190页)。

钱,比要他们抛弃自己实业家的地位和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容易得多。

尽管实业界人士实实在在地参与了国家事务,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这就是,他们从未构成而现在也没有构成国家精英整体中相当小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准确地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与前工业阶级、贵族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比,他们并没有构成一个“统治”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可以几乎不需要独特的相互衔接的国家机器,他们自己实际上充当了国家。^①资本主义的经济精英始终没有取得,而且从资本主义的性质来说,也决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

然而,这种企业家与国家制度保持相对距离的意义,很明显为国家精英独特的社会构成所明显地削弱。实业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属于上等和中等阶级——同样,国家精英中来自这些阶级的成员,如果不占压倒优势,也占据了多数。这种模式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类似,它不仅适用于行政、司法和军事精英这些不受普选制和政治竞争影响的官职,而且可以适用于
60 不受其影响的政治官员和选任官员。从社会方面看,任何地方以及在国家体制的所有机构,都具有极其鲜明的上等和中等阶级的特性。在此同时,出现一端缓慢地减少贵族的成分,在另一端缓慢地增加着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成分。招聘的领域比通常推荐的领域窄得多。正如达伦多夫教授所指出的,今日大多数欧洲

^① 哈巴库克教授论及18世纪英国时这样说,“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大臣通常来自大家族,尽管1711年法令规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可以轻易地躲开,但正常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确保了大多数议员来自土地所有者家庭。地方政府同样并未落入官僚之手,而是属于通常由大土地所有者担任的治安法官。土地税也由同一个阶级支配,甚至在主要职位由自由职业者担任的部门中,比较重要的和有尊严的位置通常是由来自土地所有者家族的人士充任。(H. J. 哈巴库克:《英国》,载A. 古德温(主编):《18世纪的欧洲贵族》,1953年版,第11-12页。)这里需要指出,土地所有者家族在军队、海军和教会中占据支配地位。

国家，“中等阶级”形成为招聘的权力精英的主要基础，根据特权、收入和影响，他们中有5%是职业寡头。^①

在由任命组成的国家制度的机构中，这种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在和这个制度之外的经济和社会寡头制有关的问题中讨论过了，也就是说，上等和中等阶级父母的子女比其他儿童有更广泛的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而这是取得国家体制中精英位置所要求的。教育中机会极不均等也在国家职务的聘用中反映出来，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具有进入这些部门必不可少的资格。

这样，在法国进入上层行政官职的主要手段是进入国民行政学院。但是，梅诺教授指出，1962年社会出身属于“居民中最幸运者”的71名大学生中，有56名成功地考入了国民行政学院；而在22名成功的文官候选人中，有10名属于这同一个阶级。在得到推荐的大学生中，没有一个人的父亲是工人或农民。梅诺评论说，“大体上说，上层职务的社会选择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与前者不同的是，尽管进行了1945年的改革，‘民主化’的实施仍然非常有限”。^② 对于法国军队^③ 和法国司法界^④，也同样如此。

61

① 达伦多夫：《欧洲社会阶级结构最近的变化》，第238页。

② 梅诺：《专家政治》，第51页。另一位作者指出，在1952年至1958年，在547名成功地作为候选人进入国民行政学院的人中有60%属于“社会等级中人数最少但地位最高的阶层，即A₁和A₂级职务，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老板”。（A. 吉拉尔：《法国的社会成就》，1961年版，第308页）。同时参见F. 邦和M. A. 比尔尼尔：《新知识分子》，1966年版。T. B. 波特摩尔：《法国的高级文官》，载《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会会报》，1953年版；和P. 拉卢米尔：《财政监察机器》，1959年版。

③ 参见R. 吉拉尔代：《1945—1962年法国的军事危机》，1964年版，第39—46页。可是另一个作者指出，“把军队官员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社会来源的重心时，如果遵循在军队威信很低时期的模式，恐怕会降低到50年代后期中等阶级的下层。然而中等和上等阶级较高的等级和贵族中较低的等级尽管处在下降中，却仍然有充分的代表”（J. S. 安布勒：《1945—1962年法国军队在政治中》，第134页）。

④ 参见吉拉尔：《法国的社会成就》，第336页。

当然不是说法国在这方面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突出地“缺乏民主”。在英国大批的高级文官中,相当一部分只能持续地从非常狭窄的受限制的居民部分中吸取,其中大多数是在公学和牛津、剑桥大学受过教育的人;^①而同样明显的是上等和中等阶级在英国军队^②和司法界^③高级官员中,仍然有明显的偏重现象。

对美国来说,情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在那里,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它也有助于国家公务人员聘用范围的狭窄化。正如马修斯教授指出的:

对于那些美国的政治决策者^④来说,情况正是如此,除很少例外,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业主、官员和农场主的儿子,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工薪阶层、低工资工人、农场工人和租户的儿子……政治决策人赖以聘用的狭窄的基础是十分明显的。^⑤

62 就美国军队来说,已经有这样的评述:

……从整体上说,军队和海军的高级官员始终是由中等阶级上层人士担任,而不是真正由更上层或下层社会的人士来担任。他们中只有非常小的百分比是出生于工人阶级。^⑥

① 参见 R. K. 凯尔赛尔:《英国的高级文官》,1955年版;威尔逊和卢普顿:《最高决策者》,载《经济和社会研究的曼彻斯特学派》,第27卷,1959年版。和《文官的聘用》,调查委员会的第6次报告,H. C. 308,1964—1965年。

② 例如,参见 J. 哈维和 K. 胡德:《不列颠国家》,1958年,第112页以下。

③ 1956年有不少于76%的法官曾在公学受过教育。(格伦勒斯特和普赖克:《公学》,第17页。)同时参见“优种法律”,载于《星期日泰晤士报》,1963年8月10日。

④ “政治决策人”在这里包括“高层文官”。

⑤ D. R. 马修斯:《政治决策者的社会背景》,1954年版,第23—24页。

⑥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192页。贾诺维兹教授也提到,“美国军队的领导人通常来自具有较多特权的等级”(M. 贾诺维兹:《职业军人》,1960年版,第69页)。他还补充说,“然而,就其社会背景来说,最近的倾向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证据说明,在担任军

至于最高法院的法官,人们始终是这样评论的:

……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压倒的倾向,这就是总统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总是从社会地位优越的家族中选择……在法庭早期的历史上,他们似乎完全来自贵族绅士阶级,尽管后来逐步来自中等以上的自由职业阶级。^①

在联邦德国同样可以遇到这种上等和中等阶级占优势的情况:

……当联邦共和国不到目前人口1%的人在自己的姓名之前加上一个‘冯’字的时候,在高级官员中拥有贵族爵位的人可能实际上在增加。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家庭后代的高级文官,其人数之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明显。^②

达伦多夫教授作出了类似的评述:

……尽管打破了旧的垄断,并使得贵族的重要性减小了,从1918年至今,德国的精英集团(包括国家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续地从中等和高等的文官阶级集团中,从中等阶级中同时也从他们占有精英地位的前任那里得到补充。^③

据说在瑞典^④和日本^⑤也存在同样多的这种情况。

63

职的人士中出身较高的人士相对在减少,它转到从社会学上说更为异质的群体方面”(第89页)。但是,这个“社会学上更为异质的群体”仍然保留了出身于“实业家、自由职业者和经理”阶级的人士,他们对于那些出身于“白领”和“工人”阶级的人士具有压倒的优势(参见前引书,表14,第91页)。

① J. R. 施米德豪泽尔:《最高法院法官的群像》,载《中西部政治科学杂志》,1959年,第3卷,第45页。

② L. J. 埃丁杰:《德国决策者背景的连续性和变化》,载《西部政治季刊》,1961年,第14卷,第27页。

③ 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第228页。

④ 在政治-官僚顶层中工人儿子的数量从1949年的10%下降到1961年的9%。而在此同时,大实业家的儿子所占的比例则从12%上升到17%。”(塞博恩:《瑞典王国的权力》,第59页。)

⑤ 参见艾比格伦和万成的文章:《现代日本的领导人:社会出身和流动》。

67

除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有助于解释这种模式,还有其他的因素促成了它的形成。在这里,正像取得国家制度以外的精英位置一样,还存在一个关系网问题。当然,与顽固不化的贵族和与前工业化时代相联系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裙带风和徇私,在当代中等阶级和竞争的国家公职人员中并不存在:公职人员部分从贵族控制下解放出来,已是国家和社会中扩大资产阶级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认为甚至在一个由考试决定取舍的时代,人口中较少部分的成员不仅在进入国家较高级公职人员阶层而且在它内部向上提升的机会方面都不占有优势,则完全是不现实的。这些成员有着血缘和朋友关系,并且一般说来有强烈的价值观共识,所有这些都利于事业的成功。两位法国作者很好地指出这一点,而他们所说的很难说仅仅适用于法国:

如果一个中等出身的学生成功地通过了他的大学课程,参加了国民行政学院的入学考试,并且甚至通过了‘文化’筛选,通过也许比入学考试更严格的最后的考试,尽管如此,他还是不会与出身大资产阶级家族的人士或出身高级官吏家庭的人士处于同一水准,在争取提升的时候(在最高层次的提升比较低层次的提升就更难说)种姓因素和个人的家族关系,会持续地反作用于他。^①

那些控制和决定最高国家公职人员选择和升迁的人士,他们自己由于其社会出身或借助于他们自己职业的成就的力量,似乎也成了上等和中等阶级一员,并且似乎在他们的头脑中有着一种高级文官和军官应当怎样想、怎样说、举止行为和怎样行动的特殊思想;而这种思想是来自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毫无疑问,这些意识到一个“能人统治”时代的要求和压力的新来者,可能会有意

^① 邦和比尔尼尔:《新知识分子》,第165页。

识地试图纠正这种偏向；而面对着那些每一行动都有所准备并有能力采取和顺应种种阶级行为和思想的工人阶级候选人，他们似乎尤其想要克服这个偏向。^①“外表粗鲁的人”现在比过去更容易为人接受，但是，他们应当更好地表达起粉饰作用的美好的诺言。

马克斯·韦伯曾宣称，官僚制的发展倾向于“消灭阶级特权，其中包括采取行政手段和权力，同时根据荣誉和依靠财富而占有官职”。^②可是这完全低估了现存阶级特权能限制这种进程，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控制它。

有一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这就是一种社会淡化过程已经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出现，并且已经使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士，甚至更多的出身于中等阶级下层的人士，取得国家体制内部的精英地位。但是，说这种情况存在“民主化”，却多少有些使人费解。这里牵涉到的还不如说成是一个对来自从属阶级的最有能力而盛气凌人的新来者“资产阶级化”的过程。由于这些新人是从国家的等级制度中提升的，所以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他们都成为其地位、收入和身分使他们接近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一部分。正如已经提到的工人阶级聘用进入经济精英的例子，这样淡化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国家公职人员的阶级特征而实际上可能加强了它。还有，这种聘用由于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根据“事业向有才能者开放”的信念，常常暗示他们是不行的。

在现存的社会秩序特殊的等级制中，也不可避免地要从次等阶级中聘用一些人员到国家体制的上层，通过既成事实，使他们成为持续统治的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不然的话，目前的吸收势必会

① 也可参见第5章。

② 马克斯·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1947年版，第340页。

极大地增加；社会秩序本身也会激进地转变，因而它的社会寡头制必将瓦解。

比任命的国家体制甚至更加明显的社会淡化作用，同样表现在直接或间接地依靠选举产生的机构即政治执行机构和议会议院。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或中等阶级下层出生的人就可以毫不稀罕地进入内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为总统或首相；有时庞大的个人权力能为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完全失去社会地位的个人所获得。

这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曾经有过什么意义，将在后面讨论。但是也许应当指出，在这个阶段，来自从属阶级的人士在这个国家中那些取得高级政治官职的人中，从未构成过多数：大多数人由于社会出身和先前的职业一直属于上等和中等阶级。^①

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形式中这种程度要低些，然而仍然非常明显。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成长（当然除美国外）已经把那些不仅出身工人阶级，而且直到他们选举时他们自己仍然是工人或者至少密切地与工人阶级生活相联系的人士（有时是妇女）带入议会，尽管他们仍然只占少数；而且，甚至资产阶级政党也经历了某种社会淡化过程。不过，这后一类通常统治着议会议院的政党，仍然是由纯粹的上等和中等阶级，加上实业家和其他与各种各样财产所有者有联系的人构成其成员中相当的部分，有时完

^① 参见拉斯韦尔等著：《精英的比较研究》，第30页；古兹曼：《英国的政治精英》，第79页以下；马休斯：《政治决策者的社会基础》，第23—24页；D. 勒纳：《纳粹精英》，1951年版，第6页；L. D. 埃丁杰：《后专制领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精英》，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60年，第54卷，第1期，第70页；阿贝格伦和万成：《现代日本的领导人：社会起源和流动》，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第9卷，第1期，第2部分（1960年10月），第116页。

全是实质性的部分。^① 从阶级角度看。民族政治(对这个事情来说,次民族政治也包括在内)^② 依旧是一种从属阶级在其中扮演显然是从属角色的“活动”。古兹曼先生在论及英国时写道:

……如果我们从选民向上上溯到政治等级制,我们发现
在每一等级——政党的党员、政党活动分子、地方政党领袖、
议员、全国性政党领袖——这些群体的社会属性有点不那么
具有“代表性”,并且稍稍有些倾慕于那些在我们社会属于中
等和上等阶层的人士。^③

事实上这种倾慕不是一点点,对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这点又都不少于英国。

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在这里,正如在任何一个其他领域一样,必须强调,构成人口必然最大多数的出生于从属阶级的男人和妇女,不仅在进入那些根据任命而出任国家体制如行政、军事和司法部门的职位,而且在取得那些表面上看来是由普选和政治竞争的运气决定因而变幻莫测或看起来变幻莫测的职位时,机会是非常可怜的。在这样一个在民主、平等、社会流动和消灭阶级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的时代,这些国家中绝大多

① 参见古兹曼:《英国的政治精英》,第97页以下;H. 巴林顿和J. E. 芬纳:《英国的下院》,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61年,第13卷,第4期,第601页以下;J. 布朗代尔:《选民,政党和领袖》,1963年版,第5章;M. 多根:《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攀登:法国1870至1958年众议院议员》,载D. 马维克(主编):《政治决策的形成》,1961年版;G. 布朗撒尔:《德意志联邦的工业在政治中》,1961年,第152页以下。T. 福当:《日本的人与社会》,1962年,第117页。

② 参见第171页以下。

③ 古兹曼:《英国的政治精英》,第27页。

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

一

相当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精英的社会构成的原因，在于对它的一般见解、意识形态的支配权和政治倾向作出强而有力的推断。然而，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看，我们仍不难推断，掌管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人每天都把他们的观点和信念强加给民众。这方面的大量事实被掩盖着。但是就大量保留下来的事实和其他证据，特别是政府实际行为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关于政府如何活动的清晰的图像。

乍一看来，这是一幅前后相继的各届政府之间而实际上是每一届政府内部、同时也是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不断变化的图画，总统、首相和他们的阁僚之间贴有不同的政治标签（这时常使人误入歧途）。他们属于不同的党派，有的则不属任何党派。

对诸多问题观点、态度、纲领和政策上的分歧肯定是非常明显，它造成了激烈的政治论争。尤其在大选时期，由于政党领袖坚持己见，他们与其反对者和竞争者之间的鸿沟极大，几乎到了不可逾越或者说实际上是不可逾越的地步，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分歧和冲突的印象。

分歧如此深刻的现实，是政治体制的功能和合法性的一个极 69 其重要的问题，这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要在主要竞争的政党之间投这个或那个的票的选民在难以两立的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他们作为选民根本无法决定国家的未来。

不过,在实际上,这幅以某种极其严酷的方式画出的图画无论如何都是绝对肤浅的,具有迷惑性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这个重要方面,严格说来,在那些大都能取得高官的政治领袖之间的分歧,并不像这些领袖和其他人民时常认为的那样,他们根本性的分歧是极少的。从这些政治领袖和政治掌权者相互的关系来说,真正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的众多的分歧,而是他们对于真正属于根本性问题广泛的一致性。——一是形势需要,正像他们自己以及公众中大量的人,不管他们听到多少政治上的花言巧语,都会认可“政治家都是一回事”这句箴言。^①当然这有点夸张。但至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企望成功地取得官职的那一点人士来说,具有几分真实性。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这一点时多少有点不同,当他们说到这些人时,不管他们贴着怎样的政治标签或隶属于什么政党,认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这种表述中基本的政治倾向是正确的。这就是说,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掌权者除极少数例外,始终都有着贝尔福勋爵所称的经典式的名言那样的“社会基础”,即所有现存的私人所有的和私人占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贝尔福笔下所写的是19世纪辉格党和托利党执政的英国。但他的观点同样可以用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19世纪,同时可用于20世纪。

70 这一点也没有超出一部平淡的政治史的内容,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始终是由超越了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和其他差异与不同的人组成,但他们至少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优点有着一种共同的基本的明确的信念,尽管他们未必这么说;尤其是他们

^① 正如有目共睹的,当问起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大量的人民是不是相信在主要的竞争的政党之间有什么重大差别时,他们倾向于作出否定的回答。

中那些远没有参与这个制度以至于了解到他们是在帮助一种特别的经济制度运行的人中,有许多还没有了解到自己所持的态度,他们至少也和他们那些意识形态感更强的同事和竞争者一样,对试图改变这个制度的社会主义者,持根本的坚定的敌视态度。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常有这样的情况,即来自工人阶级和原先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人士,或是作为个人或是在更通常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联盟的成员占有政府权力中的位置,其意义我们现在将作一考察。但是,纵然这些人时常公开声称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信念,他们却从未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过真正的挑战,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希望这样做(更精确地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愿意选择一种“混合经济”)。他们不像他们的宣言那样对这个制度持反对态度,而是欣然接受了它的基本框架和本质特征,甚至在他们执政的某些时候也倾向于提议这样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权的模式比执政的政府所贴有的不同标签及影响它外观上色彩的变化,具有更为持久如一的特点:资本主义政府始终主要是由那些真正信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人,或是那些无论对它这方面或那方面持保留态度但却承认它比任何其他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把这种制度作为其第一位事业的人所控制。或者相反,这些政权由那些他们纵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却没有发现自己会被认为至少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即准备接受甚至是热衷地接受他们将要治理的制度一切本质特征的人来进行统治。

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本世纪比先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任 71
何时期有着更多的人宣布基本上接受资本主义秩序。这不仅因为统治着这些国家的主要是保守主义的政治家,也不只是因为担任官职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正式地满足于为这个制度工作;还因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地主贵族利益的优势已

经荡然无存,他们被吸收进实业者阶层,改变了政府机构中强烈的不和谐之声。这并不意味着贵族他们自身已不再占有官职,而宁可说这是贵族的“资产阶级化”,现在更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本质问题上比以前取得更大程度上的基本一致的意见。

然而,即便我们略去这些形式上掌权的社会主义者不去讨论,也必须在此再次强调,资产阶级政治家之间基本的一致并不排除不仅在经济体制的实际管理以外的问题上,同时也在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重大的分歧。

这样就已经有有可能在政党和它们的领袖之间作出一种重要的区分,不管他们是附属于私人企业制度而支持国家采取大规模措施干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人,还是那些主张小规模干涉的人;也不管存在于那些认为国家必须对于社会改革和其他改革负更大责任的政党领袖和那些希望国家干涉少一些的人之间有些什么区别。

这种强硬的国家干涉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始终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十分真实的问题。不过,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相信私人经营优越性的人,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今天希望或是能够拆除国家干涉的主要机构;而且事实上时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对干涉机构本质看得最清楚的极具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维护者了。纵然如此,在希望实施干涉的范围、特点和细节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且围绕着这些问题(同时也围绕着许多其他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严肃的有意义的争论,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和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至少从这点来说,这些人之间的竞争决不完全是欺诈。

但是实际上,甚至在这些分歧和论争最激烈之时,那些有关的政治家也没有把“自由企业”制度的合法性作为问题提出来;而且,甚至他们中最坚决的干涉主义者从来就知道,他们的提议和政策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不会腐蚀——听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相

反,会确保它的巨大的力量和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提建议只是表面文章和玩弄辞藻,在更大程度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贯彻那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观点,而不是关心根本改变另建一个社会制度的意见。这一辩论到目前为止在政治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成为热点问题。

政治掌权者之间的这种一致无疑是个重要问题。由于存在着各种反压力,使得这种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不大可能会最终决定在每种特定的条件下政府将怎样行动。但是,那些为政府所承认的他们在其中的活动超出资本主义内容的事实,在他们遇到的一些特殊事件和问题以及有关文明社会的需要和冲突对于形成他们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共同的承诺深刻地产生着特殊的效应,并不仅影响着拟议中可望解决的特殊问题,而且影响到认识模式本身;事实上意识形态的信仰可以并且时常确实根本阻碍着感性认识,它不仅使得反腐败的法规无法实施,而且使它的设计不可能完成。

然而,政治官员们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企业承担义务加入了某种阶级偏见的因素。相反,他们是国家的观点和居于文明社会冲突之上的他们自己那种超阶级的、关心所有人以此来拯救整个民族和民族利益、并且负有特别责任使得特别的利益和具有阶级倾向的要求服从于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的极为热烈和雄辩的提倡者。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中,特别在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反对者处于执政地位时,黑格尔那种把国家推崇为整个社会的体现者和保护者、它具有较高的理性、并且代表它长远利益的观点,再次活跃起来。戴高乐将军在 1958 年执政后不久曾说过,“我属于每一个人,我又不属于某一个人。”如果说对将军是否真是这样看待他自己产生怀疑,恐怕是荒唐可笑的——他高居于较卑微的人如资本家、挣工资的人、农场主、店主、病人、年轻的或

年迈的穷人的利益之上。恐怕很难发现其他政治家用如此夸张的言语来表现自己；但是他们尽其所能使自己看起来和戴高乐将军一样，甚至他们在政策和行动中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露骨的阶级偏见时也是这样。

大多数政治领袖在掌权时，确实是忠于职守而又保持自己的观点，这一般说来毋容置疑。事实上，如果对他们宣扬自由不从阶级倾向考虑而是把它看作是纯粹的伪善，会导致对这些领袖忘我精神和果断决定估计不足的危险，似乎他们所追求的就是那些贵族所热烈追求的。通过诉诸理性、感情或是证据，不是很容易使如此自信的人改变其决心的，特别是当事情处在紧要关头时尤其是这样。

资本主义的反对者相信它是这样一种制度，即像它现在这样的本质，不可能为人类理性化的目的去最适度地利用资源；它固有的特性是强制、支配和寄生地侵吞；它的精神和目的致命地侵蚀所有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是今天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府完全是以相反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制度——把它看作最适合“人性”，把效能、福利和自由无与伦比地结合在一起，看作是把人的主动精神和能量释放出来投入社会慈善事业的最佳手段，并且为建立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和唯一可能的基础。

74 总之，为什么在讨论“资本主义”时，要激情满怀、声嘶力竭为这样一个制度招魂呢？它已不再真正存在，它已为私营企业的“工业体制”所取代，尽管其经济原动力至今仍比它过去更“起作用”，它的意图现在也仍紧紧地 在民主国家监管之下。

罗伯特·林德在 25 年前曾写道：“自由民主从来不敢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工业资本主义是社会的一种激烈的高压组织形式，它日积月累地束缚着人和他们的制度，使之成为拥有和支配经济权力的

少数人的愿望服务,而这种对于人的生命和结合形式毫不留情的扭曲,越来越少地成为“好人”或“坏人”自愿意志的结果,而越来越成为为保证“制度”运转的需要而受摆布的非人的网络组织。^①这在今天甚至比它最初写下时更为真实;但是,管理着“自由民主”的政府现在几乎完全由那些根本看不到这个制度的伪装的人组成,他们把它的缺陷归于被他们理解为各别的特有的、在其范围内可以补救的“问题”——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有补救办法。这是只有那些在这个基本方面极端的教条主义地宣称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反教义学的、实用主义的和实用地对待问题的政治家,才有可能。

一位法国作者追忆戴高乐著名的格言,“在我整个一生中,我对法国形成了某种概念”,并且评述说,“当法国的概念形成,变成现实之时,它便带有自然受其阶层束缚的精神而与托拉斯的法国融为一体了”。^②

由于戴高乐的法国“概念”确实比这里所讨论的要复杂得多,这种评述可能不十分精确。但是,正如在紧接着战后那些年代里将军的政策所清楚地表明的、以及1958年以来他对事务处理所表明的那样,包括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无疑置于强大的国家监视的目光之下的经济和社会调节,必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带有或多或少保留看法的其他政府和政治领袖,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 75 把资本主义企业看成一种这个社会必需的、理想的、可预示未来的因素。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达到更多个人和公共的目的。但是,通过棱镜式的分光分析,所有其他的结果都以接受现存的经济体制并对它承担义务为条件。

① R. A. 布雷迪:《作为一种权力体系的实业》一书的序言,1943年版,第12页。

② H. 克洛德:《戴高乐主义》,1960年版,第26页。

如果已知他们对于这个制度的观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每一个政府总是希望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实业家。然而,这根本察觉不到对于特别的阶级、利益集团有任何程度的偏见。因为如果民族利益事实上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那么表面上看来对它的偏爱并不是真正的偏爱。相反,为了实业界的利益并且帮助资本主义企业致富,政府作为所有各方利益的保证人,它真正履行了其崇高的职责。从这一点来说,那句多次被人嘲笑的成语:“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便是对美国有利”的惟一有缺陷之处,是它倾向于把一个专门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但是,如果通用汽车公司采取这样的立场,即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当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口号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应当接受的口号,这往往是明显不过的。而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合理性与合理性本身是同义语,它为一个显然不完善的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可能是最好的人类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掌权者的态度对于作为一个阶级或一种社会类型的实业家,相对来说只有较小的重要性。他们那个包括亲戚、朋友、以前的同事、熟人在内的小圈子像是要把实业家而不是工会领袖包括进去;他们所持的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善意的观点,似乎也像是要使他们对于管理它的那些人持同情的观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2年这样说:

我相信我们的私有实业和工业的高效率的制度。它们已经证明,它们不仅能够提供最有力的战争资源,并且能够为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民提供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它要求一些人要身体力行,并对拥有世界人口7%的美国生产出占世界上50%的工业品作出卓越的贡献。如果要指出他们的名字,我以为他们的名字便是美国实

业家。^①

这些不大沉醉于实业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并不经常如此天真地滔滔不绝地讲话；甚至在美国，总统必要时会用不那么热情的观点对待那些（向来如此，但并不是非常认真地）他们中一些被斥责为“巨富恶棍”的人。事实上，很可能许多政治领袖对这种或那种实业部门持一种非常鄙视的看法，甚至认为实业是一种低级活动，他们认为自已应当远离它。

然而，由于对实业家在其中占实质的主导作用的制度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这一切不会有严重的后果。^② 由于这种肯定，由于他们相信国家利益无可解脱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健康和力量联系在一起，国家自然而然地会设法帮助企业家和实业家。索尔斯坦·维布伦曾经写道，“在任何民主国家中，法定的官方当局所关心的主要是——实际上惟一的——关心国家殷实的公民可以获利的事业”。^③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不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说完全是因为“法定的官方当局”对于拥有财产的公民有一些特殊的偏爱。这种关心与总的肯定是相辅相成的。

^① S. E. 哈里斯：《政党经济学》，1962年版，第5页。约翰逊总统上台时多少有点不同地谈到这点，但他居然富于感情地推测：“我想，我们有最好的制度。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一个资本家能够抛出一个美元，他就能得到一份回报。一位经理能够很早就起床去工作，并用金钱和人力为他建设一座很好的夜总会。一个值得他雇用的工人有希望得到重视并有机会参与少许分红制，并取得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最优惠的最低工资。”R. 埃文斯和 R. 诺瓦克：《林登·约翰逊：权力的运用》，1966年版，第347页。

^② 例如可以指出，肯尼迪总统一般说来对实业家缺乏热情（见小施莱辛格：《约翰·F. 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1965年版，第631页以下。），但是他也几乎拼命地关心依靠“实业家团体”达到调节效果，关于这一点，参见以下第6章。

^③ T. 维布伦：《在外业主所有权》，1923年版，第36—37页。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不得不对私人企业制度和它的经济合理性作出承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在许多有关重大事件和问题上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行动自由。雷蒙德·阿隆曾经写道:“显而易见,在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制度里,由立法者与部长们采取的措施与资产所有者的利益不存在基本的对立”。^① 他评述的这番话意思太明白不过了,无需再作什么说明,也许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在大多数西方政治科学家看来,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国家已从阿隆教授所说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传统偏见中解脱出来。

在大多数政策中都包含有这种偏见。为了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为了减缓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恰恰要求政府应当愿意作为这些利益团体的“基本的反对党”去行动。他们极不情愿这样做是因为它是这个社会的生活中所有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而并非琐事。如果有人,一个政府面对着到处是犯罪的行为而人们不指望它采取基本的立场去反对它,对政府的特性和作用,这种看法也许不能被认为是无知的。对于阿隆教授偶然提出又被他抛在一边的说法也是一样。

在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倾向于模糊国家作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于以国家的名义活动的政府来说,事实上它在好多年中被迫去反对某些财产权,去侵蚀某些经理的特权,去帮助调整劳动与资本之间、财产和同它有关的人之间的某些平衡。这就是为保守派作

^① R. 阿隆:《社会阶级、政治阶级、领导阶级》,载《欧洲社会学档案》,1960年,第1卷,第2期,第272—273页。

者所哀悼的“官僚制”的成长和为他们所痛惜的常被忽视的国家对 78 社会事务“干涉”的一个方面。官僚制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经验已经充分地表明,完全不受限制的官僚权力能够起着妨碍创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僚主义的罪恶上则掩盖了(时常具有掩盖的倾向)这样的事实,即“官僚主义的”干预时常是减轻无限制的经济权力产生的罪恶的一种手段。

具有那种权力的国家的“干预”,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财产的利益:事实上它部分地具有约瑟夫·张伯伦在 1885 年所说的“赎金”的作用,而且他还说,不得不支付赎金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普通的财产权。为了坚持支付“赎金”,政府为财产提供大量的服务,尽管后者很少为此感谢它。即使这样,却不应当无视这样的事实,主要由于群众的压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极其保守的政府,也经常会被迫采取反对某些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特权的行动。

然而,必须确认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政府一般来说总是努力给予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以非常积极的支持。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企业依靠国家在非常广阔的范围的直接支持,并且只有在这样的公共帮助的基础上,才能保持它“私有”的特征。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旨在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像“福利国家”概念那样具有极为明确和适当的含义:没有什么地方像私人企业制度中骄傲的杰出人物那样如此不屈不挠地请求公家支持并取得成功。

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并不需要一种直接的有重大价值的帮助。因为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要求国家必须在占优势的经济体制对它实施的限制之内,采取异常的超出资本主义利益活动范围和能力的社会化形式,并承担许多功能和服务。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 79

被让·梅诺称为“制度的偏见”便会确保这些企业自动地从国家干涉中获利,因为私人所有制控制了经济生活中占压倒地位的部分,所以梅诺教授写道:

……国家采取的所有旨在发展和改进国民经济的措施,总是以控制着支配生产分配部分杠杆的那些人获得极大的利益为结束:当国家开凿运河、修筑道路、开通公路、要求收回沼泽地时,首先是相邻地段的所有者获得报酬……“制度偏见”的概念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以克服玩忽职守、缺点和资本主义弊政为目的的措施,最后成功的结果是巩固这个制度。究竟是由同情资本利益的人还是由敌视资本主义利益的人来采取这些措施则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可以发现,正是那些制定出来保护工人和直接反对它们剥削工人的法律,引导他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使得生产过程理性化和机器化,而给后者带来极大的好处。^①

政府可能只是关心更好地经营“经济”。但是,把这样一个制度描述为“经济”制度只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方法,它模糊了真实的过程。因为得到改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这就保证了无论是谁得到了或是全无所获,资本主义利益却完全不受损失。

“制度的偏见”可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强调。但是,政府这种观念形态上的支配权,只是对他们的一种很容易为其接受的通过制度对他们实施的结构束缚;而对他们来说,这种支配权非常容易服从于他们一直受到的占统治地位利益团体的压力。

赋税对于这一点提供了现成的例证。正如在第二章中指出的,经济制度本身对于保持和加强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收入和财产上的极大的不平等,产生了极端有效的作用。没

^① J. 梅诺:《关于意大利领导阶级的报告》,1964年版,第190—191页。

有一个政府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能够做出重新分配的奇迹。但是,在这个领域对于它的权力的限制,终究无法最后确定下来——尽管制度不平等的倾向和财产的影响强烈地抵制重新分配赋税。在事实上,很长时间里,赋税并没有像这些社会中收入和财富的悬殊那样必然地非常深刻地影响到政府对不平等的态度及他们对待穷人和富人冲突的要求的看法,以使他们最终接受那种经济正统主义,即在任何特别的时刻始终宣称增加对富人的负担,对于“企业界的信心”、“个人的主动精神”和投资的意向等,都将是毁灭性的。

同样的考虑适用于政府对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的长期劳资冲突神圣的委婉说法“工业关系”的干涉。

正如它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做的那样,政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感到有义务直接干预雇主和挣工资者之间的争端,他们干预的结果是倾向于对后者而不是对前者不利。在不计其数的例子中,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常常是政府采取的国家的高压力量和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在击败罢工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以国家利益、法律和秩序、立宪政府、保护“公众”等等的名义进行干预而不是简单地支持雇主,这并没有给雇主带来任何不利。

更为甚者,国家像所有的雇主中最大的一个那样,现在能够通过它自己的行为和榜样来影响“工业关系”的模式:很难说这种影响会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上创造新的规范。也不可能指望它在管理公有部分时拿出“实业家式”的精神。

政府在固定的制度化的基础上,深深地介入了“常规化的冲突”,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所在。它们把这种冲突带进了以中立和独立相标榜的政党中,它们关心的不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的彻底失败,而是“合理地”调解之。但是,如果调解的进程失败的话,那么国家以谈判的形式进行的干预,就离决心宣布诉诸高压

权力、在争端中反对一个政党而不是其他不远了。事实上,这些做法成为限制有组织劳工的一种添加因素,同时对于进一步分化工会群众起着一种有益的作用。国家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个中立者而是作为一个党派观念很强的角色介入“工业的两个方面”之间。

并不是在工业争端实际发生时这种情况才是真实的。发达资本主义晚近演进的一个主要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政府寻求把新的更多的居民置于劳工的地位,以此达到防止它行使那种只是在工资要求问题上才对雇主(而国家是一个主要的雇主)行使的压力。他们试图通过采取像“收入政策”这样的手段或通过降低对劳动力需求的通货膨胀政策,达到普遍削弱工资收入者讨价还价地位的目的。^① 在这里也是一样,采取诸如经济健康、保护流通、对工人的仁慈等等政策被宣称为对国家有利,乃是必须的,而总会发现有一些工会领袖赞成这些主张和政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要把工资领取者置于对雇主来说更弱的地位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在政府官员看来,这种“意图”完全是它所宣传的那样,但是其“结果”,由于永恒的规律性而损害了从属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许多其他情况下,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求助于国家利益团体以捍卫他们的政策时,后者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未必真会那样做的行为加以提防。工资领取者在和雇主的冲突中总是不得不考虑国家是否有敌意。但是,现在他们在事实上比以往更加审慎地考虑经济生活中这种直接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现实对抗。他们每日每时直接遇到的对手仍然是雇主;但是政府和国家现在比以往越来越紧地介

^① 参见基德隆:《大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第190页以下,《收入政策和工会》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1964年,第1卷,第3期;和《反对罢工权利之战》,载上引杂志,1964年,第1卷,第1期。

入了这种对抗。

十分自然,政府在处理与那些致力于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的运动、团体和政党的关系时,甚至表现为更加特别的、巧妙的和有组织的党派特征。政府表示的这种仇视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和因国家而异,在这里采取的是温和的政策,在那里却采取严厉的政策;然而,敌视态度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在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官员间,在不同国家的政府间,他们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取得过实质性和明显的根本的意见一致,——所有政府政党的领袖,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包括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始终对于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左翼,总是持深刻的敌意,而不论哪一派的领袖以及政府自身,事实上在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威胁下充当社会保护者和社会拯救者时,一直是它的主要反对者。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论和多元论的倡导者,在他们为社会中流行的政治竞争欢呼之时和在坚持国家的政治中立化时,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根本不是采用社会主义中立态度而是尽其所能制造更多的困难。在一些国家,例如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完全被镇压下去,其成员被依法处以刑罚;在另一些国家,如美国,作为惟一的左翼组织,共产党在自由政治竞争的概念下是在遭受骚扰和严厉地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其他国家中,国家的敌对情绪尽管可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却没有减缓——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通过对选举的操纵来达到剥夺在议会中有代表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选民的力量;政府凭⁸³借其强大的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大众媒介倾向性进行操纵;并不时极其粗鲁地对左翼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镇压。

换句话说,不论政府的政治色彩如何,它深切关心的是,“民主

进程”应该在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所起作用尽可能小的情况下进展。

争论之处不是在政府应当还是不应当在保守主义和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政党和集团之间保持中立。这个问题不应当用这种绝对化的话来加以解决。毋宁用这样的话来说，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未如此中立过，他们经常是尽其所能站在保守派反对反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使用国家权力。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不论他们可能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这样做时，他们都力求对那些其权力和特权社会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心想要加以破坏和摧毁的阶级及利益集团，提供一种极其重要的保护。那些相信具有这些权力和特权的社会等级的价值的人，将赞美和支持政府的不公正，甚至会要求它更多些。那些不希望它这样做的人则不是这样。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分析是如此混乱，而这时常是它自身引起的。这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实际就是这样做的。

到目前为止，争论始终集中在政府行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某些主要的内部结果上。但是，政府行为的外部结果并非不那么直接和重要。

政府在这里恐怕比其他领域甚至更多地公开宣称，他们所希望的是常常抛开具体的经济问题，更不必说资本主义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独立、荣誉和伟大，才是它所关心的。但是，这自然包括健全的、健康的、繁荣的经济体系；而这样一种想望的态势却需依靠资本主义企业的繁荣。这样，由于在国内事务中实施的同一种机制，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发现，要使国家达到更大的目的就要顾及资本主义利益；而且，这些利益在它们国家的生活中所占的极重要的地位，总是使得政府把反对外国资本的利益和反对要保护其利益的外邦当作对外事务的首要

问题。^①

整个西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对这一点是个切题的例子。当然,说这些政府到非洲或亚洲去完全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正确。他们从事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不仅仅是在这些利益的“推动”下才这样做的。对这种巨大的历史运动的看法不能简单化。但是在这里,在政府希望满足帝国要求的许多目标中,还显然牵涉到促进私人的经济利益。他们可能确实始终真正关心国家安全,加强经济和社会结构,承担起白人的负担,满足他们的民族尊严等等,但是,正如他们看到的,这些目标需要通过征服那些已经或者可能成为有益于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进行剥削的地域的土地来加以保证,这样,这种殖民和扩张便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官员试图达到许多其他目的的事实还不能隐蔽这样的事实,即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成为为他们的事业和投资阶级献身的奴仆。

同样的问题可以适用于资本主义政府对待正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在这些国家中,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具有某种风险,但可能获得收益。

这样,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和拉丁美洲的态度,并不完全由它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和保卫未来这种投资机会的考虑来决定。例如,当美国政府在1954年决定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必须推翻时^②,它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个政府从美国所有的联合果品公司夺取了22.5万英亩的土地,而且是因为这个行动在美国政府

^① 正如1914年5月美国的一位国务卿对国家外贸委员会所说的,这些话至今仍是完全适用的:“我敢说,不仅在礼貌上——而且在事实上——我的部门就是你们的部门;大使、部长和领事都是你们的,他们的事业就是照顾你们的利益并且保卫你们的权利。”(引自W. A. 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版,第51页。)

^② 例如参见, D. 怀斯和 T. B. 罗斯:《无形的政府》,1964年版,第11章。

看来提供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倾向的最具可能性的证据,它使得阿本斯王朝成为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威胁。^①但是,这个与许多其他类似的插曲的真实意义在于,“美国安全”被那些对它负有责任的人解释为要求外国政府对于美国实业的权利和要求表示应有的尊重。这可能不是对一个政府的“可靠性”的惟一的检验标准;但是它无论如何是一个首要的标准,作为一个普通的准则,美国政府对于第三世界政府以及对整个非社会主义世界事务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在他们国家中偏袒美国自由企业的程度,或是在将来可能有助于后者的程度。^②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行动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它们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差异不是在基本的方法上,而是在它们国外投资和企业的规模上,以及它们保护这些利益的活动能力。

根据这种合理的观察,最大的弊病很明显便是,其主要目的完全是要在经济生活大多数重要领域或者说全部经济生活中,在国内和国外取消私人所有制和私人企业的政府,僭取权力。这样的政府说到底是要不得的,不仅因为它们的行动对国外所有者的利益和企业起了反作用,同时因为它们使得未来资本主义的拓展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经济结果。但是,86 反对始终存在,因为任何国家撤离资本主义经营的世界体系,都被看成削弱这个体系,并被看成是鼓励更多的反对者和撤离。

这里还存在着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强烈敌对的根源,它导致

^① “在冷战时代把苏联的影响和权力排斥出这个半球,特别是排斥出巴拿马运河区,比旧式典型的香蕉外交对华盛顿具有大得多的重要性。但是,夺取联合果品公司拥有的土地而没有适当的补偿,确实迫使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前引怀斯和罗斯书,第170页)

^② 当然,这决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因为它在美国历史上始终是极为重要的。请参阅 W. A. 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以及同一作者的《美国历史概略》,1961年版。

资本主义政权试图把它扑灭在血泊中——附带说一句，很久以来“苏维埃的侵略”便已成为对其政策的标准的辩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实际上是在那次大战期间，就已成为这些大国政策的主要思路。^① 这个通常高于其他一切的目的，在任何地方始终阻止那些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企业并决意把它摒除的政权存在。

西方官员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运动的态度用他们热爱自由、关心民主、仇视专制和惧怕侵略来加以辩护。对此，正如在许多其他的例子中一样，询问他们这种宣言是否“真诚”并无太大意义。还不如说重要之点是他们把自由定义为使资本主义企业成为一种主要的或者说某些时候是它惟一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点，捍卫自由确实等同于捍为自由企业：保证它的安全的一切措施，无论怎样充满罪恶都可加以宽恕、视而不见，甚至加以支持。^② 根据其定义，几乎没有一个尊重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权会被认为是 87

^① 参见 J. 巴古利：《世界大战和冷战》，载 D. 霍洛威茨（主编）：《遏制和革命》，1967 年版。

^② 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 10 月对当时英属圭亚那的首相契迪·贾根说：“我们不会向世界上没有重大意义的地区，组织一支十字军强行推行自由经营。如果我们为了某个目的进行一次十字军征服，它一定是为了民族独立。那是我们帮助的首要目的。第二个目的是鼓励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做；我们始终帮助那些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国家，如果它们保持其民族独立的话。这是基本的。只要你那样做，我们不管你究竟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实用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实用主义者”。（小施莱辛格：《一千天》，第 775—776 页。）这种观点带来的麻烦不仅在于他们被遍布世界的美国支持者误解为这样一种“民族独立”的政权在于充当美国的工具，而且在于他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的概念如果不是一种猥亵的笑话，便是一种奇异怪诞之说。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真正的考验是一个政权对于资本主义特别是对美国企业的态度。支持南斯拉夫或是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出于冷战政治的范畴，但很少影响到主要目标。

还值得指出，早在 1961 年以前，英属圭那亚就已经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注意的对象，它在用一个使美国和美国资本主义企业完全满意的政府推翻贾根和夺取政权中，起了主要作用。

毫无希望的坏,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认为生来便具有优越于其他没有这种优越性的政权的特征。这种特定的态度并不是资本主义政府比实业家和投资者的利益更为关心外部关系的主要结果。不管情况会怎样变化,这些都是它们的政策始终加以维护的利益。

三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指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时刻,其基本的行政权落到那些他们的政治信仰要求他们站到传统的实业界精英的对立面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手中。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外,这种情况极为罕见。^①非常普遍的现象是,联合政府这个时期或那个时期在其重要的和相当数量的职位上,容纳了社会民主党人出任大臣,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还容纳了共产党人。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一插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事态总的发展,尽管看起来不是这样,但行政权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从未在事实上对占优势的经济制度和它主要受益者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然而,在继续对此讨论之前,有必要考虑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88 即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制度,在那里,他们都曾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冒险家,其中之一在早年曾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满口是反资本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华丽辞藻,宣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影响他们社会的整个转变,并且要在许多年中掌握完全可以

^① 关于瑞典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在三十年以上时间里,执政的党在管理其大部分经济活动资料一直为私人管理和控制的社会,它的成就与不足,可参见 P. 安德逊:《瑞典:克罗斯兰先生的理想国》和《瑞典研究之二,社会民主党》,载《新左派评论》,1961年,第7期和第9期。

被称作是绝对的权力。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经验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或没有资格被称为在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利益之间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基本协调?完全可以立即找出答案——根本不是这样。根据证据,有一点无须更多的讨论,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事实,现在并没有常常被忽视和隐瞒。

如果仅仅从缺少它法西斯的领袖便无法获得追随的群众来看,法西斯主义关于整体转变和复兴的华丽辞藻,加上他们反资产阶级的共鸣,显而易见是很重要的。也不应当怀疑,他们中许多人本着根本的信念确信,他们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然而,现实同他们自以为是的冥想完全是两码事;而且,他们自己绝对肯定,他们的工作不会损害他们时常辱骂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如墨索里尼 1934 年 1 月 13 日,即在他夺取政权 10 年后对他的参议院所说的:

合作经济尊重私人财产的原则。私人财产完善了人类的个性。这是真实的。但是它也包含着义务。我们认为,财产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功能;因此我们希望鼓励的不是无利息的财产,而是积极的财产,它并不限制享有财富,而是要发展它和促进它。合作经济尊重个人的主动精神。《劳工宪章》明确地陈述,只有当个人的主动性非常无知、不存在或无效率时,才可以实施政府干涉。^①

至少这是意大利独裁者坚定不移的一条政策路线。

至于德国,一位纳粹主义的研究者指出:

“在希特勒 1932 年 1 月 27 日对鲁尔区工业巨头信心十足的

89

^① G. 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的战斧下》,1936 年版,第 134 页。萨尔维米尼还指出,墨索里尼在那里致辞的参议院“是由富有的债券持有者、军队将领、高级军官、大地产所有者、大实业家、前大学教授和成功的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前引书,第 134 页)。

讲演中,他修改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济纲领。他在此之前一直对小企业承诺他们党支持私有财产。但是现在,他大量采纳大企业的意见扩充了这项政策。他争辩说,要在企业界消灭联合和雇主自由经营。他概述了他关于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的纲领,认为它们可以使得许多与实业阶级有关的阶层复兴。由于大实业家的领袖已经被授予通过他们控制下的经济组织实施指导经济的任务,这些民众阶层可能对于政府委派的很多经济功能已不起什么作用。希特勒还许诺,一个稳定的政府可能在较长时间中掌权。”^①

同一作者还指出:

主要的实业家接受了他的这种信心,相信希特勒并使他们自己相信,这个党一旦执政,就会向大企业提供决定其政府经济政策的机会。^②

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的这些“大企业家”^③ 汇同了许多其他德国传统的精英,他们如同意大利的同行对墨索里尼所作的那样,并没有制订一项欺骗性的契约。希特勒和他的同事们在掌握了政权后,始终毫无诚意与他们在更好地履行革命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意图上结成联盟。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而他的追随者中那些认为存在着构成纳粹主义“左翼”力量的人,很快便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一位作者最近指出:“有力地鼓励私人经营

① 施韦泽:《第三帝国的大公司》,1964年,第100页。

② 施韦泽:前引书,第100页。

③ “没有工业家强有力的支持,纳粹党恐怕要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J.W. 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复:政治中的德国军队,1918—1945年》,1953年,第273页)。还要注意阿登纳博士1949年指出的:“鲁尔工业——我把煤矿和整个重工业都包括在内——在直到1933年的那段时间,利用集中在那里的巨大的经济力量来达到有损于德国人民的政治目的”(转引自布朗撒尔:《德意志联邦的工业在政治中》,第17页)。

是1933年3月希特勒在国会提出的纲领性论点之一”。^①

90

要评价法西斯主义制度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这种“鼓励”，当然是它用暴力摧毁一切工人阶级的抵抗组织——政党、工会、合作组织、他们的辅助性组织、他们的出版物、他们的议会代表——同时创立新的由雇主和国家把持的控制团体。他们根本不用做其他什么事，法西斯独裁者通过征服所有工人阶级力量和影响就可以充分地取得雇主和其他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感激。正如萨尔维米尼恰当地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工人从工资奴隶制之下解救出来，也许立即就可资本国有化。法西斯国家已经把劳动国有化，并以国家认为有利的价格从私人资本之下雇用它”。^② 这些政府在做这样事时，还赢得了成千上万工人的感激，他们发现在这样条件下被雇用要比根本失业要好些。但是，他们的感激和支持丝毫没有影响这样一点，即法西斯主义对权力的征服，在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中，得到立即的戏剧性的增强。毕竟“提出过阶级冲突的工人们……通常不举行任何仪式就向盖世太保缴械投降”，而且“工人们现在在法律上要求对他们的领袖表示绝对的顺从和忠诚，并相应地要求他们也照顾到工人的福利”^③ 是举足轻重之事。这个“领袖”便是雇主，而对他未能照顾他的工人的福利的报怨，可以轻易地构成“鼓励阶级冲突”。不应当对这种“纯利在1933年初到

① D. 肖恩鲍姆：《希特勒的社会革命：1933—1939年纳粹德国的阶级和等级》，（1966年版第55页。）肖恩鲍姆先生还指出：“1939年一篇党报的社论宣传自由经营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从自由经营派生出的社会责任是实现它的关键。”（前引书，第55页）。

② 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的铁斧下》，第138页。

③ T. W. 马森：《第三帝国的劳工》，载《过去和现在》，第33期（1966年4月），第177页。同时参见 R. A. 布雷迪：《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1936年版；F. 纽曼：《巨兽》，1942年版；施韦泽：《第三帝国的大公司》，和肖恩鲍姆：《希特勒的社会革命》。关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的劳工，参见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的战斧下》。

1936年末期间增加了433%”感到奇怪；^①而且，正像肖恩鲍姆指出的，“在1934到1940年间当工资保持稳定或者甚至有些微下降时，这些经理人员和企业承包人以及所得税纳税人的平均净收入上升了46%”。^②直到战争发生，德国实业家剥削的只是德国工人：德国的胜利把占领下的欧洲成百上千万被奴役的工人交到他们手中，雇主对他们甚至比德国对手对待他们更惨。

当然，法西斯统治下的实业界不得不服从比它甘愿接受的更多的国家干涉和控制，而且毫无疑问有了许多的令人生厌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实业家他们在管理和控制体系中起了主要作用，这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补偿——以致于一直这么说，“直到纳粹专制的最后，实业界的领袖恐怕一直保持了比除了纳粹老板外任何其他的精英集团更大的权力”。^③在更普遍的情况下，“纳粹精英的相当大一部分不仅是中等阶级，而且绝对是上等阶级，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员”。^④

92 人们常说，法西斯主义是国家统治社会的绝对范例，这是十分

① 施韦泽：前引书，第398页。这其中有一些很明显应归于此先失效的设备。但是用同一个作者的话来说，“毫无疑问，对工资市场的支配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直接和有效地有助于恢复利润。这样，我们可以说，由政党和国家实施的直接控制远未伤害实业家，它同时剥削工人、使实业家致富，并恢复使私人获利的制度”（前引书，第398页）。

② 肖恩鲍姆：《希特勒的社会革命》，第156页。

③ W. 多伊奇和L.J. 埃丁格：《德国重返大国之列》，1954年，第99页。另一位作者也同样指出，“总的说来，德国实业界是一个政党不能主动地安插自己人员的领域。那些由于他们的政党联系和活动而被置于指导委员会以外的人士，大部分是“联系人”——通常为了公共关系的目的控制着大宗物资的分配等等——或者宁可说是决策者介入了基本的管理。”（格兰尼克：《欧洲行政》，第165页。）还可参见施韦泽：《第三帝国的大公司》，第43页以下。

④ 前引书，第54页以下。也要注意党卫队许多上层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和上等阶级的特征。（参见肖恩鲍姆：《希特勒的社会革命》，第239页。同一种阶级倾向也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见布雷迪：《作为一种权力体系的实业》，第81页。）

真实的。但是这种表述由于它的社会含义不够清楚,会在两个方面使人误解:第一,它隐瞒了法西斯国家在行动中对于实业阶级和所有者阶级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而第二,因为它没有把这样的事实考虑在内,即“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由那些属于传统的行政、军事和司法精英的人士所操纵。事实上,纳粹政权看来已经颠倒了魏玛统治时期以来作为一种特征的国家制度的“民主化”的倾向:例如,在1933年至1945年间比1918年至1933年间在掌权者中有更多的贵族,而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则较少。^①绝对至上的权力落入独裁者之手。但是,他们在表面上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其他人。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现存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总之,法西斯国家制度的所有成员都要求绝对忠诚于这样一种信念,那也许在其他方面非常明确而着重强调不得对资本主义基本框架进行任何攻击,尽管没有明确说出来。不只是在那些进出于法西斯主义政权回廊的人中不大可能有这种危险思想。这种思想被视为禁忌而绝对禁止。

但是,对所有关于法西斯主义制度真实本质最能说明问题的,无疑是在它们临近完蛋时,在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二十年之后和希特勒取得总理职位十二年之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很明显的变化。那些在法西斯分子执政以前占据经济和社会金字塔较高层的阶级,这时仍然盘踞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容忍着这些阶级。弗兰茨·纽曼所说的完全正确,“民族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政策的本质包括接受和加强德国社会中占优势的阶级的性质”。^②这对于意大利也完全真实。

93

① 马休斯:《政治决策者的社会背景》,第49页。

② F. 纽曼:《巨兽》,1942年版,第298页。

在此同时有一点也是真实的,即意大利和德国两国的特权阶级对于法西斯制度给予他们的巨大优势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因为当他们取得众多的权力位置和影响力时,他们不得不服从于一种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独裁制。在帮助独裁者剥夺所有其他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任何一点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被严厉地剥夺了,而且在某些极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完全被取消了权利。这不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阶级应有的情况,由于它介入了决策过程,它的成员常常起一种主要作用,成为一种极高的无法预言的因素,它可以非常有把握地摸索它的统治者的最终意向,因此它能够细心观察而毫无严重的不安。

正是在这个方面,必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常提到的在“例外的情况下”在文明社会中国家权力独立于所有力量的提法,^①而对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范例。然而,在那种条件下说还存在某种“中立”力量,这种概念是不清的。实际经验证明它是虚假的。马克思自己在论及路易·波拿巴政变时推断说,“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真正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②“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③但是马克思在一段著名的话中也指出,“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而路易·波拿巴的主要任务,他的“使命”,是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秩序”。^④这同时也是对法西斯独裁者的“使命”一个正确的描述。就

① 参见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对这点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拉尔夫·密里本德:《马克思和国家》一文,载《社会主义记事》,1965年版。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页。——译者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0页。——译者

意大利和德国来说,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并不是所有阶级都同样软弱无能和缄默无言。然而,真正真实的情况是,那些旨在捍卫资本主义秩序安全的独裁者,无论他们怎样花言巧语地主张“革命的”改革,他们都绝对是根据他们自己愿意做什么来作出决定,并且完全独立地对极为重要的国家问题作出决断。

正是由于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实业界传统精英中某些部分对于他们尊重的法西斯运动上升到执掌政权持一种不安甚至敌对的观点。那些支持法西斯主义并且真正使它有可能接近权力的人士认为,他们可以买得政治歹徒的帮助而不被他们统治。在这一点上他们犯了错误。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一切都发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国内、在外交上和战争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很少怨言。这些歹徒看来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随后发生了恐怖报复的威胁。由于在战争中的失败和法西斯制度的崩溃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幽灵。他们曾经一度试图驱逐它,但最终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法西斯主义者去安排。在意大利威胁来自内部,在德国则来自外部,是随着俄国军队的推进而发生的。

然而,已经失去其法西斯主义的主子和保护者的意大利和德国的特权阶级,现在由于出现英国和美国征服者和占领者,他们找到了两个新的保护者。西方大国对于战后解决东欧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它们丝毫没有打算允许激进的社会变革在他们确实拥有权力去决定事件发展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发生,例如在西欧、希腊、日本和除东欧外任何其他地方。美国和英国军队的占领实际上等于绝对地保证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会保存下去,①任何对它们的国际威胁都会遭到反对,如果必要就会充分

① 应当指出,1945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掌权一点也没有削弱这种绝对性。

95 地运用军事力量,如在希腊那样。事实上,败在西方盟军之手给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诸阶级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礼物:使他们摆脱了在战争中遭受失败的政治统治者,而战争的失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些阶级已太虚弱了,或太懦怯了,他们无力自理。

在战争后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反法西斯主义、“非纳粹化”和“肃清”妥协的精英们可以把“民主化”推进一步而使这些精英中一部分人回到掌权岗位和有影响的地位变得不可能。与此类似,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实业界来说,那种“非卡特尔化”政策非常不得人心,它会使得象征胜利的权力似乎被折服。但是,所有这些认为失败必然对国家关心的被保护阶级带来猛烈的不可弥补的结果的耽心,很快就减轻了。如同一位作者所说的:战争结束时的变革是强加于德国和日本的变革“人为的革命”并没有给那些导致其国家崩溃的人带来任何经久的耻辱;国家也没有任何重要迹象成为主权国家,使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不再夺权,甚至对最重要的岗位。”^① 该作者还提出(恐怕对在1945年仍残存的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左翼来说不恰当),德国大多数希特勒的反对者希望“一种宫廷革命形式,使老的精英返回以取代纳粹新贵”。^② 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而日本的经验实际上并无不同:在两个国家中,政权结构的演变主要发生在中等和上等阶级的范畴内,并且丝毫没有严重影响到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的统治地位。至于“非卡特尔化”从来就是试验性的和半心半意的,并且此事由于是被迫执行的,因

① J.D. 蒙哥马利:《强迫实现自由——德国和日本的人为革命》,1957年版,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此相对来说是发育不全的。^①战后几年中,战败国中的大商号已经比以往大得多,并且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扩张过程;而德国和日本 96 两个国家的实业家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了比先前任何时候更高的地位。^②

然而,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战后资本主义的胜利很难说是凤凰从灰烬中再生的一个例子。凤凰在专制和恐怖年代始终活着并且很顺遂。败在西方大国手下不过是给它干得更好的机会。对于这些国家的实业家和其他精英来说,那些年代并不是处于被打倒和复苏之间的一个黑暗的罅隙,它没有被打倒,因此也不需要复苏。

四

政府由工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组成,或者说它包括来自这些政党的人士,很明显情况并非完全一样。因为当代有很多例子说明,在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执行机构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始终是由那些代表各党派和各种运动的人士组成,他们宣称其目的是要根本超越资本主义体制,并且它将被一个把最大部分的生

^① 蒙哥马利:前引书。也可参见 T. A. 比森:《日本财阀的消亡》,1949年。T. B. 科恩:《战争和恢复时期的日本经济》,1949年版;和 J. 哈利戴:《日本——亚洲的资本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44期,1967年7~8月;哈利戴先生指出,“一份将被解散的1200家商号的名单已汇编出来;它逐渐减少。直到只有19家在这个名单上——而这其中9家准备与由5家美国最著名的实业家组成的 SCAP 的董事会打交道,决定早已作出”。(第11页)

^② 这对日本来说特别真实,有人曾对此指出,“大银行、工厂和贸易公司的所有者和总经理,在战前日本政治中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职位。在他们的影响达到顶峰时,他们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只胳膊,在经济事务中有所影响,但是缺乏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可靠的权势。当他们的财力下降后,随着三十年代军国主义的复活,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围绕统治权的斗争中处于致命的不利地位”。(W. W.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成长和结构演变》,1954年版,第564页。)

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当然也包括工业、财政和商业活动中所有最重要的战略性的部分交由公共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且,用一种集体所有制渐进的和逐个进行的方式,甚至那些曾经完全放弃的,这一目标甚至已在实施中,正如社会民主党向来所做的那样。这些政党和运动至少已经通过他们的政府直接使用国家权力以实施广泛的改革,特别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其目的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并蚕食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特权。

那些还没有成功地超越资本主义的政府则是——或者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从任何意义上说并没有解决问题,以致无论他们的政策走得多么远,其活动在事实上始终多半是符合统治阶级和实业界精英利益的。至于他们已经取得了什么,他们占有行政权力的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些“实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对其政治制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仍然有重大意义并需要进一步探究,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它们可以归于在这些制度中政治竞争观念,说明它有着极大的意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取得下述三个独特条件之一时,就会取得官职。

第一,他们有时会被邀请加入保守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内阁,以便在国家处于重大的紧急状态时求得“民族统一”,一个例子便是战争时期。但是,由于要求他们加入这种联合内阁的主要考虑是他们不应当追求“党派的”、“地方性的”和激进主义的目的,而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帮助阻止他们的政党和运动去达到这种目的,这些例子对于目前的讨论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他们加入政府可以使他们影响某些政策,并使工人阶级从中取得一些好处,但是决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他们能够利用国家的权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主要甚至是次要的特征,进行任何严重的攻击。

差不多同样真实的是,甚至在更加频繁的场所,社会民主党的

代表已经和他们保守党的竞争对手建立了联合,这样使得政府取得了议会的多数。甚至在那些他们已经取得重要官职的地方,以及 98 及在他们的某个成员已在领导政府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大臣们一般来说能够在这些混合政权中取得一点成就。他们远没有对现有秩序起一种威胁作用,他们的主要作用始终是钳制自己的政党并推动他们接受自己已经接受的本质上属于保守党的政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加入是一种圈套而不是一块跳板。

第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一种情况下,例如 1918 年的德国,曾经发现自己参政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战败和现政权崩溃的结果。但是,这些领袖不仅没有利用把他们推向执政的革命形势,反而拼命地关心这种形势尽快结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老好人保守党人和反动势力的帮助特别是德国统帅部的帮助。^①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执行机构无论如何,都不会与统治阶级利益发生矛盾。相反,在他们处于极端危急关头,再也没有比后者——其领袖反对对他们的政治或经济权力作任何侵害——这样更忠实的、坚定的、患难与共的朋友了。

第三种情况是社会民主党由于在投票中取得大胜这一结果而取得官职。

除了 1936 年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这一非常可疑的例子外,这样的例子从未在近来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发生。然而,如果激进主义舆论有了根本的、实质性的转变,并且至少对改革纲领和一个或几个在竞选中取胜的党许下的实施新政的诺言,表示一种高度的抑或含糊的初步支持,取得官职还是可能的。绝大多数支持这些政党的人们,可能都不希望通过激进改革的方式取得比他们现

^① 参见卡斯滕:《德国国防军和政治》,1966 年。以及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复:政治中的德国军队,1918—1945 年》。

99 在拥有的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完全不是希望所得较少,一般说来也不是对进一步实施社会变革持厌恶态度。那些产生厌恶情绪的人估计肯定会投票支持那些可以信赖去反对它的政党。对大多数人来说,设想出现一幅狂热的人民革命的图景作为大选中支持左翼政党的基础,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设想很大一部分民众愿意看到一个广泛的甚至基本的变革,则是绝对没有错的。

而且,随着民众的领袖接管官职,以及他们以相应的宪法形式来装饰行政权,胜利本身便一直在增强那些投票支持他们的人们的信心,认为新政实际已经到来,认为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相应地对所有拥有财富和特权的势力极其不利的伟大变革,即将由“他们的”政府开始。某些像人民期待和希望的惊雷已具有与在选举中获胜的左翼的胜利形成共鸣的倾向。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这些胜利从整体上说已是如此少见,并且出现社会传统的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中心已被逐出;实际上是由于这些胜利时常被解释(完全错误地)为实际上是统治阶级自己放弃其权力。而这种期待、希望和错觉又由于保守党势力紧接着他们的失败通常极强烈地表现的忧虑和憎恨倾向而增强。

然而,对社会民主党领袖来说,在他们胜利之时,并且甚至在那以后,他们一般说来都非常关心能否保证消除统治阶级和实业界精英对他们意向的担心,他们强调,他们主张按“国家的”而不是“阶级的”名义行事,强调他们占有官职不会给实业界造成威胁;而且他们用同一种口气同样关心地劝告他们的追随者和工人阶级说,具有普遍的耐心、守纪律和勤奋劳动是一种美德,并告诫他们,他们的领袖在选举中取胜和取得官职决不应当解释为鼓励激烈地坚持工人阶级对雇主、有产者利益和政府自身的要求,并且强调,面对着巨大的责任、负担和问题,新政府的部长们其意向决不会被100 不合理的和不现实的压力所妨碍。这些领袖一旦上台执政(并且

时常在此之前),总是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加“温和”。这是“寡头制铁的定律”的一种变形,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过例外。大多数被领导者或多或少都不情愿接受他们领袖的“中庸”立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它的意义将在以后讨论。无论如何,新的左翼政府总是一直以极大的努力去淡化民众的期望,并且强调,在他们希望通过改革的途径要做的事多得很,如果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尚未了解,那么它们势必会发现,它们正在与极有理智、有责任心的人打交道,他们与许多他们的追随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到罗马不是在一天之内建设起来的,它的建筑无论如何必须以极端慎重的态度来对待。

从他们完成其任务的手段来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新上台的左翼政府在从事这些任务时很少以一种旺盛的行政改革精神来对待他们的工作,并且对于割断包括行政权在内的国家制度深陷其中的官僚制的网络组织,很少表现出任何极大的热诚和愿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历史上事实上惟一的例子,就是改革后的行政机构对于克服至少说是某些因传统和传统主义的官僚机构加之于它的阻碍,表现出真诚的意愿;而这个例证不是由一个公开声称的左翼政府提供的,而是由一个毫不隐讳地积极表示要保持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健康的政府即弗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他著名的“百日特别国会”和那以后一段时间提供的。^① 贴有更激进标签的政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通常总是满足于使用他们觉得有把握对付的行政机构;他们在那里已经有所创新,他们还想为那些传统官僚圈内和圈外的人已经创立的新机构配置人员,人们很少知道这些人对改革的愿望或迫切要求,更不用说承担任何社会主义任务——实

^① 参见 R. E. 舍伍德:《哈里·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 1 卷,1949 年版;和小施莱辛格:《新政的来临》,1968 年版。

101 际上,人们大都只知道他们安分守己的背景和为人。在他们周围找不到热心于改革和沿着激进方向推动变革的人士,这样的政府大都喜欢任用那些对他们的改革主张施加一种不痛不痒影响的人。然而,在新大臣们手下的这些人都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他们表现出一种使新的政治官员充满生气并且进一步促使人们相信保守主义利益和势力是和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意向相一致的连续意识。

左翼新政府之所以要向这些力量作出这种保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通常是在巨大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困境和危机的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他们害怕看到“实业界”的疑虑和反对的进一步扩大。

这种担忧完全是正当的。但是这些新政府在他们夺取官职发生冲突时会有不止一种对付不利状况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把这种状况看成是一种更加大胆的挑战,作为一种实现进一步的激进主义的机会,以及作为采取更加敏捷的和决定性的改革措施的一种工具而不是障碍。说到底,存在着这样一种真正激进的政府,其目的坚定并且采取一种大体上得到民众支持的措施,不是不愿出现危机而是因为危机存在,在它的选举得到合法承认后紧接着就希望付诸行动。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得到了许多到目前为止没有承担义务或部分承担义务但愿意接受绝对领导的民众的支持。

然而,这决不是说已是万事大吉了,政府可以进行它们的工作了。相反,它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发现,对于调和他们发誓要反对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力量并把自己的雄心限制在不对保守势力造成任何威胁,他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种现成的和随时来到的指责。只要他们执政的时间越长,这种形势就越明显。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政府很少有在开始时十分大胆的;那么它在以后的阶段一般说来始终是非常谨慎和正统的。

在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左翼政府由于统治阶级和实业界精英强烈地甚至剧烈地憎恨和反对就无所作为。事实上,所有的政府不管如何保守,在此时或彼时都会被迫而有所作为;而且人们也许已经看到,一个左翼政府无论它多么“温和”,都想比那些阶级和精英不喜欢和反对的政府有更多的作为。 102

但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保守主义利益团体对改革派政府(或其他派政府)持何种主观感情和反对态度,现在看来核心问题乃是混淆了是非。毕竟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本世纪“新政”初期(甚至后期)的罗斯福那样遭受企业的憎恨和恐吓——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首相也比不上他。然而,没有人相信,罗斯福会(或真正)削弱美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现有的证据表明(对当时许多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新政”曾经寻求并且事实上的确寻求以统治阶级极小的代价去恢复和加强资本主义制度。

对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其他改革政府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正视它们改革的客观性,总的来说是必须正视对他们控制经济和社会秩序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权力和特权分配的基本影响。为了对此作出估价,可能最好是观察某些政府在发达资本主义宪政制度范围内始终致力经济和社会改革基本措施的实际记录。

要求加以考察的第一个这样的政府,是作为 1936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3 日选举结果而执政的莱昂·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在后一个日期的第二次秘密投票之后,人民阵线方面赢得 376 席,社会党获得 147 席,温和派和资产阶级激进社会主义党获得 106 席,共产党获得 70 席,其余议席为较小的左翼政治组织所获得。 103

对于新的反对派来说,它赢得了大约 222 席,分散在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右翼政党之中。^① 这样,左翼的胜利非常清楚并且不可能发

^① G. 勒弗朗克:《人民阵线史》,1965 年版,第 131 页。

生误解,这无疑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最大的选举胜利。它从法国内部或者从法国外部都构成了或看来像是构成了一个左翼激进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轰动一时的示威。而且,横扫整个法国的群众罢工浪潮,加上罢工者占领企业,几乎立即给人民阵线的胜利一种全新的规模。正像它一直被称呼的那样,把“1936年的革命”说成是工人阶级一场极富戏剧性的叛乱,很难说是一种夸张,尽管它是反对经理权威和统治、并且是工人激烈要求改变其状况的和平行动。

在这种突发的和潜在的与劳工危险的冲突中,资方面对这种规模巨大的运动,惟一可以期望解救的,是新政府本身。虽然付出了代价,还是大有所得。

莱昂·勃鲁姆总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政府,在大选一个整月后从6月4日起开始行使权力。它由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组成,共产党人甚至在他们许诺支持新政府的情况下,仍被排斥在内阁之外。

对于政府和它在议会内外的反对派,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一致的,这就是必须结束罢工和占领企业的现象。在上台的前夕,将成为内政大臣的新社会主义者罗哲·塞伦格罗曾说:“让那些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工会运动的人去完成他们的使命。让他们尽快结束这种不正当的请愿。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在秩序和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不管是谁,我将维持秩序。”^①

104 在另一方面,情况并没有发展到政府需要采用暴力的地步;并且可以相信,它并没有计划过任何这样的行动。它真正要求的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来结束请愿,它达到了这个目的,或者说,通过撮合资方和劳工,使他们接受著名的“马提翁协定”,至少为达到这样

^① 勒弗朗克:前引书,第146页。

的结果创造了条件。这些协定保证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把工资普遍提高 7% 至 15%,雇主还同意充分扩大工会权利。在其后数日和数月中,这些协定取得法律的效力,并且加上每年带薪休假两周的法定条款,把学校义务教育扩大到 14 岁,解散一切具有法西斯倾向的组织,将军事物资生产国有化,改革法兰西银行和实行关于财政和农业改革的一系列其他措施。

这些和其他一些人民阵线提出的相应的改革措施^①并没有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不予考虑。然而最近却有一位不大知名的左翼作者对此评论说:

……当时被看作十分革命的人民阵线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现在,把它与其后在法国和国外不仅左翼政府所为同时也包括那些从来不表白自己是激进主义的政府所为的一切作一比较时,就显得极为缩手缩脚了。^②

应当加以讨论的是,这一判断对于在三十年历程中人们看法的变化考虑得太少;也可以这样说,它过低地估计了勃鲁姆政府遇到的困难和对抗。

但是,这种议论只是在政府全面方针和意图的范围内才是站得住脚的。除了这些方针和意图外,说不可能指望莱昂·勃鲁姆和他的非常真诚的社会主义的同事(不是说他的激进主义的同事)去克服他们遇到的不计其数的困难和横亘在他们道路上的阻力,是完全正确的。^③ 最初,人民阵线的纲领曾经设想了一系列比它实际推行的更加温和的改革;毋庸置疑,政府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超出

① 这一点参见勒弗朗克:前引书,第 3 部分。

② J. 博米尔:(法国重大事务),1967 年版,第 35 页。

③ 这对于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它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也是贴切的,它提供了一些军事装备和飞机给共和主义者,但是拒绝了对他们提供更大帮助的要求。这一点未能抚慰右翼,却进一步促使分裂并削弱了左翼的士气。

了这个纲领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在上台执政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维的社会危机的中心,而它只有通过向工人阶级实际的让步才有希望控制这一危机。而且,政府最初的改革纲领完全未必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政府在那里只居少数)遭到来自雇主和一切保守势力那样极少数人的反对,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真实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战斗精神是政府最真实的实际上是惟一的盟友,勃鲁姆和他们社会主义的同僚们最大的希望不仅在于推行进一步的更加广泛的改革,而且要与他们犹豫不决的敌对的激进派伙伴并肩而行。

只有依靠民众战斗精神的力量,他们才有希望凭借他们已经获得的比他们最初希望获得的更多的权力去做更多的事。然而相反,他们通过小的让步而大的斥责尽其所能劝阻这种战斗精神,这样就十分不情愿地使自己失去了他们赖以对付非常惊恐、已迷失方向但难以对付的反对党的惟一真正的手段。反对党一旦从一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它便重新获得了信心,并以从未有过的更大的能量开始反戈一击;而政府自身则开始以1937年6月辞职的退却过程而告终。它面对着政治、财政和国际的困难是否可能取得更多的政绩,恐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遗憾的是它竟没有打算去试一下。在选举之后莱昂·勃鲁姆曾十分明确,他倾向于“治理资产阶级国家”,并且“把人民阵线的纲领付诸实施,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①他缺少这样的意向,即把运用权力转变为征服。^②这种选择对他和他的政府视野限制的结果是使它完全远离了外部的偶发事件,人民阵线的“实验”对于法国社会制度的影响势必是非

① D.M. 皮克尔斯:《法国政治史实》,1938年版,第130页。

② 勒弗朗克:《人民阵线史》,第141页。对于莱昂·勃鲁姆思想的这种特点富于洞察力的讨论,参见C. 奥德里:《莱昂·勃鲁姆或政治正义》,1955年版。

常有限的,它恐怕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法国社会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配。

政府权力落到那些正式献身于把现存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的人之手的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7月英国选出的工党政府,这是工党第一次战胜所有其他政党获得明显的、事实上是牢靠的146席议会多数。^①

工党取胜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取胜的情况相比,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则颇具戏剧性。在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时,并没有发生像在法国发生的那种很大的人民请愿的高潮;但是在大战结束时,还是存在着民众对于新开端的殷切期望,有一种意识广泛地传播着,即大战中的牺牲和发生的匮乏必须通过对英国社会结构的彻底更新加以弥补。正是这种意识使得工党有可能取得胜利,也正是这种意识给新政府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看起来,与他们在英国生活中取得优势的长期历史相比,对于所有的保守势力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保守势力在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危险。像反对派与勃鲁姆政府的关系一样,这些力量能够以极大的信心依靠那些因民众选举而被迫向当权势力投降的“温和派”人士。这里也需要付出代价;但是,全面权衡一下,这是非常小的代价,它原封未动地留下了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堡垒。 107

在1945年7月取得行政权的那些人极为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雄心实在是温和得很。毫无疑问,他们想过并且说过必须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

^① 以下的叙述主要是根据我的《议会社会主义》,1961年版,第9章《劳工主义的顶峰》。

是,这个新的社会秩序就其基本的结构来说与旧秩序非常明显地相似。

极其重要的事实恐怕在于,等待工党领袖们要做的是,工党必须抛弃除对英格兰银行半国有化之外的对国有化的一切承诺,而参加 1945 年的竞选。^①他们需要的是像战争时期实施的那样,在和平时期继续对经济生活加以控制;换言之,在和平时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辅之以一个更广泛的福利措施。在 1944 年工党大会前和会议期间,工党掌权的政府对一项国有化纲领作出的保证是民众压力的结果。^②

政府在它执政时期所实施的国有化纲领,比工党活动家们或是那些曾在 1945 年 7 月投票支持工党并准备支持工党的人所希望的要狭窄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包括它在英格兰银行、煤炭、煤气、电力、铁路、部分内陆运输、有线和无线电报业实施的国有化,从本质上说是半心半意的。在执政的最后一阶段,对钢铁工业也采取了国有化措施。

不能否认,这些措施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力量大概非常不愿意的,而一个保守党政府恐怕根本不愿意采取这种政策。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些力量和工党政府之间在相当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错位。

在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需要它们加以注意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政府宣布除了铁和钢以外国有化的提议后 1945 年 11 108 月的《经济学家》所表述的。该刊写道:“可以希望一个占有明显的议会多数的公然申明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多走出几步……如果将来成立一个工党政府的话,根据现在所陈述的纲领至少可以说它在

① 《议会社会主义》,第 276—277 页。

② 同上书,第 277—278 页。

行动中不会违背它在选举时许下的诺言。”^① 换句话说,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在当时条件下不论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它们对此如何憎恨,都要表示感谢。

第二,政府提出的和推行的某些国有化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家所倡导,至少说被承认了,这很难说与这个问题不相干;而这正如布雷迪教授曾指出的,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国有化措施始终是“由保守党占统治地位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推荐的。^②

第三,恐怕是最重要的,政府在考虑最重要的报酬问题时对有利害关系的政党恐怕很少有如此慷慨的;首要的是,资本主义利益作了一桩很好的交易,这是他们在利用交由他们支配的财产所作的交易中最出色的一次。

最后,政府在国有化工业管理中所面对的那种极端因循守旧的、官僚和“事务式”的方式,加上它所任命的来自大企业进入各部工作的人士,有助于确保“公有部分”的扩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使私营部分为难——更不用说构成一种威胁,它恐怕在事实上成为它的一个完全胜任的助手。

从这点来看,非常容易理解艾德礼的回忆,“对我们的国有化建议并没有很多真正的反对,只是铁和钢的国有化问题引起许多看法。”^③ 对于这些措施引起的所有关于“混合经济”的讨论,不要理会那种认为有了它们使英国经历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生常谈,所有那些好的和平的国有化不仅没有削弱英国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本质方面,它加强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甚至英国的资本家

① 《经济学家》,1945年11月24日,第239页。

② R.A. 布雷迪:《英国的危机,工党政府的计划和成就》,1950年版,第41页。

③ C.R. 艾德礼:《偶然发生》,1954年版,第165页。

和他们的政治发言人,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完全被蒙住眼睛而看不见其中的某些东西或者甚至其全部。

但是,去理解国有化的结果并非工党领袖一点也不欢迎同样是重要的。相反,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化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有了这一目标,保守主义势力很少担心有一点国有化,或者担心政府试图通过这个从战时继承下来的控制体制并不十分有效地来管理和指导经济生活。^①

即使如此,其最大的问题乃在于,工党政府的国有化纲领也许已经显示一种极其不同的前景,它的倾向已经把它作为继续不断扩大国有化的基础,注定要占领“私有部分”的“制高点”。但是在1945年并不存在这样的意向,甚至到1948年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意向。相反,除了铁和钢以外,政府坚定地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进一步的“试验”,而着手一项姑且称之为“调整”的纲领,这在事实上增强了工党在“混合”经济中明确而持久的地位。^②从那以后,除了对钢铁工业的国有化这一例外,工党领袖们转而顽固地反对任何有效地扩大公有制的做法,并且至今继续反对。

也还是在1948年,工党政府把一项“国民健康义务法”和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付诸实施。作为“福利国家”柱石的这些措施当然表明了对福利制一种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扩充,它是工人阶级在一百年的历程中能够从他们的统治者那里强制索取的“赎金”的一部分。尽管它很重要,但是它并没有构成对现存的权力和特权制度的威胁。它给现有社会秩序带来的是某种程度的人道化。就这点而论,很明显它对工人阶级是有益的。但是,对

^① 参见 A. A. 罗戈在 P. 肖尔帮助下写成的《1945年至1951年的工党政府和英国工业》,1955年版。

^② 密里本德:《议会社会主义》,第298页以下。

所有反对它的人和保守势力来说,也没有必要用真正惊恐和害怕的目光看待它——是的,甚至它最顽强的敌手也没有这样。

总之,必要时,可以用转向“调整”而从容全面退却而万无一失。从1948年以后,政府迅速地放弃了一切它以前一直持有的改革倾向。经济上和财政上主要面临的是由于它自己的外交政策和防务诺言而造成的危机,使它只好在国内政策上转而采取更加正统的方针,特别是采取早年“收入政策”的做法,这种收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给工资收入者私下加以严格的限制,并且事实上冻结了工资的上升。然而,政府保持了用选举支持的高压手段。但是它在议会任期中看到自己在1945年取得的得意洋洋的多数消失了,在1950年2月选举中只剩下6个议席,在其后的18个月中,它每况愈下,保守党重新上台执政。

如一再提起政府在它任内做了许多事,保守党势力和利益团体肯定是不欢迎的。但是要重复说,工党政府并没有想要去做更多的事,后者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的,而他们甚至有更多的理由去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做的完全没有伤害他们,在保守党看来,统治阶级知道,由于对战争的激进情绪,他们为保持现有社会秩序付出的代价与半应付出的代价相比是相当的低,这不是一件小事,由于这一点,他们该感谢工党领袖——而工党运动同意,不要过多地对其领袖的“温和性”持异议。

这种“温和性”不是那种它一旦到来就会给英国保守主义的领袖带来快乐的东西,而只会带来不期而至的惊奇。甚至在1945年7月工党政府执政的困难日子中他们就明了这一点了。¹¹¹

就1936年时的莱昂·勃鲁姆和他的一些大臣而论,法国的保守主义可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些人变幻无常、崇尚空谈,在政治上无法预言;而且,虽然早期很自信,他们却可能在他们的共产主义盟友、他们自己的阶层和人民的要求的压力下,冒着风险走得很远而

转向左翼。

这样的理解无法完全适用于那些 1945 年在英国取得行政权的人士。保守党人,特别是丘吉尔,在竞选中试图提出,英国正面临着迫近的极权主义、警察国家和红色社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很清楚是说给群众听的,因而证明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大多数惊恐万状的人完全不像是真正相信他的一个字。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将领导工党运动的人士在战前不仅是温和派和“负有责任的”反对派,他们的主要努力之一始终是要击败和斥退左翼关于实行更激进的政策的要求。但是,作为可以信赖的战时盟友,他们因为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而不是由于在不同种类的问题上的分歧而与之分手。像艾德礼、贝文、达尔顿和莫里森这样的人,或是像克里普斯那样以往反对左翼的斗士,可能会遭到急想取得官职(而不是恢复官职)的革命派突然的攻击,但并不是说他们在工作上都会遇到大的麻烦。

正在到来的变革时代会有多大的连续性,其中的一个清晰的征兆是这样的事实,即新政府无疑严格地接受前任政府的原班人马。艾德礼后来回忆说,在他大选后回到波茨坦会议时,这时他已经是首相了,“我们的美国朋友惊讶地发现,甚至在我接管后我们的官方顾问毫无改变,甚至我的首席私人秘书莱斯利·诺万就曾在 112 丘吉尔手下任同一职务。”^① 这种情况在整个政府都一样,贯穿着它全部历程。能使保守党势力安心的不仅在于为大臣们作咨询的人“通情达理”,因而这些势力能够充分信任他们;更加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这些新人根本不想要求他们周围的人比之正统顾问们有何两样。

在工党和保守党领袖之间,再没有像在外交事务中那样观点

^① 艾德礼:《事情这样发生》,第 149 页。

完全一致了。丘吉尔联合政府的工党大臣早已表明,他们并没有在战后主要政策路线上远离保守党的观点和态度。而艾德礼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已经正式向丘吉尔保证,他不曾想过“我们会偏离我们如此频繁地在一起讨论过的主要政策路线。”^①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不过的是艾德礼在取得首相位置后回到波茨坦时陪伴他的新外交大臣是厄内斯特·贝文。后来,美国国务卿指出,“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艾德礼先生和贝文先生取代丘吉尔和艾登先生,英国对于会议在重要问题的立场上没有丝毫改变。英国外交政策的这种连续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②伯恩斯指出,事实上贝文对待俄国人的态度是“如此富于进取性”,“总统和我都感到惊讶,我们恐怕要与这位新外交大臣分道扬镳了。”^③丘吉尔在1946年3月写给美国国防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的信中说得很恰当,“贝文的胜利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贝文能够比他更坚定更清晰地对俄国人说清工党政府的品质”。^④而以下对于后来继任的一位保守党首相追根溯源的评说,同样准确地评述了工党政府和保守党反对派在重要外交政策上观点的接近。安东尼·艾登爵士(正像他当时一样)在1960年写道,“尽管我处理的某些问题可能与他(即贝文)处理的有所不同,我赞同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他做的绝大多数事情,我们十分频繁地会见。他往往邀请我去他在下院的房间,在那里我们非正式地讨论事情。在议会辩论中我通常附和他。我当时根本不是想为难他,我只想更多地公开表示赞同他”。^⑤无须

113

① K. 马丁:《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1953年版,第169页。“在主要政策路线上”一致的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工党大臣支持联合政府对希腊进行反对左派的军事干涉。

② J. 伯恩斯:《直言相告》,1947年版,第79页。

③ 同上书,第79页。

④ W. 米利斯(主编):《福雷斯特尔日记》,1951年版,第144页。

⑤ 艾登爵士:《回忆录》,1960年版,第5页。

指出这种一致并不是来源于保守党反对派对与众不同的工党——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的政策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转变。正如艾登正确地指出的,并不存在这样的政策,只是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观点上不同而已。这样就有理由认为,保守党政府也许不曾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像工党政府在1947年所做的那样——使其接受印度、缅甸和锡兰政治上的独立。在时代的条件下,保守党政府无论对独立是接受还是长期持反对态度,都只是一桩投机买卖。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由于工党接受了这一点就决不会被说成是伤害了或者违反了保守党的利益。而且它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它们了解还是不了解,在外交事务和殖民地事务上这些利益集团在工党政府中有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盟友。无论如何,在纵览政府1945至1951年间的所作所为,作出这种判断是完全适宜的。

还必须提到第三个例子,即1944年法国解放时的情况,当时大量有关与敌人合作的战时记录表明,传统精英们在看来似乎无止境的短暂时刻,不仅关系到自己命运和国家的政治影响全完了,也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政府不再存在——当时一个复活的武装左派似乎就要挺身而出。^①

114 但是在这里,现实同样是非常实际的。之所以出现这样使人误解的现实,有两个主要(相关的)理由。第一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始终取得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的抵抗运动的认可,因此一旦法国解放了,他便成为统治法国的政府领袖。但是戴高乐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意图并不只是解放法国,他还

^① 参见 P. M. 德拉各斯:《戴高乐在两个阶层之间》,1964年版,第339页以下;关于解放之后“阶级权力”在政治上的崩溃,可参见如勒内·雷蒙德:《法国的右翼》,1963年版,第243页以下。

要防止解放具有革命性质,并且要防止左派特别是共产党人占居重要地位,使他在解放后的事务中独占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发言权。^① 在这一点上将军是十分成功的。

但是,这一成功使得第二个事实在法国解放时期的政治形势下变得极其容易,也就是说,尽管法国共产党热心于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却决没有致力于呼唤一场夺取政权的革命,^② 他们轻易地接受了戴高乐于1944年9月9日任命的重建的临时政府中较低的位置。政府中包括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航空大臣,另一个是公共卫生大臣,它还包括4个社会党的成员;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倾向可能影响到其他政府成员,其中一些人,例如雷纳·普利文和乔治·皮杜尔,最终成为第四共和国主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115 总之,政府是由将军本人统治着,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可以说总是选择正统的而不是激进的政策。

不过,甚至这样一个本质上极其“中庸”的政府,也无法避免,事实上它也不大想去避免对一个包括北方煤田、雷诺公司和煤气和电力业、法兰西银行和四个主要信贷机构在内的虽说有限和不系统但却颇有内容的国有化纲领承担责任。这些措施作为大规模

^① 参见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卷,《统一,1942至1944年》,1956年版。

^② 1944年11月,大赦使得共产党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得以从俄国回到法国。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戴高乐指出:“鉴于过去的环境、此后发生的事件和今日的需要,我认为莫里斯·多列士重新担任共产党领袖在目前阶段利大于弊……他回到法国的第二天便帮助消除了‘爱国者保安队’最后残存的后遗症,在他的同事中间,有些人还坚持要把‘爱国者保安队’维持在一种新的地下状态。在他的政党那种阴暗而又冷酷的严格的许可范围内,他尽可能反对解放委员会的侵权企图和那些偏激小组千方百计进行的侵犯行为。对那些听他演讲的为数众多的人们,如工人,特别是矿工,他总是反复提出要尽可能继续工作,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1944—1946年》,1959年版,第100—101页。)并见J.福韦:《法国共产党史》,1965年版,第2卷,第3部分。

地转变法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第一步,甚至比英国的措施还要逊色些。在大多数“临时政府”官员当然包括戴高乐派看来,其目的是要加强急需国家干预的经济境况的國家的作用;其目的还在于保证当时已经就位的计划机制。但是,干涉是在戴高乐和他的绝大多数大臣给予这种私人经营占统治地位经济持续保持私营和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条件下进行的。作为社会党人的生产大臣当时指出,“广泛的自由部分仍然是法国的活力和经济复苏的基本条件”。^①

就在解放一年之后,即1945年10月21日,大选使得共产党和社会党在新的立宪会议中取得绝对多数,同样在乡村中也取得了多数。雅克·福韦指出,“在法国接受人民阵线甚至人民民主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但是他又指出,“一个人——即戴高乐——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人民共和运动,使之摆脱了人民阵线”。^②“古典的权力”已经在投票中被完全击败。但是一个新的异型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共和运动”在投票中得到了478万张选票,获得了141个议席,而共产党获得148席,社会党获得134席。人民共和运动具有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但是这个政党很快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明显的保守主义政党而毫无价值地成了政治候补者,并且因为别无更好的选择,它成为实现保守党意图的极为重要的工具。更精确地说,它能够起这个作用是因为社会党决定不参加一个不包括人民共和运动的政府,它反过来要求除戴高乐外任何人不要出任新的临时政府总统。宁可选择一个没有戴高乐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政府的共产党,为了参加政府起见,欣然抑制

^① 引自B. D. 格雷厄姆:《法国社会党人和三党制,1944—1947年》,1965年版,第48页。

^② J. 福韦:《第四共和国》,1959年版,第53页。

了自己的要求,而它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意自己被戴高乐排除在任何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部门如国防部、内政部或外交部之外。^①作为替代的是他们掌握了4个“经济”部门,即经济事务部、工业生产部、劳工部和装备部;而莫里斯·多列士成为4个国家部之中的一个部长,或者说是高级部长,可见他更看重较高的级别而不是权力。

在接受了如此多的挫折和妥协后,共产党的领袖们毫无疑问沉溺于当时他们热心地设计的“民族”形象,他们很可能真正相信,他们参与一个很明显是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政府,是最终导致夺得社会主义政权、自己的领导人取得国家事务领先地位的进程中一个必要的阶段。

如果这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将会证明是一个非常糟的错误估计。共产党人的参与远没有使政府特别“激进化”,相反却有助于“非激进化”,或者说至少驯服了工人阶级运动中极端好斗的分子。这正是戴高乐把共产党人拉进他政府时他所希望的,他后来写道,“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我领导下他们的参与,会有助于确保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宁”。^②

戴高乐在1946年1月20日突然辞职并没有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随后由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组阁,它包括另一位共产主义者,他成为一个负责处理前军人和战争牺牲者部门的领导人;而莫里斯·多列士成为副总理。正如它的领导人被“雅尔塔精神”所渗透,法国共产党一直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建法国的党”,而它也许真的胜任这样的称号。但是,它在其中起了十分显著作用的“重建”,其重建的乃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所恢复的是这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第274页以下。

② 同上书,第276页。

样一种制度,其主要受益者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那些它们的地位在解放之时、似乎很危险的资产阶级和传统的精英。这里还存在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从当时环境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如果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策略,是否会带来较好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很难怀疑,在1944年至1947年共产党参加了政府,而当时共产党部长们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并没有给法国统治阶级带来任何威胁,而且事实上对它是非常有利的。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参政的经历。解放为左翼提供了一个比法国甚至更多的前所未有的革命者夺取政权的机会。但是,在意大利保守主义没有戴高乐那样的人的保护,它有的是盟国的军队,前已指出,“在这样一个根据战时盟国间的协定将置于西方影响范围之内内的国家,恐怕不会允许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或类似共产党的政府”。^①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领袖们都不曾有过任何革命的野心,如同在法国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是作为大臣参加一个不属于左派的联合政府。他们实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没有取得其他更多的东西。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的复苏给实施自由放任制度留下了机会”。同时,一个被打垮的但未被征服的统治阶级为了其优势的长存,还得付出小小的代价。

我在这一章中已经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业界和有
118 产者利益集团大都能指望它的政府确实的和积极的善意;然而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一旦上台,其成员或某些成员以最终目的为借口,耍弄着党派官场上的花言巧语而不能对其有所信赖,他们实际所干的一套乃至大大淡化或者根本不顾这些利益团体所面临的危险。

但是,在国家体制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其意识形态的存

^① G. 马马里拉:《法西斯主义以后的意大利》,1966年版,第92页。

在和实际活动在决定国家与社会和与其中不同阶级和利益团体之间关系时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国家的任务乃在于恰当地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这正是我要在下一章中阐述的,下一部分要论述的是有关行政、执法和司法精英在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中起的作用。

第五章 国家的雇员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通常带有特别的政治和党派标记,而最上层的文官通常不是这样。毫无疑问,在一部分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把它们自己党派的和有相同政治见解的人士带进行政机构,或是在提升其他人之前先提升这些人。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指望这些制度中的行政精英成为党员。相反,文官自己始终坚持说,他们在政治主子指导下推进国家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压倒一切而实际上惟一关心的是政治上的“中立”。

前已指出,把高级文官看作纯粹的政策执行者,认为他们很少或者说根本不介入决策是完全不现实的。这并不是说“官僚”必然“渴求权力”,也不是说由他们“治理国家”以及那些大臣只是在官僚统治中虚有其名。这一图景与现实并不相符。正确的看法是介于这些极端观点之间: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一般的模式,即这些人在政府决策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其社会政治力量的构成中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至于这一力量使用的形态,时常打着那种“中立化”的旗号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在迷惑人;事实上,只要稍作思考必定便会看出那是荒谬的:那些埋头于公共事务的人和那些不仅在实施政策而且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的人,他们实际所做的似乎并非超然于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倾向,然而他们自己可能很少意识到;而且,这些倾向不能不影响到他们提供咨询的整个特点和方向,以及他们

处理其行政工作的方式。^①

对于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倾向的存在不应有更多的怀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来说它期待高级文官在国家的委员会中起一种保守的作用，以增强政府中已经发展起来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在他们不大被扬名的政府中充当一种抑制因素。

就保守党政治领导人来说，这种倾向可能接受在这个或那个改革项目上一种自由的或渐进的思想，以及对社会秩序许多方面所持的怀疑的、甚至是冷嘲热讽的态度。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官个人往往在社会、经济、行政和军事改革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律；而且，实现这种情况时，其改革倾向始终完全是与现存的社会秩序不矛盾的，并且对加强现存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支配和决定作用。

只要存在意识形态倾向，很明显就没有理由问为什么上层文官在不同的保守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交替执政时不应该或多或少地保持“中立”，对他们来说，有充分的理由以同样的热情在这种可能被普选冲击的狭窄的范围内为各个政府服务。

正像社会民主党政府上台执政时那样，甚至在这种范围加宽之时，也无须较大地背离这种“中立”。正像已经指出的，后者从来不曾试图执行一套自己硬要大大背离保守党的利益和思想模式一脉相承的政策，而面对这样政府的文官也就不曾有过要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和服务当时政府之间顾及谁而作出明确的抉择。 121

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大臣们时常表现

^① 正如一位美国前高级官员指出的，“无论是文官还是军事官员很难说是中立的，他在发表意见时不可避免地要作为一个咨询者发言。”（R. 希尔斯曼：《鼓动一个民族：约翰·肯尼迪政府时期外交政策中的政治》，1967年版，第8页。）

出的忠诚却成为令人作呕的献媚。“他们的”文官的献身精神和热情,必然多少表现出一点天真甚至可怜。因为他们赞美的忠诚不过是表现文官们像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于保守党的意图所具有的无限的适应性那样,具有无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适应性。

一种好像很有道理的说法认为,由于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设想的方案一直没有成文,如果一个想要进行革命变革的政府上台执政,高级文官如何选择和它可能发挥何种作用,必定难以推测。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政府恐怕会寻求对行政机构进行广泛的变革,并且引进那些有热情并支持它的人士。事实上,决心进行重大的行政变革大概是对它意图严肃性的一个重要判断准则。因为它如果不这样做,完全可以想像它会得到一批这样的官员,其主要关心的一件事,实际上是他们压倒一切真正关心的一个问题,乃是限制这样一个可能造成“伤害”的政府;并且,对于他们认为极其厌恶并确认有害于“国家利益”的行政措施,尽其全力进行干预。是否就会造成左派通常预言和担心的“行政破坏”,还是很难说。重要的一点是,毫无疑问,政府视地点和环境决心进行革命变革,自然无法期望于他们的那些自我标榜“中立”的传统行政精英,更不用说依靠那些对他们的政策有所要求的有献身精神的热情支持者。

122 在这个问题上,它甚至不是惟一的对付这些传统精英感到困难的政府。任何一个想要“激进”改革的政府,多半会发现——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也有许多对其事业并不那么热心并十分可能怀有敌意的顾问。一个对其同僚知心并且得到他们支持的强而有力并有决断的政治领袖,完全能够越过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和说在这里不存在障碍不是一回事,至少像纽斯塔德教授就美国的情况所说的,因为“现在拥有职位的上

层专家差不多可能不受限制地保持他们长期任职期间拥有的巨大权力”。^①西森先生一直认为,就英国来说,最上层文官的任务“和国王一样,是要保持连续性”,并且,“他的职业要求他更多地关心王国的连续性而不是政党的成功”。^②下面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说法:因为上层行政官员完全不具有西森先生所说的“中立”的特点,按照他的意见,后者对于政策所采取的完全是非中立的态度,以确保“王国的连续性”,在他看来,对于改革则没有或者说对他来说看起来没有对它构成威胁。虽然如此,行政官员很可能屈服于他的政治主子,并为了他们而执行他认为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他们别无他择,只能在寻求“限制损害”上做些努力。这种态度极像是在愚弄激进的改革而不是增加它成功的机会。总之,最上层的文官在国家体制内发出的声音是慎重的,稳健的,他们永久的座右铭是“不要过分努力”,^③至少对于激进改革是如此。正像他们通常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没有政治家们追求选票时所受的那样各种的压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一种为现状、保守的惯例和被视为神圣的常规辩护的作用。这可以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和必不可少的功能,也可以不这样看。但是,它与通常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文官“中立”的观点是矛盾的。 12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文官的保守主义不仅需要一般地看待,而且对有关这些特殊社会阶级等级制度和阶级结构加以专门

① R.N.纽斯塔德:《总统的权力》,1960年版,第42页。同样可以提到一位法国作者的评述:“在每个行政部门,都存在着对部长领导公开的程度不同的抵触,在这种冲突中,行政部门掌握着技术能力和稳定性这两张王牌。部长走了,可行政部门还依然存在,所以人们常常说,即使法国不再有人统治,但还是有人管理的,正因为如此,法国才能生存下去。”(M.瓦利纳:《行政技术部门对政治权力的抵触》,载《政治与技术》,1958年版,第168页。)

② C.H.西森:《行政精神》,1959年版,第124页。

③ 原文为法文。

研究,并且要看到,它主要的意图不是单纯保卫一个社会等级,而是要捍卫这些社会中那种特定的社会等级模式。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中上层文官不是一般的保守;他们是这样意义上的保守派,即在他们所处的领域内,他们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充当了现存经济和社会精英的盟友。

造成这一现象原因不止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前面已提及,这就是最上层文官的社会根源、教育和阶级处境,使他们成为其思想、偏见和眼界大都受其影响的特殊环境的一部分,同时必然影响到,事实上是限制着他们对“国家利益”的看法。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这一点常被忽略——“环绕着”上层文官的意识形态(对许多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在这些国家中现在并不是一种听其自然的东西。决定新人招收和提升的,主要不是社会根源和加入的宗教。^①在这种制度中根本不可能希望文官们赞成一种特别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可以期望他们在一个以强有力的保守主义为一端以脆弱的“改革主义”为另一端的思想谱系中立下脚跟。离开那个谱系便会有使他们的政治前途受到损害或者根本没有政治前途的重大危险,这在某些国家是确实无疑的。

124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彻底程度有所不同(美国轻易地领导着潮流),文官候选人和它的成员都必须经过已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熟知的具有固定特征的甄别程序和安全

^① 在一些国家中尽管不再存在对加入宗教的规定,然而惟有明确的自由思想职业人士才能够在行政官职中出人头地。(例如,参见 A. 格罗泽:《波恩的民主》,1958年版,第180页。)

检查。^①对于这种过程的官方理由是要求他们从国家雇员中特别是“敏感的”岗位上清除“不可靠分子”。但是，“不可靠分子”概念的构成却是富有弹性的，并且很容易被扩展为包括任何一个在重要问题上他的意见和观点离开根据流行的保守主义意识确定的“健全的”精神状态的人。^②并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文官所具有的也是人们所期望的或者确切地说是要求他们具有的知识，似乎足以保证他们中那些可能被引诱而偏离那条人们期望他们走上的狭窄道路的人们，会减缓和克制诱惑。无论如何，他们的人数似乎是不多的。

但是，对于增强高级文官的保守主义观点，并把他们的见解引到一个特别方向，使他们转变为公司资本主义世界的积极支持者，比这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他们与那个世界的关系过于密切。

首先，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需要实 125
业家和文官之间保持持续不断的联系，不是作为一种对抗者或者说甚至成为不同的背道而驰的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服务于“国家

^① 在美国，这些甄别程序需要经过长得可笑的时间。（可参见 R. G. 谢里尔：《华盛顿温和的束缚》，载《民族》周刊，1967年2月20日和27日。）

这个过程并不限于发生在行政生活中。美国一位作者写道：“在美国，大约有25000个私有工业机构是按五角大楼制订的安全条例并在前来视察的军事工作组仔细检查下运行的……在军事当局指导下工作并且时常引起公司官员不快的安全检查官员，接管了人事部门职能的主要部分。在理论上他们是不能被雇用或解雇的，在实际上他们的话常常等于法律。”（J. 雷蒙德：《五角大楼的权力》，1964年版，第154—155页。）1956年另一位作者评述说：“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大约在美国被雇用者中的五分之一（加上他们的家属）不得不接受对于他们的交际和政治信仰的调查，为的是清除他们中一小批可疑的人士。”（W. 盖尔霍恩：《工业自由和政府的束缚》，1956年版，第41页。）

^② 另一方面，两位法国作者指出，1962年合法地进入国民行政学院的人中有两个极为离经叛道的学生，一个是左翼分子，而另一个是右翼分子（后者由于“极右派活动主义”被拘禁过），而他们指出，这象征着“一种自由主义，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在那些被人们认为最民主的国家也很难达到类似的程度”。（F. 戈盖尔和 A. 格罗泽合著：《法国的政治》，1964年版，第224页。）

利益”的伙伴,正如政治家一样,文官多半限定在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的利益一致的范围内。

而且,行政界和大企业界现在由于在人员上相互交换而增加了联系。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实业家进入国家体制的政治和行政领域的这个或那个部门。但是高级文官同样甚至更多的固定地进入公司企业。早在1946年,一位法国作者就议论说,“由于精英构成了国家最大的公司,现在行政机关,从实业界立场来说,不过是持反对派意见的议院”。^①从那时起,这种模式变得更加显著。另一位法国作者指出,“多少年来,财政监察署、行政法院……和作为法国地区和行政部门首脑的省长和专区区长,向法国主要的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高级董事、副董事长和董事长”;其实,这位作者说到的似乎是“建立了由在实业界、公共事业和政府中工作的经理人员或技术专家组成的单一寡头制”。^②明确地说,同一结论适用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在政府这种或那种雇员与实业家之间的这种可交换性,正是“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所造成的对各种部门、计划组织、管理委员会、财政和信贷机构、国有工业和公共事业施加相当影响的技术专家集团独有的新特征;并且,它也适用于甚至更晚些时候才出现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际化结果的那些超国家组织成员的国际性的“技术专家”。

126 这些人完全不属于政界或是实业界。他们属于二者并构成二者的一部分,并且非常容易地在它们之间移动,这两个集团的界限正日渐模糊和朦胧。一位作者在论及法国时说到,“公共企业或国有化企业的经理在混合公司或技术实体的董事会中拥有职位的情

① P.迪特朗:《超越资本主义》,1946年版,第359页。

② G.M.索维奇:《法国实业家及其环境》,载奇特:《实业界》,第235页。

况并不罕见；与此相似，财政稽核时常被派遣到私营企业、银行或国有化企业的经理职位。反过来，也越来越多地要求私人企业经理参与推敲国家的经济政策”。^①

技术专家在区别“私营部分”和“公有部分”的利益时遇到了困难，一个在担任法兰西电业主席后成为法国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施奈德”主席的“高级官员”，下列评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国有、半公半私和私有领域中，这些职能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三种领域中的领导职责并非截然不同。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因为当人们处于一定的领导层次，说到底，公共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相结合的，至少可以说是普遍利益的一种形式。甚至普遍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私人利益。^②

然而，其他的持“专家政治”论的人在表述这种十分清晰的意识形态立场时毫不困难。M. 拉吕米尔正是以对财政稽核的著作和宣言的分析为基础，指出在他们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信心；但他也发现：

……在这些进行分析的作者中，恐怕我们找不到一个倡 127
导对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人。稽查官集团不是一个在国家制度内部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而工作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它的成员始终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

^① J. 比利：《技术专家和权力》，1960年版，第55页。还可见J. 布林迪拉：《高级官员》，载《自由思想者》1955年6月，第837页。值得指出，在1953年还在位的法国高级经济官员中，240名财政稽核和他们的前任中有70名即将近30%在辞去公职或批准离任后加入了私营经济企业。（《法国和托拉斯》，载《经济和政治》，1954年第5—6号，第194页。）对这个精英集团的一项详细考察同样表明，这些人进入了法国大型企业中最有生气和最有权力的部门。（参见，P. 拉吕米尔：《财政稽核》，1959年版，第88页。）

^② 博米尔：《法国重大事务》，第193页。

理人。他们必然保卫它,而不是推翻它。^①

而让·梅诺在研究法国专家治国论者时非常恰当地写道:

人们时常断言,就其愿望来说是要在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处理问题——这一直是专家治国论者一个话题——它只是意味着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必然接受它们所表示的和为之辩护的力量关系。^②

他还论及了法国的计划:

……起初,人们可能把计划看成是一个可以改进经济效益和制度质量的体系。然而在实际上,计划已经表明了它是巩固资本主义的一种简单的手段,军需部门计划制定者从未错过机会来表明个人的主动精神和自由经营的特点。^③

这些结论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治国论者”。在美国也同样如此,一位作者曾经把独立的管理代理人描述为“在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中,作为自我永存的工业体系中一个功能单位没有那么多的敌对者。单位中每一个互补的部分都学会了适应这个体系的需要。从这点来看,一个代理人一旦被整合,也就不再那么被掠夺和奴役;他适应于一种有助于维持现状的体系”。^④ 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管理代理人可以独立于政治执行者;但是他们的成员却无法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地位,由它制定的规程对于被管理的利益势力更多的是帮助而不是妨碍。

128 还不应当忘记,在许多情况下,实业界现在提供给行政精英的机会有助于使后者的态度适合实业界的要求。这些机会似乎只是提供给一旦执政会表现出真正理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需要和意向

① 拉吕米尔:《财政稽核》,第191页。

② 梅诺:《专家政治》,第222页。

③ 同上书,第122页。

④ 卡里尔:《美国多元论的衰落》,第91页。

的那些人。一位美国作者指出，“很少有这样能干的管理官员，如果他是在职而采取一种较为合作的态度，在面前有着一片可资开发的新草场，他竟会无法与对方进行讨论。”^① 这种迷人的召唤对于文官可能不会立即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采取行动。总之，在一个进入了大实业界而另一个没有进入大实业界这两个退休文官之间是存在着极大差别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年代尤其这样。

此外，在下一章要说的是，实业如果不具吸引力，那么有组织的实业对不顺从或怀有敌意的官员便可施加巨大的压力。从事经济决策、调解和管理的文官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能够被解释为“反对实业界”的态度和行动，必然敌视有权和有影响的人，也似乎不可能特别受政治官员的欢迎。这里没有行政工作者成功之途，甚至对于后行政实业家也是如此。

很难强调说这些优势的实施有益于劳动者或其他的“利益”和阶级。劳动者无法向行政精英提供什么——上层文官加入在退休问题上为工会服务的例证并不多。一般说来，劳动者也极少可能如同实业家那样能够向行政精英和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②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竞争的诸阶级和利益团体之间的文官决不是“中立的”：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资本及劳动的同盟者。国家官僚，无论从哪方面说，决不是超越各阶级、利益团体和党派之间冲突的非人格、非意识形态和非政治的因素。由于意识形态，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恰恰相反，官僚在保持和捍卫先进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权力结构和特权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参与因素。这一点至少可以同样适用于经济“专家治国论者”；这些人

① R. 恩格勒：《石油政治》，1961年，第318页。

② 参见本书第6章。

的所作所为充其量也不是在从事纯粹的技术和非意识形态的活动。他们的整个目的是加强和巩固占优势的经济结构,并使其合理化,以顺应资本主义事业的需要。就这一点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比那些帮助国家进行对经济生活干涉的人更忠实和更有用的追随者。

二

同行政精英相比,高级军事人员可能更倾向于自己认为,同时也常常被别人认为,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党派的影响。高级军事人员给人的印象是,完全献身于“国家利益”,并具有“军人美德”,如荣誉感、胆量、纪律等,在党派之争中不偏不倚,这就在事实上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人全都与“政治”不沾边,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不直接卷入这些国家公开的明显的政治进程。

然而,这种认为军人在意识形态上不承担义务和不介入的看法,也明显是错误的;认为他们对事态的影响不大的观点,也同样是错误的。

一般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在国家体系和社会中是颇为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因素,他们的社会出身、阶级地位和职业利益导致他们常常以一种厌恶、怀疑、甚至是敌对的心态看待“民主”政治的特征和内容,这些似乎无须赘述。130 一方面,在一些社会中,官员集团的某些部分受到激进的、“现代化”的力量的冲击而有所动,那里的军人领导着旨在推翻至少是改革陈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运动。另一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精英总是拥护具有极其保守内涵的“国家利益”,这一般并不排斥有条件地暂时地接受“民主”进

程,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坚定地敌视激进思想、激进运动和激进政党。一位作者在描述法国军事官员的价值观时说:这种价值观“强调暴力和民族主义的作用,对团结、自我牺牲、等级制和秩序的偏爱甚于对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偏爱。”^①类似的话题经常出现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思想”的所有描述中。

和文官的情况一样,笼统地说军人是保守主义的,这也是不合适的。长期以来,保守主义呈现了比较明确的特征,也就是说,军人不仅常常明确接受“现存的机制”或特殊的“价值观”,而且还接受十分具体的现存经济和社会体系,相应地反对任何企图取代这个体系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阶段,军事精英倾向于以贵族般的傲慢对待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他们具有来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这使他们同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其中充当官吏的文职政权发生矛盾。源于这些价值观的态度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就像文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目的巧妙地调和在一起一样,经历了虽然有限但明确的社会同化过程的军事精英,也逐渐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和睦关系。正如亨廷顿教授在谈到美国时所说的:

在战后十年,很少有比军方开拓的同美国社会中的实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更能体现军界的新地位的……职业军官和实 131
业家表现了新的彼此尊重。前所未有的退休将军与元帅进入美国各公司的行政班子;新组织的诞生在公司经理和军事领导人之间架起了桥梁。在军官看来,实业是美国生活方式

^① J.F.安布勒:《法国军队在政治中:1945—1962年》,1966年版,第278页。

的缩影。^①

这一点用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不过,这些国家的军方逐渐同大企业建立特别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庞大的军事要求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密切。^②从这一点来看,不仅美国,而且其他国家的“工业-军事”集合体,不是夸张的言辞,而是由真正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确切事实。

然而,军方在国家体系和社会内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一问题仍未解决。因为即使军事精英的保守主义或许是个事实,但它在决策过程中表达的程度仍需要作进一步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是以文官对军人拥有巨大的优势为特征的。由于这一原因,对这一问题加以进一步考察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些国家(除少数国家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外),军事精英从未对他们的文职政府指手划脚,从未认真试图接替统治权。这些国家偶尔出现的独裁,事实上也不是军事专政:希特勒最初是文职下级军官,墨索里尼同样也是文职人员。这两人主要是在正规军官的帮助下才获得132 政权的;但他们也压制他们的军事精英,他们过去从来不曾、直到现在也没有这样被压制过。鲍德温时期英国将军对决策的影响完全有可能大于希特勒时期德国和墨索里尼时期意大利的将军对决策的影响。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官很少起独立

^① 亨廷顿:《军队与国家》,1957年版,第361—362页。亨廷顿教授也指出,“在50年代中期,每年有2000多名军官离开现役,而投向实业界比较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引书,第366页)。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也见F.L.柯克:《好战之国》,1963年版;和L.赖斯曼:《生活经历、权力和职业:退休的将军》,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56年版,第21卷,第2期。关于英国,见P.阿布拉姆:《民主、技术与英国的退休军官》,载S.P.亨廷顿主编:《军事政治模式的变化》,1962年版,第166页以下。

^② 关于美国,见C.R.莫伦霍夫:《五角大楼、政治、利润和掠夺》,1967年版。

的政治作用,甚至更少寻求用军事暴动和军事政变的方法,使自己替代文职政府。典型的例子就是1918年军事瓦解后,事实上在整个魏玛共和国存在期间,德国军官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但大部分军官仍坚决拒绝支持推翻软弱和动摇的政府。^①人们曾经指出,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日本,“(军队的)权力也很有限。它不能直接统治国家,宁愿采取日本传统的间接统治方式。它不能罢免政治家、外交部官员、官吏和工业家。”^②法国最近几年的经历只是这一普遍模式部分的甚至令人怀疑的例外。从未成为这个国家最民主和具有共和国思想的机构的法国军队,由于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所遭到的失败和耻辱而引起国人的不满,军方则指责第四共和国政府软弱而又优柔寡断。^③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军方对向文官权力进行公开挑战仍严重缺乏自信,尽管这时的政权在政治上迅速堕落,并且在战地发生更为严重的军事危机。1958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爆发的起义显然是不成熟的事件,这是因为在场的高级军官急于坚持“合宪”;^④这一起义之所以推翻了第四共和国,与其说是阿尔及利亚 133 的军职人员的决心,不如说是巴黎政治家的软弱和伤风败俗。在使戴高乐获得政权以后,起义军很快发现,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其他许多地方,他们都不能依靠戴高乐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三年后,这再次引起了一些将军在阿尔及利亚的起义。这一次是真正进行军事政变的尝试。起义轻而易举被镇压表明,在发达资本

① 见卡斯滕:《1917年至1933年德国国防军和政治》以及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复》。

② F. C. 琼斯:《日本》,载M. 豪沃特编《军人与政府》,1957年版,第94页。

③ 见R. 吉拉尔代:《1945—1962年法国的军事危机》,1964年版,第三部分和安布勒:《法国军队在政治中》。

④ R. 吉拉尔代:《当代法国的文职和军事权力》,载《法国政治学评论》,1960年,第10卷,第1期,第31—32页。

主义社会进行这种冒险,具有根本的局限性和困难。

在这些国家,从事这些冒险最大的困难在于,如果没有得到部分下属阶级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如果没有得到对自己的经济和防御组织心灰意懒的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右翼任何公开“非法”的挑战都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再者,这种群众性的支持需要动员和汇入拥有自己的附属群众组织的政党中。简言之,右派的挑战需要有类似法西斯主义那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从事这种运动的组织也需要有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深孚众望,蛊惑人心,富有魅力,在政治上非常灵敏。但不管他们的整个传统如何,任何高级军官都不能拥有这一切。即使在军事精英内部能找到具有这些特质的一个人或一些人,使用上面提到的这些特质的试图肯定也会很快导致把军队排除在外;至少在有关国家,很难在军队内部产生法西斯型的政治运动,尽管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高层军官,例如德国和意大利的高级军官,有时会充当右派反革命运动的同盟者这样的重要角色,而既不会是这种运动的发起者,也不是这种运动的领导者。

至于军界没有得到群众大力支持而试图篡夺政权,其失败的危险肯定很大。首先,按这一观点,军队不是铁板一块,地位不同,对待冒险主义的态度也大为不同;同下级军官相比,绝大多数高级军官更不可能具有这种冒险主义倾向。正如安布勒先生指出的,“上校在这种冒险中得多失少,他们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军事叛乱的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① 总之,各个层次的官员都得防范征募的新兵,他们不能肯定,这些新兵在不合宪的情况下是否会自动服从军官的命令。这是导致1961年阿尔及利亚军事起义瓦解的一个因素,这也常常有助于使其他国家军方类似的试图受挫,如

^① 安布勒:《法国军队在政治中》,第342页。

1920年德国的卡普暴动。

但这种下层官员的不可靠性,只是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盲动主义者可能面对的比较普遍的、最终也是决定性的障碍,也就是说,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敌对和潜在抵制的特殊表达。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任何文官政府,不管怎么软弱,只要它愿意,都能有效地借助有组织的劳工对付起义的军人。甚至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起义和对暗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①负有间接责任的诺斯克在1920年也能告诉德国的军事阴谋者:“如果你们使用暴力,我们将宣布总罢工”;^②当卡普暴动确实发生时,诺斯克所在的政府的确宣布了总罢工,这大大有助于挫伤和打败暴动分子。^③只是在劳工运动极其软弱或瘫痪的地方,热衷于获得权力的军人才能无视劳工的这种敌对或希望战胜这种敌对。在劳工运动既不软弱也不瘫痪的地方,这些国家的波拿巴主义乃是真正极其危险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如果要获得成功的机会,使右派反戈,需要采取其他比较“大众化”的方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确实采取这些形式的场合,军人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然而,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盲动主义者相伴随的危险和困难,不足以充分解释军事盲动很少发生。当形势似乎迫使他们这样做时,不管分歧多大,他们确实在冒这种风险。这些社会的军人没有经常寻求对文官的权力进行挑战 and 抵制,这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和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文官一样,军人通常也得同其观点和目的与他们自己没有大的差别的政治家和政府打交道。甚至当“左翼”政府当政时,

① 见J.P.内特尔:《罗莎·卢森堡》,1966年版,第2卷,第774页。

② 惠特-贝内特:《权力的报复》,第74页。

③ 同上书,第78页。

不管军人对这种政府的看法如何不对劲,彼此之间都很少会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绝对的疏远感。总之,这些政府一般来说实行着在军人看来与这样的政府合作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1918年及其后,德国军事领导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埃伯特和诺斯克紧密合作,以保证“社会稳定”,他们知道后者也与自己一样需要这种稳定。尽管卡斯滕把“不直接介入政党政治领域”^①作为他们的传统,但假如新人显得不够“温和”,高层官员同样不可能平静地接受不可避免的解雇而无声无息地辞职。

确实,在许多场合,当军人同他们的文职主子在政策的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发生矛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矛盾时,当军人与文官关系固有的紧张达到极危险的地步时,军方总是倒向右派。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的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持“中庸”的态度,由于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同军队精英都拥有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观,因此,他们之间的不和不管如何明显和严重,一般来说都能够得以妥协和和解。可以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官与军人特殊关系,即军人居于从属地位这种一般模式的基本线索。

136 然而,“军人居于从属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目前军队在资本主义政权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错误描述。事实上,人们,尤其是C.赖特·米尔斯坚持认为,^②至少在美国,生活的日益军国主义化以及“军人势力”的迅速增长,产生了导致军方被当作与文官政府和公司精英“平起平坐”的权力团体的气候。

这似乎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军方在重要政策的决策方面有着独立的、与政

^① F.L.卡斯滕:(德国),载豪沃特编《军人与政府》,第94页。

^② 见《权力精英》,第9章。

治执行机构平等的地位。怀疑的理由认为,对美国所作的这种断言肯定不适于法国、英国、德国或日本等国。尽管表面上美国的军事精英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资源,^①但能否建立起与经济精英相同的独立权力基础,因而能否平等地同总统和文职政府打交道,这也难说,更不用说同他们打交道时具有优越的地位。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统治五角大楼7年,对军队实行了即便不是彻底的至少也是牢固的控制,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对肯尼迪和约翰逊这样的总统产生巨大影响的不是军人而是文职人员。就我们所知,没有哪个军职人员比白宫内的文职顾问更应对越战行为负责任。夸大资本主义政府军事顾问的作用是危险的,因为这倾向于分散人们对文职官员在国家政策和行动方面应负责任的注意。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掌权者,接受了米尔斯所说的“军方对现实的限制”这一点或许是真的。但没有理由认为军人将它强加给了他们的文职主子。 137

这表明事实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精英在决定许多关键的国家政策方面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政策领域。有关国防的政策必然涉及从外交到经济,从社会福利到教育等许多其他政策。正如梅诺教授指出的:“在和平时期没有一个经济或财政问题是不与对外防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②再者,这种影响也不只限于国家制度本身;它也以各种方式充分地伸展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从这一研究中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军方在国家体系

^① 关于这一点,见F.J.柯克的著作。柯克指出,“美国的军事机构无论按何种标准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组织”。(《好战之国》,第21页。)

^② 梅诺:《专家政治》,第38页。芬纳教授甚至进一步认为,“今天,军人插手外交政策甚至国内政策已司空见惯”。(S. E. 芬纳:《骑在马背上的人》,1962年版,第74页。)

内产生大量的影响。这也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实际上缺乏理论根据。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很可能显示是高度保守的。军事精英总是被期望增加他们政府的保守偏见,在他们的一切势力范围内尽可能充当另外一种声音,即警告、限制和责备与他们保守的“国家利益”观不一致的政策。再者,不管他们的整个思想倾向如何,军事和警察精英总是被期望以特别的热情去支持文官权力反对“国内颠覆”,至少是来自左派的颠覆^①的决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社会关系紧张和公开发生阶级冲突时期,充当现存社会秩序的强制力量。他们是这种只有国家才拥有的强制功能的管
138 理者,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文官权力可能这时或那时会对他们的可靠性、忠诚和顺从表示怀疑,但过去很少发现对军方的诚意,比如说反对罢工工人,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其他扰乱现状的人,表示认真的怀疑。

三

在西方式的政治体制中法官是独立的。但独立于什么?通常的答案是,他们独立于当政的政府,他们对政府不承担任何义务,无需按政府的命令去做,或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分权的概念或许不适合其他地方,但至少适合于这里。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司法独立的观念确实有无可置疑的优点,它所隐含的事实在它掌握支配权的政治体制的生活中,有很大的重要性。

然而,司法独立的概念需要加以更为广泛的考察,因为在其有限的含义上,司法在这些体制中某些主要方面的作用尚模糊不清。

第一,高等法院的法官(也包括低级法院的法官)决不是并且

^① 另一方面,对政治另一端的异端分子活动家则不一定如此。

也不可能不受许多影响的支配,尤其是阶级出身、教育程度、阶级地位和职业趋向这些影响的支配,这些就像对其他人一样,同样也有助于法官们世界观的形成。

在这方面我们已注意到,和国家体系的其他精英一样,司法精英也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上层:那些不是明确来自中上层的法官到他们掌权时显然也已属于这些阶层。再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可能产生的保守偏见得到以下事实的强烈支持,即在许多这样的体系中,法官也从律师业中吸收新成员,他们的意识形态意向传统上产生于高度保守的土壤。用 A. V. 迪西的话,“法官处于律师业之 139 首。他们养成了英国律师那种的知识和道德风尚。他们都是生活中勃勃向上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保守型人士”。^①这句话写于 20 世纪初,但直到今天仍然适用,不仅适用于英国,而且肯定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官在处理他们社会主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时,都是保守的。

第二,一般来说,负责法官的任命和提升的政府最喜欢的正是这种保守的人。尽管法律界具有普遍的思想偏见,但仍有一些激进律师,除了激进这一点外,按其他标准,他们完全有资格担任高级司法职务。但这些人任在被任用方面不受青睐,已经具有这种信念的低级法庭的法官也未认为他们受到强烈改革冲击的触动。偶尔在他们国家的司法制度中也有一些特别开明的法官装饰门面,例如在美国。但他们总是构成很小的少数派。因此,他们的自由主义无论怎么令人称颂都不会错误地被当作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机制相敌对。霍姆斯、布兰代斯和卡多萨在美国都是开明的大法官,只有老朽的保守分子才会认为他们的自由主义没有完全包容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内;有证据清楚地表明,他们

^① A. V. 迪西:《英国 19 世纪的法律观念》,1963 年版,第 364 页。

自己恐怕也感到,他们特别偏爱任何别的制度是一种怪诞的想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明法官也完全如此。

140 这些思想倾向之所以重要,其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它们大大影响司法功能履行的方式。人们普遍认为,法官不是“赎买法律的机器”,也不是一套法律体制的无能的囚犯,或纯粹是法律的解释者。在所有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法官在运用法律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司法裁决权,在实际立法中有创造性,正如一个作家指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法律环境是司法过程中作出裁决的不可避免的因素”。^① 这一因素在某些体制中比在其他体制中大得多,例如在美国,最高法院有时起“第三院”的作用。在西方型体制中,这种司法自行裁决的成分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说法官必然寻求扩大司法自行裁决范围,事实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同意一位法官在1824年所说的话:“公共政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马,骑它有危险。”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发现,由于好的或坏的原因,他们不得不骑这匹马。^②

因此,在解释和制定法律时,法官们不能不受到他们世界观的深刻影响,这反过来又决定了他们对这个世界发生的冲突的态度。^③他们也许自以为只受超乎狭隘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利益的价值观和概念的指导。但在具体运用中,这些概念仍然常常展示独特和同一的、与强烈的保守主义观念极为一致的主张和偏见。一位著名的英国法官几年前曾雄辩地声称,英国和美国的法官“视

① W. 弗里德曼:《变动社会中的法律》,1950年版,第60页。

② “法律不是一种静态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理论,它的许多发展是由法官们促进的。这些法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他们认为是法律基础的东西作出判断。”(劳合:《法律观念》,1964年版,第111页。)

③ 因此,霍姆斯法官先生说:“法官们极少提起,即使提到,也总是加以狡辩的。法律从中汲取一切生活精髓是隐秘的根源。当然,我的意思是指有利于社会的考虑。”(O. W. 霍姆斯:《习惯法》,1881年版,第35页。)

自己永远献身于这样的原则：社会及其所有机构的目的是培育和促进各种人类精神的成长”。^①不幸的是，对这些词有形形色色的矛盾的解释，从它们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不是用来反对任何偏见，而纯粹是对偏见的一种托词。

法官自己有时会明确意识到他们的特殊偏见。非常保守的斯克拉顿法官 1922 年写道：

……你养成的习惯，你所交往的人，导致你产生类似性质的思想，当你不得不与其他思想打交道时，你不会如愿以偿地作出迅速和准确的判断。这是目前工党所遇到的一大困难。工党说：“你们的公正判官何在？他们与雇主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他们和雇主受同样的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党成员或工联主义者如何能做到公正无私呢？”有时人们很难确定，你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阶级而另一个不属于自己阶级的两个竞争者中，是否采取了完全公正的立场^②

或者，用卡多萨法官先生的话：“正如向我们中每一个人显示的，这个时代的精神常常也是出生、教育、职业或伙伴关系等偶发因素导致的群体精神。”^③知道这一点后，人们就会真诚地希望克服露骨的党派关系。无可否认，就最明显的形式而言，这种试图并不常常获得成功。

① 拉德克利夫：《法律及其界限》，1960 年版，第 65 页。

② 引自 B. 阿贝尔-史密斯和 R. 史蒂文斯：《律师与法庭》，1967 年版，第 117 页。

③ B. N. 卡多萨：《司法过程的性质》，1921 年版，第 175 页。注意埃弗谢德勋爵比较自得的观点：法律以及管理法律的法官和司法界人士很可能倾向于保守主义。鉴于它的长期传统和历史，如果不是倾向保守主义反而会令人感到惊奇，在这方面，我并不认为法律界与其他职业有何不同。实际上，这种保守主义也不是坏事，因为它必然倾向于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里助长一种稳定感。（埃弗谢德勋爵：《英国 20 世纪的司法过程》，载《哥伦比亚法律评论》，1961 年版，第 61 卷，第 773—774 页。并且阿贝尔-史密斯和史蒂文斯：《律师与法庭》，第 300—301 页。）

然而,一般说来,如果这些问题对社会结构不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越少影响劳资关系的基本模式,与国家的防御和社会秩序的安全的关系越小,在这方面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相应地,社会相对安定时期比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紧张时,更能避免令人不能容忍的偏见。

另一方面,当这些问题确实或似乎对社会秩序的构成或社会秩序的重要部分起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时,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候,法官们不太可能承认自己的不公正,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做到公正,如果他们的每一内在和心理过程都向他们表明他们必须不公正时。

当两名记者因拒绝向瓦萨尔法庭透露消息来源而被判处犯有蔑视法庭罪时,英国高等法院院长似乎是极力提出这样有趣的主张,“臣民的最高职责是对国家负责”。^① 在这种背景下比这种要求本身所产生的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帕克勋爵希望把司法系统也包括在内。不管是否如此,各国的司法精英肯定常常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在本世纪,西方型政治制度中司法不公正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法官一方面支持极右翼杀人犯和无赖,另一方面简单地反对左派和极左派所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偏见。^② 然而,这些法官是否感到他们正在背叛他们的司法职责,值得怀疑;相反,他们很可能认为他们对那些反对“共产主义颠覆”的人显得极其宽大(尽管有过于热情之嫌),而对那些法官认为是颠覆者的那些人显得极其严厉正是在履行司法职责。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官一般来说是非常蔑视激进的异端分子的,异端分子越激进,司法越

① B. N. 卡多萨:《司法过程的本质》,第 306 页。

② 关于这一点见纽曼:《巨兽》,第 27—29 页。

是敌视他们,这乃是事实。在这方面,司法裁决倾向于被用来支持而不是遏止政府和立法机关经常拥有的压服和镇压异端观点和活动的意图。诚然,法庭有时帮助限制国家体制其他因素狂热的偏狭,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肯定不应被低估。^①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危机和受到挑战以及在长期“冷战”的情况下,法官们常常显示与镇压力量同样的热忱,把由此造成的对公民自由的侵蚀当作较小的弊端,或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143

人们也许认为,种种镇压立法或司法行动很少甚至没有为司法自行裁决留下余地。如果法官打算实施法律,他必须严格按照那些颁布法律的人所要求的去做。但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接受政府和立法机构在镇压方面的努力,不仅构成司法功能的“中庸”性,它们也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行为,为这些政府和立法机构提供附加的宝贵的合法化因素。在不存在自行裁决权的地方,面对国家的镇压,法官们惟一的选择是从法院辞职。许多法官不一定认为有必要作出这种选择。总之,在这一领域与在其他领域一样,确实存在某些司法裁决权,法庭有时用裁决权来支持异端分子,但当国家与异端分子发生冲突时,他们常常愿意加强国家权力。

然而,这只是法庭在关心保护“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时常常表现出的支持特权、财产和资本这一比较普遍的偏见的一部分。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工联运动的历史也是不断反对法庭遏止和侵蚀工会保护他们成员利益能力的历史。再者,司法权在这里不单是满足于支持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遏止性努力。法庭本身常常采取主动,在解释法律时,法官通过运用司法的独创性寻求减少

^① 美国最高法院提供了明显的例子。但也必须提到一名见多识广的(但绝不是抱有反感的)作家所作的评论,“最近时期,最高法院显然赞成镇压政治异端的相对保守的政策。”(G.舒伯特,《司法决策》,1965年,第129页。)

或取消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压力下,甚至十分保守的政府和立法机构也不得不赞同和宣传。

无疑,和各国政府以及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本身一样,法官们逐渐认识到,工会远没有构成对“社会”的威胁,事实上,它们恐怕大
144 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限制而不是加剧社会冲突。因此法官对工会权利的态度不再是持续的敌对,因为这种敌对很难不使法官们受到大量和有害的批评。^①

即使如此,工薪阶层及其自卫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不应再有争议的权利,仍然不能保证不受司法的侵蚀。^②司法裁决对劳工在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这种“对抗权力”,尤其是对他们富有挑战性的坚持的那种权力,仍是持续的威胁,这一点也许比过去更隐蔽,然而却是十分明白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法庭总是把保护财产权,反对国家强行减少其活动范围的试图,当作他们主要的一项“社会”职责。司法机关无法阻止国家对财产所有者自行其是的自由的干预,法官们迟迟才接受迪西所说的“从个人自由主义”向“非系统的集体主义”的转
145 变。但是,他们一般都尽可能限制和阻碍这种转变;同其他领域相

①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官们根据神圣的准则“履行选举回报”。但这种准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它表明法官们注意群众的感情和超法律的思想潮流,但这也可能意味着,并且是常见的,法官们并不无视占压倒优势和特殊利益的压力。下级法院尤其如此,它的成员对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他们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偏见和主张,对社会中特别部分,例如比较激进部分的偏见和激情,反应敏锐,美国许多州法院肯定如此,尤其是南部各州;必须强调,下级法院构成司法过程的一部分,由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高级法院,下级法院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

② 见1964年上院高级法官对“鲁克斯诉巴纳德等人案”的决定:“该决定限制罢工和从事其他活动的权利。”(K. W. 韦德伯恩:《工人与法律》,1965年版,第273页。)也请注意上院的一则评论:“罢工行动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常常波及面很广,并且破坏性很大。罢工的威胁和暴力的威胁肯定同样严重”(上引书,第266页);也请注意著名劳工律师的评论,“人们相信,19和20世纪一再受议会反对的法庭的镇压性倾向现在正在改变之中。”(O. 卡恩-弗罗因德,引自韦德伯恩:《工人与法律》,第274页。)

比,在这一领域,他们算是“公民”反对国家的坚决捍卫者。

总而言之,同国家体系的其他部分一样,司法机关也不“超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法官们一直深深卷入这些冲突。在所有阶级中,统治阶级肯定是最少抱怨这种卷入的性质和方向的阶级。

在这一章和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利益团体,通常依靠那些国家掌权者主动的好意和支持。这对他们极为有利。但这些利益团体仍然不能依靠政府及其顾问完全按他们的意图行事。正如前面提到的,各国政府也许愿意实行它们认为完全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但强大的经济利益团体可能强烈反对的政策,不过,这些政府也受到他们不能完全漠视的其他阶级的强大压力。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在西方型政治体制中出现。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可能指望的在国家体制中获得的好意和普遍支持,并不能代替他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实现的自己的直接和具体的目标。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这些利益团体以各种方式所拥有的资源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他利益所拥有的资源。

第六章 有限的竞争

146 民主多元论至少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准确观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允许甚至鼓励公开而自由地组织大量的团体和社团,为实现其成员所希望的目标而奋斗,否则,这种理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如此盛行。除了那些主要影响左派的部分外,事实上确是如此。

多元民主论的缺陷,不在于它坚持竞争这一事实,而在于它(常常含蓄地并且想当然地)声称,这个社会中主要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和劳工,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的,因此,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和持久的优势。这是因为这种观念想当然地把上面提到的那种观察当作神话的缘故。前几章已经表明,实业家,尤其是大实业家,由于其国家精英的构成和思想倾向,在国家体系内部确实享有这种优势。在这一章我们将看到,实业家在国家体系外部也享有大量的优势,因为同劳工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实业利益集团能利用更大的压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

147 被持多元论的“群论家”倾向于漠视的这样一种压力,它比其他压力更重要更有效,实业家得天独厚地在施加这种压力时无须组织、游说和收买。这是一种私人通过对集中的工业、商业和财政资源的控制而对政府和国家施加的无所不及和持久的压力。不管

其好恶如何,各国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和其他众多事务时,都不能不考虑这种重要的独立经济力量。《财富》杂志编委会主席在1952年说:“任何谋求本国繁荣的总统对股份公司的依赖,至少等于甚至超过股份公司对他的依赖。总统的这种依赖性一如英王约翰在大宪章的诞生地兰尼米德对土地贵族的依赖。”^①这一类比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它说明了实业界权力的独立性以及政府对这种权力的依赖性。不仅美国是这样,而且其他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政府确实具有正式的权力,通过行使合法化的权威,将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实业界,阻止它做某些事,或强迫它做某些事。而且事实上各国政府常常也这样做。尽管各国政府确实这样做,并且这样做很重要,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显而易见,各国政府面对实业利益集团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任何实业家不管他们经营的业务有多大,都不能公开违背国家的旨意,无视国家的规定和蔑视国家的法律。问题的关键不如说,实业家对经济生活中庞大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的控制,使各国政府极难把实业家坚决反对的政策强加于它们。完全有理由说,其他的利益集团对政府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可能也会反对国家的意图和政策,有时还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体系的性质,实业家集团比其他利益集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能更有效地反对政府的政策,这使得政府相对于其他集团来说对实业界的愿望和感情予以多得多的注意。

哈克教授在谈到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时曾经指出: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169页。或者如阿尔弗雷德·德·格拉齐亚指出的,“凡是控制大工业者,都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见《政治与政府》,1962年版,第2卷,第56页。)

……尽管实业家肯定会对此抱怨不堪，帕森斯和其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仍宁愿把实业条令看作一只纸老虎，而不是对公共利益行之有效的经济控制体系……〔他继续说〕人们也许会对这种想当然的国家政府权力产生某些疑问。任何公共机构能决定工资、价格和利润水平吗？更重要的是，公共机构能决定资本投入的水平和方向吗？有哪个政府官员能分配原料或指定工厂的位置？公共机构能保证充分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吗？“反托拉斯部”的命令是否真的能以任何可察觉的方式分化我们一个大的股份公司？简单的答案是，按照法律，这些措施既不可能实现，也无法知道如果真这样做了会产生什么后果。^①

甚至对美国而言，这也很可能低估了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对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其他许多普遍盛行比较积极的干预哲学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所能做的，远远超过这里所提到的。

然而，各国政府对实业进行干预，尤其是反实业的干预的范围，要比这些政府的正式权力倾向于表明的有限和明确得多；因此，留给私人企业的决策领域，相应地要比爱管闲事的官僚政府及其代理人所限定的、得到充分宣传的“实业社团”形象所包含的领域，要大得多。

149 甚至决心“控制”私人企业的政府也很快发现，它们寻求强加给实业界的干预机制极其繁琐，如果没有实业界本身的合作和帮助，这种机制几乎不可能奏效。除非政府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否则就无法获得这种合作与帮助，这种代价就是各国政府在实行实业

^① A. 哈克：《社会学与意识形态》，载 M. 布莱克编：《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理论》，1961 年版，第 302 页。

界认为对自己有害当然对“国家利益”也是有害的政策时，不能过于坚决。

与此有关的不一定或完全不是经济权力的控制者对法律的积极抵制，或尽量回避得到充分宣传的规定，尽管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比这种抵制更重要的，或许在政治上有害甚至有危险的是实业缺乏活力，无法去做国家没有明确规定而仅仅是要求的事，和做那些并非完全非法的事。只要它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就很可能并且必定会给改革政府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正如梅诺教授在提到广泛运用这种手段的意大利时所说的，私有制和私人控制

……使政府很难在现存的经济结构框架内实行改革政策。任何希望对一些经济权力和社会生产进行再分配同时又想不使这种体系的基础产生危险的政府，用医疗术语来说，很快就会对这种制度的变革产生过敏反应。^①

必须强调，这种“过敏反应”并不致于阻止任何实业界所不同意的经济政策的通过。换句话说，实业界的否决权并不是绝对的。但实业界的力量很大，肯定要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

有时人们认为，各国政府现在逐渐拥有一个极其有效的对付实业界的武器，也就是说，它们现在是私人企业最大的主顾，因而在影响私人工商业的决定使政府及时实现自己的全国主要工业目标方面，具有“重要而迅速的手段”。^② 150

然而，仅仅在写出上面这段文字的前几个月，工党政府关于国

① 梅诺：《关于意大利统治阶级的报告》，第191页。

② R. 马克斯韦尔：《如何获得新的工业效率》，载《泰晤士报》，1967年10月3日。

家购买力的白皮书即援引《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很清楚，任何试图挥舞政府购买力这一大棒，迫使私人商业或工业大大地改变其方式，以此作为长时期经济政策的手段的想法，已经被彻底否决。”^①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他政府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种权力对付私人企业。

在理论上，各国政府确实可以操纵所控制的大量资源和权力，对实业界“挥舞大棒”。但实际上，试图使用这些权力和资源的政府——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不这样做——很快发现，不管其经济和政治背景如何，这一任务充满了无数的困难和危险。

这些困难和危险也许最集中地体现在“失去信任感”这一可怕的句子中。这向实业势力明确表示：所有政府，包括主张改革的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深切地关心获得或保持实业界的这种“信任感”。相比而言，没有其他利益集团的信任比它的“信任”更值得政府珍视，政府也最担心“失去它的信任感”。

约翰·F. 肯尼迪任总统时为此提供了某些富于启发性的例子。肯尼迪担任总统后不久，就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同实业家顾问委员会的“惊人的权力斗争”，“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公司高级行政人员组成的排外和自我保护的俱乐部。自 1933 年以来，该委员会一直与政府之间保持私下和特殊的关系，在每届政府都享有参与政府决策而不留下公开记录和评论的特权。”^② 商业部长路

① 《泰晤士报》，1967 年 5 月 25 日。

② 罗恩：《自由企业家：肯尼迪、约翰逊和实业机构》，第 61—62 页。另一位作家对该委员会这样描述：“尽管表面上实业家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它具有其他不易接近联邦政府的压力集团所没有的公共影响。例如，它明显充任联邦许多机构征募和安置职员机制。更重要的是，它准备着详尽的‘调查’和‘报告’。尽管这种咨询报告的具体意义很难估定，但司法部仍发现有必要通知内政部长，‘基本政策的根本问题’最初是由实业家顾问委员会决定的，政府的行动充其量只是对该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加以实施”（卡里尔：《美国多元论的衰落》，第 99 页。）

德·哈特韦尔·霍奇斯虽然算不上激烈的激进分子,却奇怪地认为,任命实业家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方式和程序应加以修改。结果,由此产生的困难导致实业家顾问委员会本身断绝与官方的联系,并改名为实业家委员会。“霍奇斯为新的实业家顾问委员会起草了计划,其中的一个计划把美国大中小规模的实业纳入了一个横向委员会。同时,它还包括劳工、农业和教育界的代表”。^①

但这些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总统有许多问题需要实业界的支持,并且“日益担心人们指责他‘反实业’,因此,他从先前坚决大胆的姿态转向支持实业家顾问委员会”。^②他与实业家委员会建立良好关系,并安排将“实业家委员会的分支机构指派给几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并指派给白宫本身。”^③就工会领导人而言,“他们抱怨肯尼迪总统掀起了反对‘大量增加工资’的运动,但就肯尼迪而言,他这样做是为了向实业界保证他不偏不倚。不过,肯尼迪总统置劳工的利益而不顾,希望与该委员会恢复良好的合作关系”。^④

仅仅过了几个月,肯尼迪总统即发现自己不仅同实业机构的成员,而且还同罗奇·布劳这位美国钢铁委员会的主席“交锋”。布劳宣称,他将大大提高本公司钢铁产品的价格,其他钢铁巨头很快纷纷响应。在这个时候,总统使用各种压力,^⑤包括在电视上引人注目地表现总统的气愤之情,成功地促使钢业巨头收回涨价的成命,尽管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一年。但这一插曲对实业界并没有造成损失,因为它只是说明总统极度关心赢得和享有实业界的“信任”。事实上,在肯尼迪总统被害时正在总统座车上的康纳利州长回忆道:肯尼迪得克萨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向“实业界”重申

① 罗恩:《自由企业家》,第70页。

②③ 同上书,第71页。

④ 同上书,第73页(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

⑤ 关于这一点,参见上引书,第6章。

自己的意图；康纳利州长写道：“我认为这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保守的实业界人士会怀疑，作为我们资本主义制度丰硕产物的总统居然会做出破坏该制度的事。”^①

赢得实业界的“信任”也是威尔逊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不倦追求的目标，尽管未取得大的成果。《泰晤士报》在1967年秋季报道说：

……在以后几个月，一些重要的工业家可能会被首相召来进行私人谈话，此举旨在使实业界相信，他们的观点对政府制定政策极为重要……实业界曾经为工党的上台提供大量基金。^②正因为如此，当后来首相准备干预白厅与工业界的经常性对话，以恢复对促进高投资和改换手法所必不可少的自信时，实业界大为失望。^③

有这种热忱并不奇怪。由于“实业界”的经济实力，由于实业界的行动(或不行动)对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任何锐意进行激进改革的政府必定求助于这股势力，或者由于希望得到实业界的“信任”为其坚定的激进行动寻找机会。迄今为止，在西方式的政治体制中，不管各国政府在上台前如何花言巧语，都不曾作过第一种选择。相反，具有改革精神的政府有时情愿，有时不情愿地遏制自己的改革倾向(尽管对它寻求安抚的人来说这些总是远远不够的)，或者使自己的改革适应实业的目的(如153 1945年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建议)，使自己成为他们在野时曾许诺要反对并予以制服的那种势力的盟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但政治可能首先取决于实业界的

① J. 康纳利：《肯尼迪得克萨斯之行的目的》，载《传记》，1967年11月24日，第100页。

② 这一点很值得怀疑。

③ 《泰晤士报》，1967年10月3日。

认同。

今天,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左翼”的政府不仅要认真对待他们国家实业阶级的力量,力图赢得其信任。他们甚至比以前更要认真对待外部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和势力的力量和压力,例如国外大企业,强大而又保守的外国政府,中央银行、私人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官方金融组织,或者所有这一切的可怕组合。维护经济和财政的正统性,正确对待自由企业体系的特权和需要,不仅仅是国内实业利益集团对他们官员的期望和要求,这些国内利益集团现在还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强有力支持,后者多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指出,同以前相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是一种国际性的体系,各成员国的经济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尽管国与国之间仍存在持久和深刻的资本主义竞争,但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相互依赖的国际资本主义“社会”。国际“社会”如果不赞同某一成员的政策,并由此取消可能给予的善意和合作,这显然会给有关国家带来重大困难。只要某个国家愿意继续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员,不愿招惹国际社会的反对,这一愿望就会对它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并进一步迫使具有改革倾向的政府不偏离正统的轨道。享有政府高度自主权的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逐渐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作为那种正统的捍卫者以及“正统财政”的典型代表的资格。经济和财政地位比较稳固的保守的政府,如戴高乐总统长期当政 154 的政府,可能会采取欺诈的手段而无受报复之虞。另一方面,一个激进的政府看来是不会得到这些国际资本主义的代表很多宽恕的。

再者,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激进的政府通常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上台的,他们发现,除非他们实行为债权

人和银行家所接受而同他们先前谴责的保守政策相去不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他们才可能获得借贷、贷款和普遍的财政支持。

另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是1964年10月当选并在1966年3月再度当选的工党政府。威尔逊先生本人在1964年选举前用人们经常引用的话警告工会大会,“你们可以把独立的外交政策或独立的国防政策当作自己的工具,但不要对此说三道四。”^① 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至少也适合“独立的”经济政策。但威尔逊先生上台后不久即“孤注一掷”,在随后几年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他的政府充分地推行了一种极其保守的政策,以保证获得资本主义政府、中央银行、国际财政机构继续而却毫无热情的支持。但这种支持自然要以严格遵守经济和财政正统观念为前提,其中心内容是以降低工资为主要目标的“收入政策”;债权人有权通过不断的监督使其确信工党政府确实在推行他们所要求的政策。

这种依赖和监督一直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从资本主义世界寻求支持和贷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的特征;获得这种支持和信贷的代价是,有关政府始终实行旨在支持,至少不阻碍
155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无论如何不冒犯贷款者和资助者利益的政策和态度。

但是,这些外部的压力现在不仅影响“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它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同样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对付一心想实行他们不愿接受的政策政府的又一个力量。在这些国家,阶级冲突一直具有国际影响,只是现在这种影响比过去更直接,更真实罢了。

^① 工会大会年度报告,1964年,第383页。

二

多元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否决团体”中的一个,与其他“否决团体”并无二致。根据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控制了经济资源而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享有的战略地位,这种观点肯定是与现实不符的。

在其他一些团体中,作为社会中一种“利益”的劳工权力,即便不被认为超过也常常被认为同资本的力量势均力敌。但这只是一种不太现实的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既成事实,要实现这一点充满了巨大的困难。

劳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日常经济决策中,没有资本那样的权力。一个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是否出口;企业是否投资,投资多少,为何投资;这种投资是否吸收其他企业参加或被其他企业吸收——劳工对这些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决定至多只能施加间接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则丝毫无法施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劳工缺乏经济权力这一坚实基础,相应地对国家潜在压力不大。这也是各国政府不如关心实业那样关心劳工“信任”的原因之一。

再者,劳工在施加压力方面缺乏资本方面已经得到的来自国 156 外的那种影响力。劳工没有苏黎世那样的“保护神”,没有属于劳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那样的机构,无法保证各国政府不采取不利工资劳动者而利于实业的措施,无法保证政府坚决实施对“低收入集团”有利以及违背经济精英利益的政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薪阶层来说,国际范围的团结一致是一种花言巧语,很少得到完全和有效的展示。而对实业而言,它是持久的现实。

作为一种“利益”,劳工确实拥有的一个重要武器是罢工;凡是

下决心使用罢工武器的地方,罢工作为压力手段的有效性常常得到明确展示。由于劳工果断使用罢工武器,或威胁要使用罢工这一武器,雇主和政府被迫再三对劳工作出让步。在许多情况下,工会和工人们被告知,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企业和工业的毁灭,或对国家经济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害,但如果有组织的劳工在实践中表现自己决不屈服时,他们的要求有时会变得可以接受。

然而能否下决心是个问题。因为作为压力集团,劳工非常容易受侵蚀劳工意志和耐力的许多内外势力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的有效性,政府普遍发现,没有必要像对待实业那样对待劳工。政府有时也侵害实业利益,但从未像侵害劳工那样厉害。例如,威尔逊先生的工党政府在实施“收入政策”时就是这样做的。

同实业家相比,作为压力集团的劳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劳工的全国性组织不如与劳工相对立的实业组织那样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之所以如此有一些原因。其中之一是,实业组织能真正“代表实业说话”,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包括相当比例的实业单位,同时也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起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任何地方同类的劳工组织没有包括大多数挣工资者,通常包括的工资劳动者很少。在这一意义上,实业社团比工会更具代表性。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任何地方的实业界都不像劳工那样四分五裂。人们很早就认为,实业在经济和思想方面都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所有问题上总是或者通常都用一个声音讲话。但事实上,它们的不同利益在代表“实业界”不同部门的各种全国性协会中得到反映。实业界的这种分裂,尤其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分裂,无论是从特别的意义上说还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但这种分裂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上的基本一致。这一点对实业界

的代表性和影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德国工商业联合会赞同的政策很可能比德国工业联合会赞同的政策更加“温和与自由”;^① 相似的分裂阴影在其他国家的全国性实业社团中也有所发现。但这些分裂显然发生在相当狭窄而一致的保守主义的范围内,因而阻碍了大的冲突的发生。可以说,实业界在策略上是分裂的,但在战略上是有结合力的;在绝大多数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以及在其他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上,它们完全可能结成一个联合阵线。

各地的工会运动肯定不会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分裂而不是团结;他们的分裂远非策略上的和表面上的,而常常是深层的和根本性的。

当然,各个工会彼此之间总是各自为政的(事实上,其内部也常常是分裂的),因为其成员具有独立的职能和技艺,有时是由于地理分布,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宗教、伦理或种族的不同。但不管是因为这些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首先是由于各工会之间和工会内部因意识形态和态度的差异而发生分裂。

在某些国家,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分裂在机构上体现为 158
存在着独立的、独特的,常常是严重敌对的联盟——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的联盟,在同雇主和国家的斗争中,在他们作为有效的压力集团方面,这种冲突是严重的制约因素。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实业界受类似分裂的影响。

再者,甚至在思想上的分裂没有发展为机构分裂的国家,其工会运动虽然仍维持在一个组织内但也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它们的影响正在削弱。

例如,英国的工会运动即总是如此。英国工会运动的分裂常常是因为工会与工会之间职能的不同,此外偶尔还有好斗与不那

^① 布朗撒尔:《西德工业在政治中》,第27页。

么好斗的工会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后一种差异也常常发生在各个工会内部，即好斗的左翼分子同比较“温和”和“负责任”的领导者 and 追随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分裂在实业社团中通常也不存在。这种共产党工会无法避免的分裂的基本原因，在于工会领导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扮演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这些领导人被指望极其坚决地保护他们成员的“派别利益”，既反对雇主，必要时也反对国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被“公共舆论”期望并且也常常被国家要求对“国家利益”负责；一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遏止和压服他们成员的要求，而不是保护和促进他们成员的利益。

在罢工行动方面尤其如此。正如 V.L. 艾伦博士指出的，

159

“罢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通常发生在敌对的环境内。它们常常被描写为对工业具有颠覆性、不负责任，不公正、违反整个社会的利益，与工人的根本利益相悖，浪费资源，极富侵略性，与民主格格不入，并且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①

但重要的是，工会领导人，尤其是具有“改革主义”倾向的工会领导人，其本身也常常受这些看法的影响。正如艾伦博士又指出的。

工会官员特别容易受反罢工环境的影响，因为他们常常要对他们成员的行为负责……一旦他们被指控号召罢工，工会官员即倾向于取守势，开始道歉并尽量避免事情发生。当他们真的进行罢工时，他们常常也是由赶快结束罢工的愿望驱使的，不管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②

这些“环境的影响”确实非常可怕。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大众媒

① V.L. 艾伦：《富于战斗性的工联主义》，1966年版，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介,这种媒介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大肆攻击任何大罢工(甚至小罢工)是“不负责任的”,不管其原因何在,同样也会谴责罢工的领导人;这些影响也包括贴着各种政治标签的政府,它们同样被希望使用任何可能的影响手段和力量,遏制罢工者,尤其是工会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①这也许不总是获得成功,但至少它们一直尝试着这样做。

导致工会领导人对促进其成员利益的战斗行动采取谨慎态度的,不仅仅是这种“环境的影响”。这种行动还可能与一系列工会资源的枯竭有关。它也可能加强好斗分子在工会内部的权力,工会领导人自然注意抵制他们对当局的挑战。再者,担心失败和大的牺牲总是起很大的作用,对反劳工力量丧失信心也加强了这一点。激烈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必须依赖其他工会的团结一致和支持,但这一点不易做到;即使做到这一点也根本不能保证它延续足够长的时间。

这些弱点中有一些是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所固有的。¹⁶⁰但在这种情况中,结构限制可能多少有些强制性,而这至少也是工会领导人使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决定的。

除了法国和意大利最大的工会运动是由共产党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发动的外,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都是由自称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天主教民主党人(在美国主要是由普通的民主党人)领导和控制的。这些不同的派别对资本主义制度显然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一些工会领导人,尤其是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所当然的并且乐此不疲;其他的工会领导人则倾向于相信最终能建立完

^① 有关最近值得注意的工党政府的例子,见P. 富特:《海员的斗争》,载布莱克本和科伯恩(合编):《难以两全》。

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普遍认为并且声称资本主义的经理和劳工之间有根本的利益一致，^①总的说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工会领导人则不这样认为，至少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

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夸大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非共产党工会领导人和官员在思想方面差异的实际重要性。^② 因为当美国工会领导人明确同意不对资本主义结构进行挑战时，其他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实际上也以同样的观点行动。不管他们对其他社会秩序承担什么义务，都不会影响工会的这种策略。

161 这大大缓和了工会领导人同雇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双方的合作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这些领导人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小伙伴。同过去相比，现在的这一进程有着更多的官方特征：政府定期同工会“商量”，工会的代表也参与国家体系的各种组织。由于工会领导人被承认是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必要因素，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与实业界在决策方面也有同样地位。事实上，他们被纳入他们国家的官场生活，主要使他们产生责任感，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并且有助于削弱其有效性。

然而，把劳工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实业利益集团的力量相比完全不现实，还有其他比较具体的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重大的压力集团活动现在常常发生在行政和

① 像沃瑟·鲁瑟这样的工会领袖常常被美国其他绝大多数工会领袖认为是“左派”，甚至像他这样的工会领袖都易于宣称“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清楚，自由劳工和自由管理者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冲突之点，我们需要拓宽相互理解的领域，将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引自卡里尔：《美国多元论的衰落》，第63页。）

② 事实上，人们也很容易夸大许多共产党工会领袖在工会活动方面的重要性。

管理而不是立法层次上。随着国家在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领域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社会中的主要“利益集团”自然也逐渐将它们的压力活动对准政府和行政机构。正如我们不久将会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重要影响。但它确实意味着,最重要的压力集团活动肯定针对行政权;现在只有最弱小的团体才寻求基本上通过立法来行使影响,这正是因为它们对行政只有很少或没有控制权。主要“利益集团”两种手段并施,但侧重于对政府和行政施加压力。

但正如一直强调的,同劳工或其他任何“利益集团”相比,实业在竞争时拥有比较有利的条件。因为实业家及其代表一般地同大臣、文职官员和其他国家精英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点与劳工及其代表明显不同。前面几章已经提到了社会出身,人际关系和联系^①,阶级地位,自身利益,思想倾向,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这些力量影响政治官员和行政官员,人们便有理由期望,实业压力集团的观点和要求会获得与劳工的境遇完全不同的那种天然的理解和同情,至少是尊重;这就像“左翼”政府执政时劳工不得不对付保守主义的行政当局一样。

造成这种差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压力集团,劳工总是比实业更像“局部的”利益。不管劳工的要求本身如何有价值,他们都很容易被当作像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对经济和财政生存有害的,对工业和其他行业的有效行为不利,对保持“信任”有危险的,肯定不利于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是一种“自私”、“不现实”或“不得人心”的行为,简言之,罢工是明显违背“国家

^① 一位日本作家回忆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鸠山一郎首相在1954年底就职后不久向所有政府机关发布命令,禁止文职官员同实业家一起玩高尔夫球和麻将。(池:《日本政治》,1958年版,第160页。)因为在日本,文职官员同实业界的关系非常密切。(见前引书,第160页以下。)

利益”的。

与此相反,实业界的要求总是被认为有利于“国家利益”。一方面,实业界反对劳工的要求可以被认为具有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实业旨在加强个别企业、特殊工业或整个资本主义企业地位的要求只要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总是非常令人信服地被描写成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这一点恐怕并非总是取得预想的结果,并且显然并非所有实业的压力活动总是成功的,而劳工的压力活动总是徒劳无益的。政府和文官很可能感到,在赞同实业压力集团时,他们无疑是在推进“国家利益”;同样,他们也可能感到,在有关劳工的要求方面,情况并非如此或不太可能如此。^①

163 由于实业利益集团能操纵大量资源,推进自己的事业,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负责处理与主要利益有关的问题和政策的政府部门和调控机构,也受到这些实业利益提供给他们资料和证据的强烈影响,并且事实上他们在决定政策时常常依赖它们。而且,他们极易受到各种实业利益能够带来的各种力度与广度的压力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只要实业界拥有巨大优越的资源,它所处的地位就远远优于劳工和任何其他利益集团。此外,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无需依赖任何中介团体与政府对话为自己说项——他们自信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正如梅诺教授也

^① 一位法国作家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高级文官宁愿同工业和财政界的高级人士打交道,而不愿同中小企业或葡萄和甜菜种植户的代表打交道。后者除了具有前者的弱点外,还对经济生活完全缺乏理解,或只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再者,大雇主的利益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这使雇主与官员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尽管官员们也了解形势难卜,但欣赏这些人拥有的知识,知道他们会把自己的要求变成普遍的思想。”(布林迪莱克:《高级官吏》,第 871 页。)

指出的，“西门子公司、罗纳-普朗克公司、蒙特卡蒂尼公司、库陶尔德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些企业在同当局打交道时，不需要任何中介。”^① 但这些中介在提出工业的要求方面，在他们所能产生的压力方面，在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形成官方心理和“公共舆论”方面，同样起重要的作用。^② 正如埃尔曼教授在谈到法国时指出的：“全国庞大的、组织完善的经济利益集团，尤其是当他们的最高社团如全国雇主委员会拥有称职官员时，几乎经常与内阁税务部门（如财政部）协商。”^③ 除实业团体外，各 164 国没有一种利益集团能接近最重要的行政权力机构，也没有一种利益集团能在必要的时候从事实业利益集团所能从事的那种压力活动。因此，1947年“劳工关系管理法”（也称“塔夫脱-哈特莱法”）对美国工会利益十分不利，后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他们的斗争同“全国业主协会”为宣传这一法令而进行的战斗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很难认为，除实业外，其他任何利益集团能集中英国在劝说政府建立商业电视时所动员的那种资源和同情。^④ 我们同样很难认为，工会和任何其他利益集团能控制英国企业在战后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时进行的反国有化运动所需要的资源。^⑤ 一位美国作者在谈到美国时曾经说过：“多元论的缺陷是，它具有强烈的

① 梅诺：《对法国压力集团的新探讨》，第27页。美国的一项研究也指出，“在美国最大的200个制造业企业中，‘华盛顿无一例外派驻代表，尤其是为政府制造‘经久耐用品’的公司’”（P.W. 切林顿和R.L. 吉伦：《驻华盛顿的实业界代表》，1962年，第1页）。

② 关于这一点，见上书第7章。

③ H.W. 埃尔曼：《法国的官僚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载《行政科学季刊》，1961年，第5卷，第4期，第541页。

④ 关于这一点，见H.H. 威尔逊：《压力集团：英国商业电视之战》，1960年版。

⑤ H.H. 威尔逊：《压力技巧》，载《公共舆论季刊》，1951年，第15卷。

上层阶级的特征……偏向于少数人。”^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论点并不认为这种不平衡会自动地保证实业利益总是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必然会把自己的每一个要求强加给国家。这同样也不是认为,其他各种有组织的团体所从事的压力活动,有时甚至是反对强大的实业反对派的运动,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假如实业利益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去说竞争那是荒谬的。资本主义利益之间有竞争,成败参半。总之,大卫的确战胜了歌利亚,但这种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大卫比歌利亚小,是以弱胜强。

实业界和劳工压力集团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在国家体系的另两个因素,也就是立法和次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行中,也得到展示。我们下面将考察这两种因素。

三

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起次要的作用。尽管人们仍然称颂它们是“人民意志”的最终来源,各国政府仍不断寻求使自己同有效的议会压力隔离开来。

尽管如此,议会仍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尽管主要“利益”现在倾向于把它们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辅助工具,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必要通过立法机构行使压力。不过在这方面,实业利益集团所

^① E. E. 沙特施耐德:《拥有半主权的人民》,1960年版,第31页。约30年前,沙特施耐德用今天仍适用的话指出:“实业家集体构成美国社会最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作为一个阶级,同其团体相比,他们具有更高的组织性,比较易于动员,有着更多的通讯设施,比较志同道合,并更习惯于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权利。”(E. E. 沙特施耐德:《政治、压力和税则》,1935年版,第287页。)

处的地位比他们的竞争对手要优越。

首先,在整个这一世纪,一直控制议会的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保守政党。这一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的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在这些议会中,保守的多数派绝大部分由来自上中层阶级的人构成,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这些多数派的成员总是倾向于赞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活动,相应地不赞成在他们看来似乎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建议和政策。美国显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美国的议会中,强烈偏向于支持私人企业的人在参众两院总是占绝大多数。美国劳工总是得依靠这样的立法者,保卫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无法保证这些人一直支持他们,更不要说是有效的支持了。甚至在其他国家的立法议会中,一般来说,与实业和财产有关的利益集团都有大量的议员站在他们一边。 166

再者,我们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如社会民主工会领导人和官员,常常奉行其领导人的旨意,按照“国家利益”观行动。这要求他们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帮助压制他们。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很容易受议会的笼络,这明显影响了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活力,导致他们透过议会的烟雾看待世界,不利于坚持其许多成员从未有过的富于斗争性的阶级意识。那些确实拥有这种意识或以这种意识行动的人总是发现,他们必须同各种旨在遏止这种主张的程序和其他障碍作斗争。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常常发现自己同他们的议会和政党领导人以及他们“忠诚”和“负责”的同事,发生激烈的矛盾:在所有将社会主义议员包容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比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议员同事更有效力。^①

在他们看来,被厚厚的意识形态外壳包裹起来的共产党议员

^① 议会中的工党即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

不易受马克思所说的“议会愚侏病”的影响而衰弱,但他们决非不受这种疾病的影响。“一位共产党议员与一位非共产党议员之间的共同处,不一定就比一位议员共产党员和一位非议员共产党员间的共同处多”。革命政党的议会党团不一定具有资产阶级议会党团的特征。而且,曾发誓要进行革命变革的党派在加入议会后并不一定就为西方式制度的政治条件所同化。不过,他们确实大大地增强了机会主义倾向,并极大地助长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毕竟是议会的战略、战术和策略,为此许多原则和目的都可以被牺牲。

保守的多数派的活动有利于实业界和有关利益集团。但就他们的许多目的而言,这些利益集团不是依赖于众多的立法优势,而是依赖于其他有利的因素。

其中的一个因素与以下这一重要事实有关,即强大的既成利益集团为了一如既往拥有自己的利益,需要阻止对各种影响他们特权的措施的立法和宣传。正如埃尔曼教授曾经指出的,“议会行动的这种消极作用一直如此。因为对有组织的实业来说,挫败竞争的要求,一般地比通过新的法律更重要,只要实业能依赖富于同情心的行政机构,这种法律就没有什么必要”。^①

立法议会极好地帮助实现这一消极和制约性的目的,一位美国作家恰如其分地将之形容为“不履行的决策”。^②上院在享有巨大权力的时代,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事实上,它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对侵蚀其权利的斗争。美国参议院是又一个极适于从事这一斗争的单位。一位作者写道:“甚至一个参议员他自己就能制造

① 埃尔曼:《法国的实业组织》,第218页。

② 布莱斯德尔:《压力下的美国民主》,第39页。布莱斯德尔教授还指出,“如果国会不能通过实业组织这一形式坚决处理与控制财产有关的问题,等于在策略上接受了在公共利益上的处境。”(上引书,第39页。)

很大麻烦；在不利的情况下，一批议员能使行政部门陷于可鄙的瘫痪状态。”^① 这话也许有点言过其实，而倾向于低估行政部门本身拥有的对不顺从的立法者施加压力的手段。如果它想采用这些手段，对立法者显然是很大的制约。然而，重要之处在于，参议员或众议员的“破坏性情绪”最容易被用来反对“实业界”也不赞同的措施，包括许多可能会影响财产权，传统上被斥之为“悄悄的社会主义”这类福利措施。^②

同样，让一个“直言不讳自己不赞成任何被重要的工业部门视为加重负担”的法案的人充任联邦议院重要的财政分会主席，这对德国实业来说是不小的胜利。^③ 德国社会其他任何团体都不可能为自己找到一位具有同样权力的忠实可靠和直言不讳的辩护者。^④

这种在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议会中都可遇到的亲实业偏见，部分出自立法者的自发倾向。与政府和文官的情况一样，如果认为议会成员是强大的实业和其他特权利益的无可奈何的工具，恐怕是太天真了。如果他们捍卫这些利益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发现，

① V.O. 基：《政治、政党和压力集团》，1958年版，第476页。

② 1967年底，《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动情地写道：“在这个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有3500万穷人，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国会是中产阶级的国会，它必须致力于满足实业界的要求……南部地区委员会的医学报告提到，儿童一天吃一顿饭即算不错了。他们患慢性腹泻、慢性溃疡，身体发育畸形，居住在没有水电的房子中。许多家庭以玉米粉、面粉、米饭和无脂奶粉为食。在联邦最富的加利福尼亚州，季节工人一年只挣到1000美元（400多英镑）。这些就是一些所谓“看不见的穷人”。此外还有黑人所受的压迫，不加追究的暴力和屠杀事件。这对美国来说由来已久。但沃茨、纽瓦克和底特律都提出了不祥的警告：穷人不再是不可见的或沉默的。国会每年开340天的会，但很少考虑穷人问题。”（《美国国会的乌托邦之梦》，载《泰晤士报》，1962年12月19日。）

③ 布朗撒尔：《西德工业在政治中》，第172页。

④ 布朗撒尔教授也指出，“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基本上只对经济事务、对外贸易和财政委员会的工作感兴趣，总的说来，它在委派倾向于对自己目的负责的主席和委员进入这些委员会方面，非常成功。”（上引书，第169页。）

这很容易同捍卫“国家利益”等同起来。

169 另一方面,压力有助于并且时常要求注意到具体的政策要求。

压力可能非常松散。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绝大多数院外活动分子认为,大多数时候对绝大多数参议员来说,最好的论据是有利于参议员的国家。”^① 参议员也很可能会认为,对实业有利的措施以及实业利益迫切要求的措施,都对他们国家有利;但他将会发现,对劳工有利并为劳工赞同的措施,则不是这样。

然而,个人因素也起作用。因为同一个参议员也知道,竞选活动耗资巨大。“每年用于支付专家各种报告的平均‘正常’开支接近 50 万美元,在两党制国家,激烈的竞选战常耗费 100 多万美元。”^② 同一作者又说:“竞选活动的大部分资金可能来自一些对他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十分感兴趣的个人和团体的大笔捐款”。^③ 这些捐款显然主要来自实业,这至少使这些捐款的接受者注意捐助者的要求。

但甚至在压力和议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十分明显的地方,实业和其他财产拥有者在形式立法意向和决心方面,在影响立法过程方面,仍比其他利益集团拥有更大的资源。压力也许是直接的和个人的,它可能采取各种形式;也许通过“基层群众”运动的办法,对“公共舆论”行使压力,这种办法耗资巨大,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例如控制大众媒介)实业利益集团比其他利益集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罗恩先生在谈到美国肯尼迪总统 1961 年税收改革建议,特别是抑制股息和利息收入的征税建议时说:“尽管筹款委员会赞成抑制,但实业家、银行家、储蓄和贷款协会发起的邮件大

① D.R. 马修斯:《美国参议员及他们的世界》,1960 年版,第 182 页。

② 同上书,第 72 页。

③ 同上。

战最终挫败了这一建议。国会对于这种压力的敏感性正是美国立法过程的可悲之处。”^① 这种运动不可能总是成功；其他利益集团也常常能对立法施加相当的压力。但事实仍然是，实业集团同其他经济集团相比，在对这些团体施加有效压力方面，具有比较有利的地位。

阿尔蒙德教授曾经写道：

……德国实业对德国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不只在在于其影响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和英国，实际上也是任何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府国家的共同模式。同美国相比，德国模式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实业压力集团直接的和有大量的代表出席联邦议会，参与各党派的资金筹措。借助于向中产阶级政党的渗透及它们的代表进入联邦议会，这些实业压力集团的组织在政治上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德国政治的精神和内容。^②

这是绝妙的强调，因为真正让世人吃惊的正是阿尔蒙德教授不经意地描写为“区区小事”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业界”对议会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它采取的这种“形式”无疑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但可以认为，实业拥有优势这一事实更为重要。

这一事实表明，和前面考虑的其他因素一样，国家体系中的立法因素，不管是普选权还是竞争性政治，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附属阶级的工具，它们在现在比过去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¹⁷¹ 立法机关也许有助于削弱阶级统治的模式，但它们仍然是阶级统

^① 罗恩：《自由企业家》，第54页。

^② G. A. 阿尔蒙德：《德国实业政治》，载 H. 斯皮尔和 W. P. 戴维森合编《西德领导人与对外政策》，1957年版，第211页（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还必须指出，在1958年，日本国会中52%的自由民主党议员同实业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R. A. 斯卡拉皮诺和 J. 马苏米：《当代日本的政党与政治》，1962年，第63页。）

治的一种手段。

四

就像立法议会的权力落到行政机构手中一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和地区政府部门也越来越明显依赖并附属于中央的权力。甚至在美国这样具有强大的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哈罗德·拉斯基在1940年所说的“过时的联邦制”在以后数年仍然在继续稳定地增长。

然而,尽管公共权力国有化的倾向很明显,但这一过程远未完成。不仅地方和地区政府仍保留中央机构的许多权力;在许多时候,它们也相应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动议权和决定权,在美国更是十分明显。即使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机构,这些单位在履行其功能的方式方面,也常常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这对其下属单位有很大的重要性。

这些原因是说明为何要简要地考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次中央权力的特征和分配。特别在美国,相当一部分多元论者曾经用“地方社区权力”为次中央权力的背景,并寻求用它来替代“统治阶级”及“权力精英”概念。^①

多元论者论证有关“地方社区权力”理论的主要方法,在本质上同论证下面这一比较一般的论点的方法基本相似,即美国的权力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是民主的而不是富豪寡头统治的。

必须指出,这并不是说地方社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

^① 有关这一问题1962年前所出的书见C.普雷斯:《典型小城镇居民政治:地方政策》,1962年版;关于最近的参考书,见A.罗斯:《权力结构:美国社会的政治过程》,1966年版。

权力。多元论的地方社区权力的主要理论家达尔教授指出,在纽 172
黑文,“工薪阶层的人几乎不会被任命或选为城市的主要官员。”^①
毋宁说这种主张认为,权力是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富有影响的不
同精英之间进行分配的,他们的权力不是“累加的”。达尔教授认为,
在重要决策方面,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表明经济权力是决策
的决定性因素。正如该理论的一位批评家总结的:“有精英集团,
但没有精英分子”。^②

再者,在多元论中同样重要的是,达尔教授在承认蓝领工人几
乎完全被排除在决策团体之外的同时^③也坚持认为:

如果认为这些层次人民的活动和态度对政府官员的决策
没有任何影响,那将是错误的……尽管工薪阶层缺乏社会地
位,但他们也有其他本钱,包括选票。作为个人,他们所缺乏
的是没有形成集体本钱。简言之,尽管他们的直接影响不大,
但他们间接的集体影响却很大。^④

多元理论家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分歧,但绝大多数同意
以上的主张。

这种理论最大的缺陷来自 C. 赖特·米尔斯所谓的“抽象的经
验主义”。它只堆积和使用有关资料,而不顾及具有重要意义的全
个社会经济相关现实。

因此,说上层阶级的成员和拥有经济权力的人不一定或不经常
直接参与地方和国家政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① R. A. 达尔:《谁在进行统治? 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1961年,第230页。

② T. 吉特林:《地方多元论:理论与观念》,载《左派研究》,1965年,第5卷,第3
期,第25页。这是对有关地方社区权力多元理论的批评。

③ 达尔:《谁在进行统治?》,第230页。

④ 同上书,第233页。

他们没有形成那些实际管理这些政府单位的人决定性的参照点,① 凯森教授曾经写道:

173

其工厂是城镇里最大雇用单位的公司部门经理,或打算建立一个工厂,使之成为小州最大雇主的副总经理,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他不只是个普通公民,而俨然君主一般……甚至大工业州和大都市都面对相似问题:密执安三个最大雇主所雇用的人员可能占全州工业雇用人员的四分之一;在底特律,这一比例几乎为三分之一。在这一层次上,公司的选择范围,它的财政能力,它对重要地方力量的独立性,在对付特别软弱的地方和州政府时,都是力量来源。②

按照实业界所拥有的实际经济权力以及使这一权力合法化的占优势的文化,最高行政当局或中层行政官员是否操纵选举以此为地方和州政府服务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有关“西波拉”(Cibola)的一个研究及时指出,“‘西波拉’的政治和市民生活公开的方向,几乎完全由中层阶级实业家和职业者团体操纵,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社区中拥有经济支配地位。”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中等阶级实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强烈意识到那些确实拥有“经济支配地位”的人对社区的重要性;他们自己不会被那些与这些权力拥有者的观点激烈冲突的思想和目的所打动;他们也充分了解,如果冲突产生,后者将拥有何种可供支配的资源。事实

① 关于美国各州立法机构中具有强烈的中产阶级特征,见 B. 泽勒:《美国的州立法机构》,1954年版。

② C. 凯森:《现代公司:多大权力?多大范围?》,载马森编《现代公司》,第100—101页。另参见 H. 泽格勒:《各州利益集团》,载 K. 瓦因斯编《美国的州政治》,1965年版,“不管州喜欢何种经济,实业界都控制游说团体”(第109页)。关于地方石油利益集团的这种权力的最好描述,见恩格勒:《石油政治》。

③ R.O. 舒尔茨:《经济在社区权力结构中的决定作用》,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58年,第23卷,第1期,第6页。

上,达尔教授本人恰如其分地指出,“要人们”之所以在与实业有关的决策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政治家们注意到了他们的潜在影响,避免采取可能招致要人们激烈反对的政策。”^①

除实业家外,政治家和官员们当然也与其他人商量并听从他们的意愿,除考虑实业外,他们也考虑其他利益。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地方和各州的权力和影响也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但这里重要的是,不管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的影响如何,凡是拥有政治权力和官职的人,不管是谁,在任何时候总是比其他人更可能听从实力强大的实业势力。^②总之,其他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也可能听从实业界。那些没有服从实业界或提出实业势力所反对的政策的人,偶尔或在特定的场合可能会发现政治家与站在他们一边的官员相互冲突:B级电影充满了这样的主人公。实际生活很可能不是这样,很少有美满的结尾。如达尔教授所说的,事实上,如果认为挣工资的人和其他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那将是错误的。但如果认为“他们间接的影响很大”,那将大错特错。由于人们一惯低估实业和财产权的作用,这等于说,在多元政治市场中,“普通选民”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实际上是在有利的基础上)同资源比自己强大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进行竞争。这一点是荒谬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一观点更为荒谬。因为在美国,“普通选民”受各种主要站在实业势力一边的通讯机构的影响,很少有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力。”我们还必须说,这种自以为是的多元论观点,没有考虑那些拥有“激进”观的人在许多“社区”,尤其是在较小的社区中可能受挫。

① 达尔:《谁在进行统治?》,第84页。

② 这种州一级控制机构只有在调控范围内奏效,不管是在保险、牛奶还是在石油界。(卡里尔:《美国多元论的衰落》,第103页。)

多元论的社区权力理论家很少考虑所谓权力的“第二面”，或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可能并且经常将决策范围限于相对‘安全’的问题”，通过“产生或加强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习惯做法，使公众只考虑政治进程中那些无关痛痒的问题。”^① 无关痛痒是对特权利益而言的。正因为美国劳工运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弱点，只有在美国，这些特权利益集团才能利用这种权力。在其他国家，特权利益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支配地位没有如此明显。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地方和州一级的实业不仅在获得它所希望的东西方面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且它在阻止那些它不希望做的事乃至对此进行认真讨论和考虑方面，也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②

最后，布丁好坏，一尝便知：假如特权利益集团没有对地方权力施加如此强大的影响，“城市的耻辱”就不会像林肯·斯蒂文斯在世纪之交使他成名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明显。他谴责说，城市本身对地方权力多元理论提供了回答。

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地方社区权力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20世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城市，甚至地区，已经落入劳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政权的控制之下，因而有时形成真正的“红色飞地”。

这是工人阶级运动明显侵入统治阶级政治霸权，替代迄今为止一直深沟壕筑的传统精英的一个例子。结果，许多这样的政权能炫耀他们在住宅、福利、市民举止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等；

① P. 巴拉克拉克和 M. 巴拉兹：《权力的两面性》，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62年，第56卷，第4期，第948页。

② “对一些已解决的问题，常常要求达成一致意见。只有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才允许讨论。土地问题、私有企业以及其它与既定利益有关的问题被认为已经解决，不允许讨论改变统治方式。”（F. 亨特：《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1933年，第182页。）

他们自己的做法常常被当作地方行政机构实现重要目的的标准。

然而,这些当局的权力既受到他们活动的一般背景的严格制约,也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制约。 176

人们注意到,在德国,“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控制绝大多数城市和一些地区,但它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很可能比较谨慎,因为它不能疏远以其税收支持他们的地方实业界,如果他们迁到善待他们的地方,它将失去这些人的支持。”^①这也许夸大了这些特殊当局所受到的经济制约,但显而易见,(不仅在德国)即使进步的地方当局也非常注意安抚有产者利益,使自己的行为和政策适于这一意向。

然而,比这种“地方社区权力”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控制以及中央政府能用来遏止最红的红色飞地激进倾向的权力。中央政府丝毫不能依靠自己的机构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法国省长的权力大到足以对地方当局的激进主义构成另一个强大的制约。正如一位研究法国省长制的学者提出的:“身居高位的省长不可能持有极端观点或明显偏见,就像法国内阁中的内务大臣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持有极端观点一样。”^②“极端”在这里可以说成“极左”。和他们在中央政府的同事一样,中央权力的这些代表很可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人”;他们更倾向于把众多的工业家、地主和其他知名人士而不是左翼工联主义者和“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当作朋友和熟人。事实上,他们是所在地区资产阶级机制的真正部分。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忘记以下事实,这一机制中最著名的成员在政府圈内看来都有良好关系。仕途的成功要依靠他们良好的舆论。

① 布朗撒尔:《德意志联邦的工业在政治中》,第186页。

② B. 查普曼:《法国外省的省长》,1955年版,第161页。

我们同样不应忘记,或多或少地存在激进的政权,是除美国外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任何地方的保守主义精英始终严格控制着广泛的行政领域,尤其是在乡村,但不局限于乡村。从“封建的”和贵族的地方领导人日益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家、经理和企业家所代替,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机会^①。这一意义来说,在全国政治中也一样,这些保守精英的社会构成经历了巨大的然而却是相当缓慢的变化。这种地方领导权性质的变化可能对地方政府造成各种重要的后果;当然,这并没有否认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仍占优势的事实。

在这方面,选择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政权不一定否认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优势,正如古兹曼先生在谈到英国时所指出的:

拥有顾问、地方长官、校监、院监这种权力、荣誉和职责的地方政治寡头,主要通过政党组织而享有盛名。和国家政治领导人一样,他们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在保守党中显然如此,甚至工党代表在地方选举机构中也比我们在整个人口中发现的来自体力工人阶级以上团体的成员更多,更不要说在劳工选民的团体中。^②

中产阶级激进的议事机构或许会为他们的工人阶级选民做许多事。然而问题是,和在全国层次一样,在地方这个层次上,工人

① 一位作者指出:“传统上在日本的农村地区,有势力者几乎总是来自大土地所有者家庭,因为土地占有权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日本仍是如此;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结果,近几十年也出现了新的权贵(N. 池:《日本政治》,第75页)。该作者认为,新的势力“比较富裕并且能量颇大”。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具有“非封建化”和“资产阶级化”的格局。关于英国的情况,见 A. H. 伯奇:《小城镇政治》,1959年版,第3章。

② 古兹曼:《英国政治精英》,第27页;另见 L. J. 夏普:《地方政府中的代表选举》,载《英国社会学期刊》,1962年,第13卷,第3期;关于特殊情况,见 F. 比利、J. 布隆代尔和 W. P. 麦克康恩:《选区政治》,1961年版,以及伯奇:《小城镇政治》。

阶级并未做多少事。他们是人口中迄今为止一直受别人统治的最大部分，他们或许有或许没有福利和激进的倾向，或许有或许没有将这些倾向同官僚倾向联系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就是他们。

在前一章的结尾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精英不满足于在追求特别目的时所享有的大量优势。因为在西方式政治制度中，我们这里分析的整个经济和政治控制结构依赖于从属于这一政治制度者的支持，至少是他们的默认。在这些制度中，从属阶级和“中间”阶级不得不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限制在它允许的范围内。对统治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继续这样做更花力气，由于居支配地位的制度的性质，这场战斗从未最后决出胜负。以下两章将讨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合法化过程。

第七章 合法化过程(一)

一

在许多制度中,那些控制着国家的人都发觉,必须依靠对所有或大多数不同政见者实行持续地和系统地镇压,以保持他们的权力以及保存现存的社会秩序。

在本世纪有过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都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例子。共产党和其他左派组织始终在一些国家遭到镇压或是被激烈地禁止,在所有地方都遭到各种歧视反对;法律也限制和禁止政治表达和活动的某些形式。但即使如此,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实例,这些制度容纳了数量巨大的反对派,包括那些直言不讳其目的是要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要推翻它的反对派。在这些试图采取危险的形式或者可以解释为已经采取这样的形式(根本不是一回事)的地方,国家便布置它的镇压力量以迎击真正的或假设的威胁。但是,它通常在采取这些措施时不诉诸大规模镇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认真地持有任何起义的意向。他们中某些派别一直坚信,革命者使用实力的尝试最终必然发生,或者至少发生类似的尝试。但是,即使具有这种看法的政党和集团也是按下列假设来行动的,即一次与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对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会发生,而必定先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在这些制度提供的宪政框架中
180 进行政治活动。而在这样一个框架中,社会主义力量尽管毫无疑

问会遇到各种各样严重的障碍,他们却必定能够组织并争夺群众的支持。

明显的事实是,争取群众支持当然是所有左翼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取得相当有限的成功的唯一手段。在有相对的政治自由但没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和那些明确地保证要捍卫和解放从属阶级的政党,一般来说比那些较为保守些的它们自己的意图明显地包括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角逐者取得的政治成果要小得多。这一事实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后一类政党在大选中始终比工人阶级政党取得的成绩更大,而它们能够这样很明显是因为它们吸引了从属阶级的相当部分,再加上数量要多得多的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中的最大部分。

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直这样,为什么反社会主义政党会在选举中得到群众合法的支持;为什么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公开的政治竞争的条件下始终能够保持其前面几章中概略地说明的持续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这是葛兰西在谈到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霸主权”时含蓄地提出的,他的意思是说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取得对从属阶级的优势。^①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种著名的公式化的回答,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原因在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

^① 格温·威廉斯教授有益地把霸主权的概念视为“一种特定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占统治地位,在其中一种现实性的概念散布到整个社会制度和私人的政见,充斥于精神活动的一切经验、道德、宗教、政治原则,特别是在其精神和道德联系中所有的社会关系的秩序”。(G.A.格温·威廉斯:《葛兰西的“霸主权”概念》,载《思想史杂志》,1960年,第21卷,第4期,第587页。)

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①

在1845年上述著作完成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它现在甚至已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了。但是,正如在下面章节中将看到的,它继续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基本要素。在葛兰西的著作以后,不只是在意大利本国仍存在侵蚀着统治阶级在他们社会中行使霸主权的情况。但是,这种蚀溃直到目前为止显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充分地_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一种较大的政治威胁。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问题继续存在,要全面地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决不是本书一两章能够完成的,这里所打算的是要把答案的某些主要之点勾划出来。

无论如何需要首先提出两点。第一,需要强调,所谓的“霸主权”并非发生的某种简单的现象,即由经济和社会优势派生出来的纯粹的上层建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过大量的代理人,并且有意识地创造被塔尔科特·帕森斯称为一个以“更高等级的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在全国超越政党的一致性”的持久的和普遍的作用的结果。^②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代理人”的问题,后者是微观政治世界所属的部分。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微观政治世界中,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成员能够通过他们地位的优势,例如作为雇主,如果说没有控制,至少可通过非正统的观点的表述去劝戒从属阶级。这个过程并非仅仅影响到工人阶级成员或中等阶级下层;许多中等阶级雇员对于来自“上层”的压力相类似也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劝告的过程并不因为要产生效力而明说。在市民生活中和在国家事务中一样,特别是在关于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公正的”标准。

^①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译者

^② T. 帕森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选举”和均势》,载E. 帕迪克和A. J. 布罗德拜克:《美国政治行为》,1959年版,第101页。

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对它的轻视是很不利的。这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并形成了政治过程明确的有时又是隐蔽的部分。

如果对以“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所表现的过程和活动下一个定义,它的意思是,“通过这一过程,价值、认识和表征都得到知识化和内在化,通过这一过程实施的关于社会的政治准则得到灌输,无论有效还是无效,政治作用制度化并且形成政治意见的一致”。^①这种对于“政治社会化”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关系的系统表述和众多讨论的薄弱之处在于,它对于这种社会化特定的观念形态内容表现出羞羞答答。它还和下述事实有关,在这种制度下,这种过程的很大部分倾向于助长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适应它的要求,否定对它的否认;简而言之,这里涉及的完全是一个庞大的“灌输”过程。

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作此强调,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它时常会被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形态和政治竞争所隐蔽。灌输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词,洗脑筋则是甚至更加丑陋的合成词,它描写一种可以说是在极权主义的、特别的一党制制度下的独一无二的活动;也可以认为它是和多党制、多元化竞争、反对派的自由以及没有对群众传播媒介垄断控制等不相容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那些应当垄断控制和禁止反对派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灌输的必要;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不平等而使一方在与另一方的斗争中取得压倒优势的地方,才显得必要。而这正是它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地位。雷蒙德·威廉斯曾描写过专制制度控制文化的意图,即一个统治集团垄断信息传播的制度,是一种“保护、维持和发展一个掌握政权的少数派的政治 183

^① H. 埃克斯坦和 D. 阿普特(合编):《比较政治学》,1963年版,第26页。

制度”^① 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这是对那些控制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它的成功的施政并没有要求一种对于通讯的垄断或者说禁止表达一切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的意旨的极好描述。真的,这种意图可以不用这样的垄断而更好地实施。

第二种绪论性的论点是说需要注意国家在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人们会记得,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的霸主权的建立和永久存在,看作是统治阶级首要的任务和他们对文化制度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霸主权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它和国家一同起着主要是维持镇压和同意之间所需要的平衡。^② 在大多数地方,至今仍然是这种状况: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同意的操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非官方的私人企业来完成,事实上主要属于私人企业的事务。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由于这些被认为是国家特别是垄断国家特有的权力,灌输和洗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值得指出的是,在葛兰西写完之后,自由的宪政国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比以前更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如它现在大量地干涉经济生活一样,它同样非常明显地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干涉意识形态的竞争,并在事实上成为保守主义舆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当然,这个国家并没有在实行干涉时超过极限。相反,可以这样说,它就像它早期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加强和需要系统的灌输,它的干涉越来越激烈。

184 国家可以采取的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的一种干涉形式已经提到过,这就是在一些国家中实际上镇压或半镇压某些政党和组织;而在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各种不那么猛烈的骚扰和歧视的

① R. 威廉斯:《六十年代的英国:通讯》,1962年版,第125页。

② 对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J. 迈林顿:《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和实践》,载《社会主义年鉴》,1968年版。

形式。很明显,这不仅直接与政治竞争有关,同时与意识形态竞争有关,因为他们试图削弱这些政党和组织希望取得的影响。但是,还存在着许多其他较不明显的干涉形式,以利于国家目前承诺的保守主义意见,现在我们必须转到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对于“政治社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作用的不同观点上来。

二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来说都存在着为某些实业阶级和统治阶级所宠爱、被选作传播媒介和工具的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一个主要的政党履行这种作用,而一个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政党时常得到某种同样类型的支持,这样,美国的共和党首先以“实业党”或实业家的党而著名;民主党则也没有失去实业界的支持。^① 对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以及其他国家不同政治组织,这种情况也是同样真实的。

而且,通常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党是保守党,它得到了统治阶级成员中大多数的支持,并得意地表示那是“他们的”党。

在绝大多数这些国家里,都有一个在所有政党中如果不是最大的和最牢固的政党,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党”,而其他政治组织,特别是左翼政党,只是暂时取得和保持政府官职,拉帕罗巴拉教授恰当地称之为“政权中的客人”。^②

在某些国家,主要的实业家政党不一定必须在大选中持续地取得成功。例如,美国的共和党从整体上说在大选中比民主党的境况要差得多;由于政党所抱的希望一般来说总是和它在实业上

^① 例如,参见 H. E. 亚历山大:《1964年选举资金筹措》,1966年版。

^② J. 拉帕罗姆巴拉:《意大利政治中的有组织集团》,1964年版,第316页。

的前景相对应,所以这还根本算不上实业利益的悲剧性的结局。而至少在法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实业利益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甚至还无法创造和依靠这样一种固定的永久性的保守主义的组织;他们转而依靠残缺不全的右翼政党或者是依靠变化多端的中间党,结果往往也并不特别悲惨。^①

这些例证表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就导致建立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但是,也无须采取其它影响和压力手段而使它失去战斗力。至少对这些利益集团来说完全有可能通过那些口头上不完全代表自己的政党和许多其他的代理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即使这有可能,却不特别需要;对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说,依靠一个“执政的”多数党更为适宜;而这样的政党确实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表现出极大的优势,甚至最乐观的保守主义者也盼望普选日的到来。

这个胜利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庞大的保守主义政党无论就其成员还是从其政策而论,都不可能只是在商业和财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政党。事实上,关于它们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他们设法适应“民众政治”的需要取得了成功。所以,像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那样,旧贵族的前工业化政治设置,先是使它们自己适应于新的工业主义,为其代表和委员会取得栖身之处;然后在 1867

^① 这种不完全依靠右翼政党的例子在 1945 年以后特别突出,当时右翼势力已完全崩溃,他们不得不与大多数领袖是职业激进派、改革派,甚至持反资本主义观点的人民共和党相处。一直这样说,“在 1946 年有许多例子表明大选时,人民共和党的选民来自一些原先支持右翼集团的集团和地区。”(F. 格古尔和 M. 艾劳迪:《意大利和法国的基督教民主党》,1952 年版,第 23 页。)其惟一的结果是人民共和党尽管没有完全成为保守党,却成为一个相当保守的政党。

年“第二次改革法”以后(甚至在此之前)有意识地在全国创造一些民众基础并吸收一些民众党员。^①至少保守党没有停止维持其民众基础。另一方面,在德国,1945年不得不在失败和战争的废墟上创立一个群众性的保守党。基辛格先生曾评述说:“1945年基督教民主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众政党,既包括新教雇主和雇工、天主教雇主和雇工、年金领取者、文职人员,也包括在现代经济中他们的利益通常与雇主和雇工利益相冲突的自由职业阶级,还加上有自己独特利益的农场主”。^②

这个过程尽管在时间和特征上变化无穷,它在任何地方却都有共同之处:政党的首要目的是保持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法国是个例外)的政党,包括其成员和活动分子中有很大量属于中等阶级下层甚至工人阶级群众的政党,它们的纲领都牢靠地加入了保护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一个重要的要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党和它们的附属组织——青年运动、妇女组织,等等——其成员至少和左翼工人阶级政党一样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以及从争取跨阶级的选民的支持的特点来看,它们完全是“民族的”政党。^③

不应当否认,他们起了一种“聚合”作用,而且他们确实“明了”(用神圣的语言说)那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外的阶级和集团的抱负、要求和利益。如果说他们不是和前者一样关心他们自己,他们就不能很好地为后者服务。这个观点早已提出,但是值得强调:无论多么强硬,保守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所有的改革措施,相反,以

^① 参见 R. T. 麦肯齐:《英国政党》,1963年版,第4章;和 I. 布尔默-托马斯:《英国政党制度的成长》,1965年版,第1卷,第10—12章。

^② 基辛格:《德国选举政治》,1960年版,第103页。

^③ 关于英国,参见 R. T. 麦肯齐和 A. 西尔弗:《冷酷的安琪儿。都市英国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1968年版。

现存的权力和特权结构尽可能小的牺牲为代价承认和传播改革以此生存下去。^①

尽管保守党接受零零碎碎的改革,他们在言辞中否认阶级存在,但保守党在政治领域仍然首先是保护商业和财产的组织。他们真正“聚合”起来的是统治阶级不同的利益。严格地说,后者并不是凝固的社会经济集团,他们需要和解、调整、融合他们的利益,是既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向,又表达他们各自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民众政治”的时代,这些意向和利益也要求提供适合于政治竞争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保守主义政党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要提供这种必须的外衣。

这些政党的成员和它们的许多积极分子,可以说来自人口中广泛的横截面。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占压倒多数的领导人都是来自上等和中等阶级,一般来说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实业家。此外,正如已经提及的,主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都是通过血缘、朋友、共同的见地和相互利益的纽带,与实业界结合在一起。当然,从未有过保守党领袖眼中不熟悉的人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更准确地说,这是在野党一个自然的栖息处所。相反,保守党指导委员会总的说来并不熟悉与从属阶级共事的人们。

关于后一点,他们既不是这些政党的议会代表所熟悉的人物,或者一般说甚至不是他们基层组织的领导人所熟悉的人物。这个
188 收入较低的集团似乎并没有在地方保守党领导机构中得到充分的代表。如前所述,这种地方政党领导层中出现的中等阶级或中等阶级下层占优势的倾向,也时常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大多数社会民

^① 正如哈利戴先生恰当地指出的,保守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调和它代表的那些支持它的社会力量的利益”。(《日本——亚洲资本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967年7~8月号,第21页。)

主党中出现。但如果把它们和保守党的社会构成作一比较,是非常明显的,有时是绝对明显的。如果就其成员和他们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来看,这些政党可以说是“全国的”政党,但是如果从全国和地方的领导来看,他们很清楚是阶级的政党,比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性”差多了。

第二,保守党领袖需要极为注意倾听实业界的意见,因为它和其他的有影响的因素不同,它构成了选举和其他宣传工作所需要的重要财政来源。维持选举和政治活动需要大量日益增长的开支;当保守党确实在财政上部分依靠其成员认捐和不大的赠款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实业家的捐赠。这无法保证承担费用的人因此无可非议地行使相应的权力,但这至少可以确信存在少数这样的记录。哈里森教授在1965年指出:

……目前表面上保守党贬低大捐赠者的重要作用,私下他们仍在向大施主献殷勤。1946年建立的由政党地区司库和人数不多的指派人员组成的中央财政部,首先是从富有的个人和工业家那里征集基金……近年来各种组织进一步加紧从工业界征集政治支持。这些都是政党须仔细考虑的。其中之一“工业家联合会”,四处奔走游说,挑选大商号的总经理,因为这些“最大的”捐助人将给保守党提供90%的资金,给民族自由党提供5%的资金以及给工业目标组织提供5%的资金,代表自由企业以推动公共关系。^①

对于德国,一直是这样说:

……通过提供大量财政捐款以及和他们领袖的个人联 189

^① M. 哈里森:《英国》,见 R. 罗斯和 A. J. 海登海默合编:《政治财政的比较研究》,载《政治学杂志》,1963年,第25卷,第4期,第666—667页。罗斯教授还指出,在1960至1964年间保守党中央机构每年平均开支达到125万镑,其中80万镑是从大约250至400家大商号征捐的。(R. 罗斯:《影响选民》,1967年版,第264页。)

系,德国工业联合会确保了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并且……在较小的范围内选择他们的议会候选人。^①

与此相似,斯卡拉皮诺教授就日本的情况写道:

……当然,较大的工业和商业组织继续强有力地支持保守党,为它提供占压倒多数的基金,并在他们决定政策和班底时起很大的影响。^②

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任何地方千篇一律都是这样,丝毫也用不着对此感到惊奇。

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政党描绘为他们那个统治阶级和实业精英的杰出的政党,并且是阻止他们社会中充满特殊的、具有决定性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职能的自卫组织。因为这些政党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是传播保守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力量。和其他政党一样,保守党也是宣传代理机构,尽管它的许多领袖常常以自己没有学派、意识形态和理论为骄傲,但所有他们的领袖通常总是倾向于把只有左翼政党才具有的特征视为灾难。这当然是胡说。保守党提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在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之间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且在每一个国家中一个时期里都经过了实质性的转变。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其本质的内容
190 即为自由经营体系作辩护这一真正的核心,在各地都是相同的。

① 布朗撒尔:《德意志联邦政治中的工业》,第88页。阿尔蒙德教授在1955年也指出,“中间和右翼政党几乎完全依靠实业家团体为其提供财政资助。”(G. A. 阿尔蒙德:《德国实业政治》,1955年版,第29页。)

② R. A. 斯卡拉皮诺:《处于传统与民主之间的日本》,见S. 纽曼(主编):《现代政党》,1956年版,第235页。同时参见J. R. 索库普:《日本》,见罗斯和海登海默合编的书,载《政治学杂志》,第742页以下。一位日本作者也说道,“个人和公司的豪富建立与那些统治政府的保守党人密切的工作关系,同政府本身保持密切关系,并且和其工作对日本民主产生极大影响的所有日本经济活动家协调一致,是取得内阁职位的门径。”(J. M. T. M. 牧:《日本的政府和政治》,1962年,第138页。)值得指出,由于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典型做法,很容易假定这样的优势与“民主”并不矛盾。

围绕着这个核心,有时则是隐匿这一核心,有许多卫士保护着被称作自由、民主、立宪政府、爱国主义、宗教、传统、民族利益、财产的安全、财政稳定、社会改革、法律和秩序等众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标记,以及其他在既定时间和地点作为混杂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其他东西。

一般说来,政党的领袖和活动家,在这些主题的传播中以及在其反左翼的宣传中,他们都在细心地设法满足远远超出特别的经济利益发展的那些个人和群众的不同的目的。但是,不论这是否可能,很难怀疑这种意识形态的活动对于那些和私人企业相关的利益集团具有极大的价值。

当然,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是在竞争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无论在大选期间或是在两次大选之间的时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这种活动。但是,就压力集团政治而论,竞争发生的条件极大地影响着它的性质和特点,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影响到它的本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联系中首要的最明显之处是资产阶级政党比他们的工人阶级对手有更多的金钱可用于选举和一般的宣传目的。人们时常提到一点,正像金钱无法买到幸福,它也无法买到选举的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财政资源的优势并不足以取得这种胜利。而且,即使金钱和幸福可能有某种联系,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范围内也无法认为它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的联系会带来极大的利益。在选举和一般宣传中比其对手有多得多的资金可以利用对事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却不能最终保证其成功;几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情况大都是右翼政党确实比左翼政党在选举期间及两次选举之间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主要原因很明显在于后者无法依靠大企业或富有者的支持 191 (无疑也有某些例外情况),而前者可以依靠他们。但是对此必须

补充这样的事实：右翼政党从他们后座支持者那里可以获得比左翼从他们“天然的”同盟者如工会那里获得的财政支持更多。举一个例子，通过实业家个人捐助的途径比工资收入者更容易克服立法对于企业和工会资助政党基金的限制。^①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会在政治上甚至更多在财政上，常常和工人阶级政党更加疏远，当然，例如德国工会，在政治上正式说是“中立的”。对于这个特例人们一直这样说：

……不论工人会给予德国社会民主党什么样的支持，是以间接活动的形式，通过工会自身的活动，还是以对党的斗争目标的支持。只要看一眼中立的誓约，这充其量不过是半心半意的，只会产生间接的效果，拿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与得到工业界慷慨资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右翼政党相比，很明显优越性要差得很多。^②

甚至在英国这样工会与一个特别的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地方，他们对其基金的财政捐款尽管很重要，但从来无法与企业家给保守党的捐助相匹敌。

金钱并不只是保证保守党比他的竞争者能够参加更多的“职业化的”选举战役，它也有助于保证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建立更完善的组织，以在全年展开对选举有效的起着实质影响的宣传活动。罗斯教授已经指出，对英国来说，“甚至今天惟有保守党具有充分发展的拥有专职职员广泛的政党组织”；^③这种广泛的政党组织是由在每个选区都可以找到的报酬优厚的全天工作的代理人组

① 对美国法律的实施情况，可参见基：《政治、政党和压力集团》，第556页。

② O. 基希海默：《西德的工会：它们的国内和外交政策》，载 H. 斯派尔和 W. P. 戴维森（合编）：《西德的领导和外交政策》，第160页。

③ 罗斯：《影响选民》，第22页。

成,而与它相比,工党的全天工作的代理人则少得多,报酬也低得多。^①有一些国家,例如意大利,那里工人阶级政党在组织上和财政上敌得过保守党的组织。但即使在那里,如果特别是当考虑到前一类政党从其他财政上富裕的组织得到支持时,这些组织的整个财源始终比那些左翼政党要优越。^②

与此相关需要提及的还有,保守党基层组织的社会构成能够为它们提供某种往往是实质性的优势。如同已经指出的,这些政党通常是由中等阶级活动家操纵着。某些左翼地方政党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它们的活动家显然包括更多的属于“低收入集团”的人士。^③而这意味着他们属于只有较少时间进行宣传,各种机构较少,较少影响手段,与他们团体中有影响的人士联系不多等等这样的人。与金钱不同的是,这些优势当然都是决定性的。但是,他们在估计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时,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忽略不计。

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左翼政党仍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没有超出向地方上传统的统治阶级,上层挑战的政治侵权者,充其量不过是侵蚀后者的权力。仅在近几十年,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政党毕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介入和渗透了许多迄今为止对他们是完全封闭的领域。甚至今天的

① 罗斯:《影响选民》,第256,264页。一位美国观察家最近指出:“有许多分支没有政党官员,他们的代理书记甚至工作时没有节约时间的装置。有一个骇人的例子,尽管选区是由几个很小的村庄和广大的农业区域构成的,但一个薄弱的边缘地区分支的书记没有办公室,没有打字机,没有电话,并且没有私人交通工具。”(E. G. 雅诺西克:《英国的选区工党》,1968年版,第15页。)

② 参见本书第221页及以后。

③ 近代对任选的36个选区例证的分析发现,工党领袖包括平均20%的自由职业者,12%的实业界人士,17%的白领工人,12%的熟练工人,14%的半熟练工人,16%的工会和政党官员以及9%的主妇。(雅诺西克:《英国的选区工党》,第17页。)

美国,工党只是在作为特殊实体的一系列大城市中可以说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特别的政治影响;但即使这样,这种影响也很难说名副其实具有反意识形态的内涵。

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选举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优势,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那种在最初对工人阶级表现出毋庸置疑优势的制度的矛盾特点。

选举权的扩大当然是工人阶级运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要求,获得它确实为至今被剥夺选举权的从属阶级提供一种对社会统治者施加压力的极端有用的因素。

但是,正像狄斯雷利和俾斯麦这样眼光远大的保守党领袖充分了解的那样,普选权给政治过程带进了大量的新选民,可以依靠他们在选举时给予传统精英以支持。恩格斯曾经说过,“普选权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①他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政党取得的选票越多,就越说明工人阶级的成熟。然而,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是不成熟的,所以普选权的获得很明显只是增强了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力量,而这一点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仍然是今天的真实情况。

还有,实现其他要求是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紧密相关的,例如秘密投票,也就成为双刃武器。罗肯教授指出:

……推行秘密投票制的最初动机是要使它摆脱来自上层的批准;这是宪章运动早期的本质要求,同时也一直是工人阶级运动所关心的基本点……^② [但是,他补充说],在选举制度的历史上一直强调得较少的是秘密投票的条款可以使选民

194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译者

^② S. 罗肯:《民众选举,秘密投票和政治参与》,载《欧洲社会学档案》,1961年第2卷,第1期,第143页。

摆脱其上级同时也摆脱他的贵族的控制……通过确保完全匿名的秘密投票,不仅可以减少上层通过经济依赖来行贿^①同时也减少了为使工人阶级顺从和一致而施加的压力。^②

让我们把原则问题本身置于一旁,如果只是因为来自“上级”的压力通常远比来自“贵族”的压力要大,这种做法显然不能被理解为工人阶级运动迫切要求秘密投票是错误的。这种议论还不如说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是“未成熟的”,有助于保护那种不成熟的秘密投票,很难断言完全不利于保守党。

与此相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普选权看来秘藏着罗肯教授所说的“影响均等——把每一次投票看作是一个匿名的影响单位。它完全和个人及市民参与作用相脱离”。^③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均等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幻想。选举法是极其浩大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我曾论述过的,影响的明显不均等是其特征。集中表现在选举法本身的形式上的平等,有助于隐蔽不平等,而且起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合法化作用。

和右翼政党相比较,左翼政党作为政治武器和意识形态传播代理人的能力,也深受影响而表现出明显无力。其中有些已在前面各章论及,但还需要置于目前的框架中。

首先要说到,事实上,某些被称作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左翼 195
政党,主要是被属于反对党却在政府任职的人士领导着。他们表达自己的意图时总是比保守党的竞争者更为谨慎而又含糊。然而,不管保守党领袖表现出怎样的集团意识和改革倾向,他们从未

① 然而,不仅行贿——冷淡、威胁和报复,同样并且更为重要。

② 罗肯:前引书,第143页。同时参见R.本迪克斯所说的:“秘密投票的条款把个人置于自身的选择之先,并且至少能够使他当时独立于他所处的直接环境:使他在投票站能够扮演一个国家公民。”(《国家建立和公民身分》,第100页。)

③ 同上书,第133页。

实际地推行革命政策。但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则经常在国内外支持和追随反动派，在崩溃状态中扮演一个社会秩序的救助者的角色，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 1918 年时的德国。

这样的领袖在议会体制中甘愿为保守党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腊姆齐·麦克唐纳，他作为工党的领袖和首相，最后以领导一个保守党占统治地位的联合政府，并于 1931 年谋求选民把他视为官方的“国民政府”的候选人推选为议员，这实际上意味着请求选民投保守党的票。在这个过程中，工党发现它的议会代表从 289 人降低到 52 人，而保守党的势力在 615 席中占了 556 席。^①但不存在保守党领袖用类似的方法为工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服务的例子。许多其他的工党领袖也非常习惯于支持和采取和他们的政敌的哲学而不是和他们自己的运动的哲学相一致的政策。保守党领袖在对待他们自己的政党和运动时从未有过类似的事。在这方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哈罗德·威尔逊、居伊·摩勒、保罗·亨利·斯巴克，或是威利·勃兰特，或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任何领导成员和非领导人，都没有同样的举动。

如果和那些保守党人相比，很难说这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个人的原因无关。问题不能这样来解决。还需要注意到保守党对于工党领袖巨大的压力；但是也需要注意到，这些领袖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的辩护一般说来并不能使其取得完全足够的力量去抵御保守党的威胁和利诱措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196 意识形态的脆弱、政治上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被遗弃，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其领袖和各种各样更富于激进思想的少数派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并时常发展为公开斗争的状况。保守党相对来说则是和谐和统一的模范。

^① 这段插曲的细节见密里本德：《议会社会主义》，第 181 页以下各页。

他们当然也存在众所皆知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强制和各种倾轧。任何政治组织不管它怎样号召团结,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保守党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分裂,以致像社会民主党那样一直成了并且越来越分裂的一个政党。

在目前情况下,与此有关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庞大而有政治势力的政治组织,在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的进行群众教育时,力量是非常弱的。西方社会要取消资本主义就要求群众意识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至少他们必须部分地响应和依赖政党组织。由于它们的领袖从未把任何与取消资本主义毫不相干的东西作为自己宗旨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社会民主党还没有(特别是在近几十年中)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义务就不奇怪了。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领袖和他们的党常常求助于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观点和意图的宣传代理人,使他们相当多的群众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对任何与他们自己的模糊又极其苍白的观点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表示怀疑。显而易见,这种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拍的分析,既由于他们的言辞,也由于特别是在得到官职机会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一直在进行的政治遣散提供更重要的东西。

在前几章中已经提到,分裂影响并削弱着左翼政党和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这里还要提到,很容易看出,这种政党的分裂帮助了保守党阵营。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这种分裂在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像对左翼政党的影响那样是剧烈的和根本性的。这里并不是试图把责任归因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的那种形势,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尽管非常重要,但只是给这种形势增加了附带的因素。和目前的上下文内容关系较大的是指分裂的事实,它使工人阶级运动衰落和保守党从中获得相应的优势。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成立的诸共产党的某些特别的特点。人们曾期望这些政党应当与作为它们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刚刚诞生的遭到来自多方面威胁和进攻的苏维埃国家休戚与共;人们同时也期望这种休戚与共的正当态度会给所有保守势力提供一个谴责它们为“外国的代理人”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无须对此感到恐慌。令人恐慌的是那种很快就把苏维埃制度弄得一团糟的完全具有否定性意义的特点,以及共产党狂热地坚持那些不值一提的或者不过纯粹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捏造的特点。这样,正当的团结便转化为对所发生的一切卑躬屈节的辩解,再以后它被称之为斯大林主义,变成了不仅是对于苏维埃的国内政策,而且是对苏维埃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政策以及在某些个别国家例如德国那样时常造成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政策中每个偏差和曲折的主动认可。

198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在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中,都遇到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但是,应当充分地看到,不加怀疑地接受俄国的领导以及接受俄国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命令,极大地加剧了这些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这种接受使得指责这些政党为外国所怂恿的说法好像真的成了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直到最近仍给人们这种印象,即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已成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这种见解必然会使许多潜在的支持者目瞪口呆,不仅使他们感到非常滑稽,而且感到实在有害。

更严重的,并且多半是由于这种扭曲的看法,共产党被轮流发作的、而且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极大地扰乱。它造成共产党内极度的紧张,由于采用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被容忍,从来不加抑制,而为集权主义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没有给民主留下位置。官僚主义造成的这种扭曲的一个结果是意

意识形态灾难性的贫乏,并把这些政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粗俗的任意篡改的口号式的术语,这极大地影响其“提高觉悟水平”的能力。总之,它们的整个历史传统有力地限制了它们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在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其意识形态和形成革命所要求的政治作用之间,造就一条巨大的鸿沟。

三

在左翼政党所进行的政治竞争中,保守党则已从教会那里得到极其引人注目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毫无疑问,发达工业社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世俗化的过程,宗教在群众决定其政治(和道德)选择时起的影响已经减小。但是,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人在论及“政治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竞争时能够无视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不加重视的、在这种和那种文化之间强度相差很大而在一切地方主要起支持保守主义势力作用的宗教和教会因素。正如多甘教授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在投票时常为宗教情感所诱导而支持非社会主义政党,这种事实在欧洲任何地方一直可以看到。”^① 199

这一点对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至关重要(但不只是在那里——例如德国)^②,在那里主要的保守主义政党始终密切地与天主教会结成联盟并得到后者的支持。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教民主党都和保守党一样吸引了大批选民支持。但是,它们无疑从教会方面得到的支持中获得巨大的附加力量,或者至少从后者表现出

^① M. 多甘:《西欧的工人选票》,载《法国社会学评论》,1960年,第1卷,第1期,第38页。

^② 然而值得指出,对于1945年德国的分裂,天主教信徒在联邦共和国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大增长对此负有责任。

的对左翼政党的敌对情绪中,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中得到支持。因此,一个观察家在决定性的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中写道,“普遍承认,在1948年只是由于组织起来的天主教主义的非凡的作用才造成了一次‘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的表决,并阻止了极端的左翼在那年的选举中合法地执掌政权”;^①而对于德国,人们一直这样说,天主教会“鲜明的立场使它在选举斗争中(例如1957年的竞选)造成了政府方面的多数力量”。^②

200 此外还要指出,这种教会和保守党的影响不仅靠教会自身的宣传,而且靠政权组织庞大的网络,它聚集了雇主和工资劳动者、青年和妇女、医生和律师,它们的影响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可以感觉到。^③

全体民主中有一部分,即妇女,特别易受这种影响的冲击。在这里,特别是在妇女的投票中,明显存在着保守主义倾向,^④当然宗教是起作用的,但不能仅仅归因于宗教因素。于是拉帕罗姆巴拉教授也提出,“对于成百上千万从不把她们的政治领袖当作忏悔者的妇女,以及另外数百万作为天主教外国组织成员的妇女来说,政治社会化的基本过程起了一种把只是偶然起增强民主制作用的

① 拉帕罗姆巴拉:《意大利政治中有组织的集团》,第30页。还要指出,在1949年7月,梵蒂冈的一道教令实际上把所有从事“共产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和反天主教信条”职业的天主教徒革出教会。(引自R. V. 伯克斯:《拉丁欧洲的天主教党》,载《现代史杂志》,1952年,第24卷,第3期,第269页。)

② 基辛格:《德国的选举政治》,第65页。

③ 一个对他们表示同情的作家描写了这些网络及它们的活动。参见M. P. 福格蒂:《西欧的基督教民主》,1957年版,第15至19章。对美国,人们始终这样说,“天主教信徒的每一种爱好、活动和集会都由某些天主教机构提供,并且按照天主教的倾向来布置。”(赫伯格:《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1936年版,第168页。)

④ “在所有西欧国家,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国家,无论工业化程度是高是低,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受到女性选民的冷落”(多甘:《西欧的工人选票》,第39页)。另见,多甘:《西欧国家中妇女的政治表现》,载《索尔维社会学研究院院报》,1956年。

知识、价值和态度供奉起来的作用”。^① 然而,对民主制度来说它可能被看作是一个障碍,这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甚至起不到加强左翼政党的作用。

这种直接的政治参与(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意义来说)的现象需要根据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情况加以修正——然而它比通常估计的要小得多。通常所说的英国教会是“保守党祈祷之处”已不符合真实情况,一位前任约克大主教所认为的“在整个 19 世纪地方教士的影响是属于保守党一方的”^② 也不能不加任何保留用于这个世纪。变化之处在于,随着工党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组织和作为一个日常执政的政党出现,英国国教会并且事实上所有英国的教会,总是毫不隐讳地避免与两个执政党中无论哪一个在政治上一致,处于其间的教会人士,如同最上层文官、军人和法官一样,被公认为是“中立的”和“无党派性”。美国的教会人士也完全是这种情况,他们在那里一般来说避免与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在两个国家中无疑都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牧师处于离开两个主要政党的“中立”位置,这一点无论怎样总是成立的。 201

然而,因此认为这些国家的教会始终没有起过并且没有继续起一种重要的和广泛的保守主义的政治作用就错了。默顿教授正确地指出,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宗教和宗教制度在它们的社会中起着一种深刻的“机能障碍”和“非一体化”的作用。^③ 但是,正像谴责“过分地、不分场合和不分时间地判断‘宗教的整合功能’”是正确的一样,^④ 认为默顿教授自己关于宗教实际的和潜在

① 拉帕罗姆巴拉:《意大利政治中的有组织的集团》第 69 页。也可参见 M. N. 皮尔里尼:《意大利的天主教会》,载《国际社会学杂志》,1964 年,第 2 卷,第 9 期。

② C. 加伯特:《英国的教会和国家》,1950 年版,第 106 页。

③ R. K.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65 年版,第 28 页以下。

④ 同上书,第 28 页。

的“机能障碍”是“夸张的不分场合和不分时间”的判断至少说是空洞的也是正确的。于是，默顿教授指出，“断言所有的宗教在任何地方的惟一结果是使群众冷淡……恐怕是结论下得过早了”。^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论及当代资本主义时陈述的含糊之处在于，几乎没有争论余地和大概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有组织的宗教从它主要的宣言来看，它在占优势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一直在起着一种“功能的”和“整合的”作用，而且，除了像“文化斗争”这种例外的情况，对于国家起了一种保卫社会秩序的作用。^②

阿瑟·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曾写道，“真正的基督教徒决不会成为一个平等派，也决不会听信法国政治学或法国哲学”。^③从那时候以来，教会在这个意义上和出于其他考虑，始终竭尽全力去帮助把它的会众转变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尤其重要的是告诫他们要反对当时与“法国政治”和“法国哲学”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

人们通常认为，在英国，非国教徒和国教徒不同，他们的言论具有激进主义和抗议之声。一位工党的总书记确实说过，他相信启发工人运动的“是卫理公会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论点以后常被人提到。这个论点比历史学的精确论述更易为人接受。因为卫理公会作为一种非国教派、无论从市俗意义上说还是就宗教意义而论，在它的历史上都很难找到证据说明它甚至曾向它的信徒宣传过反叛。相反，更多的证据表明，它所启示的主旨是顺应并服

① 默顿：前引书，第44页。

② 一位美国作者论及“宗教和国家意图的融合”时说，它“为了经济和政治的目的而把直接的剥削任务交给宗教”（赫伯格：《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第274页）。同一位作者又指出，“不要做——就是说一个人不要把自己等同于或被等同于——一个新教徒、一个天主教徒或是一个犹太教徒，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去做美国人”，而这“或许是朦胧地暗指‘非美国人’”。（同上书，第274页。）

③ 引自，K.S. 英格利斯：《维多利亚英国的教会和工人阶级》，1963年版，第6页。

从经济和社会现实,而不是进行挑战——更不必说叛乱——这样,它在调和那些为工作纪律束缚的人们和新工业秩序占支配地位的体系的冲突时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①

在英国国教会中没有哪一派在这一点上比基督教社会主义表现得更充分。例如,这个运动很明显是作为宪章运动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的创始人 F. D. 莫里斯首先关心的是“在工人和他们的愤激行动之间插入基督教的信仰”,以此减少好斗的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②这并不是要否认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那以后在改善贫民的命运的愿望方面,在把“社会问题”提到社会议事日程中更引人注目的位置方面,以及甚至在帮助建立和加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方面的真诚态度。^③但是,这只是以一种强调的形式反映绝大多数教会早已表示过的关心贫民的慈善传统。然而,这种关心 203 与“机能障碍”和“非一体化”毫不相干;而且,除了某些特别的例外,从来也没有更多的为宗教感召的改革运动希望它这样。当许多这种类型的运动多少清晰地洞察到这是一个人们彼此的联系不再被“金钱关系”统治的合作社会时,他们也正视这样的现实。它将为现存社会秩序中不确定的成分留下更多的空间;他们一点不少关心说服工人阶级认识军事骚动的概念违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这对于天主教和新教教士浅薄的但却始终坚持的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他们对于一个不正义的和“非基督教的”社会秩序的歧视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渐进主义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前景而得到解

① 例如,参见, E. P. 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版,第11章。

② 对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的有价值的分析,可见约翰·萨维尔(主编):《民主和工人运动》(1954年)中所载的约翰·萨维尔写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一文;关于它以后的演变,可见琼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复兴,1877—1914年》,1968年版。

③ 例如可参见 C. E. 拉文:《基督教社会主义》,1920年版;以及 F. E. 吉斯皮尔:《英国的劳工和政治,1850—1867年》1927年版。

决,他们的意图时常是高度的“机能失调”。这种富有斗争性的基督教徒的抗争性和坚定性,在各种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确实占有过一席光荣的地位;同时它仍然是道德和政治挑战的一个源泉,例如对美国发生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抗议运动,既不能过高估计也不能漠视。

即使这样,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明显少数派地位的无论是激烈的还是“温和的”教会反保守主义,在对待社会有争议的政治和道德问题时,不得不反对时常具有一种极端反动性质的保守主义。^①

然而,在美国,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在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两个主要政党中间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主义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本找不到理由说明美国的天主教会会冒险表达敌意而疏远大量支持民主党的天主教徒,因为那个政党的哲学和意图并没有想要触犯教会的保守的感情。对于英国教会来说,很长时间以来就不值得在与工党的关系上冒这种险,而对它的领袖给予确实的“温和”的对待。事实上,中立派甚至慈善派,会起积极地助长和默许教会和它的从属组织加强反对左翼的政党中“温和”势力的影响。简而言之,某些国家中有组织的教会总是愿意或是置身保守党一方反对左翼或是在另一些国家工人政党内部站在右翼一派反对左翼派别。它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可能比在另一些国家要大些;

^① 对于美国,例如人们通常指出,大多数信奉新教的白种人都是具有保守主义的而不是“自由”共和主义者的倾向。(G. 伦斯基:《宗教因素》,1961年版,第262页。)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已故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在这个国家中不是代表着官方的天主教观点。还要指出,在更普遍的意义,寂静教徒强调美国的“灵感”文学,在这种文学中,可以看到“英雄”越来越表现为“具有强烈适应性的”人,他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表示怀疑,他在实业或职业意义上说都取得了理想的成功,他不感到任何痛苦。”(L. 施奈德和 S.M. 德恩布施:《富于灵感的宗教文学》,载 L. 施奈德主编:《宗教,文化和社会》,1964年版,第159页。)

但它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无足轻重。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在本世纪由于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因此起了一种增强国家权威及其意图的有效作用。可以再一次引用大主教加伯特的话:“我怀疑是否其他的教会[比英国国教会]有更多的机会为国王祈祷。我们的教会从未为它的忠诚而感到羞愧”;^① 与之相似,“所有的主教、牧师和副牧师在他们就任圣职、被任命、领得执照以前,必须宣誓忠诚于国王”。^② 从这一点来看,在国教会与其他名称或其他国家的教会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论在何处,除了与他们特别有关的特殊的问题(如教育)所造成的紧张时期以外,教会一直与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甚至比凯撒的教会向凯撒作出的心甘情愿的让步还要多。也许应该赞成这样的看法,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支持的国家权力是“民主的”。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回忆 205 起许多教会轻而易举地就支持那些毫无“民主”可言的制度,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德国的纳粹制度,法国的维希制度。在这些国家中,有大量的教会和市俗人士,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找到了灵感来抵抗享有尊严但他们认为已名誉扫地的王朝要求。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他们那些既不反对这些王朝,相反却颂扬后者事业的教会。对此不应有很大疑问,否则在这些国家中共产主义制度会执掌政权;到那时教会或许会重新找到一种在绝大多数场合还未曾出现过的信徒对义务的不顺从。完全可能有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宗教或者至少大部分教会,可能会履行其反对法西斯式的制度的义务。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是,推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一直如此心甘情愿地服务于并支持国家并

① 加伯特:《英国的教会和国家》,第129页。

② 同上书,第136页。

不是(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因为国家的“民主”性质,而是因为代表国家的政府始终有一种很明显与教会本身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并不是不公正的。由于有了这种一致性,后者在宗教责任和服从国家命令之间取得一致,没有任何困难,只是在极少数例外的情况下,它们的教会组织才不得不对颂扬国家进行战争、军备、殖民扩张以及镇压的事业,表示温和的异议。

由于民族传统和以往冲突的限制,国家则用对教会的同情和支持作为报答,同时欢迎教会给予加强社会组织和国家本身权威的任何帮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现在都回避反教权主义而寻求教会与国家保持一致,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领悟到,这种一致,以及作为官场生活和官场仪式共同部分的宗教热,成为对教会和对国家双方都在寻求的服从习惯的一种温和的但十分有用的东西。

由于这些和相关的目的,当代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党的保守主义,都较少依靠传统的宗教,而较多地依靠 20 世纪中所有世俗教派中最强有力的一种——民族主义。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观点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只是在这些国家——典型的^①“功能”主义一直是社会中最好的“起整合作用的”和稳定的力量。

当然,在许多情况和环境下,民族主义往往对于政治和社会秩序表现出深刻的机能失调,而转变成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占优势的政治制度可怕的武器。这样,作为民族主义本质要素的国家取得

① 原文为法语。——译者

1
A
7

独立地位的愿望,对于殖民地和帝国自治领就成为一种巨大的爆炸性的破坏力量,并对在地球上广大地区结束殖民统治负有主要责任。

与此相似,民族主义情感在一系列独立国家中也始终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例如在比利时和加拿大,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运动纷纷要求比目前所给予他们的更大的独立性,甚至要求独立的国家地位。

同样,也是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在一些时候出现了强大的运动,特别是紧接着战争失败之后,向传统的政治精英进行挑战,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捍卫国家的完整和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0年的法国,这种反对政权的挑战失败了,但是在法国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恰恰相反,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末年,这种挑战取得了完全成功,在那里民族社会主义取得了全国的声望,在有决定性意义的讲坛上恢复了德意志的“伟人”形象。事实上,甚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反对统治阶级从属于美国,捍卫民族独立,便成为某些左翼特别是共产党在讲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但不是十分有效的)要素。 207

然而,尽管民族主义情绪时常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在各种挑战力量的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乃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在本世纪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的同盟者,并使它起一种保卫现存秩序和与左翼斗争的作用。

由于一系列诸如此类明显的原因,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中构成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从统治阶级的观点来说,显而易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强调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更为有利,即所有的不论怎样的公民他们都倾心于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这种利益要求人们应当抑制所有其他的利益特别是阶级的利益,以达到在富人和穷人、生活舒

适者和被剥夺者、付出者等级和获得者等级之间的团结这个最大的和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竞争的政治条件下，不可能祈求于这种概念来平息反对派的挑战。但是，它至少能够通过给他们指出，他们的行为可能损害“民族利益”而使他们有所收敛。特别是当从属阶级提出“局部性”要求，尤其当这些要求发展到非常激烈时，比如罢工，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从属阶级对于其从属地位——事实上几乎把他们限制在从属阶级的地位——付出的代价之一是他们的要求是可能损害“民族利益”的，特别是当这些阶级的成员认为他们的要求充满活力，是必需的，而肯定具有破坏性时，尤其如此。从来没有认为大规模的罢工，甚至总罢工，损害了雇主利益，然而，它却是损害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不管它有什么优点，必然遭到失败；雇主从这种失败中可以取得的利益则完全是意外的，并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时常为许多工会领袖和工党领袖所持有的观点，对他们的追随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结果，起了使他们沮丧的作用。

保守党特别是在其左翼敌手的竞争之下利用了民族情感，坚持把他们自我炫耀的爱国主义奉献给整个民族，并且不时吵吵嚷嚷地用这种民族情感与他们宣称的左翼政党的较少爱国主义或者确实是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反民族主义的见解相对立。^①在保守党参加(并赢得的)无数次选举中，适应于特定环境和问题这一论题起了一种重要的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主题从未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年中那样彻底地得到研究，当时关于西欧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苏维埃军事侵略威胁的神话得到广泛的

^① 因此，针对英国的保守党，麦肯齐和西尔弗指出，“很少有民主政党能够一直如此系统地和无情地对正直地热诚地对待这个国家的宪法和它的敌手的爱国主义提出过质疑。”（《大理石雕刻的安琪儿》，第49页。）

传播。^① 为了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保守主义的力量, 冷战并不曾解除。但是, 在一个被称为可怕的军事冒险时代, 它不过是值得赞叹地为这个目的服务并给“民族团结”的要求增加新的内涵。威廉·詹姆斯有一次曾为“道德与战争等值”辩解。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 这是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的冷战中形成的。从那个观点来看, 它在晚近年代中的失败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在利用民族情感的过程中, 无数市民社会的代理人非常希望保守党或多或少地通过出版物和其他大众宣传媒介、教育设施、青年组织、退伍军人协会和联盟, 特别是民族主义的组织、教会和实业家^②、它的协会和院外活动集团等等, 卷入一种保守主义所说的“民族”观念或“民族利益”的宣传。因为他们中有如此多的人宣称 209 是“无党派”和“非政治的”, 当然, 宣传中也就不带保守党的倾向, 他们担负的责任是不公开的。这种说法可能表现得非常真诚, 但是它通常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推进保守派事业的方法多得很, 远不只是督促支持一个特定的保守党。

然而, 在这样一个领域中, 市民社会的代理人在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尝试中决不是孤立的。由于国家主要要求的是要排除可能给它带来一系列危险的挑战性的“过激的”和“异己的”原则, 国家本身也总是通过其各种各样的机构, 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在扶持对现存社会明显“起作用的”民族忠诚的观点中, 起着一种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大的作用。

^① 关于这一神话得以传播的方式, 参见 D. 霍罗威茨:《自由世界巨人》, 1965 年版。

^② 例如, 需要指出, 美国实业家给予唧唧喳喳的“极端右翼”的民族主义集团相当大的支持。恐怕还没有像得克萨斯石油百万富翁们这样露骨渴求身分的实业家; 三个全国制造业协会的前任副主席在约翰·伯奇协会的第一届政府委员会中任职。(参见 F.J. 柯克:《急进分子》, 载《民族》, 1962 年 6 月 30 日。)

同样,在这里经常使用“非政治性”一词。作为民族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总统和首相很容易便装扮出一种“无党派”的姿态,向人民讲话时,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和重要仪式上,总是表明自己不是作为某个特殊的政党的领袖,而是整个民族的代表,他们只提及民族的利益。但是,正如在前几章已经提到的,这并不排除——事实上一般来说也包括在内——倡导确实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图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越是强调“民族性”,保守主义倾向就越是明显。

与此相似,有军队参加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灌输,普遍不具有明确的“政党”倾向;无论它们是否统一,它们都服从于灌输,不像通常那样不隐讳地怂恿赞成或反对这个政党。这就是军队不得随意“介入的”“政治”。但是,如果谁要认为这种“非党派”的宣传会鼓励左翼政党或者拥护左翼的意见,那恐怕就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初出茅庐之见了。军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所特别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学校。但是,如果它们不是这样的学校的话,它便不能适合他们的官员阶级试图达到的目的。

在“政治社会化”的领域内,国家和其他机构能够使用证明是有魅力的观念和信条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其中民族的或帝国的历史甚至被赋予更大的权威。这样,对于过去斗争集体的回忆以及不顾及场合和原因对过去的牺牲行为和英雄业绩持续不断的赞美,大都不会计较,而是鼓励对用鲜血换来的社会秩序的特别批评意见。甚至死亡在这里还是再次被召唤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合法政权而奉献。同样,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也通过多种象征手法和一系列与过去的牺牲和斗争相联系的种种仪式和礼仪,进一步激荡起来。所有这些,在一个主要表现为适应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至少在一些君主制持续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国家中,有关

于这种联系有效作用的记载。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承认和理解的英国君主制的统一和社会润滑作用,从来没有像“民众政治”形成以来那样明显。^①而人们同样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决定保持帝国制度负责,因为它认为,这是“一种可以通过一场上层决定的有效的革命确保平稳地转变并抑制预防来自下层的革命的设置。”^②

当然,君主和君主制很可能变得高度的“功能失调”,成为冲突 211 的焦点而不是民族统一的因素,甚至发展到威胁民族结构本身的程度^③。但是,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即君主制不再是宪政制度的一个要素;在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它具有巴奇霍特称作“使其有尊严”的功能,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具有令人崇敬的因素的含义,它有助于创造国家和事物的传统秩序,它意欲促成超出“纯粹的”阶级冲突的民族统一意识。

五

在前章中曾提到一点,实业家作为一个对国家的压力集团,对于所有其他的利益集团享有很大程度的优势。这至少部分应当归因于它充分支配社会广泛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广义的文化影响。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论及实业家对政党的影响,这已在前面讨

① 晚近关于英国君主制在促进一种“为共同生活和制度献身的共同情感”中的价值较为公正的观点,参见 E. 希尔斯和 M. 杨:《加冕礼的意义》,载《社会学评论》,1953 年第 1 卷第 2 期;但同时可参见 N. 伯恩鲍姆的文章:《君主和社会学家。给希尔斯教授和杨先生的一个答复》,前引刊,1955 年,第 3 卷,第 1 期。

② A. B. 柯尔:《日本社会和政治:社会分层和流动对政治的影响》,1956 年版,第 13 页。

③ 例如,像在战后初年比利时利奥波德三世时期发生的那样。

论过了；这里也不是要论及它对大众宣传媒介和其他“政治社会化”媒体的影响，那将在以后讨论。我只是要说明，实业界推动社会的努力不仅要社会接受它倡导的政策，而且要社会接受它自己的风尚、价值和目标、由它构成主要部分的经济体系和作为它存在核心的生活方式。至于说到对资本主义事业的信念，它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部分，实业界在传播它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论，“实业的文明化”为一种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所渗透，而企业本身在它形成过程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

212 首先，企业连成了或者至少大量资助了在前面已讨论过的与特殊的企业保护组织有联系的特别关心自由创业宣传以及保卫和赞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促进集团”。

这里需要再一次指出，在多元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促进集团”，它们中有一些的目标是反对这些企业或者至少说和这些企业不发生联系。但是这里也要指出一点，那些致力于推动自由经营的集团比那些持反对态度的集团具有极大的优势。这里举英国的一个例子，罗斯教授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促进集团“工业目标”的年收入达10万镑；^①他还指出，“就它们预期的任务来说，‘工业目标’组织的官员和左翼周刊《论坛报》并没有什么不同”；^②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这种对照推导出在任何意义上这些组织的财力都是相等的观点，恐怕是草率的。

总之，“工业目标”只是许多职业性“促进集团”之一。另一个组织是1919年创立的经济联盟。哈里森教授说，它“在1955年有

① 罗斯：《影响选民》，第98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180名全日制工作人员,它向资方、监督人员和学徒分发杂志,它宣称已分发了1920万份传单,召开了8932次户外集会和9388次室内集会,以及33700次团体讨论会。^①

与此相似,“促进集团”当然也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它有同样大的规模,或者像在美国那样,其财力更雄厚,并且有同样的活动记录。显而易见,这些集团所能通过宣传方式达到的效果和“促进集团”从事的反对实业界自由经营意识的宣传产生的效果,无法相比。这些集团的成员和宣传活动的财力都非常可怜;没有哪个领域的不平衡比实业界和它的反对者之间的不平衡更显著。

当然,没有一个“促进集团”对其他问题比对赞扬企业的进取心以及把这种赞扬变成它们的一个宣传主题更关心了。因此,美国大量的国有化组织事实上再清楚不过地在从事这样的宣传,以此作为他们捍卫真正的对美国的信仰的一部分行动,并且至少从实业界取得他们的部分财政资助。而且,显而易见,任何多少宣布过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促进集团”在保卫这种或那种自由经营形式时,都受到明确的或不明确的限定。 213

在第二方面,企业商号本身单独地或者与商业协会或其他团体联合展开一些斗争,有时是为了实行某种政策,有时是为了反对某种政策,而这些都得到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共鸣。例如,在1964年竞选之前,英国的单个钢铁公司和钢铁联合企业花了1298000英镑以反对钢铁业的国有化。^②但是,这些宣传不只是集中

^① M. 哈里森:《英国——政治财政的比较研究》,载《政治学杂志》,第567页。但是也要指出,单个商号它们自己也在起作用,例如通过“公司出版物”的途径,60年代初期美国有大约1万种这种出版物(T. 彼特森, J. W. 詹森, W. L. 里夫斯:《大众媒介和现代社会》,1965年版,第176页)。

^② 罗斯:《影响选民》,第130页。罗斯教授也指出,“与各政党的财力相比,这笔

在对钢铁工业私有制对公有制在技术上谁优谁劣的探讨。工党极其注意的不是去做一个“空谈理论的”政党，一心按照国有化的原则，试图把倡导钢铁工业国有化仅限于技术考虑。对他们来说，钢铁业的利益扩大了包括自由经营的一般优点、国家控制和官僚的弊端，以及自由、个人权利的利弊在内的辩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改革政府与实业利益集团冲突的例子。前者把重点放在他们关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非教条主义的空谈上，决无“反对实业界”的意图。正是实业利益集团自己扩大了辩论，并且积极地提出了大量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

然而，这样提醒人们还是有益的，即尽管英国钢铁利益集团财力雄厚经验丰富，仍然无法阻止钢铁业的国有化。这对于那种认为这些利益集团靠财力无所不能的观点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补正。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被打败，但是能够被打败。然而，难以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它们是强大的，它们发挥着广泛的政治影响，它们能够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而这种教化作用完全超过了社会上其他任何利益的力量。^①

这种作用在美国得到了充分发挥，人们一直说：

美国实业团体的态度、观点、议论、价值观和口号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熟悉的景色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年可以发现，实业界的观点得到了充分地表达：如公共汽车上关于‘美国经济奇迹’的招贴画，报纸和杂志关于过度征税有危险的广告，商

开支是很大的，它将近超过保守党中央机关开支的三分之一，总数比工党本部的开支大4倍（前引书，第130页）。也可参见G.W.罗斯：《钢铁工业的国有化：进一步，退两步？》，1965年版。

① 不应当过分估计在这种竞争中失败得到的补偿。竞争的激烈有助于使政府心力交瘁，并致使它“富于理性”，以致于达到使其实施竞争的政策这一地步。在主要问题上失败以后，强大的利益集团仍然能通过限制甚至几乎无任何损伤而获得很多利益。

业董事关于经理职责和权利的讲演,对大规模国债表示遗憾的社论,插有商业协会解释自由经营经济活动的广告教科书;揭露不明智地对商业的政治干涉具有危险的小册子;商业发言人在国会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一系列专门公共政策问题的论词。^①

另一位美国作者海尔布伦纳教授更加明确地论及这一点。他写道,

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持不同政见者”集团、劳工、政府或学术界都在试图调整他们的社会变革倡议不超越占优势的实业秩序。这里不存在想要超出那种秩序调节力量的意图。真的,所有这些集团都放弃了这种尝试……这样,它最终倒向作为惟一的社会经济原则的实业思想,并向非实业集团特别是知识分子团体证明,天职和命运意识作为一种产物通常是来自竞争观念。^②

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 215
条件相结合保证了“竞争观念”更为人所知;在那里,甚至保守主义也不仅仅局限于经营观念和商业价值观。当然这无须损害实业利益。相反,如同在英国那样,从前资本主义时代或其他历史和文化价值观产生的社会价值观持久的力量,或许会有助于模糊实业权力的现实,并将其价值观与更悠久和更神圣的价值观相结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国家中实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即它的广告和自我推销的力量,具有第三等的巨大意义。

商业广告,特别在美国,同时也时常在其他国家,极其引人注

① 萨顿等:《美国的实业纲领》,第11—12页。

② R.L. 海尔布伦纳:《来自上层的观念,对于变化的实业观念之观感》,见切特:《实业制度》,第2部分(着重号是文中原有的)。

目,它具有直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但是捍卫资本主义事业和宣传它的价值观不会全无效力,而由于不带有这种明显的涵义,更加放开和“非政治性”,可能会更加有效。

现在实业界,特别是最大型企业,用相当的时间加强广告和公关业的活动,这并非单纯关心产品销售^①而是要销售公关业本身,它作为一种活动不仅有益于它的那些所有者,而且有益于那些为它工作的人、购买产品的人,即有益于广大的社会。正像大西洋中部广告大亨之一戴维·奥吉尔维先生有一次说过的,“广告是制造业的私利和社会利益相结合之处。”^②他的意思当然是指广告(和公共关系)意在使它看起来像是二者的结合。事实上这比晚餐
216 会以后公司经理的讲演和亲近实业集团的宣传更为有效,在这里大企业变得“充满生气”、众望所归、具有社会责任感。使你们这些顾客只是飘飘然就迷恋在一种福利感之中。这便是公司非常关心其业务而较少关心其利润之故,而适当地关心利润是因为要使公司能给顾客和团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如雷蒙德·威廉斯谈到众多商业广告时所说的:“这和直接的政治广告的界限往往很难分开。”^③同时,需要冒着使读者感到厌倦的危险不得不再提到一个观点,即企业几乎是单独地使用广告:企业集团并不正式雇请公共关系公司宣扬他们经销的产品。

甚至散布得更为广泛但并非不引人注目的是,企业法人不懈努力的不仅在于其产品而且在于它本身和自由经营中得到社会赞许的价值标准,如诚实、可信赖、有保障、父母般的爱护、儿童般的

① 事实上,许多广告,就其所宣传的产品的性能来说,例如,战斗机和核大国地位——不会只想促销其产品其意图还不如说是为公司和它的其他产品的信誉,为整个实业界。

② M. 迈耶:《美国的麦迪逊大道》,1959年版,第59页。

③ 威廉斯:《六十年代的英国:信息传播》,第40页。

单纯、睦邻关系、和蔼可亲等等；当然，在此同时对“隐藏的威慑者”“动机的探讨”可能发现其欲望和干劲都值得进一步提高和利用。即使这样，公司还是不可爱。但是，很少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企业无法在树立它自身良好形象上达到广泛效果的话，那么它作为其一部分的那个制度恐怕就更少为人喜爱，因而更容易为敌对的意识形态攻击。

最后，除了自我形象以外，企业的广告极大地有助于促进陶尼所说的“渴求的社会”价值观的产生。这并不是要给舒适和快意加上道德的非难，说它是来自一个庞大的变化多端的“圈套”——这个词非常冤枉地具有一种诽谤的含义。这甚至也还不是主要之点，就是说太多的广告，都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它的实现与人类真正迫切需要完全不相干和不相容的要求，由于对本应得到满足的私人企业不利，它大部分或整个地是不相宜的，^①这仅仅是一个能够把它的不合理性施加于它在其中发财致富的社会的完全不合理的制度的另一个公开声明。 217

对这一点还不如这样说，实业能够自由地传播一种时代风气，即私人的渴求将被迫被看作如果不是惟一的也是主要的成功之路，“幸福”和“成就”的含义因而也限于个人的渴求，人们为渴求而进行着竞争，所以“幸福”和“成功”就被认为或假定为首要的生活法则，而为了达到人道目的而进行的协调一致和理智的行动，充其量也是文不对题的，公司充满生气、慈善、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情况正是如此，而个人则完全保持了自私的倾向，贪婪、掠夺，并满足于享有大量赐予他的幸福。

人们各不相同，可能反对这种或那种“信息”，不愿意把广告提高到一种在他们观察外部世界时对他们的态度有决定性影响的地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第5章。

位。但是,他们中恐怕还没有哪一个特别轻视企业通过其广告的力量能够起一种不是从其他意义上而是从人类学意义上被称为他们那个社会文化倾向的作用。广告总是被人们辩护说,它是发达经济体制一种必要的和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别处,即在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类型中广告采取了某些并非其活动本身具有的特征(其语言及含义完全变质了,可以说是愚蠢浅薄),其中有这样的特征,即倾向于操纵人们在购买商品的同时购买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一章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代理人在行动中并未协调一致,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是非“政治性的”,并且毅然避开“政治”。他们无论是政治性的或是非政治性的,没有一个在宣传中纠缠于和限定在保守主义观念形态上,更不必说限定在一种官方标准的意识形态了。然而,无论怎样自由,这种声音即使是多样的和不协调的,它们却采取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当他们谈及通常表现为一种适应性的改革时,这种语言一点也不少。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的语言用词上和形式上花样翻新,却必须被认为它们是和国家一起致力于一项联合而艰难的保守主义事业。然而,这一事业是在得到其他“政治社会化”的人们,即大众媒体和教育界的帮助,在无法估量的种种艰难情况下完成的。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

—

可以说没有哪个领域在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开放”的社会”自诩的民主多样性和政治自由竞争时,比传播领域——出版物、一般的书面语言、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和戏剧——更有效率。因为和共产主义制度以及其他“铁板一块”的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达工具通常并非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所垄断并充当它的工具。就拿通常的广播和电视来说,甚至交流媒体也是作为公众设施或者混合设施,它们并不完全是现政府的喉舌或官方政策或舆论的工具;相反的观点同样也可以听到和看到。

正如在许多政权下信息传播并未被国家垄断一样,它们在为这一政权服务时也不得不对极端的报复表示耽心,因为它们的传布或被允许的传播,会触犯他们的政府、其他公共团体或人士。毫无疑问,他们屈从于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其他某些时候极为严厉的官方的限制和压制。但是,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些限制和压制只是承认传播媒体独立于国家的垄断和控制;它们并没有取缔它。

实际上,甚至不能说,那些深刻攻击现政府各“机构”的观点,其中触及政治或文化,或宗教、或道德,是被狭隘地限制于只被少数人保护的那种边缘和前沿的表达渠道。 220

在所有这些国家发行的通俗报纸和杂志上都表达出这些“有争议的”观点;它们为一些大出版公司以简装版书的形式大量出版

发行；^① 它们在收音机中并在电视上播出；它们被拍成电影在一些主要的影院轮回映出，并在“商业性”剧院上演的剧目中表达出来——而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哪个人）被投入监狱。

这种表达自由和机会的重要性及价值，还没有为人理解。然而，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多元变化意识和均衡竞争意识都是肤浅的和错误的。由于传播手段，特别是大众媒体，实际上尽管表达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立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自由表达意见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包含着这些社会的真实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关于这一点，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主要意味着这种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表达有助于占优势的权力和特权制度。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教授和默顿教授有一次曾指出的那样：

那些组织起来的实业集团在其中占有极其引人注目地位的主要权力集团，日渐通过用宣传取代直接控制的方式，取得了操纵公众的技术……经济、权力似乎已减少了直接剥削[?]，并转向一种巧妙的精神剥削方式，即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宣传而取胜……这些媒介已经承担了使公众适应社会经济现状的任务。^②

221 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这些制度中文化生活的许多特点，例如缺少国家的指挥、存在着争论和辩论掩盖了。事实上保守主义

^① B. 沃尔夫在论及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全盛时期时指出，“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畅销和高雅的有用之物，出版家订立合同以把古典的和当代的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翻译出版”（《三个人制造了一场革命》，1966 年版，第 144 页）。可以称作商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的现象，20 世纪 60 年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当大规模地发生了。

^② P.F. 拉扎斯菲尔德和 R.K. 默顿：《大众信息，民众兴趣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见 B. 卢森堡和 D.M. 怀特（合编）：《大众文化，美国的大众艺术》，1957 年版，第 457 页。

并非严谨的思想实体,而它们松散性使得在它的框架和其他部分同样会发生变化和分歧。尽管它可能被掩盖起来,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媒主要是在起一种高度的“功能”作用,仍然是事实;它们既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表现,又是增强这种制度的一种手段。

可以认为,出版是表现这种作用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例子。不同地方的报纸在品味、内容和倾向上差异甚大。一些是严肃和认真的,另一些则具有煽动性和尖锐性;有的是富于才智的,而另一些则显得愚蠢;有的是反动的、保守的,也有的是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有的在外表上不效忠于任何势力,有的则作为一种政党派别或利益集团的工具;有的对当局持批评态度,有的则盲目地为其辩护;等等。

但无论各种报纸有多么大的差异,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大多数报纸却普遍具有严厉的特性,即它们有时强烈地感情激烈地反对任何比社会民主党的温和形式走得更远的左翼势力,同时更经常地反对这种温和的形式。这种行为在大选时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无论多少独立于保守党的报纸还是极为服从保守党的报纸,绝大多数都信赖支持保守党的一方,或者至少坚决地批评反对保守党的一方,它们时常是喧嚷嚷嚷毫不顾忌地这样做。这种保守主义势力通常占压倒优势。

这种行动的核心在于总的承认经济和社会秩序占优势的思想模式,特别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有些时候认为它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意的。大多数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某些更大胆者甚至支持这种或那种式样的无关紧要的国有化措施。即使如此,大多数出版机构始终断然接受这样的主张,即“公有部分”的扩大将有损于“国家利益”,私人企业力量的加强是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福

利、自由和民主等等的条件。

与此相似,长期以来大部分出版物一直都倾向于反工会势力。但不能说报纸一般都是反工会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用所有人都熟悉的隐语来说,它们只是反对工会不顾国家的利益和它的成员的利益,贪婪地和不负责任地试图去取得具有盲目性和自我毁灭性质的眼前的利益。换句话说,只要工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采取拙劣的做法,报纸就可以向工会表示善意。和政府及雇主一样,报纸对罢工感到深深的遗憾,罢工规模越大,它们的敌视态度就愈烈;对于那些鼓励或未能制止这类明显不合群的、不负责任的和过时的活动方式的工会领袖,深表痛惜。任何争端是正确还是错误,无关紧要;所考虑的是,不论花多大代价必须保护团体、消费者和公众,反对盲目听从多半是心怀叵测把人引入歧途的领导人的号召而采取的行动。

具有同样倾向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报纸,念念不忘的是“极”左的甚至共产主义者的报纸,它们对于政治谱系中这部分人的态度,只是在对它表现出的恶意和敌对的程度有所差别。这些报纸还持有这样的立场,即它们认为1945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领导的右翼势力展开的反对以苏联或中国为代表的富于侵略性的共产主义罪恶势力的摩尼教式的斗争史。革命运动几乎总是受了“共产主义鼓动”,他们掀起的局势都是罪恶的,残暴的;而在本世纪非殖民主义化的斗争中,绝大多数报纸对于争取独立运动及其领袖(毋宁说恐怖主义者)的态度,一直是极度仇恨的。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过去不是现在也不简单是诸思潮中的一种;它一直是并继续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和地方)报纸占统治地位的或者总的来说占压倒优势的思潮。

正如前几章再三强调过的,这种彻底的守法见解对许多异见

兼容并蓄：它当然不排除对于现存事物秩序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批评观点。而无论它们的政策多么保守，社会民主党政府必然期望比真正的保守党粗率得多地对待手边的报纸，而后者丝毫无法免于报纸的批评和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完全可以被称作是“独立的”起着重要的看家狗的作用。然而，这种主张视而不见的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这就是这些看家狗通常对左派凶猛地狂吠，它们所首先保护的是现状。

许多发行很广的“群众性”报纸极其关心传递反对派的意见，并且建议对每种无论怎样高贵的“制度”感到极端的不耐烦而不停地催促进行变革、改革和发展。从真实情况来看，这些愤怒的激进主义者绝大多数不过是装模作样；在攻击传统观念的不敬行为和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后面，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完全是空白。尽管吵吵嚷嚷，但斗争是虚假的。

对报纸和电视来说，它们虽不完全但主要扮演守法者的角色。这里也表现出大量观点和意见的差异，热烈的争论和面红耳赤的辩论。这些传媒无论是商业性的还是公共所有的，都要求并且无论如何都希望表明政治上极度的公正和客观。报纸会由于它们选择发表的观点和消息具有倾向性而介入政治并且具有党派性，但广播和电视则不是这样。

然而，这种装出的公正和客观大多是十分虚假的。因为它对于政治结构的操作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分裂，还是取得了部分基本的潜在的一致。这样，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中，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可以分别在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之间，以及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保持相当程度的公正。但是，这很难持续地阻止反对所有被排斥在一致意见之外的观点的宣传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不带偏见和客观性由于最终政治本身一致而划了一个句号——而持不同政见者越是激进，传媒就愈不公正愈不客观。根

据这一点,它似乎没有过分地暗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一直是并且主要是灌输保守主义的机构,也不是说他们的工作应当是向他们的听众和观众灌输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这不是要求把所有这样的不同政见排斥在广播之外,它只是要求居压倒优势的传媒倾向应当向另一方有所倾斜。而这个要求已经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那些政治生活被政党控制并在舆论一致的框架中运行的国家中,这种可使其他反对党起一种合作作用的宣传倾斜很容易被忽略。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中,在那里强大的共产党构成了主要的反对党,政治上不带偏见的概念很难确立。在前一些国家中,一般的意识形态偏见很少直接具有明显的政治涵义,因为受到敌视和歧视的政党和运动构成的是很小的甚至无足轻重的政治因素。在后一些国家,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非常直接地介入政治斗争,并且在实际上成为执政党用来反对在野党的工具,政治环境不会允许任何不合适的关于“机会均等”和任何像自由的享受一类的无益之谈。在法国,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都十分审慎地转变为戴高乐派的工具,它们的使用被用于使将军、他的政府和支持他们的政党获得利益;①在意大利情况很相似,这些传媒已经明显地成为天主教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工具。

225 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说,形势与在英国那样的国家流行的情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工党在与像保守党一类的他们的对手斗争后,其领导地位已经确定。然而,主要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比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这一点对于美国甚至有更大的说服力;人们一

① 这并不是说第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于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使其政策得到有益的表达施加压力。(对于这一点以及对于戴高乐政权不胜枚举的支持作用的例子,可参见1968年4月24日国民议会的辩论,见《世界报》,1968年4月25日。)

直说,在美国“有组织的实业界和稍弱的利益集团构成了主要的政治派别,而教会团体实际上在‘心理上垄断了’传播媒介。新闻和评论、娱乐、广告、政治口号以及宗教劝诫,都极为关注引导现有的信仰而不是激进地改造它们”。^① 处于以一切看法一致的看法为一方,以所有反意识形态的看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保证着前者的论据居最优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大众媒介给人的感觉好像只关心政治和思想。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政治刊物和书籍在整个大众媒介中大概只占很小一部分,所有报纸都用很大篇幅登载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间接关系的事件。事实上,许多报纸都用较大的篇幅登载这样的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同样,广播、电视、电影和戏剧也不是作为政治传播和灌输的媒体,它们也是甚至主要是关心这种或那种“娱乐”。至于私人拥有和控制的大众媒体,其首要目的和首先考虑的是赢利。报纸也是如此。当汤普逊勋爵说,他对自己的报纸的惟一希望是能赚钱时,他并不是在表述一种独特和反常的观点。

另一方面,赚钱与搞政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的政治灌输也不绝对矛盾。因此,各种形式的“娱乐业”的目的可能是赢利,但娱乐产品的内容不可能一点也不受某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内涵的影响。

大众媒介常常被指责文化贫乏,惟利是图,体系琐碎,充斥暴力和兽性,故意渲染色情和残忍癖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种指责为人们所熟悉并且绝大部分恰如其分。 226

不过,这种指责也常常是忽略或忽视这些娱乐产品的具体思想内容,以及被用作特定世界观的宣传工具的程度。洛温撒尔教授曾经指出,“在我们西方文明中,娱乐界和出版界的产品起码将

^① T. 彼得森, J. W. 詹森和 W. C. 里弗斯:《大众传媒和现代社会》第 26 页。

包括国家、家庭、宗教、自由进取心和个人主动精神这样的内容和动机。”^①事实上,它们的内容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主题以及其他高度“功能化”的主题;它们偶尔还涉及“功能退化型”主题。在谈到杂志界时,梅诺教授说:“它们通过专栏的形式和所写文章表面上的中立性,着力促成这种遵循惯例的氛围,它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佳的手段之一。在这一方面,女性周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刊物在不动声色地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完全歪曲的介绍。”^②这一点具有普遍性。而雷蒙德·威廉斯对他所谓的“多数派”电视的评论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他说:“‘多数派电视’杰出地表达了我们特定社会的虚假意识。”^③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许多“信息”并不分散,而是相对集中。当然,如果把米基·斯皮兰和伊恩·佛莱明(这两位作家著作的销售量大得惊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作家,那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书中的男主角都是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典范,这些主角的冒险活动包括性犯罪,常常被置于反对国内外颠覆力量这一殊死搏斗的背景下,那同样也是愚蠢的。正如人们在谈到斯皮兰作品的反共产主义时所说的:“它被融入小说的臆想网中,任何有不同想法的人,要么是叛逆,要么是天真至极。”^④这种原始的“大众意识”并未渗透到整个“大众文化”领域;但它通过绝大多数媒介渗透到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中。当然,其他“大众文化”没有怎么受到反意识形态题材的渗透。整

① L. 洛温撒尔:《从历史的角度看大众文化》,载卢森堡与怀特合编:《大众文化,美国的大众艺术》,第50页。

② 梅诺:《关于意大利统治阶级的报告》,第192页。

③ R. 威廉斯:《英国电视》,载《社会问题杂志》,1962年,第18卷,第2期第11页。关于稍早时期英国男性杂志保守价值观的典型分析,见G. 奥韦尔“男性周刊”,载《论文集》,1962年。

④ S. 霍尔和P. 惠耐尔:《大众艺术》,1964年版,第148页。

个说来,詹姆士·邦德那样的左翼分子和革命者寥寥无几。这也许是作品的风格使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气候肯定不适宜产生这样的人物。

二

大众媒介有助于产生政治气候的性质是由对大众媒介压力最大的力量决定的。这样的力量不止一个,他们都起保守的和与习惯一致的作用。

第一种同时也是最明显的力量来自对“精神生产手段”的占有和控制。除了国家所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其他传播手段外,大众媒介绝大多数由私人控制(美国的绝大多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是这样)。而且,这些机构集中于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所控制的私人领域。尤其是,大众媒介不仅是一般的实业,而且是大型实业。高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所有企业明显的特点,大众媒介也很明显:凡是私人拥有的报业、杂志、书刊出版、电影、剧院,还有电台和电视台,都日益由为数不多、并且数量越来越少的大企业所占有和控制,这些大企业在不同的媒介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其他领域都有共同的利益。有人曾经指出:“赫斯特*帝国拥有12家报纸,14种期刊,3个电视台,6个广播电台,1个通讯社,1个图片服务部,1个故事片辛迪加和阿凡牌纸面本厂。”同样,“《时代》周刊有限公司除杂志外,还拥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书刊俱乐部、造纸厂、林场、油井、地产。”^①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集中:例如,仅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帝国就控制德国40%以上的报纸和

* 赫斯特,家族名,系美国的一个报业集团。——译者

① G.W. 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67年版,第81页。

期刊,柏林近80%的报纸。至于电影,有人认为,“在英国,电影的发行实际上依赖于经营巡回上映电影的两家公司,由于电影一般只有当发行有保证时才能获得资助,这意味着两家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电影的制作和题材。”^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或其他领域目前的利益集团很容易控制大众媒介中事业新的发展。霍尔先生和惠耐尔先生在谈到英国商业电视时指出:“商业电视不是落入新手之中,而是增强了那些已控制电视者的力量。一半以上的商业电视资源分别由报社、电影业和戏剧业占有。”^②

更明显的是,那些占有和控制资本主义大众媒介的人,他们的思想极可能是保守的,甚至是完全反动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在
229 报业中,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影响是迅速和直接的。更明确地说,报纸业主不仅常常拥有报纸,而且还密切控制报纸的编辑和政治方针,并通过经常性的甚至每时每刻的干预,把报纸变成表达个人观点的工具。^③ 人们评论说,在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报纸帝国,“他像一个君主那样经营他的报纸。他否认对报纸有任何严格的思想控制,当然这种控制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正式化。不过,斯普林格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观念的人。他有一种使命感,是一名极为虔诚好战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也许不公开指导自己的报

① A. 亨特:《电影》,载 D. 汤普森编:《歧视与大众文化》,1964年版,第101页。

② 霍尔和惠耐尔:《大众艺术》,第343页。英国商业电视的主要提倡者之一诺曼·柯林斯描写这一过程如下:“观众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享有尽力表现多年来一直管理国家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和报纸的共同经历的服务。独立电视的财政利益涉及广泛的领域,这也是健康和符合民主的。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工业、新闻和娱乐部门能参与独立电视”(上引书,第344页)。在这方面的投机对参与者无疑是有利的:它是“民主的”,尽管它不够明显。

③ 正如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皇家新闻委员会的,“我经营报纸,主要是为了进行宣传,除此没有其他动机。”引自 R. W. 哈钦斯:《自由、教育和基金》,1956年版,第62页。

纸,但他的思想深深地渗透于其中。”^① 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报纸业主也是如此。有了占有权,也就有了宣传权,凡是行使这种宣传权的报纸,它最可能通过积极的主张,或删除业主认为不宜发表的文章,为保守的偏见服务。在自由企业体系中,审查制度不纯粹是国家的特权。无疑,与国家审查制度不同,私人审查制度也不是绝对的。但凡是不易获得其他报纸消息和观点来源的地方,如美国的许多城镇,城市和地区,^② 还有其他地区,^③ 尤其是在其他的媒介如广播电台和电视也在同一业主占有和控制下的地区,这种审查制度都十分有效。美国的情况就常常如此。^④

尽管如此,那些拥有和完全控制大众媒介的人并不总是寻求对他们的产品行使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常编辑、记者、制片人、经理等享有很大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自行其是。不过,业主的思想 230 确实倾向于“向下渗透”,为那些替商业媒介而工作的人提供不能忽视的广泛的政治结构。这些人也许不会被要求尽量不要冒犯保守党牛栏里的神牛。但至少被期望不要伤害雇主的保守倾向,并且对自由企业、劳资冲突、工会、左翼党派及其运动、冷战、革命运动、美国在世界的作用等问题采取与雇主合作的态度。这种结构不要求完全顺从,只要求基本顺从。这为使持不同政见者有时甚至是使与其主张相去甚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变得温和提供了机会。

① 《泰晤士报》,1968年4月15日。

② “在这个国家所有有日报的城市中,只有6%的城市有2张以上的日报。”(W. 施拉姆,“报纸的发展”,载C.S. 斯登堡编:《大众媒介与信息》,1966年版,第51页。这些数字指1953—1954年。

③ 例如已经有作者指出,在法国“外省有三十几个地区的居民只能拥有一张报纸”。(戈盖尔和格罗泽:《法国的政治》,1964年,第157页。)

④ 关于美国富人使用电视和电台从事反共产主义和其他有关的目的,见柯克:《急进分子》,载《民族》周刊,1962年6月30日。

1957年,纽约《邮报》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先生对美国新闻作了一番评论,因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仍有长篇引用的必要。

[他说]美国新闻界主要由规定美国政治辩论原则的共和党人控制和经营。我在这里故意用“规定”这一名词。

我知道,较之共产主义或法西斯国家,美国的新闻要自由得多,但它也不是毫无挑剔之处。美国的新闻业普遍变得温文尔雅,惟利是图和自以为是;除一些特殊情况外,它主要表达深沟壕筑的富人的偏见和先入之见,而不是表达同我们最崇高的新闻工作传统相联系的深入的探究和反叛精神这些特质。

这个新闻界对给予政治家财政资助的大亨的征税权的关心,普遍超过对任何受压迫者的照顾和安慰。

这个新闻界伪善地夸耀自己的独立以及敢做共和党业主所诅咒的事。这个新闻界常被视作公共托拉斯,而不是私人的游乐场。

这个新闻界在同匈牙利共产主义暴政作斗争时比为美国的自由而战还要直率和坚决。^①

231 除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一些特殊情况外,^② 这些非难也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业。

对报纸和其他媒介产生的第二个传统和保守的压力是由广告商而不是所有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操纵的。我们无须夸大大广告商对商业媒介的直接政治影响。这种广告商只是偶尔地或者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支配他们客户的媒

① 引自J.E.杰拉尔德:《新闻的社会责任感》,1963年版,第108页。正如罗伯特·哈钦斯指出的,“当然,只要新闻是一个大的实业,只要有钱人仍然感到站在共和党一边比较安全,我们就会有一党报纸。”(哈钦斯:《自由、教育和基金》,第61页。)

② 例如,《世界报》提供了一份真正重要的报纸看来都有的每天的实际情况。

介内容和政策。然而,他们的关照对媒介的财政生存能力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报纸在某些情况下(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还有杂志、商业电台和电视台能否存在的问题。这一事实也许只是加强了这些媒介在与这种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打交道时特别谨小慎微这一普遍倾向。但这一点不是毫无用处,因为它向实业利益集团进一步保证:它们将得到富有同情心的理解;“实业界”至少享有劳工和工会很少享有的自由;而他们的不快则丝毫不会造成任何后果。

我们在上一章谈到,同其他任何利益集团相比,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之所以在公共关系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种资源也被用来“软化”特定的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界,使它以尽可能好的看法进一步帮助实业利益集团。

梅诺教授曾经指出,意大利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绝大部分新闻界实施的控制,使新闻界对这些利益集团的“纲领和偏见”极其“温顺”。^① 有人认为,“在法国,金钱对新闻的控制更多地表现在种种禁忌,表现在对某些不许涉及的主题的禁忌,而不是在于对一些必须宣传的东西作出硬性的规定。”^② 各个国家和各种报纸对此的强调必然各不相同。但不管实业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是大是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压力,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反对实业”对报纸和杂志的财政总是极为不利的。毫不奇怪,甚至当极左派的机关报发行量很大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也不能指望从实业那里^③

① 梅诺:《关于意大利统治阶级的报告》,第192页。

② 戈盖尔与格罗泽:《法国的政治》,第156页。

③ 同最大最有影响的独立报纸相比,意大利共产党报纸财政拮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发行量不足,而是缺乏有偿广告,《La Stampa》用45%的版面登载广告和其它有偿声明,而《L'Unità》用于这方面的版面只占6%。(S. 帕辛革利:《意大利——政治财政的比较研究》,载《政治学期刊》,第722页。)

或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广告收入。^①

对大众媒介产生的第三个压力因素，一般来自政府和国家体系的其他各个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这种压力一般不等于强制性的命令。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是实际的。

首先，政府，各部和其他官僚机构，现在更详尽系统地把向报纸、电视和电视台提供对官方政策的解释（自然有辩解性和倾向性）当作自己的任务。换句话说，国家现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管理”，尤其是当它遇到威胁和危机时，而这种威胁和危机对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几乎一直是存在的；危机越大，信息的管理、封锁、欺骗性的报道和明显说谎就越有意义。此外，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尤其是对海外文化的管理，其范围越来越广泛，并用教育和文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战后，美国在这方面花的功夫最大。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努力，使“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② 具有全新的规模。应该指出，正如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的活动所表明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忽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就报纸而言，政府和国家体系的其他机构在试图管制消息时，可能会使用各种压力，哄骗，^③甚至威胁，^④ 这也许多多少少有点效果。但总的来说，它们被迫主要依赖出版商，编辑和记者的合作

① 工党政府有意不在共产党的《晨星》上登载广告，致使政府在对一份极左派报纸实行处罚的同时，却把大量津贴给予对该报批评最严厉的右派批评家的报纸。

② 见《非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协会年鉴》，第356卷，1964年版。

③ 在西德有时直接进行哄骗：“在财政大臣的预算中，有一笔1300万西德马克的秘密基金，部分用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和期刊，部分用于比较体面的目的。”（V. 迪尤伯和G. 布朗撒尔：《西德——政治财政比较研究》，载《政治期刊》，第774页。）

④ 例如德国政府试图压制爱挑剔的《镜报》。见O. 柯克海姆和C. 门杰斯的文章《东德新闻是自由的吗？以“镜报案”为例》。见G.M. 卡特和A.F. 韦斯汀：《欧洲政治》，1965年版。

与善意。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合作与善意不难获得,因为广泛地说,绝大多数报纸倾向于同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政府持相同的国家利益观。在报纸不顺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时,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报纸也是独立的机构,尽管它有缺陷,但报纸的独立性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事实。

另一方面,公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则是“官方”机构,它们比报纸更易受到各种“官方”的压力。和在英国一样,这些电台和电视台也可能享有对政府的高度独立性和自主权,然而,他们仍然脱离不了官方的影响。按官方的旨意行事,这保证这些媒介在政治和一般意识方面扮演一个顺从者而不是批评者的角色。这虽不能使政府和官方政策不受批评和攻击,但使批评和攻击保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贝尔福勋爵对上院的评论认为,不管保守党还是工党在位,占上风的一般都是顺从的观点。正如约翰·里思在总罢工时以 BBC(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的身分写给首相的:“鉴于 BBC 是为了人民,政府也是为了人民,因此,在这次危机中, BBC 也必须为政府讲话。”^①自那以后,事态也许有所变化,但没有像人们常常认为的,或者像 BBC 是独立和自主的机构这一概念所表明的那样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斯图亚特·胡德先生在谈到最近几年的 BBC 电视时指出, BBC 将要制作什么节目,这要看“什么能作为节目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什么是合适的得体的,什么是可以允许的和不允许的,这种时代精神逐渐被那些与节目制作有关的人所接受。”^②这种“节目时代精神”在与舆论一致时比与舆论不一致时更可能引起争论。凡是节目一贯或好像一贯反对当权派的,

① J. W. C. 里思:《在风暴中》,1949年版,第108页

② S. 胡德:《电视概览》,1967年版,第50页。

官方就会有效地施加压力,它不一定来自政府本身,而是来自 BBC 董事会(独立电视管理局)这样的团体。后者都是当权派,不管是保守党的、自由党的、工党的还是“非政治的”。^① 因此,BBC 的总监本人“有责任”将《过去一周》这样明显具有讽刺性的栏目从屏幕上删掉。但正如胡德先生也指出的,“任何了解当时董事感情力量的人都不会怀疑,总监如果要保住自己的职务,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TW3 不乏不敬之处,但它力戒任何政治义务。事实上,它主要是围绕任何这样的义务都是老玩意儿^③ 这一概念制作的。可以推测,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它也许不会延续这么久。

总的说来,政府和官方对大众媒介的压力不仅确实存在并且很大,而且不管政府和国家精英一般的政治和思想色彩如何,这些压力都加强了已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保守主义和顺从的趋势。

然而,到目前为止,用私人的和公共的压力来解释大众媒介的特征和作用,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表明,那些对大众媒介的内容负有实际责任的人,如制片人、编辑、记者、作家、评论家、导演、剧作家等,都是保守力量和商业力量无可奈何的工具;他们是受抑制的叛逆者,被恐吓住的激进派和左翼分子,是他们所憎恨的思想和舆论被迫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资本主义束缚强制下的忿怒的持异议者。

① BBC 管理体制的最高层是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由 9 名有才干和地位的男女知名人士构成。一般说来,他们代表英国社会的上层,也就是说,英国的“当权派”相当于美国的“权力精英”。政府不刻意任命工会或工人阶级出身的董事,董事会成员很少从事过广播报刊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工作。”(B. 波路:《转变中的英国广播》,1961 年,第 17 页。)关于 BBC 董事会和“文化理事会”在 50 年代的阶级构成,见古兹曼:《英国的政治精英》,第 342 页以下。

② 胡德:《电视概览》,第 49 页。

③ 原文为法文。

这种描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在大众媒介工作或为大众媒介服务,他们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挫折;他们寻求突破正统的禁锢,有时他们成功了,但更多的是失败了。不过很少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人构成大众媒介所雇用的“文化工人”的多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政治支配权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对那些为大众媒介工作的人的思想倾向进行真实的描述,可以将他们分成三个广义的类型:属于各种左翼阵线的人士;多少具有强烈保守观的人;第三个团体,可能也是人数最多的,他们的政治观相当模糊,他们希望避免“麻烦”。实际上,这些人属于顺从者谱系中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能比较容易地适应他们雇主的要求。与其承担义务的保守同事一样,他们绝大多数能“畅所欲言”²³⁶;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雇主多半喜欢他们所说的,至少在他们所说的话中挑剔不出什么。这些“文化工人”不太可能遇到盛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强加给大众媒介的各种限制和压制的麻烦,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构成一般地不会使他们起而反对这些限制。他们所受束缚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完全可以让他们享有所希望的行动自由。因此,他们不感到紧张,或感到无法生活下去。

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特征和作用并无不可思议之处。不管这些媒介履行功能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如何,它们主要都是传播将加强而不是削弱现政权和特殊模式的思想 and 价值观的手段,因而是阶级统治武库中的武器。如果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那将是一种误解和不可思议的。他们能够并且有时确实扮演“功能紊乱”的角色。但它们被允许这样做的事实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这在特定的条件下,非常明显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它们的主要作用。它们被期望履行保守的功能,事实上它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并不表明,对大众媒介的控制以及“对偏见的动员”能保证保守派别在选区竞选中获胜,或有效地保证意识形态的和谐。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提到,在1966年的英国大选中,只有一张报纸即《星期日市民》(发行量23.2万份)“完全站在即将下台的政府(即工党政府)一边,而其他报纸(发行量3800万份)基本上对工党政府持批评意见。”^①这些数字倾向于给人以绝大多数报纸特别信任保守党的虚假印象。但实际情况仍然是,当时的报纸普遍具有反对工党的倾向。不过,这并不妨碍工党政府将它的议会多数从6人增加到100人。人们同样常常指出,美国的绝大多数报纸倾向于共和党,尽管如此,民主党在选举中并未因此受很大的影响。再者,戴高乐派对法国电视的控制以及法国大量报纸所持的偏见,并未妨碍反对派在一系列选举中获得巨大的成功,^②就像法国的大多数报纸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偏见,并未妨碍共产党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一样;这样的观点甚至更适用于意大利共产党。大众媒介并不能自动地把选票送给保守党的阵营。

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范畴,认为不顺从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最终会围着电视天线转,这也是不现实的。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文章中,拉扎斯菲尔德教授和默顿教授提到了大众媒介的“麻醉性功能紊乱”。^③他们解释,他们之所以说“功能紊乱”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的,“即大量的人口对政治冷淡和麻木不仁,不利于现代复杂社会”。^④这种假说言过其实。因为不管“现代复杂社会的利

① 《新政治家》,1966年3月25日

② 见R. 雷蒙德和C. 诺伊施旺德:《电视与政治行为》,载《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63年,第13卷。

③ 《大众信息、大众爱好与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第464页。

④ 同上书,第464页。

益”是什么,大量的人口对政治冷漠和漠不关心,特别是对这些阶级政治有害的问题漠不关心,肯定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由于大众媒介的目的可能是“麻醉性”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它们的效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事实上,它的影响同人们想像的也许正好相反。美国电视每天对越南大屠杀的报道,当然不是想唤起人们对美国干预越南的反感。但它在使人们看到美国在越南所犯的罪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加强了反对战争的运动。同样,在最近几年,电视也展示了国际上警察反对示威者的模式,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使成千上万人看到了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当局”常常感到窘困不堪。

然而,这并非电视台的本意。胡德先生也指出:“广播电台在处理有争论的问题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观众基本上倾向于寻求通过传媒证实他们自己所持强硬态度。”他指出:“这种普遍法则适用于政治层次的各个部分,不管观众拥有的态度强硬与否,激进还是保守的。”^① 这是相当天真的。尽管“普遍法则”很适用,但重要之处在于,在不计其数的公共和商业电视观众中^②,坚定的持保守见解的观众远远超过坚定的持“激进”见解的观众。就“激进”一词的严肃含义而言,它起一种持久的告诫作用。

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即使这话是真的,即“我们通常所知足的,如大众传媒所标榜的,它们在确认和加强现有观点方面比在改变现存观点方面更重要”,^③ 这对现存秩序仍然有很大好处,因为电视的目的肯定是要阻止主要在传统气氛中形成的“现存观

① 胡德:《电视概览》,第63页。

② “盛传商业电视的诞生使英国电视产生了一种傲慢的、不分阶级的和不屑一顾的精神。在独立电视管理局(ITA)的领导下,商业电视比BBC更受现政权的束缚,更顺从,更保守,更缺乏冒险性。”(上引书,第62页)。

③ L. 爱泼斯坦:《西方民主中的政党》,1967年版,第237页。

点”发生激进的转变。大众媒介不能保证完全保守的和谐；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一点。但它们能够并且确实有利于顺从气氛的形成，也就是说，不用全面镇压的方法，而是将与大众媒介不一致的观点当作奇怪的异端，或甚至更有效的，把它们当作任何认真和理智的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的奇谈怪论。这是非常合乎“功能”的。

三

239 不管人们关于大众媒介及其偏见的实际政治影响的争议有多大，不管它们是否有什么明显的偏见，没有人会否认大众媒介与政治有关，它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过程中起某种作用。但对教育在这些社会的性质人们却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相反，人们关于教育的最普遍最强烈的观点是，“政治在教育中没有地位”；任何政治灌输都将并且实际上也是与西方式制度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相悖的。

然而，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无论是教育实践还是教育理论，都不是如此明确的。

同大众媒介相比，在教育方面更有必要区分狭窄的、明确的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灌输与广泛的、一般的和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概念。关于前者，人们可能很容易认为，学校和教师一般说来（尽管不总是）试图避免过分的政党偏见和依附，也就是在政治上坚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另一方面，在第二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学校或许会也许不会有意识地致力于“政治社会化”，但在任何情况下，学校都无法避免“政治社会化”，尤其是它们对盛行的社会政治秩序高度“功能化”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各层次的教育机构大都履行重要的保守任务，在他们的社会并为他们的社会作为合法

的机构起或大或小的作用。

有一种学校公开履行这种功能并以此作为它的主要和宣称的目的之一。这些学校主要以特权阶级的儿童为对象,英国的公学即是著名的例子。有人评论道:“总之,维多利亚公学所灌输的态度和价值观几乎成了保守主义的代名词。”^①这种保守主义在过去几年在内容和侧重点上也许经历了变化,但偏见一直存在。和过去一样,今天的精英学校有意识地寻求把灌输保守哲学当作自己的职责,这种哲学的主题仍是传统、宗教、爱国主义、权威,等级制度和极度狭窄的民主观,至于明显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与目的就更不用说了。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学校的政治灌输过程也许有它的失败之处,但不乏这样的试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精英学校对许多不那末高贵的教育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英国,公学的目的和精神,甚至它的习惯和传统,常常被“普通的”语法学校模仿,被整个教育体系当作杰出的典范。

再者,直到不久前,公学仍不仅被当作教化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当作“大众”的学校。^②这种教育不止一个目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教育那些上学者驯服地接受一般来说注定要成为其基础的社会秩序。

只是随着劳工运动力量的增长,政治权力的扩张,重要工人阶级政党的兴起,“大众政治”的产生,以及民主和利他理论的迅速传播,学校才逐渐支持和宣传“民主公民”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与先前的“各司其职”的概念是相悖的。

① R. 威尔金森《英国公学的级长》,1964年版,第110页。

② D. V. 格拉斯:《教育》,载 M. 金斯伯格编:《20世纪英国的法律与舆论》,1959年版,第324页以下;H. 西尔弗:《大众教育概念》,1965年版。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不再是“政治社会化”和维护现状的机构,而是意味着它们在履行这一功能时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和直接,尽管效果不一定比从前逊色。

24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体制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可以说在三个层次进行,它们密切相关,但为了便于分析,将他们区分开来仍是有必要的。

第一、就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教育起着重要的阶级整合的作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把学校描写为“一种个人被训练成在动机和技巧上适于履行成年角色的机制……社会化功能也许可以归纳为个人义务感和能力的发展,这是他们在未来履行角色时的基本前提”^①。这一点其本身没有问题,但系统表达出来会在思想上产生困惑。因为这一词汇模糊了以下事实:对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他们学校“开发”(这个词在其实际内容中不乏讽刺意义)的“义务感和能力”是一些适合低技术工资工人“履行未来角色”的义务感和能力。对一些工人阶级儿童来说,学校显然是向上流动的手段:总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确实需要经常从这一层次中吸收或多或少受过训练的人员。然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学校在确认他们的阶级命运和地位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学校通过提供饥饿教育,通过遏止而不是“开发”同不利的环境因素相联系的进一步的教育机会,最有效地行使这种角色。一些工人阶级儿童能够逾越这些障碍的事实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观念,即那些不能克服这种障碍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胜任因而才命运不济;他们的处境是自己造成的。这样,教育体系至少在它的受害者中产生这样的印象,即社会上的不利实际是个人的、天生的、上帝给予的以及不可

^① T. 帕森斯:《作为社会体系的学校:它在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功能》,载哈尔西·弗拉德和安德森(合编):《教育、经济与社会》,第434—435页。

克服的无能造成的。正如两位法国作家指出的：“学校的法律权力 242 可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因为过分关注自己的命运而对实现自己的命运的途径毫无意识的失宠阶层，往往会因此产生上面的这种看法。”^① 不仅其他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奴役的事实证明一些人天生是奴隶；而且大量现代的奴隶也这样认为。他们还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囚犯，不是因为社会制度，而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第二个层次上，这种个人的不适合感得到以下事实的强有力支持，即对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儿童而言，教育实际上具有灌输异质文化、价值观甚至语言的倾向，^②这种教育与家庭和环境几乎完全脱节。一位作者写道：“英国教师已成为试图传播典型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理人。由于教育体系不是从社区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上面强加的，身处高位的那些人的价值观通常无意地被当作值得灌输的东西。”^③ 马格里特·米德在谈到美国时曾经指出，“当美国人听到‘学校教师’这一词时……他会想起教三、四年级的小学教师；这些教师通常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也许三十四、五岁，既不年轻，也不太老，她们负责灌输中产阶级世界的伦理和方式。”^④ 她又说：“在人浮于事的城市学校，教师教学生养成卫生和勤劳的习惯，为以后获得成功而勤奋学习，为成功作必要的牺牲，不受外界的直接刺激，以企业家的 243

① 布尔迪埃和帕斯朗：《继承者》，第117页。

② 关于这一点见 B. 伯恩斯坦：《决定感觉的一些社会学因素》，载《英国社会学杂志》，1958年，第9卷，第2期，以及《语言与社会阶级》，上引书，1960年，第11卷，第3期。两位法国作家也指出：“在集体劳动高度发展的年代，教育体系却仍然以个人的成功为中心，特别注意表达和抽象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身上是比较强的。”（博纳和布尔尼埃：《新知识分子》，第259页。）

③ P. W. 马斯格雷夫：《教育和社会学》，1965年版，第227页。

④ M. 米德：《美国文化中的学校》，1951年版，第5页。

方式或企业家同意的方式,克服任何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传统观念。”^①这种思想是要把工人阶级儿童“整合”到既定的社会中:那些“聪明”的人被帮助准备逃脱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其他人则被帮助接受他们的附属地位。

在第三个层次上,这种帮助倾向于采取相当强烈的思想和政治形式。教育体系不仅寻求灌输一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且还寻求灌输比较特别的既定社会观和世界观。迪尔凯姆曾经强调,社会必须通过教育传播“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社会化,他把对作为民主道德基础的理性、科学、思想和感情的尊重称之为“基本原则”。^②他无疑是对的。社会的确需要灌输“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原则”。然而问题是被普遍认为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价值观和原则是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认可的;而“民主道德”能比较容易地适应顺从的目的。

多尔教授在谈到日本时曾用“民族团结”和“阶级分裂”这样对立的词语,并且指出,“现代日本教育制度在某些方面已阻碍日本阶级意识的发展。”^③同样,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各国的教育方法、文化和传统不同。例如,马丁·迈耶先生在谈到美国的教育时曾经指出:“美国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宣扬种族优越感,坚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民。除非危机时,社会并不在意人们如何会作出这种断言,但这种断言肯定不是无稽之谈。”^④应该指出,作出这种断言并不需要教育部的教导和指示。较小的教育机构也在其中起作用,尤其是在危

① 米德:前引书,第25页

② E. 迪尔凯姆:《教育和社会学》,1922年版,第62页。

③ R. E. 沃德和 D. W. 拉斯陶(合编):《日本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1964年版,第119页。

④ 迈耶:《学校》,第48页。

机时期。^①甚至没有接到任何指示和训令,学校本身也愿意投入这种对爱国主义的赞美,不是反对而是捍卫“民主道德”,只是侧重点和强烈程度不同罢了。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维护资本主义政权方面,爱国主义是强有力的力量;学校则是传播爱国主义并将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化为每个人的思想的重要渠道。

人们特别强调的其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各国不尽相同。有人指出,“美国社会通过其学校传授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也就是各种资本主义[原文如此]常常宣称的自由企业体系。”^②在谈到意大利时,有人认为,意大利的教育制度

……保留了强烈的罗马天主教的倾向。在罗马公共教育部的高度集中管理之下,教育更多地被用来灌输合乎保守天主教甚至法西斯理论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灌输合乎天主教民主党左翼赞成的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采取新的态度这一中心思想。不用说,主要由亲天主教的教师构成的学校,决不可能成为极左派政治思想的滋生地。^③

尽管各国的侧重点和内容或许有所不同,但整个这段话适合于各国盛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其主要机制和价值观。学校也许不总是引导人们接受盛行的权力体系;但他们确实以各种分散和 245

① 罗伯特·哈钦斯从根据国家法律有权解除任何老师教职的中西部学校监察官致所有教师的信中引用如下的话:“国际共产主义对美国机制的威胁,使我们的学校有必要更多地强调研究美国民主的意义,重要性和价值。美国的教育家从没有重视灌输这种观念……美国的学校有必要向美国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民主……在我们目前这样混乱的世界,我们有必要使每一个年轻人知道,美国的民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形式,我们有必要向他们说明,这种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他们必须知道,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这种经济制度造就了伟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由于这一制度维持和保护私有制,这个国家将变得越来越强。(《自由、教育与基金》,第110页。)

② R. J. 哈维格斯特和 B. L. 纽加顿:《社会与教育》1957年版,第146页。(方括号内文字由本书作者所加)

③ 拉帕罗姆巴拉:《意大利政治中的利益集团》,第68页。

具体的方式传授现存的权力体系。当然,这种模式在各地有例外的情况。不过,它们只是总的顺从这一模式的例外。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所有教育体系中,不管是集中的还是非集中的,那些负责任命教师和校长的人,通常都注意避免任命可能引起“争议”的老师,尤其是不任用这样的校长。这不仅涉及政治,而且肯定包含“有争议”的政治观,尤其是强烈的左翼政治观。

受这一点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

……自 1945 年以来,几个州通过法律,要求不任用共产党员或被首席检查官认为具有颠覆性的组织的成员。这种要求的一个后果是阻止了一些拥有颠覆性政治观点的人从事教学活动。另一个后果是防止许多其政治和经济观在几年前或几年后被认为既不是颠覆性的,也不是危险的,而仅仅是受欢迎和不顺从者从事教育活动。^①

不管这种偏见是否成为定式,程度如何,它自然并且不可避免地不利于其观点和态度与盛行的模式不一致的人;知道和怀疑社会上存在这种偏见并且知道这可能会影响前途,其本身就足以促使人们避免冒犯最高当局或引起它不快的观点及活动。这种诱导常遭到正当抵制。但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教师一般来说比其他男女更不受其影响。

四

246 鉴于本章的内容,我们也应该注意大学。当然,中学与大学之间有许多明显和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大众媒介与大学的差异了。

^① 哈维格斯特和纽加顿:《社会和教育》,第 267 页。

但它们在合法化过程方面的相似性比许多大学教师乐于承认的或者比许多人可能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因为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以各种方式起重要的作用。这不是大学的主要功能,就像它也不是中学和大众媒介的明确功能一样。但它们确实履行这种功能,尽管其广度或成功的程度不尽相同。如此强调有其必要性,因为有关“大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所说和所写的一切模糊了这一事实。它们履行这样的功能部分是因为它们受到外部的压力 and 影响;部分地也是因为它们独立于这些压力。

除了一些私立高等学术机构,尤其是美国的私立高等学术机构外,各大学在从事主要活动即教学和科研活动时,主要依赖国家提供的资助。对这一事实人们没有争议,实际上这也是人们的共识。这种事实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国家在大学使用分配给它的基金的方式上直接或间接地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克拉克·克尔教授在谈到美国时指出,1960年,“美国高等学校从联邦和政府那里获得了15亿[美元]的资助。在20年中增加了一百倍。”^①他进一步指出,“显然,大学从事研究的形式和性质常常受联邦资助的影响。”^②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军事与工业关系”的告别演讲中甚至认为,“历来就是自由思想和科学发现源泉的自主的大学,其研究方式经历了革命。部分由于有关研究的开支庞大,政府的合同实际上成了引导对知识好奇心的标尺。”^③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大。更合适的说法是,一般说来,政府的合同和捐助倾向 247 于在一些领域比在另一些领域更多地引导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尤其是在“防务”领域。这一点也完全适合其他国家的大学;现在每

① 克拉克·克尔:《大学的作用》,1963年版,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53页。

③ 引自柯克:《好战之国》,第3页。

个国家在决定大学如何教学和如何研究时起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各大学则可能在“服务于社会”方面起作用。因此,不仅政府而且英国大学基金委员会也比过去起更积极的作用,它把以下内容作为自己的任务:“同各大学和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协商;准备和实施大学发展这样的计划,以保证这些计划充分适应国家的需要。”^① 这意味着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干涉和指导的程度可能有所增长。

但当这种发展不可避免时甚至在一些有限的方面被认为令人满意时,在它产生的特定背景下,一些拥护国家干预的人具有忽视其重要内容的倾向^②。克拉克·克尔教授也指出,“大学已成为实现国家意图的主要工具;”^③ 前奥尔良大学校长也附和说,大学“与国防是对民族前途最基本的使命负责的集体,并且越来越与国防合成一体”。^④ 但大学成为实现“国家意向”和“使命”的主要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学自然无所作为。换句文雅一点的话来说,它们所服务的是异己的目的,也就是国家的目的。它们不仅服务于国家;而且它们通过服务于国家,把自己等同于国家,并且承认国家是合法的值得支持的。

各大学及其发言人常常回避这样的明确义务。罗宾斯勋爵1964年在格廷根召开的欧洲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联席会议的演说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一种共识。他说,大学的义务是

……培养社会按照后果而不是按照范畴进行判断的习

① W. 曼斯菲尔德·库珀:《英国的变化》,载曼氏及其他人:《政府与大学》,1966年版,第7页。

② 见 R. O. 伯达尔:《对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再认识》,载 P. 哈默斯(主编):《英国大学教育的社会学研究》,1963年版。

③ 克尔:《大学的作用》,第87页。

④ G. 安托瓦纳和 J. C. 帕斯隆:《大学改革》,1966年版,第25页。(着重号为密里本德所加。)

惯。我们必须根据对人类幸福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先前即存在的、与这一种或那一种先验伦理一致的分类来判断行动的价值。我们必须教育他们哪怕天塌下来也要行使正义这句来自人类童年的格言;在任何文明的判断中,天塌下来是我们断定一些行动过程是否正当之前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后果。^①

但罗宾斯勋爵所说的“文明的判断”似乎更可能被人们用保守的方式而不是异端的方式来解释。整个说来,大学作为一种机制很少拒绝服务于国家限定的“国家意向”,它们很容易按照自己宣布的理想将它所接受的目标理性化。从这一观点来看,那种认为大学与其他一些人们在其中工作的处所不同,它是异端的中心的概念是一种神话。大学(包括它的绝大多数教师)特别是在全国发生大的危机并且涉及到严重的道德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对职员和学生中的异端分子采取不赞成的看法,他们常常帮助国家对此进行镇压。正如麦基弗教授指出的,“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教育者明显激进’这一指责。相反,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教育在整个地倾向于保守势力一边。”^②这不是低估少数派有时是相当多的少数派的作用。正如美国少数派分子对待越南战争问题一样,有时少数派也拒绝把自己等同于由国家限定的“国家意向”。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的少数派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占的比例都大。随着高等教育扩大到足以满足经济体系的需要,高等教育中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教师以坚持“哪怕天塌下来也要行使正义”为自己的使命,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同不公正的社会和表达这种不公正的国家格格不入。然而,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大学教师依然发现不大困难或没有任何困难将他们的使命同对“国家意向”的支持一致起来,

① 罗宾斯勋爵:《现代世界的大学》,1966年版,第15页。着重号原文即有。

② R. 麦基弗:《我们时代的学术自由》,1955年版,第132页。

而不管这一目的是什么。^①事实上,美国许多大学教师不仅愿意而且急于用自己的技术为他们政府实行的任何政策服务。正如里斯曼教授曾指出的,“不管我们国家的多元传统和对国外的研究如何,美国绝大部分学者都愿意在全面战争时代应征入伍,并对国家完全忠诚。”^②在这方面,其他地区的大学教师同美国的大学教师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美国大学教师在最近几年有较多的机会。

这表明大学生活发生了另一种大的变化。不仅国家更多地介入了大学生活,而且同以前相比,大学教师同国家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鲍登勋爵在谈到美国时说道:

……专家充斥华盛顿,他们操纵科学政策委员会,充任总统本人和绝大多数部门首脑的顾问……大学本身是这种新机制的基本部分。这一体系依赖于政府、实业界和学术界之间人员的自由和经常的交换。^③

麦康内尔教授在引用这一段文字时作了十分合适的评论:

[他写到]在这种互换中,……大学似乎必然丧失了它们某些批评的特权以及对有争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自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像艾森豪威尔离职时的演讲一样警告说,工业与国防部的联盟可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巨大的作用。克尔校长还警告说,军事—工业—大学综合体危及大学的正直。^④

应该说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大学教师为公共政策的决策提供

250

① 关于最近几年美国社会科学家的道德和政治态度的研究,见 T. 罗斯扎克(主编):《持不同政见的大学教师》,1967年版;C. W. 米尔斯:《社会学构想》,1959年版;P. 拉扎斯菲尔德和小蒂勒斯:《学术思想:危机时代的社会科学家》,1958年版。

② D. 里斯曼:《美国教育的强制性和多样性》1956年版,第90页。

③ T. R. 麦康内尔:《政府与大学:比较研究》,见曼斯菲尔德·库珀等:《政府与大学》,第89—90页。

④ 同上书,第90页。

有用的资料,而是在业余时间或者说在一段时间进入政府部门充任职员。一些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批评权的大学教师没有卷入这种官场和权力世界。但对绝大多数大学教师来说,涉足官场至少可以使它们“了解”政府的问题并有助于他们对政府作出的“负责的”批评更像老于世故的辩解。这些人通常是资深的和著名的大学教师,我们不应低估他们对大学的思想 and 行为“官场化”的影响。

除国家外,对大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实业界。这有许多原因。首先,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现在作为被征求意见者和顾问进入实业界;如同那些与国家有关联的大学教师可能被期望把对官方观点的“负责”性评论带进他们的大学一样,那些同实业界有密切关系的人也被期望在学术工作中旗帜鲜明地评价私人企业的价值和目的。和他们“官场化”的同事理解有关政府的问题一样,他们也最可能真实地表明对实业“问题”的“理解”。正如麦康内尔在提到这两者时指出的:

大学同政府和工业结成联盟的某些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些危险则是很微妙的。我相信,细致的研究将会表明,学术人员的价值观日益成为市场和政府活动领域的价值观,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大学教职员工长期流入官场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牺牲了人和人类的价值观。^①

第二,私营高等学术机构,尤其是美国的私营高等学术机构, 251 主要依赖于富裕实业家、其他富人以及社团企业的支持。但甚至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学也发现,来自实业界和统治阶级成员的捐助、赠款、基金也非常有用。私人给各大学的慷慨捐助一般地常常被当作大公司和富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充满生机”的明确证据。但不管怎样,只要这些捐款的实际和潜在接受者想获得

① 麦康内尔:前引书,第90—91页。

捐助,他们就不可能对提供捐助者或使捐助成为可能的活动持批评性的独立态度。因此,实业学校主要由实业家提供捐助,它们的教师同实业界有密切的和真心真意的关系,这种学校不会做许多有害私人企业的事,哪怕这种捐助连影子都没有。同样,由实业发起和提供资助的大学研究计划,最可能在“实业团体”的前提和价值观框架内进行;它同样不可能引起发起者的某些不快。

第三,那些思想倾向不可能偏向激进主义的实业家和其他“实业团体的领导人”,支配着最终控制大学的评议员、学监和董事会。在谈到美国时人们经常提到的这一点对于其他普通董事在高等学术机构中起作用的体系也同样有效。麦基弗教授在谈到美国时指出,“在非政府机构中,典型的委员会成员同大量的实业家、银行家、制造商、企业管理人员、著名律师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跻身高收入阶层。”^① 1947年出版的一个较早的研究成果也指出,在252 30所著名大学的734名理事中,“知识界与业主、经理和官员各占一半”。在后一部分中,以“银行家、经纪人、财政家”与“制造商和管理人员”占的比例最大。在自由职业团体中,律师和法官最多,教士次之。^② 就所知的政党偏见而言,61%是共和党人,35%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在整个团体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要高些。^③ 这一研究是以1934—1935年的资料为基础的。但正如多姆霍夫教授最近指出的,^④ “没有理由认为,在随后的年月权力精英的成员对著名大学的支配会有所减少。”

这种“支配”产生的对大学生活的实际控制程度在各个大学无疑有很大不同,但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正规的支配。不过,常常不

① 麦基弗:《我们时代的学术自由》,第78页。

② H. P. 贝克:《控制我们大学的人》,1947年版,第51页以下各页。

③ 同上书,第103页。

④ 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第79页。

是这种正规的支配。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控制的程度如何,非专业董事几乎肯定产生保守的影响,并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以增强大学的顺从倾向^①。

再者,由于大学校长,行政官员和教师易受其他“外部”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可能鼓励上面提到的趋势。用麦基弗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大学,甚至我们的中学,都是引起大量抗议、指责和控诉的对象。”^②他或许还可以说,这种抗议、指责和控诉很少以大学太保守这一观点为根据,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正是由于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自由主义和“宽厚”的态度,大学当局才受到新闻界和其他各种保守势力的攻击——这种情况不只在美国存在。

253

第四,除了实业家的影响外,公司企业的发展也对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尔布雷思教授曾经评述说:“当然,现代高等教育广泛地适合工业制度的需要。”^③威廉·怀特先生证实了这种“适合”的一个方面。他提到这样的事实:在美国1954至1955年毕业的学生中,最大的一部分(19.4%)研究实业和商业,超过学基础科学和人文艺术的人数总和(也超过学法律、医学和宗教……之和)。^④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业的研究在大学中还没有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工业管理系、工业关系学系、商学院之类的增长表明,至少已为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种类型的研究的一个特征很少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这就

① 美国的一位著名教育家于1930年写道:“我认为,他们间接的,主要是无意识的影响可能常常是很大的……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他们开创了谨小慎微的气氛,这对关键性的任命和提升不无影响。”(A. 弗莱克斯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1930年版,第180页,载贝克:《控制我们大学的人》,第34页。)这在那些年以后仍是如此。

② 麦基弗:《我们时代的学术自由》,第62页。

③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第370—371页。

④ 小威廉·怀特:《有组织的人们》,1956年版,第88页(着重号原书即有);同时可见第8章“实业对教育的影响”。

是,这种研究为其学生提供的不仅是“管理技术”和其他相应技术的训练,而且还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思想、价值观和目的的训练。那些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如教师和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那种被认为是大学活动所特有的知识研究;但他们也是财神崇拜的信徒。

在其他方面,大学也使自己“适应”实业的要求。怀特先生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实业的要求也影响大学,他们在选择学生和给予奖学金时总是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人。一位负责招生的院长告诉我,在筛选来自中学的入学申请表时不仅要考虑大学需要怎样的人,而且也要考虑4年后什么团体需要这样的人。”^①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方面,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要落后些。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各大学及其学生不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正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实业的要求。

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的作用。在任用大学教师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确实仍拥有广泛正式和实际的自主权,只不过不是绝对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是在深深地影响各大学的特定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实行的。这不是说,大学当局和教师是外部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在行使这种自主权时不能冒犯现政权。有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只有部分大学当局和教师承认这种背景并以与这种背景相一致的方式行使自主权。这不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因此,在1961年对哈佛大学校友会发表的题为“学者的时代”的演讲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普西博士用下面的话为他的经济学系的同事和其他教师辩护:

是否任何人都可以严厉指责他们系的这些人和其他人破

^① 怀特:《有组织的人们》,第116页。

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如果注意一下美国大学在历史、管理、公共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设置的课程以及它们在实业方面的深远努力，这些几乎完全是为了使私人企业制度在极其困难的社会中继续有效和有益地活动，是否还会有人会指责美国的大学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呢？^①

有些人或许会发现，这种奴颜婢膝同大学有关的理想格格不入。但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它的表达与普西的思想和信念有不合拍的地方，或是普西没有真实地反映他的教师的思想。 255

这一点同大学的任用政策直接有关。在麦卡锡时代及其以后的时代，美国大学的悲剧不仅在于它们中有许多禁止雇用共产党员和其他“颠覆分子”，同样的而且甚至更大的悲剧还在于，这些大学绝大多数易于赞成“忠诚”的要求；那些未这样做的大学也利用任用教师方面的自主权和自由同样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如果已进入大学则将他们开除。在这方面，像哈钦斯这样开明和人道的大学管理者令人不快地踟躇不前并不是没有原因。一方面，“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歇斯底里和迷信的话，那么，大学中有令人信服和能干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人们也许会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很好地思考（原文如此），因而根据我作的限定，他不能充任大学社区成员。我承认这是由推测造成的”。但然后他又说，“我还必须加上一句，将推测当作无可辩驳的事实等于说任何与我意见相左的人都不会思想。”在寻求区分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即那些尽管“果断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少有独立思考的领域，但仍在这些领域活动的人）和坏成员（即不能证实他在教学和研究领域具有独立性的共产党员）后，哈钦斯博士接着说：

^① N. M. 普西：《学者的时代》，1963年版，第171页。必须强调，这是在1961年发表的讲话，而不是在麦卡锡时代。

我是否有胆量向我们的董事会推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的坏分子或其立场不受政党路线影响的优秀成员担任教师，事实上很值得怀疑。但如果万一这样的人的学术水平在我之上，并且只有他们有资格在某一特定的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我应该有胆量说，他们应得到任用，而不管他们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属性如何。^①

256 这种标准非常苛刻，事实上，这使哈钦斯博士几乎没有机会检验他的“胆量”。至少哈钦斯博士对此感到疑惧。许多与他处境相仿的人的行为表明，他们很少受到这种标准的约束。

但这不仅仅是在外部压力下有否“胆量”的问题。而且，它也是对某些非正统的知识或政治是否会自发地产生怀疑态度和敌对态度的问题。这一问题很容易理性化为真挚的信念：在“学术背景下”，这种非正统形式至少使人们对个人担任学术职务的能力特别是担任高等学术职务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一点在美国之外更是如此。例如，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家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荒唐的。他们不愿看到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系里任职，这并不是基于偏见这样世俗的原因，而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这样的人很难想像会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优秀的经济学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思想过程以及与此类似的思想过程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中司空见惯。它们并没有做出绝对禁止任用甚至禁止提升离经叛道的大学教师担任高级职务一类的事。但它们有助于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形成某种离经叛道的思想模式和政治义务模式很难得到鼓励

^① 哈钦斯：《自由、教育和基金》，1956年版，第158—159页（着重号为密尔本德所加）。但哈钦斯博士也遗憾地指出：“没有人会坚持所有教授必须是共和党人；看来，按这样的观点，应当要求他们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上引书，第153页。）

的气候。

大学从整体上说是极端顺从的机制,它们的绝大多数教师可能将自己的思想方式停留在盛行的一致意见的范围内,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履行教学功能的方式。

在上面引用过的谈话中,罗宾斯勋爵对欧洲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说:“我们的大学是自由社会的大学,没有什么比我们将成为灌输特定教条或教义的工具更与这种社会的精神相悖的。”^①但罗宾斯勋爵又说:“尽管如此,这个法则也有例外。自由社会有一条除非自己放弃否则不能摒弃的教义——自由教义本身。”^②

这话很对,但需作进一步考察。因为许多赞同这一教义的人都知道,自由主义包括甚至要求一些适于“自由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这自然导致人们对与之相反的思想采取极其消极的态度。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赞同自由主义并且也认为自由企业是自由社会的基本部分,他将会发现所有论述取消这种自由企业的社会理论都是令人讨厌的。按照这一观点,自由主义不一定会在赞同者中产生罗宾斯勋爵当作自由基本组成部分的“吹毛求疵的反对习惯”。^③总之,正是在自由的名义下,美国的许多大学才貌似极公正地采用任命的方式事实上逐出了某些类型的异端分子。罗兰夫人深切地悲叹:“自由啊,人们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恶啊!”,在这里可以改成:“自由啊,多少人借用你的名义也用民主的名义,为正统辩护啊”。

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学不是“传播教条和教义的工具”是正确的,这样说确实有某种重要意义,例如,一般说来,

① 罗宾斯:《现代世界的大学》,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不要求教师和学生服从任何特定政党或领导人的理论；争论一般不被压制并且事实上常常受到鼓励；同时也因为在最受人尊敬的大学机构中，学生们确实易于接受与绝大多数老师传授的相悖的观点和思想。

258 事实上，这些是大学生生活中值得称道和宝贵的特征。然而必须指出，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一领域，大学生活表明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多姿多彩，这丝毫不是小看它们。大学是知识、思想和政治分化的中心，它们的学生主要受旨在帮助接受与“传统智慧”一致，而不是与这种智慧离经叛道的思想、概念、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许多大学可能潜藏并使它们的学生接触每一种可以想见的思想潮流，但在各大学中，有些潮流总是比其他潮流更盛行。

然而，年轻男女在离开大学时确实比刚进入大学时更具有反叛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的大量学生引人注目地证实，作为社会化机构的大学有独特的缺陷。老师在教育学生们认识世界时是采用一种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强他们改变世界的倾向的方式。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决定摆脱他们的长者为他们编织的使其顺从的罗网，这种试图常常被挫败。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大学对顺从产生了很强的压力这一观点；大学确实残存着精英制度，这在那些倾向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阶层的大学生中滋生了远离从属阶级和同情上层阶级的感情，这不利于保持叛逆性。这种叛逆性会给前途带来麻烦，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工人阶级儿童本人或其父母要为此作出大的牺牲。甚至在大学上学时抵制这种压力或其他许多压力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强烈期望也会在许多毕业生中产生这样的感觉，即叛逆和不顺从是一种最好在将来才使用的奢侈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意义上的未来从未来到。相

反,安全地隐蔽在“现实世界”这个或那个地方的原有的叛逆者,以 259
解嘲和怀旧相夹的心理回顾自己年轻时的偏执。

大学在合法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许多方面同知识分子(当然,他们可能不全是大学教师,就像并不是所有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一样)在形成——不同于传播——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①这种幻想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像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这种对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功能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部分得到验证,该宣言说,“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时期……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③

自那以后,世界普遍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出现在“德雷福斯案件”时期,那时含有贬义以指谓在这个问题上拒绝采取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的人。^④此后,“知识分

①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译者

② 同上书,第53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译者

④ L. 博丹和J. 塔查德:《定义、统计和问题》,见《当代法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法国政治科学评论》,1959年,第9卷,第4期,第836页以下。

子”一词一直带有它当初的烙印，它不具有辩解的内涵，而是与异端分子这一含义联系在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运动和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大大有助于证实这种观点。绝大多数右派运动特有的强烈“反知识分子”偏见也有助于证实这种观点。

260 但这种把知识分子当作“天然的”异端分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视，它是由人们更多地看到异端知识分子产生的，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坚持以为自己是异端分子这一事实决定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甚至那些假民族主义之名猛烈抨击亲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的人，其本身也常常是知识分子。正如勒内·雷蒙德指出的，“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不应掩盖民族主义本身也有着明显的知识分子特征这一事实：民族主义之父都是些作家，如巴雷斯、莫拉斯等，民族主义就某一部分来说就是一种文学创造！”^① 这一点还可以更进一步引伸。不仅是知识分子他们形成和宣传各种保守主义意识的变体（这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可以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总是大大超过异端知识分子。历史上人们只记得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因此，这使人们容易忘记，迟至理性时代的法国，这些人不仅反对旧政权，而且也反对支持它的大量知识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如此。自然，可以使用重要思想影响手段的正是每一个旧政权的知识分子支持者。正如波特教授评述的，“按定义，那些在思想体系内比较强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传统主义者、旧知识阶层、思想家、保守派……空想家、叛逆或先驱他们发现自己多少有点被排除在传播媒介之外，要不就被描写为奇谈怪论者而处于被控制的地位”^②。

然而，知识分子对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贡献——用葛兰西的

① R. 雷蒙德：《知识分子和政治》，第 870 页。

② J. 波特：《各种层次人们的马赛克》，1966 年版，第 493 页。

话来说,他们是“合法化的专家”——除了直接和明显保守地为它辩护外,还采用了其他许多形式。

很明显,对资本主义体系威胁最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从属阶级中)认为,以社会至少占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手段为基础,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致力于消除特权和不平等权力的社会秩序,不仅可能,也是人们所想望的;“大众”在政治行动中也必然寻求表达这种信念。 261

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合法化过程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意识的传播。但是这一目的不仅在于坚持资本主义现状的各种优点,同时也要批评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的许多方面,然而反对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反对可能基于许多不同的理由: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无论怎么明显都可以在自身的范围内进行补救而无需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或是公共占有权不会自动带来民主和平等,这是事实,但说对他们的利益无须加以考虑,则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公共占有权同使“资本主义”概念本身显得陈旧的“工业体系”问题无关。

假如社会秩序的经济基础未产生问题,对社会秩序的批评不管怎么严厉对它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使争论和辩论变得充满活力但又不会引起危险,有助于“促进”因对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即对私人利益的追求支配着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而模糊和转移人们注意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在系统表达激进主义,在系统表达没有危险后果的批评,以及在为现政权直接辩解的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起着极度“功能化”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起这样的作用时极为真诚并且尚未意识到是在为它辩解,这一事实丝毫没有减少它的有用性。

五

262

合法化过程必须提到的最后一个方面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在其他所有方面的基础。这就是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恰恰由于它自身的存在程度,在本质上倾向于在从属阶级中同时也在其他阶级中生产出合法化的条件。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图示中所发生的正是相反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松懈,使无产阶级产生了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指出的: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①

自此以后,许多人嘲笑这些预言,认为显然被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归因于工人阶级没有起来反抗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许多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人士,用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文化霸权以及前者对后者制造的虚假意识来解释工人阶级没有反抗资本主义。事实上,正如本章和前一章坚持认为的,资本主义对精神生产手段的控制使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方面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然而,把合法化归因于资本主义改良能力的增强——这是极为相对的事——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机构的操纵和劝诱,使一些重要的后果无法解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译者

马克思本人偶尔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他在《资本论》中也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①实际上，这就是由这个制度本身的活动造成的“社会化”。合法化过程只是加强了它。 263

这种“自然的”从属关系没有极为明显地排斥改善产生这种关系的条件这一愿望。但它一般说来确实产生了可怕的心理障碍，使人们不愿完全废除这些条件。列宁在《怎么办？》的一个著名段落中写到：“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②他所说的就是这一意思。

一个简单但又重要的事实是，附属身分不总是但却常常造成对资本主义的有条件接受而不是完全排斥。1937年，乔治·奥威尔写道：“这种小的麻烦和侮辱、不时的等待，为别人做一切事是工人阶级生活所固有的。成千上万种势力迫使工人扮演消极的角色”。^③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人们津津乐道工人阶级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这种观察仍然是现实存在的。^④

再者，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他们不仅在物质再生产，而且还进行精神再生产，倾向于向他们的儿童灌输与他们的阶级相联系的意识、期望和心理习惯。在家庭所履行的所有社会化功能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功能化了”；因为在目前的背景下，它意味着工人阶级家庭倾向于用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孩子与自己的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05—806页（着重号是密里本德所加）。

② 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7页。

③ G. 奥威尔：《通往维根码头之路》，1937年版，第49页（着重号为原有的）

④ 关于最近欧洲有关工人阶级“听天由命”的论文的综合评述，见S. 赫克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载《国际社会主义期刊》，1965年，第2卷，第7期。

属地位相协调。正如现在更频繁发生的那样,甚至当工人阶级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寄予厚望时,他们所希望并力求的成功主要也是按照后者的要求将自己整合到这一体系更高的等级中。这大概也
264 导致他们试图说服自己的孩子,成功的途径不是与他们寻求进入的世界的价值观、偏见和思想方式相对抗。而是和它们取得一致。

简言之,工人阶级的条件本身就是工人阶级“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它为所有其他寻求促进这一过程的力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刻意努力的结果还是制度本身的压力,调和的力量确实起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的影响最终是咄咄逼人的,它们以后肯定不会再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或者它们预示了“单面的人”的到来。它们在阶级冲突的等式中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一些人希望这种冲突越大越好,另一些人则悲叹这种冲突太大,他们希望与“富足的社会”一起结束这种冲突,使工人阶级撤出战场,使战场上只剩下为数不多并且比较温顺的散兵游勇。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破坏平衡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也从根本上过高估计了它对付这些力量的能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现实图景不是和谐和稳定,而是危机和挑战。在下一章即最后一章,我们将讨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正在到来的年代中的特征。

第九章 改革和镇压

265

在本书中已经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事实是在这些社会中继续存在着私人的甚至更加集中的经济权力。作为其结果,拥有和控制这种权力的人在社会、政治制度和决定国家政策 and 行动时,有着巨大的优势。

人们听惯了长期占优势的意见,准确地说是假设,即所谓早已取得政治平等的国家,无论如何,它们在经济和社会上都是平等的,这只是这个时代十足的神话。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表面宣传,政治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生活无法和政治生活分开。就不平等的经济权力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规模和它的冲突来看,无论宪法是否讲明,它多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的不平等。

与此相似,国家在其中运行的资本主义广泛的不平等条件,在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政策和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些社会中的国家能够成为并且在事实上大多数已成为“民主的”社会秩序的代理人,对任何阶级或集团都没有固定的偏见;它有时表现的背离“公正”则应当被看作是背离其本质的偶然现象。但是,这也全然是一种错觉:在这些阶级社会中,国家首先并不可避免地是在这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的卫士和捍卫者。它的“真正的”意图及使命是确保它的连续统治地位而不是妨碍它。 266

然而,国家履行其作用的方式以及其倾向的表现程度,因时因地有很大不同。保持社会秩序使其具有阶级统治的特征,要求国家实行专制统治、镇压所有的反抗、废弃一切宪法的保护和政治自

由。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并非如此。除了某些特别例外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中阶级统治容忍广泛的文明和政治自由的;它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在文明社会的许多领域有助于缓和阶级统治的形式和内容。这种缓和的主要代理人便是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始终能以社会公仆的身分出现以及为什么它一直能得到广泛的接受。事实上,这种缓和作用并没有取消阶级的统治,甚至作为一种代价有助于保证这种统治。但是,这并不损害它对附属阶级的重要性。

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和政治自由,一直在严重地为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所限制;它们时常在实际上被破坏,特别在危机时期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宪法的保证也不能制止对少数人例如美国黑人不断的不公正的待遇和镇压;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市的市民享有的自由并不因为屈服于帝国主义占领的地区缺少自由而更显著;尽管它们口头民主和自由谈得天花乱坠,这些政府表明,为了保护肮脏的利益它们干尽了坏事。

然而,当人们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下公民和政治自由具有局限性和偶然性的特征,所有这些和更多情况时;当人们恰当地指出这些自由中有一些不过纯粹是给阶级统治脸上贴金时,真实情况便是,是其他许多东西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有价值的因素;而且它们实质上持续地影响着国家和市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如果有谁相信并宣布说,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不充分并持续不断地遭到侵蚀威胁,因此它们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是危险而混乱的。就它所有的巨大的局限性和伪善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和专制主义,特别是和已证明是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社会主义者批评“资产阶级自由”之处,不是(或

者说不应当是)它们无关紧要,而是它们极其不完善,需责备它们机能不全和有腐蚀作用,因此需要在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上进行激烈的改造以扩展它。

实际上,西方式政体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结构似乎适合先进资本主义的意图和需要,究竟能持续多久;不管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是不是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迄今一直能够适应它自己的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工作。

这就是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极其迫切地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问题,当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向许多左翼人士,而且也不仅向左翼人士,预示着“自由资本主义”在除了意大利和德国以外的许多国家中游荡的方向。在以后数十年中,这个问题被深深地埋葬在对西方民主、自由世界、福利国家、富裕社会、结束意识形态和多元均势论的庆祝声中。在几年以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恐怕除了是陈辞滥调外,看起来似乎是荒唐和不合时宜的。不管怎么评判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缺陷(这种倾向总是一片赞扬声,或者说更赞扬“后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它的“民主的”和“自由的基础能够保护它免遭挑战,最终免于左翼施加给它的威胁。

然而,在不久的过去那个一直频繁地提出的老问题,决不只是 268
再一次向左翼提出。没有谁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与它相伴随的政治体制日渐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感到惊奇。问题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向旧式的法西斯主义发展,还不如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比过去一个长时期更厉害的倾向的支配,而它对解决这些倾向时所表现的无能,使它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向已往宣判的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演进。

有很多理由用这种观点看待这些社会的政治前景。但是,由于无法避免的自相矛盾,最基本的要看其生产上的成就。由于经

济体制的物质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展示它对人类解放的宏伟诺言,这使得它在履行其诺言时的无能变得更加显眼明了,这并非新矛盾,只是在生产和技术进步中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它自己。

为了发挥他们的人的潜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在它的计划、经济合作、预先设计和理智地使用物质资源上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仍然首先要考虑拥有和控制它的资源的个人意图的经济体制限制下,不可能取得这一切成就。

与此相似并与此有关,这个社会要求其成员具有一种社会合作精神,一种真诚的介入和参与意识。这在一个私人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推动力的制度下,同样是难以实现的。可以永远这样说,工业是一种合伙关系,一种合作事业,一种社会冒险等等。它需要什么这是很明确的,然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使之不可能。“工业的两个方面”仍然是永久必然不相容的两个冲突的方面。实际上,在一种竞争的商业主义的毒气中前进的整个社会成了一个战场,现在斗争更加激烈而不是更缓和,而且看不出有和平的诚意。

无疑,资本主义的超越——换句话说,由公众支配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不能由它自己解决同工业社会有关的所有的的问题,然而,它能做到消除实现它的决定所有的障碍中最大的一些,至少是创建一个建立一个理性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基础。

所有合法的代理人都需要设法隐蔽这种资本主义的超越。然而,他们无法隐蔽诺言和实施之间的矛盾。他们无法隐蔽这样的事实,即尽管这些社会很富裕,但它广大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贫困;它们为健康、福利、教育、居住、社会环境提供的总体设施还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他们秘藏的特权和不平等违背了他们被迫颂扬的平均主义思潮;他们“工业关系”的结构仍然是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

系,而他们自夸的政治体制,从真正民主的秩序来看,乃是一种腐败和残破的体制。

意识到这种差异决不会自动导致抵制产生它们的社会制度;即使导致这种结果,也还时时会赞成完全是“功能性的”因而会使自己失败的假的替代物。事实上,经验已足以表明,一种具有深刻病态的意识转变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变革的愿望,是一个痛苦的、复杂的、矛盾的“分子”过程,它完全可以大大地被一种在前面几章业已讨论过的那种无休止的变化因素而阻碍、偏转和扭曲。

然而,一种深刻的病态,一种到处皆是个人和集体都无所作为的意识渗透了并逐渐腐蚀着每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潮。尽管所有关于整合、加以资产阶级化等等一类的议论之声从未像现在这样大,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多的人民已经更加明了变革和改革的必要。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众多的男子和妇女尽管决非为革命的意向所驱使,却已经更加坚定地要保卫和提高他们的利益和希望。他们要求的直接对象可能是雇主、学校当局或政党。但是,正如在这一研究刚开始时所提及的,这是一个其人际关系持续冲突的国家,他们日渐把他们的压力对准国家,他们正是希望通过国家来实现他们的期望。 270

面对这种压力并意识到它所造成的普遍的不安,掌权者在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第一,宣布他们自己愿意实行变革。不妨这样说,正统的政治家从来没有如此慷慨地使用诸如改革、更新,甚至革命这类词藻。然而今天没有什么政治家会是简单的“保守主义者”。我们在今天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都是热心的社会改革派。现在已成为政治时尚的改革言辞中有许多无疑是虚伪的,但其中有一些并非如此。描写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对于贫穷、贫民窟、失业、教育不足、缺乏福利设施、社会沮丧,以及其他许多折磨社会的弊病漠不关心,却是轻描淡写的。这种人乃是采取

一种不成熟的凭感情用事对魔鬼的看法,而把真正的问题掩饰起来。

问题不在于掌权者的愿望和意向,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带引号或不带引号的改革者都是罪犯,并常常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自愿的罪犯,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把他们的改革宣言变成真正算数的口头许诺。

在论及发展中国家时也时常会提到这一点,例如像拉丁美洲国家,即使他们真正得到他们至今没有得到的无私的援助,这种援助也必然会被支配他们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的结构弄得全无成效,而那些支援他们的人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它变成禁猎地。271 这一点在考察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实施的具有改革意图的行动时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改革行动不得不在出现这种情况的经济制度所创造的结构之中,这些常被描述为“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国家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更准确地说,它们是财产权和不平等的经济势力施加的限制,而国家乐于接受并捍卫它。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当然是可能的。但是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况,当群众压力异常之大时,它便成为阻力、不相协调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并消除首先要求变革的压力。即使这种改革至少有助于缓和某些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机能失调”,而且正如这里已经重申的,这种缓和实际上不过是保卫社会秩序职能这种国家最重要的属性中本质的和辩证的部分。然而,改革总是而且必然离它所宣布持有的目标相差甚远:改革运动要到达的是“新的领域”,创造“伟大的社会”,消灭贫困,取消阶级斗争,保证对所有人的正义,等等,等等——改革因举步维艰而常常停顿,国家处于反复出现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国家随后便作出了第二种选择,即镇压;或者说改革与镇压同时并举。这里不存在二者择一,而是互补关

系。然而,由于改革表明它本身无力制服压力和抗议,于是便强调转向压制、高压、警察力量、法律和秩序、反颠覆斗争等。由于他们面临难以对付的问题,那些操纵着政权杠杆的人发现,越来越需要浸蚀民众压力可以藉以实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些弱点。代议制机构的权力必须进一步削弱,并且行政权必将更有效地使其孤立起来。工会的独立性必将被削弱,而工会的权利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必将被新的而且也是更加严厉的禁令所折服。国家必将用更广泛更有效的镇压手段武装自己,寻求更加严厉地限制“合法的”272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活动的领域,使那些企图越过它的人感到恐惧。

这一进程具有日渐增强的趋势。因为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抑制它达到这一目的。与此相反,国家越是试图镇压,激起的反对就越大,而它激起的反抗越烈,它祈求的力量就越大。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民主”便转变为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

无须想像这种转变具有的戏剧性特点,或者说引起制度上激烈的变革。它的进程和结果都无须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它同后者的特殊形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耻辱始终附在他们身上,法西斯主义始终没有停止引起厌恶。事实上,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具有一种危险的将它与它的不那么极端的替换物相混淆的倾向,这种替换物不要求全部撤消所有的民主制度,全部颠覆所有的自由,当然也不放弃一种民主的辞藻。使人们极易接受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的”保守的独裁主义,它可以因为仅仅不是“法西斯主义”而被称为“民主主义”,而它的确立可以出于“民主”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受到辩护。所有这些并不是走向不确定的未来的一种遥远的计划;它描绘了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进程,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似乎不是要被取消,而是在得到强调。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可能是一

种神话；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逐渐转变为多少具有公开的独裁主义的形式，则不是神话。

这种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见解，看来没有把左翼即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的力量以及在那些社会中他们的“抵销”力量估计在内。不幸的是，这些力量目前所处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危机中，这就为这种演进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历史地看，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是扩大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特征的主要推动力；而也正是他们成为反对直接针对他们的侵害文明和政治自由的最强大的保卫者，并尽其所能扮演着反压迫的代理人角色。但是，他们扮演的这个角色连续不断地受到资本主义结构中社会民主党领袖表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整合作用极其消极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或者说社会民主党领袖，长期以来便不再向除了他们极易被欺骗的追随者（在他们的敌手中是颇愚蠢的）外任何人提出建议，说他们关心任何一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措施。在另一方面，他们和美国民主党内与他们极相似的那部分人，一直在宣称，他们献身于改革和激进的变革，并将此作为他们与他们保守主义对手的主要不同之处。

但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特别清晰地说明了改革的局限性。他们也曾在他们的追随者和许多其他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人士中唤起极大的希望，但他们执政时工作的压抑感以及致使他们服从这种压抑的意识形态的倾向，给他们履行其诺言只留下很小的余地。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另一半是他们面对的是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以及他们通过改革无法克服的压力，他们只得使自己成为强化国家的首倡者。像他们的保守党对手一样，他们也寻求摧毁工人阶级自卫组织的力量，例如，像英国工党政府那样，通过对工会权利的立法约束，或者如同“大联合”时期德国社

会民主党大臣那样赞成和支持发布主要针对左翼强有力的反对的紧急法律。无论他们是否得到机会,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自己始终努力地投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但是这种行政工作越来越要求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他们的领袖已经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274

由于使自己转变为现存秩序的支柱,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起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在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和其他人士中,特别是在可能成为其支持者的年青一代中,起了一种反动作用,雷蒙德·威廉斯后来以工党4年执政的经验为根据写道:“一种定义已经失败,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定义和新的东西。”^①就这种寄希望于驱散长期恪守的谬想,并推动对真正的可采用的方法进行探讨,存在着比希望更多的东西,纵然这种探讨带有无数的偏向和离题之错误,似乎极其缓慢和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极其常见的现象是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和错误也造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明显疏远左翼的运动,并且增加了人们对向右翼谄媚的责难。不仅失败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此负有责任,而且所有的左翼力量对此也负有责任。正是因为它的极端的保守主义被精心地隐匿在一种民族复兴和社会重建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之下,不论恰当与否,美其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借助于任何可资利用的偏见,使得所谓的人间救世主下凡的道路变得平坦。

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替代物,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为某种深刻的弱点所折磨而其中最致命的是其内部缺乏真正民主的共产党,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失败恐怕就不会使人感到前景暗淡。

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必须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具有“领导权”的政党,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政党必须能够

^① R. 威廉斯:《五一宣言》,1968年版,第14页。

275 “创建一个不只是在经济和政治目标上而且在思想和道德上统一的联盟,不仅有能力处理团结问题,而且能处理‘具有普遍性’的一切问题”,并且“具体地同等地对待从属群体的一般利益”。^①但是只有在自由讨论,内部民主、具有灵活性和反应迅速的结构条件下,才可能创建这样一个党。

这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避免意识形态的贫血症和政治上的硬化症的一种手段,它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对这个政党寻求建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抗议。这是在它自身目前的结构中以它自己目前的行动方式、态度和习惯向社会预示它的热望。因为只有这样做它才能使它需要其支持的大多数居民确信,它的意图不只是用另一种可能是更坏的制度取代这种统治制度。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对明天的渴望,社会民主主义今天在国内的作用也不过如此了。纯粹宣传将来的意向是不够的。

无论现存的共产党能否把它自己转变为一个适应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代理人,还只是一种猜测。然而即使这个答案已经被确认,也只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才可能希望这种转变有助于解决左翼的问题。在所有其他地方,无论这些政党准备做什么,都必然被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地作第二等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明显要求革命变革的大批党员和支持者的先锋党,对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团体来说情况就更加明显了。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一个左翼组织能够取得一个能够真正把社会主义问题提到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程上的地位。当然,这是不可能通过自发的突发行动来取得。法国1968年5月至6月发生的事件充分表明,在一种看来

^① 转引自迈林顿:《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和实践》,载《社会主义记事》,1968年版,第154页。同时见A.高兹:《改革和革命》,前引书,第131页以下。

是平静的政治表象下面慢慢地沸腾着对根本性变革的渴望,用雷吉斯·德布雷的话来说,学生运动的“小发动机”将逐渐驱动工人阶级的“大发动机”。但是,这些事件同样充分表明,在缺少适当的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它可能酿成骚动和压力而不可能发生革命。 276

在目前和即将到来的一个长时期,缺少这样一个与现存的深刻不安和不满能与之相抗衡的合适的政治替代者,以使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走向独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倾向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越来越明白,即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和保卫他们的掌权人,正面对着一个正在夺取政权途中的革命运动。面对着这种威胁。关于左翼常常是这样说的,这些利益集团对其回答是选择专制独裁主义,接受或支持摧毁宪政以拯救自己免遭革命。

这是一种可能实施的方案。但是,深思熟虑告诉我们,不论是统治阶级、经济精英或是保守势力一般说来可能都这样希望,但在这样一个时刻作出这种反应似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地位之时,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超出工人阶级范围的巨大的群众运动,对于保守主义力量来说,要想通过选择独裁主义取得成功已为时太晚,当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被分裂,对自己及自己的意图产生怀疑之时,实现这种选择便具有可能性。历史先例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当实际生活中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远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秩序真正威胁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事实上都严重地分裂了,并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这就证实了马克思在论述法国波拿巴王朝时所说的话,他说道,它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

惟一可能的统治形式”。^①

277 早晚有一天，排除了前进道路上所有巨大障碍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其他同盟者将获得这种权能。当他们能这样做时，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需要建立作为旧的残余的全权的国家。相反，它们的“民族统治的权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给他们带来一种真正民主的社会秩序，一个由男人和女人自己管理的真正自由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②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页。——译者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译者